

HUANG HUA GANG

2003 年 第 3 期

總第 6 期

黃 花 崗

文 歷
化 史

季
刊

• 中華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

• 大陸青年學者著 三民主義政治五原則

• 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 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 南京保衛戰

• 大陸學者對國民黨抗戰功績的頌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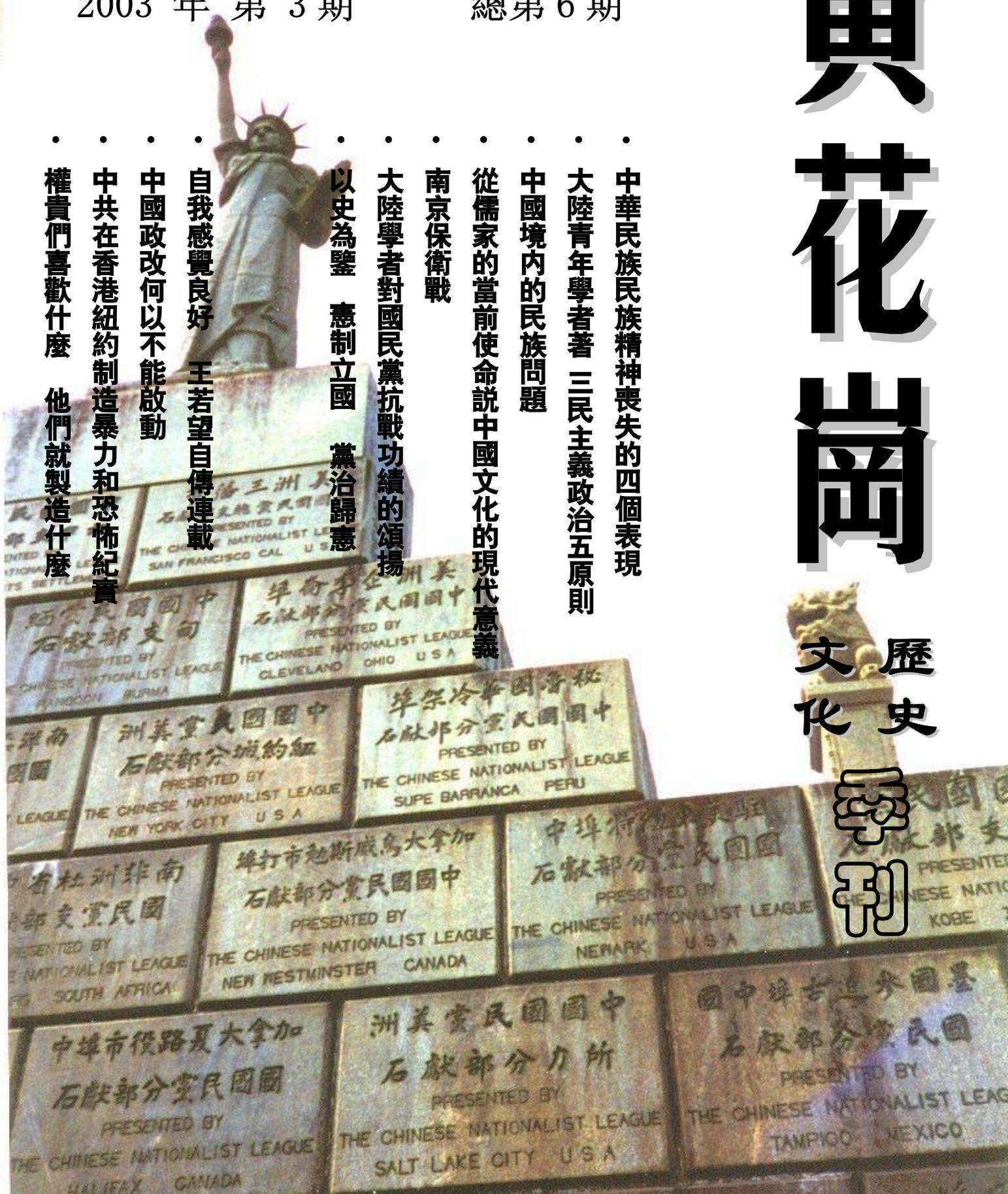
• 以史為鑒 憲制立國 黨治歸憲

• 自我感覺良好 王若望自傳連載

• 中國政改何以不能啟動

• 中共在香港紐約制造暴力和恐怖紀實

• 權貴們喜歡什麼 他們就製造什麼





魏京生在華盛頓的六四紀念會上



香港民主黨領袖李柱明在華府



溫哥華支聯會紀念六四十四週年



洛杉磯反共民主人士馮國鏘等聲援王炳章博士越南芒街蒙難一週年



王若望生前與王炳章在華府合影

黃花崗

歷史文化季刊

二零零三年 第三期 (總第6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05

Published

July 27, 2003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hg-magazine.org>

eMail: h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馬佩華、周美娟、姚鑫華、路人
董事會幹事 孫雲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易丹軒

主編 辛灝年

主編助理 李剛博士

特邀編審 吳學燦、李勇、王友琴教授

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

編委會名譽編委 王德耀、成其林、黃玉振、李勇、向厚祿
黃其柱、黃偉悌、麥青芬、趙增義、孫國欽、韋峰、于京山
張學海、陳慶國

編委： 丁抒 王友琴 尚戎 劉國凱 丁毅 楊海平
邢錚 魏碑 高陽 余建文 丁南 明辛 華
陳維健 嚴青 陸中原 周健 宮晨 陳一如 楊柳春
林牧晨 王平 宋子明 吳學燦 翟心海 孫雲 林才君
辛政 高優鏗 夏雲 葉寧 賴安志 魏玲 應易中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黃花崗雜誌 第6期 (增刊) 2003年 第3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July 27, 2003

新聞發佈會

去世的老人與不死的精神—清水君報導黃花崗雜誌
良心新聞一則

清水君 17
劉意 17

黃花崗雜誌社將採行全體義務制

本刊記者 18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傑出民主人士獎金”

馬有志 19

新聞追蹤

中共在香港紐約製造暴力和恐怖記實

李勇 19

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頒獎大典記實

李勇 25

臺北三民主義大同盟今昔—兼為大陸反共人士辯誣

李勇 27

秉承春秋大義的名報人—李勇

黃玉振 30

驅除馬列 (講演稿連載)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

辛灝年 4

《驅除馬列》一文讀後

趙增義 15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三民主義研究

三民主義《政治五原則》

段正坤 35

中華民國研究

以史為鑑 憲制立國 黨治歸憲

蔣學鳴 33

孫中山研究

孫中山的超前思維、理性精神和經濟思想

曉黑 43

緬懷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陵寢巡思

董欣賓 46

南京保衛戰

石懷瑜 47

國民黨抗戰研究

大陸學者對國民黨抗戰功績的頌揚

宋復中 63

花園口掘堤真相解密(下期預告)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劉國凱 71

張育明教授《血淚年華》一書簡介

張育明 67

共產黨炸水庫淹農村—千萬人喪命

張育明 69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牟宗三 84

論《禮》九章(下期預告)

謝選駿

中國人不知中華文化真可悲

高思維 97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馬列中國的知識份子
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
跨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

自我感覺良好—《王若望自轉》第三部連載

王若望 99

我的抗日從軍行(下篇)

孫國棟 112

陌生的父親

林牧晨 124

步韻和黃花崗詩

林詠泉 126

台港海外的知識分子

貳臣傳—香港名報人傳(下期預告)

段干木

理論探討 專欄**革命與改良
特稿**

中國政改何以不能啓動

張三一言 129

改良與革命—中國工黨的選擇

方圓 127

三個代表就是三個控制

朱執中 132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中俄關係記實**

黃沙俄匪中華血(下期預告)

蘇軍佔領東北以後(下期預告)

時代與文學 專欄**文藝評論
作品**

統治者需要什麼，他們就製造什麼...

梁衛星 136

當代老嫗歌(本期封底配詩)

阿冰 66

世界華人 專欄**華僑人物**

《周祥自傳》之三(下期預告)

周祥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中共對大陸基督教信仰者的迫害記實(下期預告)

泰國 李志剛

大陸《民間故事》連載

申雪 70

中國新政經辭典(續)

申雪 139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本刊董事會第六次財務公告

32

本刊榮譽訂戶

15

黃花崗雜誌訂單

144

為本刊封面敬告讀者

本刊 111

敬啓者

本刊 16

黃花崗雜誌訂單 《誰是新中國》訂單 編後致歉

本刊 144

本期義務編稿：吳學燦 辛灝年 本期義務校對：應易中 李勇 辛灝年 本期義務排版：李剛 辛灝年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

編輯前言：

由於講演稿“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明確地指證了“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樣一個“要害”，故該講演稿始於本刊第五期發表後，反應頗為強烈。許多作者來信來電稱之謂“擲地有聲，無可辯駁”。

本期發表的“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個表現”一文，是“驅”稿的第二部份。該文指證了，在馬列對中華的五大危害之中，其最至最烈的危害，就是造成了當代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喪失。而我們民族精神喪失的四大表現，就是：民族意識的喪失、民族自尊的喪盡、民族自信的破滅和民族意志的沉淪。但因為篇幅關係，本期祇刊出“三個表現”，“第四個表現——民族意志的沉淪”，將留待下期與“驅除馬列的民族革命就是思想革命”一文同時刊出。

（銜上期）

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遭遇的這個“萬古一劫”，究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為可怕的危害呢？因為，我們也祇有對馬列為中華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確深刻的認識，才能使當代中國曾為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對**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產生最為痛切的認同，更因為“冤有頭、債有主”，才能對馬列真正地同仇敵愾起來，才能夠凝聚起“非驅除它不可”的民族決心和民族氣概。

如果對我在前面所講的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那末，這第一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對辛亥革命的真正反動和全面反動，造成了已經在“走向共和”的真正新中國——中華民國，遭遇了持久的、全方位的專制復辟和封建復辟，甚至遭遇的是——對中世紀歐洲宗教專制極權統治的全面復辟和“創造性復辟”——對此，我還將要在第二講中作詳細的說明。

這第二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文化之邦，既被殘酷地阻斷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傳承，又被強行地阻隔在精神和物質早已飛躍進步的世界之外。這一部份的內容，除掉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外，我還要在下面，就何謂中華文化，何謂馬列文化；什麼是被馬列圍剿並坑滅了的中華優秀文化，什麼才是被馬列“創造性”發展到了極端的中華落後文化，作出更詳細的講述。

這第三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造成了晚清腐爛局面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造成了革命的極可能爆發，和惡性造反局面的完全可能出現。這一部份內容，我將在第三講中進行詳細的討論。

這第四個最可怕的危害，就是中共一手造成了現代中國長期分裂的痛苦現狀，而當代中共對少數民族的強暴統治、兩手統治、和當代中國社會已經處於革命前夜的實際狀況，又為中國更大的分裂，製造了可怕的“機遇”和“前景”。對此，我雖然在《誰是新

失的四個表現

的民族精神 (之二)

辛灝年

驅除馬列 — 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還我民國 — 凝聚中華中國的國家認同
實行民權 — 確認中華立國的民主方向
愛我中華 — 追求民主中國的繁榮統一

中國》一書中已經作出了明確的闡述，但我還將在第四講中，加以詳細的補充說明。

我想，這第五個最爲可怕的危害，就是在馬列對我們中華民族、中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所有僭奪、篡奪和迫害中，所造成的，最集中、也是最具深度的禍害，也是我今天要特別強調的和詳加說明的，就是——造成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可怕喪失。

因爲這個可怕的喪失，實在又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休戚相關。

而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

第一個表現，就是民族意識的喪失

首先，如我前面所說，由於馬列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族權，特別是民族傳承的權力，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幾代中國人，也就對自己到底是“何族”之人，

豈但是變得不清不楚起來，而且由於“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和事必奉馬列”，而使得舉國上下都變成了馬列黨族，而非中華民族了！

比如，過去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總喜歡說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康熙乾隆，直到孫中山和蔣介石，但自從中國出了一個馬列子孫毛澤東，自吹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後，我們中國人，在講到自己的族譜之時，就非但不再提自己的老祖宗，竟反而口口聲聲地說起什麼“馬恩列斯毛”、甚至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來了，並且，歲歲年年——牆上掛的，書中印的，嘴裡”喊的，便都是那幾個“碧眼黃鬚的馬恩列斯”，而且，豈但是不能“不掛、不印，不喊”，而且，稍有不恭，則不是批判鬥爭，就是勞改槍斃。絲毫含糊不得。更有甚者，自從中國的馬列子孫毛澤東說了一句他“死了便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於是乎，幾代中國人個個都說起“死了要去向馬克思報到”的話

來。從此之後，中國人便不再有人說要向“孔子、孟子、秦始皇、漢武帝，特別是孫中山先生去報到了”！也就是說，那個不要祖國、祖國也不要他的馬克思，雖然連死了，也不能“尸歸故土”，但卻成了我泱泱五千年華夏民族的祖宗，並且我們人人死了，都要向他去報到！這些話，認真說起來，既會令人吃驚，也會令人發笑。然而，一驚一笑之餘，當真就不能痛感到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喪失之哀嗎？

因為——中華民族儼然成了馬列一黨之族，中華兒女竟然祇能去做馬列一黨之族在中國的傳宗接代之輩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到了八九年“六四”中共大屠殺前後，才會不論是在反對官倒、腐敗的遊行隊伍裡，还是在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憤怒洪流中，伴隨着人們撕肝裂肺呼喊的，竟然是共產黨專門用來號召共產革命和消滅中華民族、顛覆中華中國的“國際歌”。那一句“英特勒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嘶叫，實在將這一場中國人民反對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民主運動，變得不倫不類。

如今，由於中共的胡總書記又在會見古巴的馬列子孫卡斯特羅之時，說他一定會“將社會主義堅持到底”，所以，今天的中國馬列黨族，還是會“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的繼續傳承下去。僅此可見，今日華夏，究竟是中華後裔，還是馬列遺後，難道還有什麼看不明白的嗎？

歷史和現實都會痛切地告訴過我們：元人滅宋，便不給漢人知道唐、宋；清人滅明，便不許漢人知道宋、明；五十年來，祇因馬列及其子孫當道，我們豈但已經不知中華民族為何族，甚至連自己的祖宗是誰，祖宗的牌位應該放在哪裡，祖宗的思想、文化和傳統是什麼，我們不僅不知道，而且連想都不會去想一想了！如此看來，我們的中華民族是不是已經像是滅亡了一樣呢？

然而，一九八九年之後，在中共的陰陽兩謀之下，中共在大陸的御用文人，混跡海外的中共民運特務，“中共不要、卻偏要中共”的極少數“中共民運人士”，和少數豈止是不解歷史、甚至是缺少起碼中國歷史文化教養的狂妄之徒，在他們明地、暗地制造的一波又一波的“倒孫”惡浪中，連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曾去朝拜南京明孝陵的事，也成了他

們攻擊的藉口。我們姑且不說孫先生此舉確有告知祖宗“漢民族業已光復”的意義，姑且不說孫先生緊接著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大綱，以期能夠建立一個對外對內都能夠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單就孫先生祭拜的祖宗，既不是美利堅的華盛頓，也不是不列顛的維多利亞女皇，當然更不可能是馬克思、恩格斯或新沙皇俄國的首任教主列寧，而祇是我們中華民族地地道道的祖先——這樣一個事實而言，這個在少年時代就曾漂洋過海去西方求學的民主革命家，他起碼還不是一個“背祖忘宗之人”吧！他起碼還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後代子孫吧！然而，當中共已經有能力奪取整個中國大陸的江山，已經有能力建政、建國，已經有能力將國號從它的“工人階級祖國”——蘇維埃俄國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成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衛星國”的統一國號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劉少奇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建國之後，急急忙忙趕著要去恭恭敬敬朝拜的又是誰呢？當然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不是孫中山先生，乃是那個與我中華有著世仇大恨的俄國兩代新沙皇、馬列黨族的兩代新族主和馬列邪教的兩代新教主——死了的列寧和活著的斯大林！

應該說，我們幾代生活在中共洋教政權和邪教政權殘暴統治下的中國人，由於無可奈何的膽怯、麻木和無知，已經使我們連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都不自知。但是，一個真實、有趣而又令人為之一震的故事，卻使得本講演人曾為之一驚，甚至成了我這部講稿的真正由來。那就是僑居紐約的一位華僑、也是一位名報人的故事。幾年前，當他隨團訪問大陸、在中共浙江省領導人宴請他們時，祇因一位中共書記在向他敬酒時曾對他說，“你就是李勇先生，久仰久仰，我讀過你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不過，有些反華的文章還是不要再寫為好嘛，我們都是中華兒女嘛……”

誰知道這位李先生倒真是一個橫豎不怕、敢愛敢恨的中華兒女。當時，他竟然攬下酒杯，對著這位中共的書記大聲喝道：“誰反華了？你才反華！告訴你，我才是中華兒女，你才是馬列子孫！反華的是你，不是我！是你們佔了我們的中國，殺了我們的父母兄弟，我們這些真正的炎黃子孫才被迫逃到了海外……”言罷，差一點當眾便把馬列子孫用來“統

戰”他這位海外著名中華兒女的酒桌掀了一個底朝天……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的故事。李先生不過是道出了海外千千萬萬真正華僑、而非“共僑”的心聲。這個故事，對於五十餘年來在馬列統治下的中華後人來說，是不是有點震聾發聵呢？當代中華民族意識的喪失，是不是造成我們民族精神喪失的第一個原由呢？

其次，我要說的是，正是我們喪失了起碼的民族意識，所以，我們才會在對國家的認同上，發生一個巨大的“誤區”。這個誤區，說白了，就是“中華不知亡國恨，歲歲猶頌馬列恩”。

因為，就像幾代中國人，曾經“錯把復辟當革命”一樣，同樣是這幾代中國人，祇因為民族意識的喪失，外來馬列邪教的強行教化，中共的謊言建國和殘暴治國，才終於造成了我們對真正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極度仇視，以至我們個個都把這個中華民國罵成了“舊中國”，罵成了“壞中國”，將這個中華民族的中國看成了自己的“敵國”，還要跟著共產黨高唱什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卻忘記了：“有了共產黨，才沒有新中國”，和“有了共產黨，才沒有了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中華民國”這樣一個真理！甚至還要跟著共產黨，對馬列和馬列的子孫們山呼萬歲，卻將自己的真正敵國，一個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之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以馬恩列斯毛鄧江為其族譜的假“共和國”、假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直到被那個洋教和邪教在中國的子孫們糟蹋得夠了，仍然不能自省！甚至能比“五胡亂華”歲月那些“漢兒傍得胡兒睡，便以胡兒傲漢兒”的漢奸們猶過之而無不及，竟然是“漢兒學得馬教邪，便依馬教殺漢兒”了！

雖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是因為反思的必然，二是因為偶然的機緣，使得中國大陸知識界終於開始了對中華民國歷史和歷程的反思，而且成果昭彰，對人民的歷史性覺醒、即革命性覺醒，功莫大焉。但是，在海外，由於一些所謂的人士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民對歷史的痛苦反思毫不知情，也不想知情；由於一些人本來就是馬列的直系子孫或“另冊子孫”，屬於馬列和共產黨不要的，而非不要馬列和共產黨的；更由於一些號稱搞民主的人，對自己故國的

現代歷史非但絲毫不知，而且腦袋裡面裝滿了的，又全是馬列的邪教思想和中共藉以編造歷史的謊言和假話，所以，雖然歷經了將近二十年反思現代史的大陸人民，正在對自己被馬列欺騙和被中共摧殘的慘痛歷史，痛定思痛，正在思考著如何才能“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匡正歷史，重建民國”，但是，在海外的某些人士們，雖然仍在領著那個“不認、不要中國的中華民國”的津貼，卻依然要將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歷史之一部份、並且是最為輝煌痛苦之一部份的中華民國及其歷史，視為寇仇。這種令人痛心的政治現象，說到底，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所招致。而也正是民族意識的可悲喪失，才為這些反民族的所謂人士們，帶來了民主追求的鉅大混亂，和民主道路的鉅大偏差，從而也就帶來了他們必然的失敗現狀。

再就是好幾代中國人，既然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高喊萬歲的“新中國”，非但不是中華民族的中國，而且是馬列子孫的中國；不知道中共強迫他們否定、批判、打倒的“舊中國”——中華民國，才是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自己的真正新中國——所以，我們才會認賊作父，認馬列為祖宗，認中國的馬列子孫——中共，為當代中國的“萬歲萬萬歲”，直至造成了五十年來，我們中國人“不分敵我”和“難分敵我”這一令人痛心狀態的出現。同時也造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祇因為他們受夠了中共專制統治的欺辱和鎮壓，才會忘記了他們和漢族人民乃有著一個共同的敵人——馬列這樣一個應該“同仇共憤”的事實。某些少數民族，非但沒有意識到自己和漢族人民一樣，同樣是遭遇了馬列的殘酷文化侵略和馬列子孫的種種殘酷迫害，卻將漢族、甚至是中國，當成了自己的民族之敵，雖然富有著鮮明的自我民族意識，卻同樣是喪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意識**，更不知道這一整體民族意識的喪失，對於他們自己和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意義究竟有多大。從而不僅造成了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中國的仇視，直至造成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反叛——中國和中華民族將要遭遇分裂的危險，亦因此而橫亘在我們的前面。

至於當代臺灣獨立的傾向，其根本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大陸政權，曾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所顛覆；其當前的原因，雖然存在著不堪中共要“促成專制一統”這樣一個緣由；其性質，卻是

政治分裂，而非民族分裂。它不僅為中共所一手製造，而且和那個與中共有著密切歷史關係的惡性台獨勢力密不可分。對此，我將在第四講中予以詳細地講述。

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已经丧失的

第二个表现，就是民族自尊的丧盡

顯而易見的是，民族意識的喪失，自然就會帶來民族自尊的喪失，甚至是民族自尊的喪盡。

而**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一個特徵**，也是民族自尊喪失的最主要表現，就是由於中共北京洋教政權，不僅是一家外來的邪教政權，而且是一家重建了宗教專制制度、復辟了君主專制統治、甚至是封建專制統治的罪惡政權。它在宗教上的“不二馬門”，和它在思想上的“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特別是它既要全面批判摧毀中華民族的優秀民族文化，又要根絕一切近代西方進步文明文化的種種倒行逆施，**便實在是將我們這幾代中國人，變成了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幾代馬列之奴**。也就是說，由於馬列的思想和文化是伴隨著屠刀來進行強制性教化的，並且早已有無數的中華兒女，為了捍衛中華優秀文化和世界進步文化，而成了馬列的刀下之魂，就是我所說過的，中共是“以奪命來奪志”。所以，雖然幾代中國人傳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本能猶在，但是，在已經長達半個世紀的痛苦歲月裡，特別是在毛共殘酷統治的時代，我們這幾代中國人，也就真的是在思想文化上成了馬家的奴才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祇要翻開任何一本當代中國的文史哲著作，甚至是自然科學著作的序言或前言，我們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弄個一清二白。何況，既然身已為奴，哪裡還有什麼自尊可言？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二個特徵，就是五十年來，在中共制造的一次又一次腥風血雨之後，即便尚有少數心繫中華的兒孫們，並不害怕中共“以奪命來奪志”，但在馬列的強勢文化侵略之下，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成了馬列主義者，有的甚至成了“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們才會帶著一個好人的本能

的正義感，在馬列精神鴉片的作用下，既能夠積極地批判中華優秀文化，明確地否定“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又能夠積極參與中共的批判、鬥爭、鎮壓、造反、抄家、破四舊、批林批孔之種種“革命行動”。但是，由於正派的做人本能、傳統的文化本能和對進步追求的為人本能，一旦使他們對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心存疑惑，甚至是心存反感，直至大膽妄為地也要造中共的反、要向中共這個極端殘暴的專制統治集團進行挑戰之時，由於他們早已失去了對馬列罪惡實行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能力，也就是手中缺少批判否定馬列之堅實有力的思想武器，心中缺少應有的傳統文化根基和進步文明素養，他們便祇能夠在馬列邪教的“十八般武器”中，去尋找敵人的槍炮來與自己的敵人作戰。然而，這個敵人卻是在理論上和行為上擁有著“全副馬列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馬列邪教的本質早已決定了對該邪教的解釋權力，祇有掌權的這一家才能擁有，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擁有。所以，挑戰者自然不是敵手，甚至祇能敗下陣來。一九四九年以來，一些要用所謂的“真正馬列”，來反毛、反林、反江青四人幫的英雄們，他們的“成仁取義”，雖然具有極為動人的悲劇美，但是祇需要掌權的馬列子孫們定他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罪，他們就祇能夠痛苦地、甚至是英勇地在馬列子孫的槍聲中，去結束他們那“既作為馬列子孫、又作為反抗英雄”悲劇人生了。然而，這正是失去了民族自尊、因而也失去了民族思想武器和世界文明武裝的英雄們的必然下場。這與歐洲中世紀那些既要反對教權統治、又要維護共同宗教教義的亡命教士們，又有什麼兩樣呢？

至於當今中國極少數心心念念仍然要追求那個“真正馬列天堂”的人士們，他們作為一家外來宗教——實際是邪教的篤信者，其執著的追求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黑髮黃皮”的中華後人，卻敢於置這一家外來邪教對自己民族制造的滔天罪行而不顧，置這一家外來邪教對自己國家製造的淋漓鮮血而不睬，我們怕也祇能夠送他一個“馬列子孫”的雅號，並為他敢於“魂絕中華”而傷心難已了！

民族自尊喪失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時期，一批既心存改革的理想、又心繫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精英知識份子們，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曾被迫做過馬列之奴；在短暫的思想解放的號角聲中，他們又曾懷抱過追求真正思想解放的理想。但祇因中共祇號召思想解放，卻不允許明辨是非，目的祇是爲了拯救和鞏固他們的獨裁權力；祇因爲伴隨著中共所謂思想解放之誘導的，竟然是被人民立即抓住了歷史契機，便要實現解放自身的真正歷史要求——即要從馬列邪教的殘酷禁錮中解放出去，說白了，就是要從思想解放走向民族、民權和民生的真正解放和徹底解放。於是，那一批在八十年代因身懷改革的理想而走進了中共、或者是已經走上了中共紅地毯的所謂知識精英們，也就帶著他們被誘“偏”的理想，和他們身上還殘存著的馬列思想殘餘，及其對馬列、甚至是共產黨的“感情”殘餘，一邊雖要充當中共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一邊卻又立即做起了阻擋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攔路石。所以，他們才會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就是“幫助共產黨改革”的道路。他們甚至陶然自得地認爲，這“既符合中共的口味，又符合人民的利益”。所謂“魚與熊掌”，他們皆能夠“兼得”。

而也正是這條道路，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迅速墮落成了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層層掌權人和腐敗者，和中共僅僅是要推行專制改良的思想文化先鋒；卻也使得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成了“不敢正面進取、祇敢繞道而行”的“偏鋒”。這後一批人，雖有變革之心，卻無變革之膽。他們不敢批判和否定馬列邪教，卻在共產黨已經將我們的祖宗和祖宗的文化，批判、推倒、掃光、殺盡幾乎數十年之後，又繼承了“黨的事業”和“馬家招式”，專門對我們的中華民族和我們的民族文化，進行了又一次的徹底批判，甚至是全面栽贓，直至乾脆將馬列的一切罪惡、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都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劣根性所決定，從而將我們的全部民族性和所有民族文化都列在必須重新打倒、掃蕩之列。毛澤東時代那種「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的種種肉麻景象，和「罵盡中華祖宗、燒盡中華四舊」之種種欺祖滅宗的行爲，我們就不用去說它了。但是，今天，我們祇需再讀一讀八十年代以來某

些「思想文化精英」一心要「歸向鳳池誇」的煌煌大作，就祇能讓人感到作爲一個中華兒女和作爲一個中國人的羞恥。因爲，他們非但不將造成當代中國落後和愚昧的痛苦現實，歸咎於馬列及其子孫的種種倒行逆施，歸咎於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邪教的劣根性，卻始終在洋洋灑灑地罵著中國、罵著祖宗、罵著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直至罵盡了中華的天、地、山川、河流、歷史和人民，卻絕不去罵那個毀壞了中華大好河山、踐踏了中華優秀文化、毒害了中華純樸民性的馬列，及其在中國的殘暴子孫們。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爲中共批准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也就是要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混名混利”的某些“思想文化精英們”，就是這樣地在思想文化上，將自己應有的民族自尊毀滅殆盡，更積極地使用對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栽贓和陷害，一方面爲中共提供了逃脫種種罪行的當然藉口，一方面則在思想解放的歧途上，對新一代中華兒女進行了錯誤、甚至是罪惡的“啟蒙”。其流風遺毒，伴隨著中共對他們的“既捧又打、先捧後打，和變著法兒又捧又打又勾”，而效應廣被。

而也正是他們，才將“辱罵中華民族劣根性和中華文化劣根性”的“族罵和國罵”，帶到了海外，帶到了海外民主運動的陣營之中，甚至造成了一個“隱性中共民運陣營”的出現，直至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成爲一九八九之後海外民運的“主流”。於是，一場批判否定中華民族和我們民族文化的共產文化改良運動，竟然就在思想無限自由的海外世界，“舊帽翻新”式地變成了“反對革命、乞求改良，鼓吹分裂、漫罵統一”的“嶄新”思想文化武器，從而在中國人民再一次追求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萬難道路上，自亂了神志，自毀了陣腳，增強了敵營，銳減了戰友，直至在海外造成了一派否定中華民族、卻不否定共產黨，否定民族文化、卻不否定馬列邪教，敢於大罵中華奴性、卻不敢批評馬列奴才的“奇異民主運動景象”。這種種景象，自然祇能使我們每一個真正愛中華、愛中國、愛我們優秀中華文化的華人，竟祇能“他哀而復自哀”而已了……

對此，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雖然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種助共改良、而不是爲

民變革的思想和文化，說是爲了“保共改良”，也絲毫不能爲過，但卻將中華民族民族自尊的長期喪失，推向了徹底喪盡的可怕境地……。

至於今天那一塊已經掛遍了中華大地的“無字招牌”，那讀來讀去便都是“洋人與狗，可以入內”的八個大字，又該將我們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糟蹋到了何等令人心酸的境地。就不說那些拼命要做“世界公民”，卻絕不要做“中國國民”的某些“愛國”者們——他們今天正在和馬列邪教政權勾勾搭搭、眉來眼去的“動人情景”了。而那些常常要被某些人掛在嘴巴上的“大中華、大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人的世紀”等等，無非是他們在“心靈空虛時”和“中共需要時”，才會表現出來的一番“虛驕”和“虛假”罷了。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

第三个表现，就是民族信心的破滅

而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中共用“奪命以奪志”為手段，消磨了我們中華兒女理應推翻馬列王朝的血性和志氣。因爲，五十餘年來，中共在使用“奪命以奪志”的決心上，實在是從來也沒有動搖過。雖然時弱時強，但是，任何時期，只要誰敢於真正向它的馬列王朝挑戰，只要誰真正敢於向他們這些馬列子孫挑戰，甚至只要被它懷疑是在向它挑戰，哪怕是在向它表忠心、卻又被它懷疑，它都會使出“奪命以奪志”的絕招，毫不含糊，也毫不手軟。毛澤東時代的血腥統治就不去說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共在北京屠城和在全國進行殘酷鎮壓的“血染的風采”，就曾又一次地證明了，“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甚至是“不用機關槍掃射、坦克車輾壓無辜學生和民眾，就不是共產黨”這樣一個馬列王朝的鐵血真理。至於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鎮壓和虐人折磨，以及它對法輪功學員已經欠下的成百上千的血債，也無非證明了中共還是中共，和中共爲維護這家外來邪教專制復辟政權，將仍然要對中華兒女施行以奪命來奪志的本相。

然而，正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對中華兒女的長期瘋狂濫殺和長期殘暴鎮壓，和毛澤東之後中共殺人本性雖有收斂，卻無根本改變，才造成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無數中華兒女，因長期面對中共專制殘暴統治的淫威，而喪失了我們民族血統中敢於反抗的血性和志氣。

我在一九八零年曾發表過一篇小說“他就是軟了點兒”（《延河》文學月刊，一九八零年十月號），雖然當時有許多讀者曾誇獎我寫出了當代中國人就是“軟了點兒”的悲慘人生，但是，中共文壇的領導們，也祇是因爲“軟了點兒”，而不得不一邊打壓這篇小說和我那些更“離譜”的創作，一邊又要安慰我、鼓勵我多寫點“社會主義的光明面”；特別是我自己差一點點又因此而“軟了下去”的危險，則使我更深地明白了，“在馬列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人”，之所以都“軟了點兒”的根由何在。

然而，我在這裡猶如骨哽在喉而不得不說的是，如果誰非要將當代中華兒女這種“軟了點兒”的變態、變形人格，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並由我們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那麼，我們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解釋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無數的“陳勝、吳廣現象”了；甚至我們只需將民國時代那些不論是拿槍的，還是拿筆的，他們動輒就敢發動武裝叛亂，天天都敢橫罵、直罵和“曲罵”那個“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歷史事實，拿來作一個簡單的對比，我們同樣就會發現，他們是否也太“硬了點兒”呢？所以，當代中華兒女們的“軟了點兒”，也就實在是由馬列王朝的血腥統治、形形色色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

但是，正是這種“軟了點兒”，和一再地“軟了下去”，才在中共已經長達五十餘年的統治下，使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被消磨得幾乎“蕩然無存”。其後，中共雖在它八十年代的第一度專制改良中，誘惑了、又收買了相當數量早已經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知識份子，欺騙了和誘惑了一些同樣是不得不“軟了點兒”的群眾，卻更在九十年代，如西太后和俄國宰相斯托雷平那樣，在不得不推行第二度專制改良以救命的歲月裡，在一手抓緊政治鎮壓、一手放縱經濟“改革”的年頭，又使用一切向錢看的手段，進一步迅速地腐化了他們自己的層層知識官僚，中國的上層

知識份子，以及相當數量的、特別是為專制權力所壓迫的生意人和普通人。誠如我在前面所說，從而造成了一派**衣食足而禮儀崩**的社會腐爛景象。單就這一景象而言，即便要用中國歷史上因“五胡亂華”所造成的，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腐敗和士人腐化相比，也都是小巫見大巫。然而，正是這種由中共所一手制造的腐爛景象，才又在極大的程度上和相當的範圍內，消泯了我們中華兒女的血性和志氣，特別是消泯了當代“士人”、也就是當代眾多知識份子、主要是上層知識份子的志氣和血性，使得中國人民對於民族解放、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迫切追求，遭遇到了新的痛苦和艱難。

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二個標誌，就是中共以“**奪知來奪志**”，從而造成當代的中華兒女們在重建中華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因為，中共不僅以馬列邪教治國，而且以**流氓暴力**治國，特別是它長期以來以**無知來治國**和以**謊言來治國**的愚民國策，特別是他對中華數千年文明文化的殘暴摧殘和滅絕性摧殘，實已造成了當代中華兒女對自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瞭然無知。

因此，由於不瞭解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究竟文明在何處，才造成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無所由來。由於不瞭解辛亥革命前後近代中國的**真實歷史**、甚至為中共所精心編制的**虛假歷史**深深地欺騙了長達半個世紀，所以，才會不懂得辛亥革命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輝煌意義，更不懂得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在內憂外患之中，曾為捍衛共和、抵禦外侮，而進行過怎樣不屈不撓的殊死奮鬥。而由上述兩種無知所造成的，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無愛、無情、輕蔑、甚至是辱罵，直至毫無信心，豈但早已是另類馬列子孫們的專利，甚至早已經因馬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而使得一些所謂的發憤追求者，也將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當成了自己的“敵國和敵族”了！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某些從大陸逃往海外以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的人士們，他們不論是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際行為上，所已經一再表現出來的，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毫無情意和極端蔑視”；所一再表現出來的，對馬列及其種種邪說異端的“戀情和深情”；所一再表現出來的，仍然要用馬列的思想和

方法來反對中共、追求民主的種種奇形怪象；所一再表現出來的，非民族和非傳統的種種思想行為；所一再表現出來的，**祇知馬列、不知孫文**，甚至是**祇認馬列、不認孫文**之種種繼續要“背祖忘宗”的言行；特別是他們一定要將孫先生直到今天都仍然極富生命力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民主建國思想，說成是“過時了”——這就不僅與二十年代的中共唱出了同一首濫調，而且連今天因窮途末路，竟然也要拿孫文來騙取歷史正統性和歷史合法性的中共都不如了……

就不說海外某些一涉及到孫文和“三民主義”，就反感，就厭煩，就不屑一顧；一提起馬列來，就會宏論不絕、雄辯滔滔的“海外民運奇觀”了。甚至是一些正在尋找希望的勇士們，甚至是少數十分正派的人士們，祇因為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所知甚少，祇因為他們在思想內容、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已經與馬列難分難解，所以，他們才會在缺少民族自信的徬徨心態之中，依然要在馬列或馬教落難子孫們的思想裡面，去尋找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出口、道路和方向……

這些現象，一方面雖然證明馬列主義的幽靈，依然徘徊在數十年來中國人民民主追求的營壘之中，證明少數民主追求人士還沒有從共產黨的思想、感情和立場的羅網裡面掙扎出來，脫胎換骨；另一方面，則更加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某些後人們，非但「不識」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本相，而且「不認」孫中山優秀民主傳統的「心態」。這個心態說白了，無非就是「即便孫中山是正確的，我們也還是要在、和祇願意在馬列或其它洋人的思想裡面，去尋找指導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而這個心態之所以形成的根由，就是因為馬列造成了我們民族自信心的可怕喪失、甚至喪盡。

著名的歷史學前輩大師錢穆先生說得好：“欲其國民對其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而上述種種因為民族自信喪失、甚至喪盡，才造成的種種“民主運動景象”，實際上都是因為對自己的民族國家毫無真實的瞭解，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失去了真正的愛情所致。

而民族信心破滅的第三個標誌，就是中共以“奪路來奪志”，從而又一次摧殺了我們民族自信心。

然而，怎麼才叫做奪路呢？我先說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中共改革開放期間第一次學潮將起的時候，我曾在武漢大學作了一次很大規模的講演。在這個講演結束後，有很多學生都向我提了問題，而且問題都集中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上，幾乎與我講的“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這個主題無甚相關。其中有一個學生竟然問我說，“你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我當時不遐思索地就回答他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由倡導改革的黨，在改革的大道中間，壘起了一座不容我們逾越的堡壘。”

我回答之後，有一刻，我眼前那個幾乎能夠容納上千人的禮堂，居然靜寂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但是，沒有過一會兒，就象是有人發號施令了似的，竟突然爆發出了持續的、猶如爆風急雨般的掌聲，我甚至看見那些站滿了窗台的年輕學生，一個個使勁鼓掌的激動模樣。我知道，他們聽懂了我的話。那一刻，我忽然又為自己的大膽，擔起心來了……



辛瀾年在美國 OHIO 大學講演

而今，已經十七個年頭過去了。回頭一看，實在不能不說我當年的“妄論”不對，因為我當年的妄論，今天回想起來，確實是說明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正是因為中共這個所謂的改革者，要用奪路來奪志的辦法，將一塊專制頑石橫攔在人民追求真

正民主變革的大道上，所以，才會造成某些也想變革的知識份子，祇敢歧途求取，不敢正路進攻，從而造成了方向和道路的必然錯誤，甚至是種種歧途的出現。其主要者有三：

歧途之一，就是面對著中共絕不容許將思想文化的解放，解放到對馬列甚至是毛澤東思想實行批判和否定的**正途**上去，而祇想“解放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於是，我們的一些知識份子，便祇敢在**側面**公開批判和否定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文化，卻絕不敢在**正面**批判和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而將一場必須推倒馬列專制復辟統治的歷史性變革，又錯誤地引導向對於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批判和否定之中去了。這就不僅在實際上為中共消解了罪行，為中共利用這個歧途來繼續詆毀我們的民族、愚昧我們的人民，帶來了“人賜良機”，而且也在實際上為中共專制復辟統治的所謂“合法性”，製造了歷史的、民族的、甚至是文化的藉口。此後，諸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中華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中國人啊你什麼時候才能不愚昧，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劣根性”這些“理論”的提出、甚至是甚囂塵上，竟導致在文學上也誘發了要尋找和表現中華民族之“劣根”的文學，一時間，表現中華民族歷史性落後、無知和愚昧的荒唐文學竟成為一種時髦的文學潮流——這一切對於進一步維繫中共的統治，進一步打擊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壓迫人民要求真正思想文化解放的急切願望，直至誤導新一代涉世不深的青年，實是起到了令人痛心的作用。

歧途之二，一是製造了一個叫做“不可取代性”的理論。因為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祇允許施行專制改良，也就是意在維護專制統治的改良，而不是民主改良，就是決不想改到民主制度和真正自由的軌道上去。於是，一批絕然不敢**正取**者便告訴國人，“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代替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來取代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他們才認為，唯有

幫助共產黨改革，推動共產黨的改革，中國才有希望。

二是進一步提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理論，甚至當一些人士因被共產黨趕到海外而要自己組黨搞民主運動之時，他們居然也在自己的“民主追求”裡，喊出了“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和“要幫助共產黨健康力量”的口號，從而表明了他們追求民主的本相。

三是在還沒有人提出革命的口號和理論時，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否定革命”，直至在海內外煽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革命、特別是要否定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惡流，理由自然很“悲天憫人”——因為“革命”只會造成天下大亂和人民遭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第一種謬論**，是建立在中共和他們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上的。因為他們既然已經徹底地否定了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以，他們才敢於嘎然一剪，就剪掉了我們的四千九百五十年——在他們的眼裡，豈但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且是“沒有馬恩列，就沒有舊中華”了！不僅如此，為了證明“共產黨是不可取代”的，他們還巴望將中華民族的未來，規定在祇有共產黨當家才能存在下去——這樣一種荒誕不經的歷史預言之中。似乎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馬列的中國，中華就會亡族，中國就會亡國。卻忘記了：正是因為來了馬列、有了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已經亡了族，中華中國才被亡了國，中國人民才遭遇了四千九百五十餘年都不曾遭遇過的痛苦和災難！那位“成就巨大、人格渺小”的科學家楊振寧先生（參見《黃花崗》雜誌第四期李勇先生文），他的父親楊武之，就曾痛恨不已地說過：“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未見有如此手段治民的，禁掉所有的書，祇許讀他一人的書，真比秦始皇（焚書）高明一百倍，更狠毒一百倍。”（《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他們的**第二種謬論**，無非是要告訴別人，共產黨有的是力量，特別是鎮壓的力量，因此，想挑戰共產黨，無異於是想用雞蛋來砸石頭。因此，對一個根本就打不倒的黨，還是識相一點，乾脆不打的好。而中華的江山，只能共產黨坐；中國的改革，也只能共產

黨來領導。他們當然忘記了，這個地球沒有任何黨、沒有任何人都會照樣轉的真理。更忘記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遭遇了馬列之難和中共之災，但是，我們的民族斷不會因此而滅亡，我們的民族也斷不會因此而無路可走了！並且，只要下決心解決了馬列邪教和共產黨的問題，只要下決心推倒了這個萬惡的共產專制復辟，我們就一定會有真正的和光明的正途可走！至於說到共產黨裡面，有、還是沒有健康力量，我們只能說，一切志在寧願放棄專制權力也要推倒共產專制制度的中共黨內力量，自然可以稱做是健康力量；相反，一切不願放棄權力、甚至祇想幫助中共推行專制改良者，一切祇是根據中共黨內鬥爭需要而利用改革名號者，他們豈但根本就不是什麼健康力量，甚至不過是中共專制統治力量的一個部分罷了。雖然“這一部分”，共產黨倒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根本就不管他們是否還在想著、戀著共產黨，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他們的**第三種謬論**，無非是藉否定革命，而要否定一切革命；藉反對革命，而反對“反共產黨的革命”，藉反對孫文革命和辛亥革命，而要拼命反對這個真正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再一次爆發。因為共產黨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真是跟慈禧太后推行專制改良時代的中國太像了！雖然就官場的貪腐黑暗而言，就鎮壓的殘酷程度而言，西太后只能自嘆不如。何況，在今天的中國，除掉不爆發革命，只要爆發革命，就一定是人民起來革共產制度的命，所謂“變革天命”。所以，他們才會拼命地反對革命，才會把民主革命描繪得比共產革命還要恐怖可怕，才會假裝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寧與發展，來反對民主革命，似乎是一副“菩薩心腸”……卻無論如何也包藏不住他們意在“保共改良”的用心和真情。

歧途之三，不敢正面否定中共的假民族主義，祇敢從側面藉反對民族主義來反對中共，竟然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批成了“真民族主義”，從而爲中共幫了一個“大忙”，更爲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幫了一個大大的“倒忙”。

這種危險狀況的出現，第一是證明了他們對中國的這一部現代歷史完全沒有瞭解，或者說，他們早已將中共這個勝利者精心編造的歷史，當成了真實的和

真正的歷史了。這不怪他們。但是，我們卻要敦促中國的歷史學者們，務要記住胡耀邦先生的名言——“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推翻我們了”，以在你們已有的歷史反思的成就上，繼續地和迅速地作出貢獻，以使得歷史的大是大非能夠更多更快地得以澄清。而只要使我們的國人、我們的青年、特別是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中華兒女，明辨了這個是非，認清了中共這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曾徹底出賣民族國家的歷史罪惡，認清了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曾瘋狂屠殺中華兒女、滅絕中華文化的歷史罪行，就會因為“是非昭彰”，而從根本上戳穿他今日一心想操之在手的“民族主義大旗”。雖然，揮舞這面大旗，如今竟然是他唯一能夠在國內矇騙國人、在海外誘騙華僑、對臺灣則可與惡性台獨勢力們一唱一和的唯一看家本領了。再就是，這雖然是中共最後一張有用的“王牌”，但因為它祇是一張“假牌”，所以，我們才必須將它揭穿，使它不能繼續行騙。而戳穿這張“假牌”的結果，就是我們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復，和對民族主義正確認識的復歸。當然，之所以會出現對中共今日鼓吹民族主義“信假為真”這樣一種現象，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民族意識、民族自尊和民族信心已經喪失所致。

第二、則是他們在將中共的假民族主義錯誤地認作了“真民族主義”之後，便要以批判民族主義作為手段，企圖以批倒民族主義來瓦解中共，甚至一邊拿辛亥之後各省獨立從而造成滿清王朝的崩潰為例，一邊又將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較量階段，大小軍閥們曾張揚過所謂“聯省自治”為名，竟希望以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形式，來瓦解或推翻中共。殊不知，就前者而言，辛亥之後，各省宣布的是獨立，而不是分裂，祇是要從滿清王朝中央政權裡面獨立出來，而不是要從中國裡面分裂出去，更不是從此不認中國，不要中國。這實在與今日海外那些要支持藏獨、台獨人士們的背景和目的，完全不同。就後者而論，所謂聯省自治，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說，那無非是在大軍閥要用武力統一中國的情勢之下，小軍閥們要以“聯省自治”來自保而已。自治，不過是他們在口號上要“借乎潮流”罷了。這才是二十年代各地軍閥們提倡“聯省自治”的名實關係。然而，它卻被

一些不解歷史的“精英”們，拿來作為攻擊孫中山先生、甚至是鼓吹中國應該分裂的“法寶”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從對真假民族主義的辨識中，認清楚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在當前，“絕不能中共喊什麼、幹什麼，我們就反對什麼”。無數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中共是一個“假話說遍，謊言說盡，陰陽兩謀用精”的黨，如果今天我們竟仍然要根據中共的假話、謊言和行逕來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還是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將大錯特錯。今天，之所以會出現“中共要紀念辛亥革命，有人就要反對辛亥革命”；“中共要紀念孫中山，有人就要否定孫中山”這樣一些十分混亂的現象，其一部份根由，都出在這裡。因為，只要我們不能、或沒有能力辨識當今中共種種言行的真正用心，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這樣做我們就會上了它的“大當”！比如說，如果我們不能識別它要將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傳人和辛亥革命繼承者的真正用心，不過是它要在共產革命及其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崩解之時，企圖騙取歷史的合法性，於是，我們竟然因為“中共現在要肯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了，我們就要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那豈非是大錯特錯？最近，中共先是在《走向共和》這一部電視劇中刪掉了孫中山有關“什麼才叫做真正共和”的講演，後來則乾脆禁播《走向共和》，也就實在將它對孫中山究竟是敬、還是怕，是真想傳承、還是假想傳承的心態，表露無遺。至於它今天要高舉那一面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並且將它玩得煞是好看，亦不過是要內騙國人以鼓吹所謂民族情緒、外騙臺灣海外以繼續搞它的統戰罷了。

……

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些戀共、保共的言論和理論，也正是上述種種對歷史的不解、甚至是善良的糊塗，才在當今中共推行專制改良的中國，起到了再一次消磨我們民族信心的很壞作用，甚至對中華民族自信心的復蘇，進行了又一次的扭曲和破壞。特別是在一個號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將本應該是正取的歷史方式，活生生地又誘導向了各種各樣的歧取之中，從而予共產黨以喘息，予人民以迷惘，推遲了真正變革的到來，延緩了對於“和平革命”的積極準

備，直至將一個早已經應該到來的民主變革時代，變成了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發展瘋狂腐敗和中國大陸普通民眾遭遇更加痛苦的歲月……

然而，使中共真正感到可悲的是：中共層層級級的官員們，之所以必須瘋狂腐敗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比誰都更加徹底地看清了馬列王朝必然滅亡和就要滅亡的傷心景象；使我們感到十分悲哀的卻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巴不得中共早一天垮掉、卻又害怕天下大亂的原因，就是因為對中華民族自己還能不能“從頭收拾好山河”，喪失了自信心；至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們，中共的上層知識分子、和中共遊走海內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他們雖然明知中共要垮，卻又時時要為中共出謀劃策，總希望中共還能藉改革以救命，所謂時時處處，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歧求而非正取，就是因為他們早已“自信”全無，祇能將自身的名利榮辱繫於中共一身罷了。

朋友們，“民族自信”的破滅，所給我們帶來的，也祇可能是上述這一番令人傷感甚至憤怒的“末路”景象了！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已經喪失的**第四個表現**，就是**民族意志的沉淪**將在本刊第七期、零三年十月號刊載。

本刊新增榮譽訂戶

美國 明里蘇達大學
中國留學生自治聯誼會

王士生、莊思明、胡芷民

陶先生、林先生

李又寧教授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止)

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

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辛灝年「驅除馬列」一文讀後

趙 贈 義

灝年教授吾兄：

《黃花崗》第五期收到了。

閣下“驅除馬列”一文擲地有聲。爲了響應你的革命性的號召，我寫了一篇“讀後”，發表在《華聲報》上，請你指教。

昨日與李剛、王榮科、劉翔、王岩諸兄聊天，我發覺來自大陸的年輕人對政治的觀察力都很強，且具智慧，見到了你們這許多熱愛國家的志士，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但願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你那“新十六條綱領”一一實現。

不多說了。敬祝

撰安！

兄：趙增義 敬上

六月二日

中國大陸現代史學者辛灝年教授鑒於中山先生曾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個字推翻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中國共產黨竊據中國大陸以來，腐敗專制，尤甚於滿清，因此參酌當今時代及人民的需要，另提「驅除馬列，還我民國，實行民權，愛我中華」十六個字，以恢復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承襲中山先生的道統，回歸中華民國的政制，重新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回想筆者于七十年代也曾以「馬列是罪惡，投機是墮落，反共是道德，均富是幸福」企圖喚醒國人不要向閻王獻媚，反不了共，即救不了國。與辛教授主張，曲調相同。只不過辛教授在大陸歷經

多次運動，又深明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他的觀點顯得更積極，更深遠。

有人說：中國共產黨早已不信奉馬列主義了，現在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如果回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所說的話：只要共產黨當家作主，資本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可見今天在經濟方面靠右，使人民吃飽了不造反是手段，維護專政才是目的。中國共產黨一旦揚棄了馬列，就喪失了專政立場，且先翻閱中國共產黨黨章所列鐵血般的文字：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

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

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保持社會長期穩定，堅決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犯罪活動和犯罪份子。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

前三項強調專政，後一項隱藏階級鬥爭。馬列實是中國共產黨竊據國家護身符，控制人民的緊箍咒。馬列這個神雖然不靈了，可是沒有了神就沒有了廟。同時中國共產黨，口稱的「人民」實際上是個抽象名詞，猶如專制皇帝的「奉天承運」一般。皇帝自封為「天子」中國共產黨則自稱人民的代表，這個「人民」的涵義即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共產黨對待真的實體人民有時如工具，有時為敵人，有時為奴工。所謂「為人民服務」就是為政治服務，為專政服務。人民順乎專政報之以甜蜜哄騙，人民反對專政，實行殘酷鬥爭，建國五十四年來，不論大鳴大放，文化革命，改革開放，三個代表都是源自馬列用以保衛專政手段，對你笑為了專政，對你狠也是為了專政。因此馬列不除，專政就永垂不朽。中共大小「職業革命家」也就世襲罔替，中國的禍害也就延綿不絕。辛教授說得好：「**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中華兒女如欲避凶趨吉，如欲當家作主，非驅除馬列不可。

驅除馬列不只要驅除馬列毛鄧的陰魂邪氣，而且要闖割共產黨的惡根。共產黨之所以為惡，因為把人

性中原始的獸性儘量釋放出來，貪婪、殘暴、陰狠、凶毒、猜忌、掠奪，無一不備。毛澤東的鬥爭手段講究狠、穩、準，完全是獸性的現代化。儒家主張先修身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崇揚仁道，就是克制自私的獸性而以利他的神性為人群服務，西方的民主政制也不過是把人群觀念利益等衝突用協調溝通方法解決，建築在理智和人道主義基礎上，不必搞個你死我活。中山先生強調互助合作，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以求達到社會人人平等的境界都是採取王道的方法，不是霸權，有霸權即有壓迫，即有暴政。辛教授指責馬列侵略了中華文化的空間，中華文化的精髓乃以仁為本，因馬列入侵變為「以鬥為綱」。原以中庸為道，變為極端專制，原兼收並蓄，變為馬列獨姓單傳，將整個大陸惡變為「黨治、黨有、黨享、黨貪」的血腥遍野的黨天下。自馬列入主中原。在文化上、人權上中華民族變成為被壓迫民族，驅除馬列，實與打倒帝國主義具有同一意義。

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建中華民國的聲音，在大陸知識份子中逐漸傳播。今人驚訝的是臺灣有人不要中華民國，大陸人士則視為瑰寶。大陸人士的心態可以了解，他們覺得馬列非中國貨是有毒物。改革開放以後，知道了中共抗戰時間「專打友軍不打日軍，專圖擴張，不圖抗日」的史實，以及奉史大林之命曾成立中華蘇維共和國，率先分裂國土。經歷各種運動的殘酷鬥爭，又看到太子黨新興貴族階級的茁壯，工農階級被剝削，覺得今不如昔，希望重建中華民國，還我自由民主。相反地中華民國的國號是臺灣的保護傘，在中華民國的旗幟下，臺灣倖免赤色災禍，民生康樂富裕，政治民主自由。而若干人不幫助大陸共同驅逐馬列，使大陸回歸理性社會，消弭戰爭危機，反而封閉門戶，搞正名運動，捨安求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筆者至愚，不明其理。

驅除馬列是反文化侵略，反政治迫害的運動，必須長期奮鬥，對中共多一分幫助，多一分諂媚，即對中國人民多一分壓迫。反共是道德，要從這方面理解。

敬啟者：為考慮故事的完整性，《周詳自傳》連載，暫停一期，下期全部發完。 編者

良心新聞

良心新聞

一則

紐約《世界日報》讀者 劉意



王炳章「失蹤」周年 民運人士集會示威

「中國之春」創辦人、民運人士王炳章自去年 6 月 27 日在越南遭到中國公安「帶回問話」，在廣州被判無期徒刑，至今整整一年。在王炳章「失蹤」一周年後，多位關心王炳章命運的民運人士 28 日上午到中領館前舉牌抗議，要求釋放王炳章。

「紐約各界救援王炳章大會」昨日下午也在法拉盛舉行，與會者再次呼籲海外民運人士團結，捐棄成見，在合作營救王炳章的同時，不忘繼續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使命。座談會由民運人士陸耘主持，包括王若望夫人羊子、趙品游、嚴家其、傅中平、周永軍、唐杰、唐元儒及僑界人士李勇、王涵萬等到場聲援。

(圖：本報記者林潛修 文：本報記者羅旦兮)

在王炳章博士越南芒街蒙難一周年之際，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世界各地的大陸人士，均舉行了抗議活動，聲援王炳章博士。紐約《世界日報》記者羅旦兮和林潛修，竟為紐約聲援王炳章博士的抗議活動，寫下了數行沒有摻假、沒有歪曲、特別是沒有醜化的報導，雖然為文含蓄，卻處處流露著真誠的同情之心。短文上面還配著一張頗有氣勢的抗議照片。一時間，竟使得許多來自大陸的讀者，感嘆唏噓不已。

因為，這樣的《良心新聞》，在海外的中文媒體上，尤其是在該報版面上，似乎就要絕跡了。就不說，王炳章博士被中共綁架之時，那位也是該報的所謂專欄作家，竟能公然地對被綁架者施以冷嘲熱諷，竭盡侮辱之能事，猶用著一副小市民的腔調，嘲弄王炳章博士“半生家庭、事業兩空空……”許多大陸讀者，實在已經不能解釋，何以臺灣來的報人，在配合中共之種種惡行劣跡上，居然就能甘做大陸人民的仇讎之人，中共獨裁者的助虐之輩？

謝謝《世界日報》記者羅旦兮女士和林潛修先生。謝謝你們的良心新聞。謝謝你們還能夠為貴報帶來一點讀者的讚賞。我們更希望這樣的讚賞能夠再多一點，那該多好……！

新聞發布會之二

去世的老人與不死的精神

清水君報導《黃花崗》雜誌

如果說《大參考》是對中共保密刊物《大參考》的一種反對的話，那麼，《黃花崗》雜誌就是對中國同盟會《黃花崗》精神的繼承。

黃花崗雜誌於 2001 年 10 月創辦於紐約，傳播的方式包括傳統的雜誌印刷郵寄與網絡宣傳兩個方面。雖然創辦至今不到兩年，卻已經在大陸知識界和海外民運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這本雜誌同樣是沒有任何背景，沒有得到任何組織的支持，然而，這個雜誌的誕生與經營，都有著如同黃花崗烈士們那樣悲壯的情懷，雜誌的創辦人是美國中國現代史研究所負責人、大陸赴美著名學者辛灝年先生，他所撰寫的《誰是新中國》一書引發了大陸反思民國歷史的民間運動，他在美國做的幾百場演講感動了無數華人華僑流下熱淚。其中，就有一對八十多歲的紐約老華僑夫婦、愛國革命前輩周祥周戴琦，他們把畢生的血汗 50 萬美金全部都捐獻給了《黃花崗》雜誌，畫下了完美的人生句號……然後是馬佩

華、大陸留學生出身的工程師任松林博士、大陸新移民郭易君等人開出的一張又一張捐款支票……

一張支票一片情，正是這無數熱愛中華的心腸，才有了這本厚重、莊樸、深沈、熾熱的《黃花崗》雜誌。

《黃花崗》雜誌發刊詞《民主、統一、和平為中華》一文中說：

創辦黃花崗雜誌，其意雖在「述往事，思來者」，其志則是：民權、民族、民生要實現；民主、統一、和平為中華！

《黃花崗》起義的命運，是一個失敗的命運，七十二烈士曾被拋屍廣州荒郊野外的淒慘景狀，便是它遭遇失敗的痛苦見證。然而，失敗的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的悲壯之死，卻醞釀了半年之後的武昌起義，實現了扭轉乾坤的歷史夢想。所以，廣州的紅花崗才變成了黃花崗；所以，黃花崗的命運，又是一個必然要勝利的命運……

辛灝年先生是一個博學的學者，他這樣談及創辦《黃花崗》的感受：

「失敗的黃花崗起義，迎來的便是辛亥革命的勝利；那麼，《黃花崗》雜誌即使會失敗，卻絲毫不能破滅我們的民主夢想。因為我們夢醒之後的夢想，已經與黃花崗先烈們的歷史追求「相接相續」了。所以，在種種刁難和抵制接踵而來的時候，我們只要一想起那曾橫躺在荒草野塚間的七十二烈士，還有後來那曾開遍在黃花崗烈士陵園裏面的金黃色迎春花，我們的心頓時就會充滿那無怨無悔的感覺。」

這種種刁難，並非全部來自於中共方面的打壓，還來自李登輝陰影下的臺灣國民黨部分勢力，也站在了拒絕三民主義和背叛孫中山的前列。

特別是臺灣背景的《世界書局》說，因理念「不同」，而拒絕發行《黃花崗》雜誌，這對長眠在廣州黃花崗的國民革命同仁們來說，是怎樣的傷害和背叛？對《黃花崗》雜誌來說，又是怎樣的打擊？

然而《黃花崗》同仁並沒有沮喪和悲哀，他們甚至沒有時間去考慮成敗，他們默默地不發一言，祇是將《黃花崗》辦出去、發出去、寄出去……

黃花崗雜誌的電子地址：hgang2001@hotmail.com

黃花崗雜誌的網站地址：hng-magazine.org

新聞發布會之三

黃花崗雜誌社

將採行“全體義務制”

（本刊訊）黃花崗雜誌自創刊以來，雖然董事長、社長和主編們均不領取工資，主編也從不領取稿酬。但因創刊伊始，出于編輯、出版和發行等工作的需要，我們不僅對為幫助黃花崗工作而有經濟損失的朋友，給予了一定的經濟補償，而且對一些願意幫助黃花崗工作的朋友，亦給予了一定的報酬。這些報酬雖然微薄，但也表示了本刊的一份感謝之心。

現在，本刊已經艱難地走過了第一個出版年，第二個出版年也已經走過了一半，黃花崗雜誌已經贏得了一些讀者的肯定和支持，已有更多的朋友甘當黃花崗雜誌的義工。是故，為繼承黃花崗先烈的獻身精神，學習法輪功信仰者們的克己奉獻作風，珍惜海外民間華僑的血汗捐助，亦為節省開支，以便開展一些必要的活動，進一步為宣傳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國思想、為傳揚我們民族的優秀思想文化做更多的工作，本刊決定從現在起採行“全體義務制”，即所有參與本刊的工作人員，均本著奉獻的精神，不領取工作報酬，主編繼續不領取稿酬。這一決定得到了許多朋友的支持，曾在本刊長期擔任具體工作的孫雲先生仍將利用每周的假期，以協助董事長和社長管理財務；邢大昆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刊記者、負責對外的採訪工作；捐款人、大陸新華僑郭易君等數位朋友則主動為本刊辦公室值班，分擔日常事務；特邀編審吳學燦先生、李勇先生和王友琴教授等，則繼續願意幫助主編做好稿件的編輯和校對工作；本刊主編助理李剛博士等則義務擔負了部份編排工作、並承接了雜誌上網的全部工作任務……

當此之際，本刊要對一位曾長期為本刊做了大量艱苦工作、付出許多心血、卻從未拿過本刊絲毫報酬的年輕博士，表達我們由衷的感激之情，儘管他永遠都是我們黃花崗雜誌的開創者和自己人……

當此之際，我們當然還渴望著有更多的朋友能夠走進我們奉獻的隊伍之中……。

「傑出民主人士獎」

【大紀元 6 月 4 日訊】大紀元記者馬有志報導/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於 5 月 31 日在舊金山假日大旅館進行一年一度的頒獎大會，獎勵對中國民主運動有傑出貢獻的人士。本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的受獎者是劉曉波，楊建利，方覺和張昭富；本屆頒獎大會還增設了特別獎，獎勵評委孫國棟夫婦和已故基金會理事成其林先生。儀式後，徐文立先生作了「促進中國民主轉型的幾點設想」的專題演講。

基金會會長蔣亨蘭女士在頒獎儀式的開場致詞中說，「在解放伊拉克戰爭後，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注入了新的動力，但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前途，依然充滿了曲折磨難。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共 16 大和全國人大會議進行了最高層領導人的換屆，由於江澤民的戀棧節外生枝，而 SARS 疫情的爆發也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場無形的‘世界大戰’中，中國社會落後政治體制的最嚴重弊端暴露無疑。」

蔣女士接著說，「中國政府對外做出種種承諾，繼續信誓旦旦地欺騙世界輿論，對內部把防治疫情變成一場政治鬥爭，在繼續剝奪百姓知情權的同時，加緊鎮壓異議人士，鎮壓法輪功，加緊鎮壓工潮和各種反抗運動。同時，還加緊了互聯網的監控……。」

王丹代表劉曉波領了獎；方覺和張昭富先生在領獎時作了講話；當楊建利的夫人符湘女士領著幼小的兒子替正在中國大陸被關押的楊建利領獎時，全場氣氛悲肅，不少人眼含淚花。

張昭富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民主的道路還很漫長，但不會太久。

方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中國政府對政治改革沒有公開承諾的前提下，在中國政府繼續對示威工人、網民、法輪功百姓實行迫害的時刻，向中國政府發出過份友好的信息是自私，對民主運動是有害的。

(下接第 46 頁)

新聞追蹤

前臺灣聯合報

北美世界日報名報人

李
勇
專
稿

之一

中共在香港紐約 製造暴力和恐怖

紀實

一、中共香港“暴力團伙”燒殺炸鬧，無所不為，製造恐怖在先

中共在紐約的一些爪牙，今年六月廿三日晚間在紐約市華埠的「解放區」（即華埠東百老匯大道與地威臣街一帶），向一群法輪功的會眾展開「武鬥」，把法輪功一名年輕會員李軍打傷。事後李軍持驗傷單向紐約警察第五分局報案，警方派人到「解放區」逮捕頭號打人者梁冠軍，但梁冠軍聞風逃走，事後由一名叫黃克鏘的華人陪同到警察第五分局自首，經訊問後移送法院，被控三級襲擊的刑事罪。

該場「武鬥」首犯梁冠軍是中共幹部口中的「僑領」，其實他與另外打人者當年在大陸文革中是一批極端左傾份子。他們深知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五十三年來全靠暴力控制廣土眾民，他們當年打砸搶在中國大地受到共幹賞識，現在到了海外，當然更希望爭取到中共駐海外幹部寵愛，讓他們有賺錢發財的機會。

其實海外親共份子的「武鬥」與中共在大陸的表現一樣，已成為一種共產黨傳統，他們相信「始皇帝」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更相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真理」；他們認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論，要打倒階級敵人，要埋葬資本主義，只有訴之於暴力，否則就不叫「革命」。

中共在海外的爪牙，早在沒有成氣候前，就已經開始傾向以暴力對待非共份子與「反革命」人士。因為中共政權本身，從建黨那天開始不論對內對外，都以暴力為最高訴求，尤其是大陸淪共後更把暴力武鬥向外擴展，禍延平民百姓。撇開中共在延安時代與在蘇區境內的歷史性暴行不說，單就他紅色政權在中國大陸建立那天開始，就在國內城鄉和知識界連續地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鎮壓運動，批判鬥爭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屠殺的中國人總數有五千七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中共不但在中國大陸屠殺同胞，同時把暴力輸出到海外的自由國家與地區，首當其衝的是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香港，然後是八〇年代至今的美國。

先說香港。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後的兩年間，數以百萬計大陸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經過香港借路轉去台灣及歐美、紐澳、日韓、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難民最多，高達二百多萬人。這些逃避共產災難抵達香港的人中，有七千多人是國軍的傷殘人員，他們斷手斷腳、扶老攜幼抵達香港，港英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們，把他們安置在東華醫院與廣華醫院，有一部分則散布在中環的花園廣場靠乞討維持生活。港英政府為了市容觀瞻，只好把他們送到摩星嶺一帶，替他們蓋搭了幾百個三角棚當作暫時難民營，每天供應兩餐飯，讓他們安定下來。

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強烈反對，他們說這些難民是流寇，基於毛澤東窮寇必追的理論，港府應該把他們遣返回中國大陸，由「黨和人民」清算鬥爭後處決。

英國政府雖百般討好中共，並首先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但卻不敢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這七千多名傷殘國軍殘餘才可以苟活下來。中共方面當然不會甘休，故意派出他們的爪牙到摩星嶺一帶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懷槍械，當摩星嶺難民跑出來指責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時，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槍械向難民射擊，並高叫殺死反動派，幸港英政府派出軍警彈壓，才把事情平息下來，但對香港社會已產生嚴重影響。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憂心忡忡，為了安定社會，港英政府乃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廿六日，以兩天時間，把七千七百十九人用木船載運送到偏僻的將軍澳海灣附近的一座荒山。這座荒山當地人叫做「吊頸嶺」，原因是四〇年代一名英國商人在這座荒山開了一家麵粉工廠，因生意失敗導致工廠倒閉，該英國商人乃在荒山的廠房內上吊自殺死亡，從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跡，港英政府把難民安頓此處後，把「吊頸嶺」改名為「調景嶺」。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高卓雄及若干善長仁翁發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在調景嶺一個填海出來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一千二百個 A 字棚、三十座葵棚、三十棟木屋，讓七千多難民有容身之地，同時每天發給兩餐飯菜。

但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不絕，他們知道有一個收容難民的調景嶺，便紛紛乘船或翻山越嶺到調景嶺定居，不到一年，已有一萬六千名不列入港府難民名單的難民抵達調景嶺，他們沒有居屋，自己蓋搭棚屋，沒有飯吃便以繡花、做火柴盒、拾麵包皮糊口。

調景嶺難民在調景嶺內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擁護中華民國，並盼望台灣的國軍早日反攻大陸、光復國土。中共政權因此對這些難民更為深惡痛絕，不斷派他們的爪牙到調景嶺的棚屋放火，並在山溝水中放毒，要把難民們燒死毒死。七千多人曾經有多次因火燒棚屋餐風露宿，也有多次因飲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燒死毒死，因此引起國

際人士注意並關切，中共的暴力才開始收斂，但並不停止。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傍晚，廣東台山籍的三十一歲男子陳寒波，在九龍黃大仙竹園聯合村的覺蔭園住處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殺手開槍擊中胸部死亡。經香港警方調查，陳寒波是中共尚未奪得政權前重用的特務，因看穿中共殘民禍國的真面目，四九年從大陸南下逃抵香港，經常在報上發表抨擊中共的文章，人稱「反共作家」。他所寫的暢銷書是一本定名為「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報紙曾對此大肆攻擊，罵陳寒波是「反共、反華、反人民」的「三反頑固份子」。香港警方判定這是政治暗殺，不可能破案，傳訊了幾個關係人之後就不了了之。

不過後來有人查出，陳寒波原在中共華東區特務頭子楊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離中共逃來香港後，楊帆曾揚言要手刃此叛徒。不過楊帆到了文革，也因為是劉少奇的親信被打成叛徒工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家破人亡，為自己的殺人罪行付出了代價。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上午，香港灣仔星街天主教煉靈堂內主持神職的兩位神父——程野聲、魏蘊輝，均被人以刀刺及棍擊打死在他們的宿舍內，室內電話線被剪斷，財物金飾現金均在。警方根據兩位神父的言行判斷，他們死於政治暗殺，原因是兩位神父所辦的「公教報」與「時代學生報」均堅持反共立場，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嚇信，要他們立即離開教堂，並在公教報上刊登「離職啓示」，否則「人民」不會放過他們。兩位神父並不向這些恐嚇信屈服，沒想到果然遭到中共「人民」的毒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漢在九龍城嘉林邊道追殺，身中四槍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搶走。後來知道此人於四九年從大陸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願公開的文件資料，因此遭到槍殺，文件被搶去，案件當然無法偵破。

一連串政治暗殺發生後，英國遠東情報局派人與中共方面表明英國的立場與態度，希望中共方面節制，不要再在香港從事暴力暗殺行動，否則英國將向國際間公布中共罪行。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殺行動才略有收斂，但暗殺計劃仍在擬定，只是不敢下手。

一九五三年四月，從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聞記者許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為《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

的書。此書只有一百四十二頁，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在香港創立的亞洲出版社出版，內容是敘述許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槍殺的經過，同時披露中共統治下上海腥風血雨的政治運動如何展開。這對中共宣傳的「新中國」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於是許瑾女士遭到一連串恐嚇。中共方面並透露一張要處決對象的黑名單，許瑾女士被列為第一個被整肅處決的對象，其次是撰寫反共政論的名作家李燄生（筆名馬兒），第三是新聞天地雜誌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粵籍政論家黎晉偉。這些黑名單上的人，都接到過恐嚇信，信內附有子彈頭與刀片，內容都是說要取他們的性命。

在恐怖氣氛籠罩下，許瑾女士知道不能再留在香港，只好帶著三個兒女離開香港去台灣，回到她從前服務過的《中華日報》做事，這才擺脫了中共暗殺的陰影。（日後許女士又帶著兒女逃去西班牙，輾轉來到美國，定居紐約，去世之前曾向筆者說及這段可怕的經歷，並歷述她逃難的辛酸。）

此後，中共在香港的暴力行動息止了一段時間，到了一九六六年又再復燃，到了一九六七年更發展到了高潮，終於引發香港暴動，不少人死在中共爪牙的定時炸彈上，首先遭殃的，就是當今香港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董浩雲的東方航運，早期在台灣創業，後來發展到香港，並成為亞洲船王。發跡後的董浩雲，一直夢想辦一個「海上學府」，他買下了伊麗莎白豪華郵輪，駛到香港，投下巨資改裝成為「海上學府」，準備招收學生四海遨遊。

那時候董浩雲主持的「東方航運」奉國府為正朔，上面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並以中華民國的國花——梅花作為公司標誌。這種表現在中共眼中是不可饒恕的「反動」及「反革命」罪行，於是中共便命令他們在香港的爪牙給董浩雲一個警告——當伊麗莎白號改裝成為「海上學府」的當天，一場大火竟然就把這艘豪華遊輪燒焚，所謂「折戟沉沙」，在九龍海灘上，成了一堆廢鐵，粉碎了董浩雲辦「海上學府」之夢。

沒有想到，當董浩雲兒子董建華被中共賞識，出任香港首任特首（行政長官）之後，竟頒獎給當年放火燒他父親遊輪的工人頭目楊光，表揚他對香港的「貢獻」，這真是鬧了個天大的歷史笑話，叫人哭笑不得。

中共爪牙放火燒船之後，港九人心惶惶，大家爭先恐後移民離港，今日許多生活在美加、年齡在六十歲左右的老僑，就是那個階段移民來美國的。然而，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當中共策動的香港暴動進入高潮之際，一名在香港商業電台主持節目的香港人林彬，因在節目中抨擊中共在香港暴行並譴責暴力，罵搞武鬥的左傾份子污糟臘場（廣東話：骯髒卑劣之意），竟被中共活活燒死。

林彬在香港商業電台的節目稱為「大丈夫日記」，每天定時播報並評論香港發生的人與事動態。那時候，中共在香港的爪牙遊行示威抗議港英政府，主張「祖國」立即收回港澳、解放台灣，達成祖國的和平統一。他們除了到處張貼大字報（甚至到港督府外面貼了滿牆大字報）外，還在港九鬧區放置炸彈，上書「同胞勿近」，藉此表示炸彈是要炸死港英的白皮豬（英國人）、黃皮狗（香港官員及警察），但每次炸彈爆炸，炸死的都是華人，而且是無產階級的斗升市民，全香港五百萬華人大為憤慨。林彬據此在香港商業電台的「大丈夫日記」中每天反映市民意見，不但罵左仔，更罵北面那個禍國殃民的政權。聽眾每天收聽後，還打電話去電台，也跟著大罵中共政權及那個「戰無不勝」的毛賊。

這種民氣反應，令中共政權十分頭痛，於是下達命令要收拾林彬。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個黃昏，林彬與他的弟弟駕一輛敞蓬汽車返回他在九龍窩打老道山的家中吃晚飯。當汽車駛到他住所那條街口，發現街中豎立了一個修路的路牌，說明此路不通。林彬見狀立即停車倒退，就在一剎那間，路旁走出三名彪形大漢，其中兩人各拿一桶汽油，分別潑在敞蓬車內的林彬與他弟弟身上，另外一人則划了一支火柴丟在他們身上，轟然一聲巨響，兩人渾身火焰衝出車外，走了幾步就倒在地上，然後活活被烈焰燒死。

次日，林彬兄弟被中共派人燒死的消息成為香港傳媒的重大新聞，幾份中共喉舌——「大公報」、「文匯報」、「商報」、「晶報」（人稱左報）則幸災樂禍說林彬「民憤極大」，被「人民」所唾棄，因此自找滅亡，並說這是「人心大快事」。其報導方式與紐約中共喉舌「僑報」、「明報」等報導法輪功會眾被毆的內容近似，使香港人有時光倒流的感嘆。他們不禁要問：胡錦濤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有什麼不同？

另外一個被中共仇視要剪除的文人是在「星島晚報」上寫專欄的名作家萬人傑（本名陳子雋），他每天在晚報的專欄「牛馬集」上大罵擾亂香港安寧的左仔與北面那個殘民政權。由於讀者喜愛他的專欄，把「星島晚報」的銷量推上香港第一位，把中共辦的「新晚報」打在後面。不但如此，讀者每天寫信或打電話給萬人傑，向他透露左派集團及中共政權在大陸胡來的種種內幕，使萬人傑的專欄更有可讀性。於是中共爪牙先去信恐嚇萬人傑，接著打電話去罵萬人傑「反華、反人民」。

由於有林彬的教訓，香港警局政治部派出多名密探到萬人傑住所及辦公大樓外保護他安全，並勸萬人傑搬到政府提供的大樓居住以策安全，但萬人傑表示不怕左仔暗算，他決定與中共政權及其在海外爪牙週旋到底。果然，警方密探及停車場的管理人員不止一次在萬人傑的座駕下面發現左傾份子放置的定時炸彈，若非港府防範得宜，萬人傑早就在香港六七年暴動中被中共爪牙殺害。

二、中共紐約“紅衛兵團”文攻武打，樣樣都來，始藉保釣而起

到了七〇年代，正是中共紅衛兵血洗中華故國之後，中共爪牙又借著台灣留學生掀起的保釣運動，把他們殺人放火的「武鬥」革命暴力行動轉移到了歐美地區，在歐美地區的華人社區展開打砸搶罵，一時間風起雲湧。他們訓練一批土生華人配合來自港台兩地的左傾份子，學習殺人打架的恐怖活動，創立了一個叫「義和拳」的組織，說是以拳頭來對付洋人及依附洋人的華人，實際就是中共紅衛兵打砸槍抄運動在海外的“延續”。因為這些「義和拳」組織者，師承大陸紅衛兵，六〇年代在紐約活動得最積極。他們學中國功夫、練西洋拳，經常出現在歌頌毛江、吹捧林周的集會上，誰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立即蜂湧上前毆打；經常借著假期在紐約華埠中心鬧區，向來往行人發送「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萬歲」、「江青同志萬歲」的傳單。他們認為，這就是愛國行為，中共方面當然對他們表示賞識。

這些紅衛兵份子不但在華人社區活動，也散布在美東各大學的華裔學生團體中。他們一個個好勇鬥

狠、盛氣凌人，仗著他們拳腳功夫了得，經常到各大學學生開的非共會議上鬧場，誰攔阻他們就打誰，其積極程度與此刻在華埠毆打法輪功學員的梁冠軍相類似；不同的是，法輪功人有備而來，拍下梁冠軍指揮打人的照片，然後憑照片向警局控告梁冠軍打人，並要梁接受法律制裁，而當年中共海外紅衛兵所對付的卻是毫無戒備的愛國華僑。

一九七六年七月卅一日晚間，紐約兩份非共政論雜誌——「鄉親」與「自由人」假哥倫比亞大學伯爵堂舉行中國大陸問題座談會，中共爪牙唆使紅衛兵「義和拳」去哥倫比亞大學搗亂。他們揮舞刀槍、大叫大嚷，使座談會辦不下去，於是主持會議的人報警，把紅衛兵「義和拳」的人抓了幾個送去法院，雙方對簿公堂。當時中共在紐約喉舌——「美洲華僑日報」還以大字標題宣示「造反有理」、「武鬥無罪」，然後表示要與「反動派」週旋到底。其「義和拳」組織的紅衛兵性質，也就泄露無遺。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拆開郵包時被包內預藏的炸彈炸斷手臂，經台灣警方調查發現，此一恐怖活動是台獨份子王幸男所為。於是紐約親中華民國的華僑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座談會，聲討恐怖暴行，中共方面立即命令哥大擅長武鬥的「紅衛兵」去會場破壞。因主辦座談會的人早有準備，與滋事的左派份子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抗爭，並把滋事者告上法院，壓下了左傾份子支持台獨的氣焰，也使武鬥息止了一段時間。

當時「世界日報」曾以大篇幅報導此一新聞，並發表評論強調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武鬥」解決不了問題，也說服不了別人，主張大家心平氣和討論問題，不應訴諸武力。

那些年月，「世界日報」被台獨份子與親共的老保釣份子視為國民黨的喉舌，眼看「世界日報」的崛起，暴露了他們的醜惡，影響了他們的活動，於是他們把目標轉向「世界日報」。當時整個「世界日報」只有我一個人從事外勤採訪工作，每次抵達武鬥場合，除了有人挑釁指罵，並有若干面目猙獰的男女拿著攝影機迫近拍照。中共喉舌僱傭的所謂「記者」更肆意在「武鬥」現場指手劃腳、神氣活現。

對這種變相恐嚇的拍照，我十分反感，但又無可奈何，最後我想出辦法，準備了一批彩色半身照在身

上，照片後面寫著自己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有人趨近拍照恐嚇，我就走近他們把照片送給他們拿回去，並叫他們不要浪費底片拍我的像，這種辦法果然使拍照者自知沒趣，不再騷擾。

當然，在採訪中也曾遭遇被左仔包圍叫打的場面，幸虧我曾經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暴動時去香港採訪，見過左派份子對付記者的武鬥，有了經驗，知道怎麼對付他們，總算逢凶化吉、保住性命。

左派份子不敢明目張膽武鬥，卻悄悄在晚上到「世界日報」在華埠窩克街四十七號的社址破壞，陰謀投書到英文報章造謠攻擊傳統僑社與「世界日報」。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左傾份子以強力膠注入「世界日報」大門的鎖孔中，使清早上班的「世界日報」同仁無法工作，延誤了兩個小時才把鎖鏟開。

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紐約曼哈頓下城出版的一份英文週刊「村聲」，刊出一篇「國民黨接管中國城」的報導，除了攻擊中華公所、台灣駐美機構外，並把「世界日報」作為目標造謠破壞，一看就知道是左傾份子在暴力之外的一種惡行。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一群不法之徒以鉛管石塊襲擊位於華埠窩克街四十七號「世界日報」總社的門窗，把玻璃砸壞；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又縱火燒總社所在的樓宇；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又有人以強力膠灌入鎖孔，使大門無法打開。中共喉舌於是乘機報導說，「僑胞」痛恨國民黨喉舌造謠，給「世界日報」一個警告，那些恨「世界日報」入骨的親共「老保釣份子」更投書「左報」幸災樂禍。

除了武鬥、破壞之外，他們還投書到「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世界日報」不但是國民黨大本營，更與僑社黑社會聯絡欺負「愛國」華人，破壞祖國名聲，反對祖國統一。

此刻在紐約從事經濟活動的一名王姓華人，由於他中學從台灣移民來美國讀書，再加上曾經在美國服過兵役，因此英文講寫都不錯。在紐約左傾運動最激烈階段，他以左傾華文報紙記者的身份，寫了一篇讀者投書到「紐約時報」，罵國民黨、罵中華公所、罵世界日報、罵孔夫子，由於文筆不錯，「紐約時報」把它發表在一九七九年元月廿日的第二十一頁的頭條

位置，並做了一個醒目的標題：「國民黨就在此地」（The Kuomintang Here）。

王瞻這篇文章除了介紹他自己的出身外，並以「客觀」的身份掩蓋中共爪牙在海外的種種暴行；相反他指責國民黨與華埠黑社會勢力勾結殘害僑胞，力指國民黨豢養的政治打手在海外各地橫行，把中共爪牙形容為一群被迫害的綿羊，把台灣來的人形容成窮兇極惡。果然在這種煙幕下，一個在左傾僑團內反對掛五星旗的華人翁瞻，被人在孔子大廈停車場出口處近距離開槍打死；當時的中華公所主席譚中平（已去世）屢屢接到恐嚇電話，為了安全，他經常佩戴自衛手槍上班；另一個僑領李文彬，則在自己經營的餐館內被人刺殺重傷。

有一個在台灣讀政治大學的香港僑生邱瞻，也在華埠針對「世界日報」『破壞』，向美國情治單位密告「世界日報」是國民黨特務大本營，與香港的東方日報老板馬惜珍勾結，而馬惜珍因在香港販毒被捕潛逃至台灣求庇，「馬惜珍」與「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同姓，而且是販毒同夥。

美國情治單位對「世界日報」是否國民黨特務沒有興趣，但對「世界日報」有販毒嫌疑則很關心，於是展開一連串明查暗訪。中共在紐約喉舌就乘機推波助瀾，刊登誹謗「世界日報」的新聞，說「世界日報」是馬惜珍投資，又說「世界日報」的副刊與香港「東方日報」副刊一樣，是「東方日報」供稿。

邱瞻甚至策動左傾激進的土生華人到「世界日報」門前示威，到地鐵站發傳單叫華人不要看「特務報」與「販毒報」。但此刻，這個邱瞻卻在香港主編一份週刊，並用盡辦法混入「世界日報」寫專欄，這種行為比暴力更為恐怖。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老婆江青及黨羽在一場政變中被捕下獄。「世界日報」收到這則電訊消息時，報紙已經出版，為了爭取時效讓讀者知道，立即出版「號外」，除在街頭散發外，並在華埠重要地點張貼。沒有想到，一群左傾份子蜂湧而出要當眾毆打送號外的人。這些左傾份子中有「紅衛兵義和拳」份子、有「老保釣」、有中共在紐約的爪牙，他們大罵「世界日報」造謠，次日並在當時的中共喉舌「美洲華僑日報」上把「世界日報」說成是「世界謠報」。

那群永遠效忠毛江的左傾份子，一直主張「江青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們認為，新中國婦女已頂住半邊天，為什麼海外反動傳媒如此歧視女性，以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她應是當之無愧的「革命接班人」，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世界日報」居然造謠誹謗她，當然應該打。由此可見中共的欺騙滲透和暴力顛覆，並非始自盲流出身的梁冠軍也。

左傾份子最激烈的活動是一九七六年孔子大廈落成、孔子銅像樹立的階段。那時候中國大陸正掀起批林批孔狂潮，中共爪牙及他們的同路人也在海外響應，把孔夫子當作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動派及階級敵人加以批鬥。因為孔子大廈以「孔子」命名已經「反華」透頂，還要在大廈前樹立孔子銅像更是傷害十三億人民的感情。何況這座銅像又是台灣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所送，可見存心與「祖國」作對，是可忍，孰不可忍，非想辦法破壞不可。於是他們用鐵棍毆擊孔子銅像、破壞基石，並向銅像潑紅漆、貼標語，聲稱打倒孔夫子、林彪與國民黨反動政權、完成「祖國」和平統一。

當孔子銅像樹立那天，中華公所屬下六十僑團均派代表到場舉行一個祝賀儀式，面對銅像並掛五星旗的崇正會會眾大為不滿，紛紛向參加儀式的僑領擲雞蛋，幸虧警方有人駐守現場，立即展開偵查行動，防止情況惡化，才沒有武鬥暴力事件發生。經過這番騷擾，僑胞才真切地瞭解了中共在紐約的動向與他們的暴力傾向。

不久前，法輪功會員遊行經過崇正會門前，也遭到一群不知名的左仔襲擊，他們把法輪功會員當作孔夫子與國民黨反動派，總之這些中共爪牙必然是愛中共所愛、恨中共所恨。當然，此刻他們已不再仇視孔夫子，也不把國民黨當作頭號敵人了。

早年中共在紐約的爪牙，以國民黨為敵視對象，他們拉攏台獨份子一同為推翻國民黨努力。現在，國民黨在台灣失去了政權，他們就把矛頭指向了形形色色的反共人士，對已成爲北美最大華文報紙的「世界日報」不再打擊，相反極盡拉攏、討好、收買、滲透之能事。因為現在他們在美國的大敵就是法輪功人與反共人士，其中民運份子雖然將近三十萬人，他們曾借「六四」被中共迫害要求政治庇護而取得美國居留權，此刻已入籍成爲公民，但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過橋

抽板，不但不再痛恨中共政權，相反為中共唱讚歌，中共也不再防範他們。所以，現在中共在乎的是法輪功龐大的會眾，因為他們有計劃、有行動，既擁有報紙又據有電視台，令中共十分頭痛，因此他們只要找到機會就要向法輪功會眾下毒手。梁冠軍之所以襲擊法輪功學員就是這個道理。海外大多數華人都是中共暴力武鬥下的受害人，因此對法輪功的遭遇表示同情，我相信美國法律會給法輪功會員一個公道，也會制裁那些誤把美國當作中國的左傾親共份子們。

之二

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

頒獎大典記盛

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第十一屆頒獎典禮，於二〇〇三年七月七日下午三時在紐約華埠中心的中華公所二樓會議廳舉行，參加的來賓將近二百人，把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氣氛隆重而熱烈……

頒獎會場中央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兩旁是美國國旗與中華民國國旗。中華公所主席兼「大紐約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任委員伍廷典是頒獎大典中的主要人物，在他兩旁是涵蓋紐約傳統僑社團體的美東聯成公所主席陳玉駒、臺山寧陽會館主席伍銳賢，而出席的僑學界人士有知名學者夏志清教授、「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等。

中華公所主席兼大同盟主委伍廷典在致詞中推崇萬人傑生前在香港為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對抗極權暴政的精神，並對獲頒新聞文化獎的四位男女余杰先生、謝幼田先生、楊逢時女士及羅塞特女士表示敬佩。他說：希望得獎人今後秉持萬人傑精神，繼續為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而努力。

美東聯成公所主席陳玉駒也上臺對得獎四人表示敬佩，他相信在有理想的新聞文化工作者領導下，中

國人必會奮起與暴政抗爭，並得到最後的勝利。他以香港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來證明他的說法。

臺山寧陽會館主席伍銳賢，是年輕的僑社領袖，他來自香港，經歷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港共暴動，親身體驗到共產黨暴徒的惡行，目睹當年共產黨暴徒以汽油活活燒死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兄弟，他說，他永遠忘不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發生在他住處附近一一九龍窩打老道的慘痛事件，林彬只不過在節目中批判中共就遭到毒手。這種觸目驚心的事件的發生，促使他移民遠離鄉國，來到美國定居。

伍銳賢回憶萬人傑在香港最險惡環境中撰文指責暴徒，安定香港民心的表現。他推崇萬人傑是抗暴英雄、文化鬥士，他相信今日得獎的新聞文化工作者必會步萬人傑的後塵，繼續抗暴、對付邪惡。

我是基金會秘書長，每年都在頒獎典禮上做工作報告。由於我來自香港，經歷過香港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也曾與萬人傑一同在香港新聞界並肩作戰，因此我在工作報告上補充說明了伍銳賢主席關於林彬被燒死的經過，並評述暴動後，大批香港人逃離香港的往事，並把萬人傑當年在香港的種種傑出表現告訴在座的來賓。

我說，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萬人傑在香港創辦「萬人日報」，其意義是秉持全面抗日戰爭精神去對抗目前的共產黨暴政。果然「萬人日報」出版後便一紙風行，中共在香港的爪牙不但幾度要暗殺萬人傑，並命報攤不可售賣「萬人日報」。幸虧香港政府指派警務人員護衛，才使萬人傑逃過劫難。到了一九八四年中共與英國談判，決定「收回」香港，香港人與萬人傑都知道這次在劫難逃，乃把九七年七月一日視為「大限」臨頭，紛紛做好移民打算。多虧這時主張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知道香港人不歡迎共產黨君臨，恐懼共產黨統治香港，由於怕香港人跑光，於是叫出「五十年不變」與「一國兩制」，這才止住香港人的移民潮。

在夏志清教授與馬克任先生、梁君甫先生致詞後，頒獎儀式開始。本屆得獎人有來自北京的青年作家余杰先生、來自美西的歷史學者謝幼田先生、來自美中的音樂家楊逢時博士及在紐約《華爾街日報》總社處理中國新聞的羅塞特女士，他們分別得到新聞獎

及文化獎，獎品除獎金外，還有一座設計很美觀的獎牌，上面寫著各得獎人得獎的理由與褒詞。

過去十年來獲得「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的傑出人士有二十八人，加上本屆四人，共有卅二人得獎。這個每年定在七月七日頒獎的文化活動，已成為美東華人一大盛事。它得到以中華公所主席為首、美東聯成公所與臺山寧陽會館主席為副的僑社領袖們贊助，再加上美東地區的僑學界人士支持，因此每年頒獎大典引起僑社廣泛的注意。中華民國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每年均列席致詞。眾所週知，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是紀念香港已故新聞工作者萬人傑先生而設，萬人傑先生原名陳子雋，他於一九九一年在美國波士頓去世，他的妻子陳何智明女士，把他遺留下來在香港灣仔的住所賣掉，把賣屋的這筆錢存入銀行後，成立了基金會，每年把這筆錢孳生的利息當作獎金，頒發給海內外與他理念一致的傑出新聞、文化工作者。

基金會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成立並頒發獎金，得獎的人中有知名文化人李志綏醫師、王若望等多人。

第十一屆得獎的四人中，以青年作家余杰最受矚目。這次他能來美國，是托美國政府之福——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因欣賞余杰的才華與膽識，邀請他六月間來美國作為時一個月的旅行訪問，故余杰能在七月五日結束這段行程後趕來紐約接受頒獎表揚。

華府自由亞洲電台節目主持人張敏女士介紹余杰說，“今年二十九歲的余杰，是北京大學的文學碩士，今年二十九歲卻已經出版了十三本暢銷著作，備受海內外華人同胞所欽佩。”

余及杰從中華公所主席伍廷典手中接下獎金與獎牌後，在發表致答詞中，詳細敘述了他對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的悲憤感受，並闡述他對民主、自由嚮往之殷切。他說：“在這七月的陽光下，請允許我向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為了捍衛尊嚴而受到凌辱的優秀同胞致以深深的敬意。”

第二位接受表揚的是音樂家楊逢時女士。歷史學者辛灝年在介紹她的時候說，楊女士是中國留學生中第一個在美國得到音樂博士學位的傑出文化工作者，每年六月四日都在美中地區舉辦悼念音樂會來撫慰因中共“六四”屠殺失去孩子而悲傷哀慟的母親們，並提

醒關心中國人權的朋友督促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善待被他們所掌控的中國人民。

楊逢時從萬人傑夫人手中接下獎金獎牌時說：我要用我對音樂的熱情來表達我的感受——上帝珍惜每一條生命，追求自由是全人類每一個種族、每一個民族應有的最基本的權力，崇尚生命則成了我音樂創作最基本的靈泉。

第三位接受表揚的是歷史學者謝幼田。他一九八〇年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試以後進入四川社會科學院，先後擔任編輯、研究員。一九八七年應美國胡佛研究所之邀長期從事客座研究，出版專著有：「中國政治文化史論」、「謝慧先生事蹟紀傳」、「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志在根據中共的檔案資料把中共顛倒歪曲的歷史釐清。

第四位得獎的羅塞特女士是《華爾街日報》女記者，專門採訪處理中國新聞，對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的努力給予支持。名記者于金山先生在介紹她的時候說：羅塞特女士愛中國與中國人，因此對中共的禍國殃民有十分深刻的批判。

第十一屆頒獎典禮順利完成之後，我與好友談到基金會頒獎十一年的一點感想，回首前塵，竟萌生不少感傷……

一九九三年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在紐約華埠成立，並決定把第一屆新聞文化獎頒給剛剛來到美國的王若望、鄭義先生、劉香成先生等三人。

那是「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發生不久的年代，海外華人痛恨中共殘暴、同情民運份子處境，基金會據此立場決定了頒獎的條件，因此第二屆再頒獎給魏京生、王軍濤、曹長青“異議”份子。

基金會的決定引起許多誤會，並產生不少流言。有人造謠說基金會是國民黨與美國 CIA 出資成立。儘管我們從基金會成立後的十一年間，不止一次聲明這是香港名作家萬人傑先生生前遺留下來在香港產業變賣的錢，但仍然有人以為基金會有政治背景，於是發生過不少令人難以釋懷的事。

記得第二屆頒獎給一位民運份子時，該民運分子因認為是臺灣國民黨出錢頒獎，一方面拒絕出席，一方面又想要那三千元獎金，於是叫他的妻子來領獎，並告訴我：他自己因仍要回中國大陸，怕引起麻煩，所以不能參加頒獎典禮。

該人士的話令基金會同仁十分不滿，有人罵他佔了便宜還要賣乖。他應該知道，他拿去的三千美元是萬人傑生前寫稿賺來的血汗錢，他的妻子在先生去世後，爲了節省開銷搬去波士頓，住在政府建的平民住宅內，過著簡樸的生活。她之所以同意把獎金頒給他們，只不過同情他們被中共流放的處境而已，想不到該民運分子會這樣打量基金會。

在每年決定頒獎對象時，常會接到與民運人士有關的朋友打電話來說，瞻人被中共流放來美國，衣食無著，基金會可否先把獎金送給他應急，到頒獎時再宣佈。

即使受人尊重的王若望老先生，去世前也曾經以爲頒給他的三千元獎金是一種政治酬庸，甚至懷疑我是國民黨的幹部，因此我給錢他、照顧他、或者跟從他，都是我份內的工作。當然，這個誤會，由於朋友的解釋而消除，王老依然是受人尊敬的人。

也許大多數得到獎金的中國大陸異議份子都有這種想法，因此獲獎後便不再與基金會同仁來往，甚至每年頒獎典禮也不來參加，即使寄邀請函給他們也置之不理，並以爲這是他們“清高”的表現。

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同仁，多數是傳統僑社裡的老華僑，他們之中不少人靠政府養老金生活，住在廉租的政府樓宇內，日常生活之簡樸與貧民無異，但他們決定頒獎時一點也不吝嗇。

基金會最初決定把萬人傑夫人拿出來的錢存放在銀行生息，以利息頒發獎金；三年前基金會同仁爲了提高基金會獎額，把基金會的錢投資「共同基金」（Mutual Fund），沒有想到股市下跌拖累共同基金，以致略有虧損，基金會同仁爲了維持獎額，甚至有同仁把養老金墊出來。這種對基金會愛護、對得獎人敬慕的表現，令人十分感動，這大概是那些把基金會視爲有政治背景的人所無法想像的事實。

我之所提起這些往事，只是想讓公眾知道基金會的背景與性質。今後基金會頒獎的對象，不再局限於從事民運的人士或異議份子，當然更不會再與那種認錢不認人的所謂民運份子有任何來往。既然基金會標榜新聞文化，因此基金會同仁決定把從事新聞文化的華洋人士列爲優先頒發的對象，對他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傾向則列爲次要考慮，希望公眾對此有所瞭解。

之三

台北三民主義大同盟今昔

——兼為大陸反共人士辯誣

本刊編委孫雲按：自從王炳章博士去歲為中共在越南綁架回國被判為終身囚犯，歷史學者、本刊主編、非民運分子辛灝年在紐約為援救王炳章而慷慨陳辭，混跡在海外的中共民運特務，第二天就在網絡上聲稱：“在解決了王炳章之後，就要解決辛灝年了！”我將此話告知辛先生，辛先生一笑：“此對一介文化人的我，該是何等地榮幸！”

果不其然，網上立即就有所謂“什麼黨”，也專門就是這個“什麼黨”，和這個黨早已暴露在海外的“公開特務”，便什麼謠都敢造，什麼誹謗都敢放地“企圖”大鬧特鬧起來。他們一方面想將辛灝年打成是國共兩黨的高級特務，將他說成是如今那個祇一心想被共產黨統戰的“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槍手和宣傳幹事；一方面則企圖將被他們認爲的、當今海外反共要民主的新生力量和正派力量，如中國留學生《博訊》網站，新誕生的中華愛國民主黨及其負責人清水君等等，統統打進臺灣那個什麼三民主義大同盟的“髒泥坑”，一廂情願地想利用一般人對這個“大同盟”的不了解，來將他們今日頂頂痛恨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和有正氣、有力量的中國留學生們，放到一個鍋裡給“煮”了……

其實，對這些混跡海外民運的中共小特務，本祇該置之一笑而已，而辛灝年和上述一些朋友也確實沒有把他們的誣蔑造謠放在眼裡，更沒有把那個“東西”放在心上，哪怕他們在海外還有著更深、更厲害的所謂“人士”在撐著他們。但是，對於當前那個所謂的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我們倒是覺得有必要作一些介紹。因為，這個大同盟，他們果真還是個堅持三民主義、堅持反共要民主的“大同盟”，面對著這一番誣蔑，豈但是倒也罷了，甚至就是當真被人認爲做了它的“槍手、幹事”什麼的，倒也還不失為一種光榮。——只要這個“大同盟”心裡還有著那一份真三民主義的情懷、還有著苦難的大陸人民就行。但是，這個“大同

盟”多年來的表現，卻使被造謠者感到，被人硬要責進這樣一口鍋裡面，也是有點過於地噁心了些……

恰巧紐約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的秘書長、著名反共報人李勇先生，對當今那個臺灣的“三民主義總盟”早就有了骨哽在喉、不得不說的話，所以，我們就將他的一篇介紹台北三民主義大同盟今昔的近作，作為他的新聞追蹤專稿之一，發表出來，也好給大家作飯後餘興時的“談資”，以使更多的人，都能夠對臺灣那個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歷史性變遷，多少增加一點認知。或許，這對他們，還可以起到一點正面的作用呢？

但願如此。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中國人最高理想，追求自由、民主、均富，是所有中國人追求的目標。中國如統一在這個目標之下，中國的富強必定能夠實現。

但是，這個目標對主張以共產主義統一中國的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來說，那可是一種大逆不道的反動思想。因此，二十多年來，中共政權及其同路人千方百計詆毀在臺北成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栽誣或者打擊有此理念的海外華人，把他們當作間諜特務拘捕，甚至栽贓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海外華人“拿了國民黨多少經費，每月支取薪水若干等等”！

中共這種血口噴人的謠言，竟透過網路向外界公佈或透過他們的喉舌傳播。爲了拆穿中共及其同路人的惡毒用心，我覺得有必要把“大同盟”成立的經過與當前的變化，向關心中國和平統一的朋友說個明白：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九日，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北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理由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實施了三十多年的三民主義，使人民安居樂業，成效卓著，證明了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中國大地如果要想達到自由、民主、均富的境界，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在三民主義制度下達成統一的中國才是十三億中國人熱愛的中國。因此“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組織，就在這種背景下，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臺北成立。

那是蔣經國總統主政的年代。在他主張下，臺北成立的大同盟立即昭告天下，世界各地華人均積極響

應。臺北大同盟由中華民國執政黨主導成立，因此首任主委是有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何應欽將軍擔任。五年之後，何將軍逝世，一九八八年元月，曾任國民黨秘書長馬樹禮先生接任，馬先生德高望重，接任後得到臺北工商界大老支持，籌募了逾千萬元新臺幣的活動經費，並召開多次國父思想研討會，舉辦了許多活動，同時並支持北美地區大同盟每年在各地舉辦的年會。

一九八二年四月六日，旅居日本的華僑李海天首先宣佈：“橫濱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在橫濱的華人社區成立，他將結合橋社團體，一同參與大同盟的活動。

繼日本之後就是美國，美國八個大城市的華埠，以中華公所及中華會館爲首的僑團，也宣佈成立大同盟組織，所有僑團都是大同盟的成員，各地大同盟的主委，均由當地的最高僑團領袖擔任，成爲僑團中的僑團。

“大紐約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是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成立，首任主委是當時中華公所主席鍾僑征先生。鍾先生是國民黨人，也是華埠社區的人。當他在中華公所例行的常務議員會議上宣佈此一消息時，全體與會議員一致鼓掌通過，即使左傾的僑團也沒有反對。原因是：海外華人社區，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一向十分尊重。當然更服膺孫中山先生遺教，他們都知道，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是我們中國人都可以接受的治國寶典。

鍾僑征同時宣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是全國性的組織，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可參加，國民黨員固然應該參加，擁護中華民國、認同三民主義的人更應該參加，即使親共的人只要接受這個理念他也表示歡迎，在這個號召之下，大同盟在紐約成立當天，有一千多人在中華公所大禮堂聚集，同爲此一崇高的理念歡呼。並立即舉辦籌款餐會，籌措大同盟的活動經費。

到目前爲止，全世界各地共有八十六個大同盟組織，這些組織與臺北大同盟並無從屬關係，也不受臺北大同盟約束，但由於理念一致，大家均以臺北大同盟馬首是瞻，一同向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路途邁進！馬樹禮接任臺北主委第二年，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北

京天安門發生驚天動地的民主運動，有百萬青年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共實行民主政治，給人民自由，並指責中共政權貪污腐化，中共惱羞成怒出動坦克車與軍隊鎮壓，在天安門廣場內外展開屠殺。此一暴行遭到舉世譴責。馬樹禮主委深受青年學生追求民主自由、提出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表現所感動，立即從臺北大同盟經費中撥出一筆錢資助逃離中國大陸的民運份子，並吸收大陸人士加入大同盟，共同奮鬥。

也許是因為如此，鎮壓民主運動的中共政權對大同盟恨之入骨，於是造謠破壞，並把大同盟視為間諜組織。其實，自從蔣經國去世，有台獨思想的李登輝繼任大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已無統一中國的興趣，當然更無光復大陸、反共復國的宏圖。於是，他上任後不久，就宣佈取消「懲治叛亂條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治實體，放棄兩蔣定下來的反共國策，竟把千方百計逃去公海的大陸民運人士押送回大陸，把駕機投奔自由去臺灣的反共義士當作囚犯，判刑後送回中國大陸任由中共宰殺。李登輝明言這是他對中共的善意，希望中共也有善意回應。結果是，中共不但沒有善意，而且加深了對中華民國的敵意，而最令海外僑胞寒心的是，李登輝切斷了國民黨政府與僑社和同盟的聯繫。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大同盟根據臺北的「人民團體法」修訂盟章，依法申請為「社會團體」成立理事會，馬樹禮主委為首任理事長。到了公元二千年三月任期屆滿，由臺灣省籍的高銘輝先生接任。

臺北大同盟一直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念與立場。但從若干迹象看出，臺北大同盟與成立之初的表現已大不相同。最顯著的變化是：早年他們同情民運人士，贊助民主運動，但到了最近幾年則開始排斥民運人士，不但與民運組織保持距離，甚至拒絕來往。導致這種現象，固然是海外民運人士的表現令臺北大同盟失望，再加上中共一再把大同盟視為間諜組織，也使他們心生恐懼。臺北方面知道中共對民運分子深惡痛絕，為了避嫌，便與民運組織劃清界限。因此五年前，北美地區大同盟年會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時，曾決定下屆年會由大紐約地區大同盟接辦，當時馬樹禮理事長立即反對，理由是，紐約地區大同盟立場太反共，與民運組織來往太密切，而臺北大同盟目

前正積極與中共政權接觸，保持交流，紐約大同盟的表現與臺北大同盟的政策不符。

臺北的朋友透露了內情，原來大同盟內頗受馬樹禮重視的副秘書長明居正，經常遊走於臺灣海峽兩岸，也穿梭於中美之間，其目的不明。但從其表現出來的立場看出，他“馮滬祥的味道濃厚”，因此他仇視紐約大同盟，排斥民運分子，相反，卻一心拉攏中共御用學者、紅色幹部去臺北旅行遨遊，表面上是讓他們看看臺灣實行三民主義後的繁榮富裕景象，其實是向中共示好，企圖消除中共敵意，強調大家都是炎黃子孫。

有兩件事發生，使人對臺北大同盟的立場產生疑慮：

第一件是二零零一年二月，中共拘捕一名從美國回去中國大陸的女學者高瞻，指控她是“臺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間諜，理由是她曾經四次去臺北接受臺北大同盟招待。但當高瞻被中共拘押審訊之際，臺北大同盟前後任理事長正在北京與中共“交流”，正在把酒言歡，談得十分投機。那時候，高瞻被中共拘押的消息，已傳遍國際，美國當局為了營救高瞻，向中共施壓，要他們放人，但臺北大同盟居然毫無表示，也不為高瞻澄清。因此高瞻被釋返回美國後，對此大為不滿，她甚至懷疑臺北大同盟內有人與中共勾結陷害她，誣指她是間諜。

第二件是北美地區大同盟第十四屆年會在華府召開時，大紐約地區大同盟邀請來自大陸的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去年會上發表演講，介紹他的大作《誰是新中國》，他認同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推崇蔣介石先生，因此他的演講得到全美八個地區大同盟代表熱烈歡迎，掌聲不止。因此，會議當即議決，要透過僑委會安排辛灝年先生到臺北巡迴演講，振奮臺北人心。紐約地區大同盟立即擬好推薦信，並以傳真機傳去臺北大同盟，結果臺北方面毫無反應。後來有人說，辛先生去臺北演講的事，臺北大同盟反對，國民黨當局沒有興趣，理由是，辛灝年可能是中共高級特務。此後辛灝年雖然在北美處處受邀講演，各地大同盟也十分熱情地邀請他，但台北總盟總是“暗中抵制或搗亂”。

後來臺北由於統獨之爭，不久統派人士因反獨而投共，也有痛恨李登輝而親共，他們當然不會招待在

海外反共的人士去臺北，好在各地大同盟都是獨立個體，與臺北大同盟沒有關聯，也很少來往，只要認同三民主義的理念不變，彼此仍然是同道中人。不過經過這些變化，可以窺出臺北的政治氣候變化，兩蔣時代對中國大陸有情有意的國民黨的人已不存在，下一代的國民黨人中，對中共的邪惡政權甚至產生幻想，國民黨內就曾經傳出**要與中共友好的說法**。真是令人既意外又難過。兩蔣雖已去世，但中國國民黨不能卸下他們對中國大陸的責任，當年他們在大陸，老百姓交糧交稅給他們，要他們管理好國家，保護好老百姓，結果他們不爭氣，敗退去臺灣，把大陸老百姓留給中共政權囚禁殘殺，下放勞改。大陸老百姓五十三年來所受的苦，國民黨也有責任，不能因為兩蔣去世而改變國民黨的政策，放棄國民黨的責任，**因為國民黨還叫中國國民黨，不叫“臺灣國民黨”**。

臺北大同盟，此刻的主持人仍是國民黨人，紐約大同盟的人有權要求他們正視現實，不要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也不要動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念，正如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臺北大同盟理事長高銘輝與秘書長曾復生在一封致海內外盟員公開信中所說：讓我們的心連心、手攜手，堅定地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共同為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中國而努力。

走筆至此，在網絡上又看到中共及其同路人醜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文字。他們居然能夠無中生有地栽誣著名反共學者辛灝年竟擔任著三民主義大同盟的宣傳幹事，是大同盟的槍手，每月還拿大同盟二千二百元薪金；造謠說反共的中華愛國民主黨及其負責人清水君，和雖然中立、卻反共影響很大的中國留學生《博訓》網站，都是以三民主義大同盟作為政治背景的，為“大同盟所領導、所指揮”，真是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恥。他們為了“保護共產黨”，竟然不惜將那個現在**根本不反共的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美化成“反共之盟”了！這些混在海外民運中的中共特務們，他們不相信人有是非善惡之心，因此以共狗之心度海外反共華人之腹。我們相信，這些網絡上的爛言，影響不到各地正派的大同盟團體今後的運作，相反，祇會更加刺激各地真正大同盟人對中共的敵意，或許還能因此而將臺北大同盟對中共的幻想消除，放棄與中共方面再搞什麼友好交流了！

秉承春秋大義的名報人

—— 李勇

前聯合日報總編輯 黃玉振

在近期出版的《黃花崗》歷史文化季刊第四期中，讀到名報人李勇先生寫的一篇題為“巨大的成就，渺小的人格”批評大科學家楊振寧的文章，衷心的敬佩他滿懷熱愛國族，哀念蒼生的無限悲情，承傳春秋大義的傳統精神，評論是非，辯證善惡。這篇文章評盡記述楊振寧如何忠愛中共政權的過程，如何在言論上行動上歌頌毛澤東的“偉大、正確”，為毛殘殺暴行辯護，以及輕蔑、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所引述的資料豐富，確鑿事實，文情縱橫，筆端流暢，引起共鳴。

我們這一代逃避暴政的海外中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推行馬列主義暴政，殺人盈野，滅絕人性，摧毀文化，橫行掠奪，奴役壓榨，民不聊生，帶給中華民族史無前列的浩劫，無不痛心疾首。從“土改”、“三反五反”、開始大屠殺到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止的數十年間，海外傳統僑社廣大僑胞滿懷國破家亡之悲痛，激於大陸同胞親友慘遭迫害的義憤，曾一波又一波的掀起反共運動，遊行示威，抗議請願，從未間斷。雖無法改變大陸政治現狀，而華僑愛國救民的熱情，對暴政的同仇敵愾，因引起國際重視，對中共亦不無威懾之效力。但最使國人寒心的不幸事實，是像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之頂尖科學家楊振寧一類人物，不顧是非，不辨善惡，助紂為虐，自滅讀書人的志氣，助長獨夫之淫威，誠為我中華民族最可悲哀的事。

知識分子是非常可貴的。放眼古今中外，社會如無前知早識，文化不會進步，知識分子是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的倡導者，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凡希臘所謂智者、愛智者，羅馬所謂文士，十七世紀以來，歐洲所謂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近代所謂科學家、文學家、著作家；中國自古以來所謂師、儒、士、聖、賢、哲、文士、學士，和一般稱之為「讀書

人」；今日各種以知識、學問、文章、技術，從事精神勞動者，俱可稱為知識分子。文化即人道，知識即權力。人類賴知識文化之功，超於禽獸之上，提高其能力與生活水準。知識分子固然是文化創造者，知識傳遞者，人民教育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更是道義維護者，良心鼓舞者，人性保持者，社會安定者。人類歷史上每當世衰道微時代，或國家被統治者斷送後，就要靠幾個讀書人奮起，撐持場面，

尤其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特別受尊敬，除了因為他們在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教化民眾、提高生產、團結國民、保衛國家、貢獻其心血之外，更懷著極大的責任心，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發揮其為維護平民利益而奮鬥的精神，為捍衛正義不惜犧牲的精神。中國無論儒家、墨家、道家，都以平民代表的資格，本忠恕立場，仁義原則，為平民請命，必要時，挺身而戰，萬一無法，退守方寸之安。但無論如何，不受貲財暴利之淫屈，可殺而不可辱，使寡頭暴君不無忌憚，使帝王權力有所限制，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這種精神教育、鑄造中華民族的靈魂和國格，也就保證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沒有這種氣概，早就沒有中國了。

但不幸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精神，迭受無情的摧殘。第一個有系統摧殘知識分子的是秦始皇，此即焚書坑儒生之禍。第二個有系統、有計劃，企圖徹底摧殘知識分子的是毛澤東。蘇聯和受命蘇聯的中共，利用中國戰後的衰弱，中國文化的空虛，進而征服中國，並進而盡力毀滅中國知識分子，以完成其征服。中共以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使淪為“無產階級的工具”，實則做共產黨的工具，做俄國人的工具。其最傷天害理的手法，是用恐怖與飢餓的迫害，對知識分子暴露虐人狂與自虐狂，迫使表演一幕一幕“改造”、“坦白”、“交心”的醜劇，其目的，一方面滿足不學無術無知黨徒暴民的報復心理，一方面是破壞中國讀書人之廉恥與自尊心，使變成毛共的精神俘虜，完全受其操縱，供其使用。由此可見共產黨禍國殃民之罪，不僅在於出賣國家，屠殺平民，尤其在於對知識分子的精神凌遲、靈魂污辱，這是絕不可以饒恕的罪惡，這也證明蘇俄唆使中共替其征服中國，要先消滅中國文化（如十年文革）的原因。而要消滅中國文化，就是要對中

國知識分子作徹底的摧殘。當知識分子違背了中國文化精神和本身傳統，忘記了責任心與自尊心而自賤自辱之時，就是國家精神崩潰，民族靈魂喪失之日，就出現了虛偽充道德，八股代學問，阿諛說謊即文章，視荒唐為英雄，視符咒為天書，直至公然的恐怖，公然的無恥。

在這種專制恐怖統治下，李勇批判楊振寧文章指出，如大陸名作家謝冰心要生存，就不能不說違心話，不能不做違心事，“不應該追究，而且應該原諒，這根本不是甚麼風骨問題，而是生死交關的問題。”但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的美籍華僑科學家楊振寧呢？享受崇高的榮譽，生活於自由民主的美國，處於資訊靈通的時代，有理由有必要本著做人的良心，和中國讀書人應有的道義精神，為民呼冤，揭奸伐暴，伸張正義，為甚麼要「泯滅良知」、「助共為虐」呢？難道對於八千萬人民慘遭暴政屠殺迫害死於非命，對數以千萬計知識分子被判為「右派」而置於死地，真能無動於衷嗎？楊振寧無視中共在大陸種種踐踏人權、滅絕人性的政治運動，竟認為反右運動是必需，大躍進是正確，文化大革命有道理，大飢荒無法避免，把史無前例的屠夫暴君毛澤東，吹捧為「民族救星」。當毛喪命是，楊振寧竟然能面對學生痛哭流涕，大呼「中國豈可沒有毛主席領導！」

說到此，筆者認為李勇批判楊振寧這篇文章，是承傳春秋大義傳統精神之傑作。

今天，我們海內外中國人，要救國家，救民族，復興文化，匡正人心，絕對需要發揮春秋大義的正統精神力量。

孔子生長於一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詐，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篇）的混亂時代，一切言行失去標準，是非善惡混淆不清，真假不分，篡殺淫亂，視為故常。所以，“孔子懼，春秋出”。《春秋》這部書是一部正名的書，使天下思想行為有個公認的是非善惡真偽標準，促使撥亂反治。

孔子的春秋筆法，只用很少字句來褒貶是非善惡真偽忠奸，簡明扼要，正義凜然，使亂臣賊子看後能知所警惕畏懼，不敢為非作歹，故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就是春秋大義的精神表現。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博大的文化中，最基本的精

神就是“春秋大義”，包括民族大義、國家大義，延伸為政治社會的大是大非。在中國五千年歷史進程當中，有過暴政統治，有過篡竊統治，有過侵略者的統治，更有過漢奸流寇的統治，不論其局面是大是小，都是民族的災害，中國人都不予以承認，決心加以推翻，因而這些統治的箝制，很快就消滅了，這就是發揮春秋大義正統精神力量的效果。

因此，國家民族雖遭受中共統治五十餘年的災難，中國知識分子慘受摧殘，我們無須悲觀，到底中國人文文化根基深厚，人心未死，士氣並未消亡。大陸民間反暴運動，前仆後繼，為爭生存，民不畏死；知識分子普遍覺悟，恢復自尊心與自信心！著書立說，敢於批判。近年呈現著令人興奮的現象，不勝枚舉。譬如：一、大陸新生代知識分子，一般厭惡共產黨專政，要求民主自由，用真名發表文章，在海外報刊發表，大膽批評暴政，令人欽佩。在歷史學家辛灝年教授主編的《黃花崗》季刊裡，及自由時報《民主論壇》等，刊載許多這類的精彩文章。二、海外不斷出版揭露中共統治數十年來如何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巨著，所列舉屠殺老百姓的確鑿證據，如何集體殺戮達到上級指標，人吃人慘劇在甚麼地方村莊發生，及吃人被吃者的真實姓名都列舉出來，令海外廣大讀者不忍讀，又不忍不讀。這使中共一手遮天自我粉飾的企圖，歸於破滅。三、中共至今仍自感其政權孤立虛弱，採取一貫的恐怖手段對付異議分子民運人士，但大陸反共志士無畏鎮壓，奮起挑戰，不怕坐牢。基於不能寄望能“和平演變”，逐漸傾向於革命行動。四、最具有諷刺性的，是由中華民國培植出身的楊振寧，七十年代和一些親共學者登報促美與中共建交時，聲言中華民國早在一九四九年滅亡。時至今日，中華民國不僅堂堂正正屹立於世界，位於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先進國家之列，而且大陸學者鑑於共產主義已徹底破產，掀起研究三民主義高潮，提出「三民主義，建設中國」、「走孫中山的路，這就是結論」。（按：《黃花崗》刊出一系列大陸學者宣揚孫中山先生理論文章），這是楊振寧所料想不到的。

最後，筆者要為傳承春秋大義精神揭奸伐暴的李勇先生和所有致力救國救民的志士仁人歡呼，還寄語楊振寧博士和所有擁毛親共人士，勇於反省，激發天良，促中共摒棄暴政，救救蒼生！

《黃花崗》雜誌董事會及現代史研究所 第六次財務公告

(4/1/03 - 6/31/03)

總收入	2688.00
捐款	1060.00
雜誌銷售	276.00
雜誌訂閱	1352.00
總開支	20235.64
印刷費	3285.00
打字費（包括補發的打字費）	562.50
外請編稿校對費	500.00
美國及海外發行費(追補3期500元)	1100.00
稿費	3041.50
郵寄費	1154.64
辦公室租金(含搬遷後定金、手續費)	4300.00
辦公室水電雜費	350.67
電話費(包括寬頻上網費)	364.36
雜誌社接待費	674.45
外請兼職人員誤工補償及車馬費	3000.00
辦公室用品(購電影機攝影機冰箱等)	830.52
辦公室搬遷費	170.00
周祥文集打字費(部份)	300.00
捐助紐約華府民運聲援王炳章蒙難周年會場費用	527.00
第五期雜誌搬運費	75.00

說明：

- 一、本期賬目由常務董事孫雲計算、董事長周光亞審訂。
- 二、上期所指總收入誤算610元不明，經查驗為重算，故應在總收入中扣除。
- 三、本期謝辭稿費的有：孫國棟、周亞輝、馬有志。
- 四、第五期主編所得稿費已經全部回捐黃花崗雜誌專款專用。

以史為鑑

“憲制”立國

“黨治”歸憲

——兼論以“中華民國”統一中華兩岸

旅歐大陸學者 蔣學鳴

中國古代與“憲”無緣。古中國乃皇帝“私產”，改朝變“國號”，換代變“年號”。古中國沒有世襲貴族，只有世襲皇帝，因皇權不可分，故至高無上。一切權利源自皇帝賞賜。古西方之“憲”源起於“分權”：神長與君主分權。古中國敬人如神，人神合一。中國人信“人治”。古西人信“神制”。因此，中國人以“治”代“制”，而西方人卻以“制”限“治”。中國人常找人的毛病，思想亦可得罪，政治人物總嫌百姓素質不高。西方人常找制度的毛病，思想大可自由，政治人物總嫌制度不够完善。東、西兩種政治文化，孰優孰劣？國人自可見仁見智。中華文化之精華乃“中道之學”，如可與西人之“制”相輔，有望開中國歷史新回合。

憲法乃諸法之源。法從憲來，正本清源。各國皆多法，然絕無“兩憲”。以往中華兩岸“黨治”下的憲政實踐表明：法案太多，立法不斷，然常互相重複抵牾，減損執法效力。究其主因，實乃“法源”不清。黨治、黨法難民主，非黨公民無庸置喙，豈有國憲尊嚴？國大？法大？黨大？中國人難回答。公民意志與民主手段同等重要，是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不可缺少的條件。“黨治”必須歸憲，在“憲法”下運作，以“憲制”立國。“公民”的國家，才能組成“公民”的世界。“憲制”下的政黨，才能造就民主自由的國家。

筆者從國際通行的憲制規範，分析中華兩岸“統一”之難題，看見一個事實：只有用“中華民國”的“承繼主權”，才能涵蓋中華兩岸現存的“既成主權”。

一九四九年中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因“一國兩憲”及“中華民國”治權被分割而產生“兩個中國”之史實。時人曾有言：“黨不歸憲，國家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內戰”以後，並沒有能够完整取代“中華民國”的“承繼主權”，而只是“既成主權”國家。五十年不變，今天“中華民國”仍是主權承繼、治權被分裂的獨立國家。顯而易見，只有“中華民國”存在“統一”的憲制依據。正因為國際實用外交承認“既成主權”與“分裂治權”，所以“兩個中國”被國際政治變通接受。“臺獨”主張縮減“中華民國”承繼主權，效法中共榜樣，變“中華民國”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式的“既成主權”，把臺灣省從“中華民國”的“承繼主權”中抽出，試圖造成在“中華民國”國號下臺灣“實質獨立”的法理依據。“臺獨”主張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為“既成主權”的兩個獨立分體，實質拋棄“中華民國”這個憲制母體。由此觀之，只有中國大陸“歸國”——“中華民國”，中國臺灣才可能合憲“歸省”——“中華民國之一省”，“一個中國”才能在合乎國際憲制規範下產生，外國勢力才難有藉口介入其中，兩岸百姓才能長“制”久安。

蔣中正、蔣經國先生父子自遷臺後，始終是“中華民國”承繼主權的守護人，不畏中外利誘逼迫，至死堅持“臺灣是中華民國之一省”。中國歷史將誌之。

國際風雲變幻無常。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種國際政治勢力因憲政理念、經濟實力不同而分化改組，今日世界已從“野蠻強權”轉為“文明強權”。中華兩岸未來的政治人物任重而道遠，應明察國際遊戲規則之變化，無遠慮必有近憂。

筆者以為，中華兩岸之“統一”，將是本世紀兩岸中國人對自身最大的政治挑戰。這已不僅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傳統國家政治訴求，而更關係到以下四個方面：一、海內外全體華人在祖國政治上的大和解，棄絕內戰、內耗。二、中國人的整體政治未來，“憲制”立國，“黨治”歸憲。三、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整體的平等接納：一國一憲。四、統一的中華民國儕身於世界文明發達的國家之林；富強的公民社會，捍衛人類平等互利；實現“你的權利、我的義務”之公民理念。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聯合華僑、同盟會及中外友人，在推翻中國幾千年“帝治”後所創的亞洲第一個民主憲制共和國。“中華民國”決不是某黨、某派之專利，而是一切愛好民主憲制的中國人共同的、寶貴的政治財富。中山先生與同期的世界大政治家一樣，有其時代的局限，尤其表現於他生命的晚期，受到當時蘇聯“鄰居老弟”列寧“黨治”理論的影響。但是，中山先生反對封建“帝治”、開“憲制”民主的政治遠見，當時中國無人能出其右。他深知中國，精通世界。他主張在西方憲制分權之“三權分立”之外再加“考試”“監察”兩權。這是他將西方“憲制分權”理念與中國“帝魂難散”的政治時情相結合而創“中道久安”之憲政大構。孫文一生，秉“天下為公”之志，引中國“民權憲制”之先聲，開“民族共和”之偉業，啟“民生尊嚴”於中華。中國歷史將永誌之。

反觀目前中華兩岸的“統一進程”，實在令國人不敢恭維。中國大陸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確是“中華民國”被分裂的產物。中國臺灣已經廢省，拒不承認臺灣只是“中華民國”之一省。這一切置“一國一憲”國際文明政規於不顧之行徑，證明兩岸政治人物均站在“否定歷史、褻瀆憲制”的立場上，無休止地空談“統一”，實在是有辱中華祖先，蔑視國家根本利益，浪費納稅人血汗，模糊國際視聽，有損中國人整體理智務實的形象。難道中國人非“鬥”不可嗎？且總是“鬥”而忘“制”。

中國近百年來從無外侵的歷史。國際社會卻有人視中國為世界文明國家的敵人，視華人為“黃禍”。國際公理何在？中國就註定不能成為世界公認的文明國家嗎？中國人就注定只能盲目“接軌”嗎？筆者以為，中國人在世界上的這種整體形象大半是自己“鬥”出來的。中華兩岸目前尚欠基本的政治文明，中國人因“帝魂難散”而不明白“憲制立國”之重要，加之馬、列播入，而聽任中共“黨治”，以黨代憲，以黨代國，以黨代法，以黨代政……，如此不知釀成中國多少人道災難：“內戰”、“鎮反”、“文革”、“六四”，國分家敗，妻離子散，腐敗公行，公產私有。中國封建“黨禍”遠未就此停止，端看今日中華兩岸權謀：大陸力爭“惟一合法政府”，臺灣妄稱“中華民國只有臺灣”。如此下去，只會中國“統一”無解。臺灣“實質獨立”現已存在。以史為鑑，中華兩岸絕不可再封建“大統”與“偏

安”，“黨治”不能取代憲制，“民粹”不能取代民主。

猶太人漂流上千年，最終建起自己的“憲制家園”。中國人受欺侮上百年，最終卻分裂自己曾有的“憲制家園”。歷史就這麼偶然。難道中國人只有“忍”？或者“流浪世界”？中國政治人物的智商難道還達不到國民平均智商的水準？孔子知“行仁政”須“復周禮”，難道今日中華兩岸政治人物倡導“政治文明”卻可棄“憲制”於不顧？

筆者以為，中華兩岸政治人物應以“國家根本利益”與“民族文化的尊嚴”為重，共同回到“憲制統一”的軌道上來，放棄“黨治”之私見。謀國以制，天下為公。由此，在兩岸各政黨、智庫、社團的參與下，廣邀海外華、洋憲制專家，充分攷慮全體中國人的權利和義務，充分汲取我中華文明之精華，借鑒西方政制之經驗，尤其考慮今日世界之政、經大勢之走向，經過各種民主程序之運作，成立“統一大法”籌委會，為最終制定“中華民國統一憲法”作準備。中華兩岸將和平“依憲”完成祖國統一，兩岸中國人將和平“依憲”成為統一祖國的第一代“憲制公民”。

祖國分裂已五十餘年，“統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會經過許多波折和各種民主程序起動期之艱難，但最終的願景給人民以巨大的動力，兩岸中國人將“依憲統一”在“中華民國統一憲法”的架構下。中國軍人聯合護憲，統一國防，履行“統一憲法”賦予的神聖職責。中國商人統合市場，履行統一商法賦予的權利與義務，增進中華全社會的更大效益。中國學人聯合繁榮我中華文化，統一文字與拼音，恢復我中華哲學、科技大國之尊嚴。中國工、農統合就業，在統一的勞工法下履行義務與享受權利。兩岸“依憲統一”的“中華民國”，符合中國時情，符合兩岸中國人的長遠利益，尤其是“國家利益”與“私有制”得到“統一憲法”的規範。大陸歸國，臺灣歸省，政黨歸憲。“統一”將為未來中國的“公民社會”奠基。“統一”將為中華兩岸光復亞洲第一個憲制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而光榮歷史，繼往開來。公民立憲，政府行憲，軍警護憲，司法督憲，憲制治國，讓統一的中華民國公民，在真正穩定的憲制環境下，創造文明、均富的國家，恢復已失去的統一國家公民的自信、自強、自愛。

（二〇〇三年元月十五日寫於銀杏苑寓中）

三民主義

《政治五原則》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 段正坤

主編按語：一位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在極其艱難甚至是危險的情況下，寫了一本名謂「三民主義的政治五原則」的書，志在繼承三民主義的民主建國思想，意在發展三民主義的民主建國理論，一心要用我們自己先人的優秀思想，來追求我們中華民族的民主富國之路，其精神、其意志、其民族情操、其智慧膽量，都在在說明了，在今日中國，除掉當權者批准和製造的所謂精英之外，在廣大的民間，還有另一類真正的精英，他們視眼前的名利為無有，視中共當權者的「獎賚」為不屑，絕不「又罵又拍」而敢說敢做，絕不自號「自由派」卻在追求真自由，絕不自稱「精英」卻五腹藏書、胸懷大志，他們只將痛苦人民的今天和國家民族的未來放在心頭，腳踏實地地生活在人民中間，一心一意地在驀然回首之中、放眼未來之際，決心走中華民族自己的路，走中國人民該走的路。這樣的精神，這樣的行為，難道不正是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希望所在嗎？

段正坤先生剛過而立之年。我們相信，他在對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研究中，會越來越發現孫先生「沒有過時」的睿智，會越來越發現我們自己的不足，會在「既要傳承、又要發展」之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讓我們期待於他。

作者簡介：理論家，學者。湖南隆回人，1969年1月生，1991年畢業於湖南邵陽某高校，1992年入北京魯迅文學院，同年開始從事三民主義研究。1993年將三民主義解釋成為自由、人權、民主、法治與民生五項原則。經過長達11年的奮鬥，建立起政治五原則三民主義理論體系。2002年11月完成了《政治五原則》一書。

正文：

前言：政治五原則理論體系

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但國民黨的教條主義、知識分子的冷漠主義和共產黨的封殺，使得三民主義就像一塊蒙塵的瑰寶，在歷史的角落熠熠生輝。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不斷地產生自己的經典作家，才能傳之久遠；否則理論就有失傳的危險，就會淪為絕學。三民主義現在真是到了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的時候了。

依據新的時代潮流，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說：「這種工作是一件比石門水庫還要巨大的工程」。「六經責我開生面」。我傾十年之力，終得以完成這一歷史重任，三民主義終於「以一嶄新的面目與大家相見，在中國政治思想上重放異彩」。

我首先在全面理解和把握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上，用自由主義全盤改造了三民主義，使它具備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個人自由，這是連孫中山先生本人也「思慮未精」的地方。個人自由是三民主義和民生哲學的邏輯基礎，也是三民主義與民生哲學永恆的奮鬥目標。將個人自由做為三民主義與民生哲學的支點，是我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出發點。

我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民生政治五原則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具備了新的時代內涵。我以政治五原則為基礎建立了新的憲法理論——新五權憲法，使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合一，簡化了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我在孫中山先生五權分立的基礎上，提出了六權分立的主張。六權分立是一種大三權（立法、執法、司法）與小三權（考試、監察、貨幣）模式。由國會監督小三權，強化了民主重鎮國會的地位，形成 2+4 的三權分立格局，消除了五權分立的內在缺陷。六權分立更加切合中國國情，與孫中山先生以四大民權為基礎的分縣自治，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民主理論體系。

我以生存價值論為基礎，建立了民生主義政治經濟學，使三民主義思想體系趨於完整。我在孫中山先生原有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大政策：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以建立一個以三大政策為基礎，既充份競爭又相互關懷的民生社會，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

以政治五原則為基礎的三民主義的簡化表述，就是民主國家、新五權憲法、六權分立、分縣自治和三大政策。政治五原則回答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提出的所有問題，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的前途。通過我的理論創新，和孫中山先生的原有基礎，三民主義又重新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煥發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後記：十年磨一劍

《政治五原則》一書，真是應了唐代詩人賈島的《劍客》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為不平事。」政治五原則就是我傾十年之力磨的一把鋒利無比的理論之劍，今天拿出來初試鋒芒。傳奇緣起

1992 年春，我在某著名學院讀書，正是鄧小平南巡時期。4 月初的一個晚上，我獨自一人在寢室聽收音機，剛好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青年信仰問題採訪胡喬木。胡喬木說：「現在的青年，既不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信仰儒家思想，不知道他們要信仰甚麼？」言下之意，是青年們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思想嚴重。胡喬木的胡說八道給了我異常強烈的刺激。他話音未落，我就拍案而起，大聲回答：「三民主義！」胡喬木的話讓我太氣憤了，好像世界上就只有馬列毛之類的狗屁思想。真是胡扯。三民主義不就很好嗎！

我冷靜下來後，猛地一拍腦袋，恍然大悟似地醒過來：「我終於找到了我們需要信仰的思想！」我為這個想法高興得跳起來，興奮得徹夜未眠。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欄珊處。

我深知，孫中山時代的三民主義已經時過境遷，如果純粹套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是不會有說服力的，必須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琉璃廠中國書店，買回了一套《孫中山全集》，共 11 卷，就這樣開始系統地研讀孫中山先生的思想。

1992 年，我剛好 24 歲，正是風華正茂、精力充沛的時候。我從 17 歲開始，到 23 歲曾做了 7 年文學夢，發表過不少作品，有良好的人文根基。從 1992 年開始，我就終結了文學之旅，走向了理論之路。艱苦跋涉

我對 80 年代的民主思潮進行了系統研究。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是 80 年代 10 年中總結出來的最高思想成就。但這些思想從來沒有系統化過，從來沒有納入一個思想體系加以闡述，在理論上十分凌亂。

我開始嘗試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這四個原則來解釋三民主義。1993 年初，我明確形成了政治五原則的思想。我真恨不得三天就完成這座登天塔。但這項工作無比艱巨，真像殷海光所說的，比修石門水庫的工程還要巨大。殷海光曾建議國民黨組織一個專門的班子來搞這項工作。而我只不過是一個人，既要學問，還要謀生存，艱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0 年中，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來搞研究，後來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更加要為稻糧謀了。不能全力以赴，不能脫產從事研究，是我最為痛心之事，代價和損失是無比巨大的。

80 年代以來，孫中山研究就已成爲顯學，但學術界囿於政治壓力，只是就研究而研究，把三民主義當做死的遺產，而不是活生生的理論，沒有甚麼創新之處。中國思想界也十分平庸，沒有一個大師級的人物，老當益壯者都是強弩之末，年少力強者又功力不足。

重新解釋三民主義，要集時代思想之大成，這樣才能富有理論魅力。我對這個時代的一些重要思想進行了系統梳理，構築了一套從思想到政策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我尤其重視美國經驗、日本經驗和我國台灣經驗。三大經驗是把理論落實到實踐的根本環節。理論沒有實踐機制，是決不會有說服力的。以政治五原則爲基礎的三民主義，處處都能找到實踐的根基。

我徜徉在思想的長空，特立獨行是寂寞的，尤其是沒有人能理解我的時候。1995 年我曾把政治五原則的提綱給王丹看，他很讚同我的研究計劃，希望我寫成一本系統著作以便發表。2001 年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辛灝年先生推崇三民主義，感人肺腑動人心弦，這使我格外激動，終於看到了同道，更使我信心倍增。

柳暗花明

哈耶克說：「儘管我仍把自己主要視爲一經濟學家，但我日益深切地體認到，對我們這個時代諸多迫切的社會問題的回答，最終須取決於對一些基本原則的認識，而這些原則實超出了專門的經濟學或任何其他專門學科的範圍。」

重新解釋三民主義，要過兩道難關，一是理論創新，二是學術準備。理論創新固然不易，學術準備更是艱難。因爲三民主義涉及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等多門學科，在這些領域都必須達到專家水準。10 年來我的主要功夫就花在學術準備上。在學術上的廣泛涉獵，開闊了我的視野。我尤其覺得這五門學科對於政治理論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就不可能有完整和系統的理論體系。

我記得李澤厚說過，這個時代既要有眾多的學問家，也不能沒有思想家。學問家靠精深，思想家靠博大和敏銳的洞察力。洞察力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正是依靠對這個時代的洞察，才使政治五原則具有廣泛的說服力。

理論研究，哲學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民生哲學就像一把萬能鑰匙，打開了一座又一座思想寶庫。我在政治學、政治經濟學、憲法學和歷史學上的建樹，都是以民生哲學爲基礎的。

最後衝刺

理論創新和學術準備進展最爲迅速的，就是 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這三年，整個理論體系的細節都是在這三年之內完成的。

正當我從事學術準備的最後階段，5 月 23 日我妹妹在去廣州的途中，在湖南郴州被人拐賣，當時就有人報警；但當地公安局未採取任何解救行動，導致我妹妹 5 月 26 日慘遭殺害，並拋屍河中。當地公安機關未經家屬簽字，兩天內就火化遺體。更爲惡劣的是，當地公安局居然拒絕立案偵查，我多次申訴毫無結果，官僚勢力的德行真是令人髮指！

這件事令人無比悲痛，又無比悲憤，給了我極大的刺激。通過這件事，我了解到全國有 70% 的案件不予偵查，其中包括大量人命案，而這些命案都屬於無權無勢的貧弱階層。弱肉強食的中國，連生命權都得不到保障，哪裡有甚麼生存權？！哪裡有甚麼人權？！所謂三個代表，在現實中純粹就是代表腐敗、代表特權、代表壟斷。這件事激發了我的鬥志，增添了我無比的政治勇氣，堅定了我立志改造中國的決心。

《政治五原則》本來計劃在 2003 年一年內完成，2004 年三民主義誕生 100 週年前夕發表。我妹妹用她的死，促成了這本著作的早日問世。2002 年 8 月底，我提前做完了最後的學術準備工作。2002 年 9 月和 10 月，我用兩個月時間完成了這本 16 萬字的著作。希望這本著作的發表，使我妹妹在天之靈得到安息！也希望她的沉冤在社會各界的干預下得到昭雪！

寫作的時間儘管短，但卻是我奮鬥十年的結果。漫漫徵程，10 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思考著理論問題。政治五原則是 10 年思考和智慧的結晶，政治五原則長期在思想的熔爐中冶煉，在理論上是相當成熟的。

展望未來

政治五原則理論套餐，只是框架性論述。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是龐大的、廣闊的、深奧的。我下一步的任務是繼續努力，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終生。

政治五原則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均應形成專門的著作。我計劃完成的主要著作有《唯生論》、《生存道義邏輯》、《生存現象學》、《分縣自治》、《六權分立》、《新五權憲法》、《民生立法》、《民生主義政治經濟學》、《反貧困：首要的目標》、《三大政策》。這 10 本著作，我估計通過 20 年奮鬥，是可以全部完成的。在這些專門著作中，可以進行細緻的理論梳理，對三民主義進行深化和細化。

我 24 歲時就決心「作三民主義的傳人」，讓三民主義的偉大旗幟永遠飄揚在中華大地的上空，讓孫中山先生的學說，永遠傳承下去。我想，再奮鬥 10 年，我在理論上將達到一個新的境界。

第一章「重新認識、解釋及發展三民主義」第三節：

3. 1. 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

三民主義的最初設計，吸引人們去對它重新加以解釋和修正，其開放性是三民主義之生命力所在。20 世紀試圖去解釋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人如過江之鯽，但能解釋好的卻沒有一個，是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掌握住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徐復觀在《中國政治問題的兩個層次》中，將三民主義分解為基本精神與具體結論兩個部份；認為基本精神是永恆的，具體結論則可以改變。這是一個非常有眼光的見解，三民主義就是靠這個內在結構永立時代潮頭的。

但徐復觀像戴季陶一樣，把三民主義往儒家的死路上引，錯解了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從戴季陶到徐復觀的教訓中，弄清楚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是發揚三民主義關鍵之關鍵，否則就會變成人人討厭的「三五教授」。對三民主義基本精神的曲解，是孫中山先生以後三民主義萎靡不振淪為教條的主要原因。要讓三民主義重新發揮說服力和號召力，就要挖掘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讓它重新放出奪目的光彩。

那麼，甚麼才是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呢？這需要到三民主義思想的源頭去尋找。三民主義的思想藍本，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而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內核，就是個人自由。這是歐美主流思想的核心觀念。因此，個人自由才是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這是孫中山

先生本人也沒有把握好的，導致他的思想在邏輯上不盡一致。

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大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總結歐美進化經驗得出的結論。這三大主義都可以用「自由」二字一以貫之，都是自由所結之果。西方的一句名言是「不自由，毋寧死」。在歷史上，如果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就不會有民族主義；如果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就不會有民權主義；如果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就不會有民生主義。歐美國家的歷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歷史。因此，三民主義的目標就是追求個人自由，這才是對三民主義的真解。

徐復觀沒有去認真分析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還要高唱《為甚麼要反對自由主義》，真是和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南轅北轍。三民主義能夠保持她的青春和活力，就要靠以個人自由為中心的基本精神，這個基本精神是永恆的，所以三民主義理論之樹萬古長青。

3. 2. 從殷海光到李慎之

三民主義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從而形成了一種極為開放的結構，誰都可以對它從各種角度向不同方向進行新的解釋。解釋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三民主義的命運。這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我用自由主義來改造三民主義，可以說是受到了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先生的影響。殷海光先生是 20 世紀中國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是台灣自由主義的鼻祖。我在思想成型多年之後才開始接觸殷海光的思想。我發現，我的思路與殷海光是一脈相承的，我從殷海光那裡找到了支撐我思想的重要依據。

殷海光 1949 年就指出，對於三民主義的詮釋，應與世界現實潮流配合，應與新的情勢相適應，對三民主義多做新的解釋，使三民主義重新發揮說服作用。1960 年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一文中認為，「三民主義的大間架還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內容和鋪陳，幾十年來，毫無修正、翻新和充實。」「如果要它跟上時代，永遠常新，並且使青年們讀起來真正從內心發生興趣，那麼必須來一次改造。」這是非常有思想深度的見解。尤其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所做的思考。這就彌足珍貴了。我從自由主義立場來改造三民主義，就是從殷海光出發的。我把三

民主主義的理論航船行駛到了自由主義的大海上，可以說是繼承了殷海光的遺志。

無獨有偶，當代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物」李慎之先生，也一樣走到了三民主義的道路上。2001年辛亥革命90週年時，李慎之先生寫了一篇《和平奮鬥興中國》。他認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甚至是亞洲民主化與現代化的不祧之祖，「儘管孫中山或者思慮未精，或者知行違忤，中國要完成現代化與民主化，還是超不出孫中山所概括的三民主義，亦即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的範圍。」李慎之在其他場合始終認為「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對中國自由主義，他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如何借鑑國外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實現自身體系的完善。二，如何開掘中國傳統中的自由主義理論資源，充實自身的中國地基。」李慎之強調，「無論甚麼現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資源」，「下一轉語」即可。我認為，用自由主義對三民主義下一轉語是一舉雙得的，一是使三民主義重新具備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二是使自由主義之根深深地扎入中國的土壤。

從殷海光到李慎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屢屢看中三民主義，就是因為三民主義和自由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具有融為一體的品質。我抬出殷海光和李慎之，不是壯膽，而是確證。

3.3. 民主三原則

20世紀90年代後期，繼承三民主義、發展三民主義、光大三民主義的呼聲，在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及海外華僑中，日益高漲。我對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正好順應了這股潮流，應了孫中山先生那句話「適乎時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孫中山先生多次講三民主義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這是孫中山先生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份，因為這裡面隱含了對自由主義的認同。但後人很少用林肯民主三原則來理解三民主義。我對三民主義做新的解釋，其出發點就是回到三民主義的源頭去，回到林肯的民主三原則去。因此，與其說是從孫中山出發，不如說是從林肯出發。只有以民主三原則為基礎，才能夠清除三民主義在邏輯上的不一致，修正成為一套邏輯嚴謹、思路清晰、結構穩定的理論體系，以求三民主義與林肯民主三原則的完全重合。

我的政治五原則，就是以林肯的民主三原則為基礎的。把民族民權民生轉化為民有民治民享，再轉化為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民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說：「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個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它是在自由的願望中孕育產生的，它奉行『一切人生來平等』的原則。」「希望我們能使國家在上帝的賜福中得到自由的新生，並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從此成為美國的建國哲學。雖然林肯沒有闡述何為民有、何為民治、何為民享，但我們可以用自由和人權去理解為民所有，用民主和法治去理解為民所治，用民生去理解為民所享。用政治五原則來解釋民有民治民享，是最切合林肯原意的。用政治五原則來解釋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和民有民治民享完全重合，也是最切合孫中山先生的原意的。

民主三原則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民族民權民生，這闡明了一個大道理，也就是三原則，才是民主的完整內容，才是民主的全部含義，三者缺一不可。很多人對民主理解得不夠深刻，主要就是沒有從民主三原則角度去理解民主。民生是民主的原則之一，沒有民生，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同樣就沒有廣泛的自由。這是很多人漠視民生，而我要凸顯民生原則的根源所在。我們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根本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大眾的處境，改變他們受專制壓迫的命運，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對民生的漠視，是中國民主運動沒有廣泛群眾基礎脫離人民演化為孤立運動的根本原因。民眾關切的是自身的切身利益，我們的政治訴求就必然要與他們的利益聯結在一起，這樣才能夠組成廣泛的政治同盟，才能掌握政治戰略主動權，才能喚起民眾，才能號召民眾。扛起民生原則的大旗，是我們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3.4. 政治五原則

(1)理論總結

如果僅是復述而不能創造，孫中山時代的三民主義顯然已不能符合21世紀的時代潮流。杜威說：「民主必須每代更新。」在自由主義者眼中，理論之樹長青，理論是沒有任何教條的。我們不會像國民黨人那樣，弄個「任何人不得有所獨創」之類的緊箍咒把自

已套起來。三民主義要與時代同行，就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

用政治五原則去解釋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之後對三民主義的最好解釋。政治五原則是汲取 80 年代民主運動的四個思想成果，即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加上孫中山先生的民生理論，精心構築而成的。我在 1993 年就形成了政治五原則的思想框架，經過近 10 年的奮鬥，結合我在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和歷史學幾個領域取得的思想成果，最後融合而成政治五原則思想體系。

思想要有說服力，使人信服，深入人心，取決於它能夠有效地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政治五原則不僅有深厚的理論根基，而且有現實的實踐機制，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嚴謹和有效的。

(2) 民族主義：自由原則與人權原則

我們常常要反思，為甚麼民主法治在中國始終扎不下根來，根本的答案是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從來就沒有自由和人權的地盤。我們今天爭自由爭人權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種新傳統，藉以重塑中華民族，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可以依靠的東西。孫中山先生只提出過振興中華的口號，具體怎樣振興，他沒有細說。自由和人權就是兩個振興中華的法寶，梁啟超的《新民學說》，倡導要做新民，就是要用自由和人權把公民武裝起來。

美國為甚麼有如此鞏固和成熟的民主政治？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民主權原則之上，人民主權是美利堅的民族精神。而人民主權原則是從鄉鎮自治中走出來的。1620 年 12 月，英國清教徒移民乘「五月花」號帆船來到馬薩諸塞海灣的普利茅斯，登陸前在船上簽訂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公約說：「我們這些簽名者，為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進步和我們君主與國家之榮譽，已決心遠航弗吉尼亞北部，去開墾第一個殖民地。茲由在場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莊嚴地互定契約，把我們自己聯合為一個公民團體，以便更好地實施、維護和推進上述計劃；並根據公認為最適合於和最有利於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則，隨時隨地出於至誠地制訂、設立和構造出如此正義和公正的法律、條例、措施、組織和機構。我們約

定：所有的人都應當服從於遵守這一切。作為證人，我們簽名於下。」

《五月花號公約》蘊含了強烈的人民主權思想，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國獨立前，弗吉尼亞人就特別「高傲而珍惜自己的自由，忍受不了任何限制，幾乎無法容忍任何高高在上的權力的控制，甚至這種想法也忍受不了。」「人民極端猜忌不直接來源於他們自己的任何外來的權力。」8 美利堅民族強烈的人民主權精神和自由思想，是美國民主成熟和發達的根基所在。

我們到現在為甚麼還要提倡民族主義？就是要「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孫中山語），也就是要用人民主權精神來救國。自由和人權是人民主權的兩根支柱，用自由原則和人權原則來解釋民族主義，就是要使自由和人權成為中國民情的一部份，使自由和人權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新基石，用自由和人權思想來培養普遍的民主主權精神，使民主主權精神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當人民「無法容忍任何高高在上的權力的控制」的時候，民主和法治才會是成熟和鞏固的。

只有憑藉自由與人權精神，才能使中華民族走向光明和振興之路。中華民族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擁有一席光榮之地，肩負起一個偉大民族的重任，就要用自由和人權來武裝自己。我們的民族精神現在有兩重枷鎖：專制勢力與官僚勢力，個人自由和基本人權是專制勢力和官僚勢力的天敵。我們提倡自由和人權，就是要用自由和人權來清理這兩種勢力。只有把這兩重枷鎖去掉，才能形成基於公民的契約，才能培養民族的民主主權精神，才能煥發中華民族的活力。

自由與人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恩賜的，而是在與專制和官僚勢力做鬥爭中爭取來的。要靠我們長期地不懈地去追求、去傳播、去奮鬥，使自由原則和人權原則深入人心。只有依靠自由與人權，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才能建立一個鞏固和成熟的民主憲政。辛亥革命使中華民族從心理上徹底推翻了帝制，21 世紀的任務是要從心理上徹底推翻專制。只要自由與人權深深地紮根於人民的土壤之中，中華民族就獲得了新生。孫中山先生在 20 世紀初期就指出：「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

但我們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⁸

自由與人權是人類共同價值觀，自由與人權的民族精神，就是公民主義，就是大同主義，也就是世界主義。以人類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大同主義，是現代民族主義的關鍵內容。現代民族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在每一個民族之中貫徹人類共同價值觀，為人類永久和平奠定不移的基石。

(3)民權主義：民主原則與法治原則

人民主權要靠自由和人權來支撐，要靠民主和法治來實踐。民權主義的核心理論就是人民主權；要貫徹人民主權，就必須推行民主和法治。我用民主和法治來解釋民權主義，使民權主義落實到這兩個原則之上。只有實現了民主和法治，才能實現民權主義，才能落實人民主權。

民主要靠制度來支撐。沒有制度保證的民主，只會是假民主、真獨裁。除了毛澤東敢說「先生們，你們說我們獨裁，我們就是獨裁」這種「陽謀」的話之外，現在沒有哪一股專制勢力敢於標榜自己就是專制，而是千方百計用民主的脂膏來塗抹專制的醜臉，以此欺騙人們。這也證明了專制是見不得太陽的，是虛弱的，是決不會長久的。

孫中山先生設計的民主制度方案，是一種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相結合的方案，在制度上實行的是均權體制。以四大民權為主體的分縣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只有建立一個高度成熟的地方自治，民主制度才能根深蒂固。分縣自治是孫中山先生的重要創見，我們必須加以繼承和發揚。通過直接民主的村自治，到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相結合的分縣自治，既能培育民主制度，鞏固人民主權，又能建立一個生機勃勃的制度體系，形成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開放格局。

分縣自治是今天民主化的基本方略。中國已經實行了 10 多年的村民自治，民主應該向縣一級挺進。落實自由選舉、高度自治的分縣自治，既能消除腐敗，也能構築有序民主，防止社會動蕩。分縣自治方案對於共產黨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國不可能老是這樣維持下去，在越來越尖銳的矛盾下，在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下，政治體制改革總要見諸行動，從哪裡開始著

手，則是十分重要的。推行分縣自治運動，是中國通往民主的一條最為現實的道路。

孫中山先生在間接民主方案中，實行的是五權分立。五權分立有很優秀的思想，只是孫中山先生沒有把握好而造成內在缺陷。這個缺陷主要是五權分立違背了三權分立分權與制衡的基本精神。孫中山先生分權的目的不是為了制衡，而是為了實現他的萬能政府主張。這與民主政治的有限政府主張是不一致的。孫中山先生晚年以俄為師，借鑑蘇聯經驗，在五權之上設立一個國民大會，加上凌駕於五權之上的總統，就變成了實際上的七權分立，政治局面過於複雜，在國民政府的實踐中也證明了是不成功的。孫中山先生的權能區分理論也近於空想，尤其是把民主重鎮的國會肢解成互不統一的國民大會和立法院，更是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五權分立主要的問題，在於孫中山先生要締造一個萬能政府來引導社會，偏離了公民社會引導有限政府的民主原則，因而達不到民主憲政的預想。但五權分立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創新，只要克服它內在的缺陷，它的卓越之處就可以發揮出來。獨立的考試權在大陸就是很成功的，建立了一個良好的文官制度體系，這個體系在台灣經驗中同樣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對五權分立問題進行了多年思考，我通過增加獨立的貨幣權，在孫中山先生五權分立思想基礎上形成了六權分立的主張。六權分立既繼承了五權分立的優點，又彌補了五權分立的缺陷。我進行了多年權衡之後，發現這個方案是最優美的。我把六權分立解釋為大三權和小三權模式。大三權表明了六權分立事實上仍然是三權分立的結構，又返回到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黃金原則始終經得起邏輯推敲，經得起歷史與實踐的檢驗，是不能動搖的，是人類民主政治的一條帶有終極性的永恆原則。小三權的正確表述應該是「在政府內是獨立的」，它不受行政權的干涉，但受國會的監督。因為考試、監察、貨幣小三權本身就是國會的。這也體現了國會至上的思想，六權分立形成「2+4」的三權分立格局。

六權分立理論的出發點，剛好與孫中山先生五權分立的出發點相反。孫中山先生是致力於怎樣營造一個萬能政府，而我則是致力於怎樣才能使公民社會牢

牢控制住有限政府。孫中山先生是從萬能政府角度看問題的，我是從公民社會角度看問題的。這是六權分立與五權分立的的不同之處。

六權分立和分縣自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民主理論體系，分縣自治與六權分立的配合能形成一個高效與穩定的民主政治局面，這種格局是最切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十分嚴重，危機重重，現在只有推行民主憲政，推行分縣自治和六權分立，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

我們可以對孫中山先生的權能區分理論做一番更新，人民擁有的是主權，政府擁有的是治權，主權怎樣才能夠管制治權呢？設置一個象徵性的國民大會，毫無用處。西方民主國家體現主權管制治權的方法，就是法治。法治是時時刻刻保障主權管制治權的政治機制。

法治的基礎是憲法。憲法的目的是保護和捍衛個人自由與基本人權，建立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秩序，阻止政府對個人財產和自由的侵犯，也就是阻止政府治權對人民主權的侵犯。在公民社會眼中，政府就像一頭危險的老虎，憲法就是公民社會為政治老虎做的一個鐵籠子。

人民主權原則強調，公民社會永遠大於高於重於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由公民社會通過民選方式組織的，政府權力嚴格限定於作為公民契約的憲法所賦權範圍之內，憲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分權與制衡迫使政府依憲行事，使有限政府不能越過公民契約凌駕於公民社會之上。

憲法是公民社會的契約，是人民主權的保障書，是人民主權的象徵，制訂一部良好的憲法至關重要。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有重大缺陷，主要是因為五權分立不能單獨構成憲法基礎。五權分立只是政府部門的組織模式，沒有集中闡述和凸顯人民主權思想。

人民主權是由各種價值觀組成的，價值理論是憲法理論的基石，憲法的基礎是價值原則。政治五原則就是五個價值原則，是人類共同價值觀。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民生是人民的五項主權。我用政治五原則做為憲法基礎，使憲法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為與孫中山先生的老五權憲法相區別，我把我

的政治五原則憲法理論，也就是五項主權憲法，稱為新五權憲法。

在孫中山先生那裡，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是並列的，是兩套理論體系。新五權憲法的一個重大成果是，統一了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新五權憲法就是三民主義憲法，政治五原則使兩套理論簡化為一個體系，體現了完整、簡明、優美的特點，整個理論保持了內在的一致性。

治理國家有三大法寶：即法律、制度和政策。這三者是融為一體，互相支撐的。沒有法律、制度和政策做保障，任何思想都會是空的。例如三個代表，沒有形諸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能力，三十個代表也不行。思想的實踐理性就體現在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推演能力之中。因此，檢驗一個思想是否具有實踐理性，基本標準是看這個思想能不能推演形成具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由新五權憲法能推演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在法律體系方面，新五權憲法能推出民權立法體系、民治立法體系和民生立法體系；在制度方面，新五權憲法形成了分縣自治和六權分立的均權政治格局；在政策方面，新五權憲法提出了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三大政策。新五權憲法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依靠具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設計，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生國家。

新五權憲法在憲法理論上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我自認這是最好的憲法方案，是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思想成果。只有通過新五權憲法，才能建立一個自由化、民主化和民生化的新中國。

(4) 民生主義：民生原則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最為成熟的思想，也是三民主義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提出了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扶助農工等一系列思想。我用民生原則來闡釋民生主義，並把民生原則分解為民生思想與民生政策。民生原則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羅斯福新政為藍本，參考一系列重要的地區與國際經驗，整合成為一整套的思想與政策。

在民生主義思想體系中，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民生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這樣才能夠為

經濟政策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我以生存價值論為中心，建立了以生存條件和生存結構為基本範疇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深化了民生主義思想原理。政治經濟學是經濟立法指南，沒有政治經濟學，三民主義就是不完整的，這項工作十分重要。生存價值論建立在龐巴維克邊際效用理論的基礎之上，把龐巴維克的主觀效用推進到客觀生存，建立了更為一般的價格理論和利息理論。民生主義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擴展到整個生存體系，為經濟學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只有從整個生存體系出發，經濟學才是更為接近現實的。

三大政策是民生國家的三根支柱，節制資本是要通過反壟斷和累進稅制，使社會財富分散在大眾手中，促使資本社會化，防止家族勢力操縱國計民生；通過節制污染企業，恢復和改善我們的自然環境。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是要在土地私有制下維護自耕農制度，使耕地由耕種者個人所有，防止土地尋租、土地集中和地租經濟；耕者有其田強調，取得耕地的目的僅限於自己耕種，限制耕地的所有權移動，限制耕地的轉用；耕者有其田政策既保證了耕者有其田，又能建立土地流轉市場。社會保障的目的是要建立覆蓋全民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剷除人間不平和社會痛苦，消除貧困，建立轉讓與安全保障網，建立全社會的安全體系；社會福利政策主張福利針對窮人，為盲人、完全殘疾人、孤兒和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社會保險政策通過向全民強制徵收社會保險工薪稅，建立個人賬戶制度，為每一個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網，為長期失業人口和長期患病人口提供社會援助。

三大政策是要從生產三要素的角度對經濟結構進行規範，在市場的初次分配中進行立法干預，通過均富，使資本利潤為社會所共享，使農民耕種自己的土地，使貧弱階層擺脫絕望的悲慘處境。三大政策，充份汲取了美國經驗、日本經驗和我國台灣經驗，從三大實踐經驗中總結經驗和方法。

通過三大政策，才能建設一個既充份競爭又相互關懷的民生社會和民生國家，才能使中國擺脫拉美化、南亞化和非洲化的罪惡之旅，才能使中國走向自由化、民主化和民生化的良性循環之路。

孫中山的 超前思維 理性精神 和經濟思想

兼說革命家的理性與經濟頭腦

中國大陸留學生、歷史學博士後 曉 黑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語：中國自古就有「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的思想。孫中山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人。中共由其專制本性所決定，從自私、狹隘、愚蠢、無能的角度出發，認為孫中山重視經濟規律是什麼“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相反，孫中山先生的最大失誤——“聯俄容共”，卻被中共美化為“高瞻遠矚”。曉黑先生的文章，立論持平，說理清楚，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本刊主編按語：中共在二十年代就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過時了，所以，他們要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結果祇將一個又一個“史無前例”的災難，帶給了我們的大陸人民，至今難能解脫；而今，一些要搞民主的人士又說三民主義過時了，其原因，是因為他們“祇知馬列，不知孫文”，或者乾脆是“祇認馬列，不認孫文”。所以，中國的那個“當代民主運動”，至今也不知“出口”究竟何在……

然而，三民主義究竟有沒有過時？它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意義？中國留學美國的歷史學博士曉黑先生的文章，顯然可以告訴你一些端倪。

中國國內史學界很長時間內甚至一直有一種幼稚的傾向，即誇大孫中山的失敗和中共對他的「幫助」，把聯俄，聯共策略看成唯一的陽關大道。的確，孫中山先生遭遇過很多的失敗，但是他在這一過程中所發展起來的思想理念，比如對民主制度的篤

信，對發展民族經濟的赤誠，是一以貫之的。另外，人們在談論國共兩黨早期領袖時，也通常集中在政治活動一面，而忽略他們的經濟思想。事實上，經濟思想極大地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迥異的政治選擇。儘管在當時險惡的內外社會政治環境中，孫中山先生的理念在激進的共產黨人眼中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然而，從今天的觀點看來，孫中山的理性精神是中國革命者中少有也非常超前的。

以最為核心的，也是中共最為驕傲的土地問題來看，孫中山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中共主張土地改革，看似沒有區別，其實不論在出發點，手段還是最終效果上，兩者都不一樣。中共主張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有推翻幾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在於進行革命煽動，追求一種農民翻身的，誇張的，狂歡節似的效果，從而用土地作誘餌，換取農民的忠誠。並用階級鬥爭學說，把同屬國家公民的土地所有者階層劃入另冊進行殘酷的報復，侮辱和損害。一旦革命成功之後，很快就用集體化的方法，把土地集中到國家手中，要邁向「共產主義」了。且不說這個過程對於農民階層的欺騙性和殘忍性，從經濟觀點來看，是一種完全為追求政治效果，忽視經濟規律的蠻幹，其後果早已路人皆知。

與此相對，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一方面也要結束不合理的封建土地佔有制，一方面則是從經濟學的理性思維出發，認為改變土地的過度集中狀態，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孫中山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富有階層不斷將資本投入土地買賣和佔有中。資本被束縛在土地上，不能被投放到工商業領域，國家的經濟形態則始終處於農業社會的水準。為中共所痛恨的「國民黨右派」胡漢民也明確指出，一旦平均地權，資本家就會放棄土地佔有而投資於機器工業，由此而來的經濟發展將是不可避免的。土地與資本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在美國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的著作中也有體現，直到今天，仍在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課上討論，被認為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滯後的一個有效解釋。基於這一認識，孫中山認為應當首先由國家下令減少地租，令地主的經濟收益縮減，這樣佔有土地的吸引力就會變小，資本可能轉而投向實業，同時核定地價，在地價核定後將來的增值部分由國家抽稅。因為土地增值是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地主個人的努力，在孫中山看來，應當成為全民的財富。國民政府遷到臺灣後，主持土地改革的陳誠也正是這一經濟思想的服膺者。在臺灣，整個土地再分配過程通過政府向地主贖買，再轉賣給農民的和平方解決了。如同孫中山預測的那樣，從 1950 年到 1955 年，22% 的農業資本流向非農業部門，有效地促進了臺灣工商業的發展。這樣，土地問題成爲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它的解決依靠政策和法律，根本不需要宣傳，煽動，仇恨和暴力。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大陸內外交困，的的確確沒有條件實行平均地權的思想，這一點，不論蔣介石還是陳誠在退守臺灣後也都沒有否認。

再看反帝。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中共在這方面很積極，但是把反帝改造成爲一套革命煽動話語，並沒有耐心以理性的態度區分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侵略和經濟上的全球化趨勢，看不到後者積極的一面，而是一味地狂熱攻擊「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建國後，其極左思潮甚至完全抗拒任何國外資本，執意要「自力更生」。甚至 80 年代初設立保稅區的改革動議都還要冒一定政治風險。其實，假如中共能早點務實，利用外資發展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又何至於因提供不出工作機會把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去農村呢？現在的中國大陸，不也正是一面反對「國際反華勢力，」一面持續吸引外資嗎？

孫中山先生終其一生，都堅信國際貿易關係就其本質來講並不具有剝削性質，只要實現政治平等，經濟剝削就變得不可能。政治上對帝國主義的反對並沒有必要擴展到經濟上的閉關主義。胡漢民也同樣認為中國應當歡迎外國投資，積極利用先進工業國的剩餘資本和技術轉讓及外國專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總體經濟戰略看，孫中山主張由系統地提升農業地位，改善農業技術，發展基礎設施，實施大衆教育，利用中國人口衆多的特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引進外資並同時對幼稚民族工業實行關稅保護。同時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和國有資本結合起來，既鼓勵民族資本發展，又對重要產業進行國家控制，實行混合型經濟，以保證大多數民衆的利益。這些思想都是非常務實而卓有成效的。臺灣的經濟發展基本沿襲這一思路進行。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在事實上也是這種經濟思想的體現，因為我們不難發現，這些

思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熟悉的語彙了。如果中國大陸的改革沒有系統地研究孫中山的思想，而是自行摸索出一套規律，那麼其中的不約而同更加能夠證明孫中山思想的理性與前瞻性。

為什麼中共在政治上如此「高明」，而又在經濟上又顯得弱智呢？從早期中共歷史分析可以看出，中共黨內並沒有多少經過嚴謹的科學訓練，具有經濟學常識和理性的人，但絕不缺少熱情的宣傳鼓動家。這和學醫出身，遊歷歐美日本，兼具鼓動家的熱情和自然科學者的理性的孫中山完全不同。中共的創始人中，李大釗曾經是一個激進知識分子，起初主張英美式議會民主，覺得孫中山的反袁革命是在胡鬧。¹ 後期又轉向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應該看到，李大釗首先是一個熱情的民主主義者，在對英美民主產生懷疑後，認為蘇俄制度才是一種高形態的真正的民主。李大釗為蘇聯的制度辯解說，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暫時的，只是最終自由的一個過渡期。當然他沒有機會看見無產階級在蘇聯專政了 70 年，直到最後垮臺，人民都沒有享有過一天他所憧憬的自由。一套 5 卷本的李大釗文集中，他寫下了大量的國際政治評論，一些詩歌，甚至於「論自殺」這樣的文章，但是幾乎沒有一篇討論經濟問題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即使有，也是闡釋一點粗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他同時還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生產力）決定論與階級鬥爭之間存在內在矛盾。他對「勞工階級」的誇大的情緒化崇拜——中國知識分子向來不缺少這種情感——在孫中山那裏是看不到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中明確地否認無產階級的決定作用，而認為社會發展是各個階層合作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更多是一種追求最新人類思想成果的文人的熱情。

另一位中共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原本已準備長征的，因其患肺病組織上沒有同意。（參見《瞿秋白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117 頁）後來有人將此說成是無情的拋棄，甚至算到周恩來頭上，或許不實，但瞿確實很快落到蔣介石手中並被處決畢竟是事實。這位中共的早期領導人臨死前在爭議頗廣的自述「多餘的話」中，竟完全懷疑自己革命經

歷的價值，認為自己在黨內的經歷不過是「一場惡夢。」是在「扮演角色。」他認為自己原本是個「十足」的少爺，從小沒有煮過一次飯，完全是一個頹廢的，脆弱的寄生蟲。（同上，145 頁）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僅僅來源於嚮往一個「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而階級鬥爭則令他感到「有趣。」他承認，「資本論——我就根本沒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147 頁）

非常明顯，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大都是一些帶有浪漫氣質的文人，他們熱情奔放，豪情萬丈，熱衷於絕對的社會平等，盲目熱衷於狂熱的革命運動，但最終卻又陷入了絕對的殘酷鬥爭的漩渦和邏輯悖論。在狂飆突進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對於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們傾向於從政治和思想的角度認識，而恰恰缺少一種冷靜，理性，經濟學的精神。他們中極少人願意和能夠用現代經濟學和國家發展的戰略眼光來分析中國的國內形勢和國際關係。和孫中山不同，共產黨人絕對不會相信經濟的發展本身會帶來社會各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將階級鬥爭的合法性從根本上動搖。他們認為只有打倒和推翻才是出路。在批判妥協性的時候，中共忽略了一個它自身最終也難以超越的規律——現代政治本身就是一種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妥協的藝術，而不能夠是古時代一言九鼎的暴君體制。於是，革命和破壞本身成為被異化為目的，這種狂歡節心態由毛澤東推倒及至，結果是一場災難。其實，孫中山並非先知先覺，他只是多了一點理性思考，知道疾風驟雨替代不了經濟規律。重要的是，理性正是中國歷次社會改造中最缺少的。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理智在戰勝之前，總是要先被狂熱捧上幾個跟頭，白白付出一些鮮血和人命。²

2003 年 4 月 21 日，紐約

¹ 見《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² 本文關於孫中山，胡漢民經濟思想的論述，見 A. James Gregor with Maria Hsia Chang and Andrew B. Zimmerman,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緬懷

孫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陵寢巡思

旅美中國大陸學者 董欣賓

激長空而去國，臨窗俯視遙觀，大地漸漸逝於蒼茫，唯中山先生之寢陵莊嚴，若自由之鐘，聳立鐘山。霞籠煙彌，豪氣激野，無比雄壯。

此乃民族近世奮爭社稷之壇，元祚之所，撫昔思今，百轉迴腸，戀戀之，不捨之，唏噓長歌之。

遊於異邦，固然亦見有古今英靈之大墓，雖亦壯觀，也多雄麗，卻難激發我的情懷。唯獨對於中山陵才能油然而生如此一份深厚的敬意和激心貫肺的慷慨。只因他是中華民族臨危赴難間的號角，天崩地裂際攜民煉石補天之女媧。中國人對中山先生的這份感情，經得住歷史的顛仆。我想，這應當是良知的共鑒。

中山陵墓建於民國，碑文僅「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廿四字。無虛詞文言頌飾。然而當你游目沖天而上，頂披鈷蘭色琉璃瓦的雄偉建築，便覺心思為之共奮，雲紋石柱擎天而立，蓮瓣寶頂雍容相庇，漢白玉的石獅，平步上下的石級表現出無比壯概。國之大氣，民之壯慷，先生揮師北伐，叱吒風雲的精神，都能在此得到靈感。博愛坊與中門相透映，便見「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先生這手書，雍穆寧靜。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孔子的話，為孫先生容為革命之口號。這是一種繼往開來、集中兼外的法則，也是一種將現實、哪怕是革命的現實不與歷史割裂的法則。這也是先生與後來許多極左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他愛本民族的一切優長和創建，並以此為拓建新境的法則。

故先生能危難振呼，率沉睡千年之民族，披艱歷險，推翻滿清王朝，授民於民族自強、民生自立、民權自治之三民主義精神，並立五權憲法，為中國革命奠基。

中山先生堅守一生者，正是中華民族所抱負的人類歷史的宏觀操持與理想。天下為公，正是本民族之宏觀品德的核心。三民主義為內容，五權憲法為方針，進入人類文化交流的時代潮流，並且以我們自己歷史精神為基礎，此絲毫無悲觀的浩蕩正氣，實在是萬世楷模。

漫步查爾斯河畔，回徊去國它鄉的激昂，看著這裡的明月，清風徐徐使我份外之清醒，深思著中山一生賦於我們的，我們又將如何以其寬博之精神賦於歷史。

中山之精神便是自尊、自強、自愛與自立之精神，中山之精神便是喚起民眾直面強權，衝擊一切腐敗無能，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爭取人類共同進步的精神，中山精神便是率本民族偉大的文化與世界上一切文化自體平等交流的精神，中山先生便是站在「中西古今」這樣的一個世界文化進行的十字架上的偉大的佈道者，東方文化的英雄主義者。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狹隘民族主義領袖所無可比擬的。中山先生的高度，便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高度，是人類文化行進的高度。

因之，我默默地告訴查爾斯河，世界有此固然十分美麗，但世界若沒有站在這河上驕傲的思考，一切也將是無望與暗淡的。我遙想著躺在寢陵間的漢白玉的彫像，我深深地感覺著他心的跳動。

由中山陵到靈谷寺的路上，有一清幽幽的佳區，樹水相掩映，白雲藍天，游鱗淺低，眾山環抱。水榭是中山園陵設計師顧文鈺的代表作，飛檐環欄是中山陵羣之一環，稱之為流微榭，是隨追孫先生革命之軍人捐款修建，建於民國二十一年，紅柱白瓦，最是顯眼，最是可以容人坐臥省思的地方。查爾斯河座落的波士頓，固然清省無它，但絕無那樣幽麗適人的佳構絕勝。

（上接第19頁）方覺說，我很佩服海外控告江澤民，我覺得不管結果如何，這樁訴訟案向國際社會和人民傳遞了一個信息，那就是世界上不只存在專制獨裁的壓迫，世界上還有民主自由的正義力量。這樁訴訟案表明，中共獨裁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走向了末路，而尊重宗教自由，尊重人權是當今國際的主流。

南京保衛戰



北京九旬前輩

石懷瑜

參加南京保衛戰時的中華
民國國民革命軍
上尉石懷瑜

石老爲國犧牲戰友一覽表見本期第 143 頁

編者前言：

本文作者石懷瑜老先生，1912年3月21日生，是中華民國的同齡人，卻一直生活在中國大陸，並沒有“逃往”台灣和海外。他出身黃埔九期，一九三七年參加南京保衛戰時，任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上尉連長，1948年任中華民國國防部第五補給司令部通信處上校處長。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命運可以想見。今年，他已經九十一歲高齡，卻不能忘記那些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戰友們，不顧一切地寫下了他的回憶錄，並直接投遞本刊，為中華民國衛國戰爭中壯烈犧牲的國民軍官兵，留下血寫的歷史見證。本刊編輯讀稿後，深感義不容辭，並對石懷瑜老先生——我們的前輩，深表感激和崇敬。

血沃鐘山

上海戰場，敵我集中了 130 多萬兵力，在滬西狹窄的地區，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戰鬥。我軍以落後的武器裝備，全憑官兵高度的愛國熱忱和英勇無比的犧牲精神，浴血奮戰，抗擊武器精良、裝備齊全，且有強大空軍掩護、海軍支援的強敵，給日寇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擊，打消了所謂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粉碎了敵人速戰速決、三天佔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戰鬥持續到 1937 年 11 月初，敵人付出了很

大的代價之後，佔領了上海閘北、江灣、瀏行、真茹等處，突破了我蘇州河北岸陣地，淞滬戰爭至此達到了最高潮。我軍因傷亡很重，又無生力軍增援，處於劣勢。如果繼續在非決戰的時間和地點過度消耗兵力，勢必影響戰局。爲了保存實力，有利於持久抗戰，統帥部認爲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宜硬碰硬地消耗有限的兵力；應有計劃地主動轉移到吳福、錫澄、蘇嘉等線，佔領有利地形，憑藉既設的國防工事，阻止敵軍前進，並抓緊時機積極整補，爭取戰役勝利。蔣委員長採納了上述意見，命令前線部隊按計劃行動。當部隊業已開始轉移之際，他又與白崇喜親臨前線，突然變更決心，命令轉移部隊返回原防固守。大兵團在一退一進之間，由於道路狹窄，溝渠縱橫，兵員車輛過於擁擠，通信聯絡中斷，各級指揮失控，加之敵人尾追，敵機晝夜襲擊，因而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轉移部隊既不能回到原防固守，又無法在既設的國防線形成整然態勢，立足不住，只好潰退下來。11月8日，敵人在金山衛登陸。守軍既未拒敵於登陸之前，又未殲敵於登陸之後，以至敵軍順利登陸後遂即擴大戰果，向我右翼作戰略大迂迴，企圖將我上海大軍包圍殲滅。至此，上海戰場形勢大變，不得不作全線撤退。11月12日，上海淪陷，淞滬戰役告一段落，敵人付出很大的代價，取得了局部勝利。

敵人佔領上海之後，分兵三路，對南京採取分進合擊之態勢：其右路沿京滬鐵路線西進，企圖奪取沿江要塞，消滅我江防部隊，使其軍艦溯江而上，直抵下關，隔斷我江北之策應，阻止我守軍渡江撤退；其左路以金山衛登陸之敵為主，沿太湖南側西進，企圖下廣德，佔領宣城、蕪湖，切斷我南京守軍之退路；而其中路主力部隊沿溧陽、句容京杭大道前進，直扑南京東郊。一俟三路會合，將我南京守軍壓迫到下關江邊予以全殲，以達到戰略目的。敵軍本此要旨向南京推進。

11月下旬，蔣委員長拒絕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提出的苛刻的誘和條件，堅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態勢後再作談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希特勒命令調停中日停戰問題遂告失敗。蔣委員長當然很明白，在日本侵略軍已經取得上海戰場局部勝利的情況下，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狀態再行談判，不過是夢想。他這樣做，主要是表示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使日本侵略者休作妄想。首都南京寧可化為焦土，絕不拱手讓敵。即便不能固守，也叫敵人付出血肉代價。如果輕易放棄，就可能動搖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到底的決心，挫傷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為國效命的志氣。因此，保衛南京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軍事價值，誰也不會同意輕易放棄。至於如何保衛南京，那是力量和戰略問題。

蔣委員長決定保衛南京，唐生智自告奮勇，臨危受命，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臨時組織領導班子，調兵遣將，準備迎戰。此時，蔣委員長仍坐鎮南京，親自指揮調度。記得12月初的一天，他在唐生智、羅卓英、桂永清、宋希濂等將領陪同下登上紫金山，視察了我們總隊的陣地，並召集附近部隊團長以上的軍官講話，總隊附近的連長也就近參加聽訓。他首先聲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顧國際公法，悍然對我發動大規模的軍事侵略，燒殺虜掠，慘無人道，對我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說，日本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處心積慮，把吞併中國，稱霸世界，作為既定國策。“九·一八”事變的突然襲擊，強佔了我東北，扶植了傀儡政府，脫離祖國，使之成為他的附庸。當時國家未告統一，尚有內患，無法全力對外，只有忍辱負重，待國力充足後，不惜任何犧牲，收復失地，以消百年奇恥大辱。但日寇得寸進尺，野心更大，又藉

口製造盧溝橋事變，妄圖以軍事壓力迫使我華北當局屈服於武力威脅之下，接受其華北特殊化的條件，再造第二個滿州國式的傀儡政府。由於我華北將領和軍民基於義憤，忍無可忍，奮起抗擊；敵人在其陰謀詭計未能得逞之後，仍不甘心，在我經濟中心首都大門的上海，發動大規模的軍事侵略。現在和平業已絕望，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要堅定不移地把抗日戰爭進行到底。上海淪陷後，南京就要變成戰場。南京是國家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先總理孫中山的陵寢所在。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本委員長領導下建設起來的。現在，為了領導全國軍民繼續抗戰，不得不離開南京，不能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保衛南京的任務交給了唐司令長官，希望大家精誠團結，服從命令，奮勇殺敵，保衛首都，不成功便成仁，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勿負本委員長重託，勿負全國人民的厚望。他講話時心情沉重，嚴肅懇切，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對南京的留戀。講話完畢後，向聆訓的軍官頻頻點頭，表示懇切的希望和依依不捨之情。當時我抑止不住內心的激動，掉下男兒不輕彈的熱淚。我左右的軍官莫不感慨悲壯，熱淚盈眶，都感到國家民族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正是炎黃子孫、黃埔健兒、革命軍人赴湯蹈火、捨身效命之時。我回到連隊後反覆傳達，鼓勵戰士，為保衛首都，保衛國家，保衛先總理陵寢而犧牲是無尚光榮的，也是人生難逢機會，死重於泰山，雖死猶生。戰士們各個發誓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與來犯之敵血戰到底，與陣地共存亡。記得12月7日凌晨，我們在山上構築工事，積極備戰之時，看見福特號座機從明故宮機場起飛，有三架飛機護送，知道蔣委員長離開了南京。此時，南京外圍守軍已和進犯的敵軍接觸，戰鬥已經開始了。

北伐勝利，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沒有組建警衛軍，首都的治安警衛任務，由南京警衛司令部所轄的憲兵團及警察部隊擔任。“八·一三”抗日戰爭開始後，統帥部決定教導總隊為拱衛首都部隊，但不久就奉命增援上海。11月9日上海大撤退，部隊撤回南京的兵力不到五千人。此時敵軍已長驅直入，快要兵臨城下；南京的機關、學校、工廠早已撤離，除少數警察憲兵外沒有部隊。大敵當前，城防空虛，蔣委員長曾幾次召桂永清到官邸指示保衛南京事宜。為應急

計，桂永清命一團二營死守烏龍山要塞。將在句容的補充兵調到清涼山一帶佈防，第三團在堯化門佈防，一二兩團在紫金山孝陵衛及光華門一面整補，一面佈防。後來蔣委員長調來了宋希濂的 36 師，王敬九的 87 師，孫良誠的 88 師，分別擔任下關、光華門及雨花台的防務。又恐兵力不足，留下葉肇的 66 軍，俞濟時的 74 軍，鄧龍光的 83 軍，還從安徽調來了徐源泉的 41 師、48 師，加上砲兵營、通信營、戰車連等，總共兵力十多萬。大多新兵，均不滿額，裝備短缺，未經訓練，戰鬥力薄。以此殘缺的兵力，配置於南京廣闊的防線，抗擊優勢的敵軍，又處於內線作戰，完全被動，眾寡懸殊，強弱異勢，盡人皆知。但保衛南京的官兵並未因此而稍有沮喪，反以保衛國家首都是最爲難得的盡忠效命機會，是至高無尚的任務。因此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抱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誓與來犯之敵血戰到底，恪盡軍人天職。南京保衛戰從開始至結束，始終是本此大無畏的精神而進行戰鬥的。

總隊參加南京保衛戰的經過

一、兵力

總隊由上海撤回南京後，奉命擴大編制。以原來的三個步兵營爲基幹，擴編爲三個旅，旅轄兩團。直屬部隊除特務營、通信營外，騎兵、砲兵、工兵、輜重營均擴充爲團，按編制兵力約三萬多；但因時間短促，接收新兵均不滿額，未加訓練即參加戰鬥，戰鬥力薄弱。蔣委員長還以爲總隊係德式裝備，武器精良，久經訓練；在上海雖受損失，但尚有較強的戰鬥力，且久駐南京東郊，地形熟悉，因而作爲保衛南京的主力部隊，配置於紫金山、孝陵衛之線，以抗擊由京杭大道進犯之敵主力部隊。

二、防禦部署

紫金山和雨花台兩地之得失，關係南京城的安危，至爲重要。紫金山又名鐘山、蔣山，最高點爲第一峰，次高點爲第二峰，其東麓突出的小高地爲第三峰，又稱老虎洞；不論攻防，均爲兵家必爭必守之地。總隊受命後，根據敵情地形和兵力判斷，並吸取上海作戰經驗，重點配備，縱深防禦。

1、右守備隊第一團（欠第二營），附戰防砲一連，据西山南北、孝陵衛至白骨墳之線陣地，右與 87 師聯繫，左與第二旅聯繫。

2、左守備隊第二旅三團，附工兵一連，据陵園、鐘山陵西側、靈谷寺高地至老虎洞西側一帶陣地，右與第一旅聯繫，左與第三旅聯繫。

3、左守備隊第三旅之五團，附榴彈砲一連（兩門），据紫金山一、二、三峰陣地，右與第二旅聯繫，左與守備堯華門的 48 師聯繫。

4、獨立之隊（一團二營）擔任總隊防區重點工事修補，任務完畢後擔任中山門一帶城防。

5、砲兵團進入富貴山陣地。

6、騎兵團在湯山、青龍山陣地，拒止敵軍前進，爾後視情況撤到太平門外徐墳一帶警戒。

7、特務營、軍士營、工兵團、輜重團爲總預備隊，位於太平門中山門內附近。

8、通信營以總隊指揮所爲中心，向各旅及直屬團營構成通信聯絡。

9、總隊指揮所設在富貴山砲台地下室。

附註：

（1）步兵第二旅最初爲預備隊，後因中山陵一帶兵力單薄，調到陵園地區。

（2）步兵三旅之六團，原任堯華門地區之防禦，後由 48 師接替，轉到岔路口及陵園一帶。

（3）步兵一旅之第二團在 87 師未到達之前代守光華門城防。

三、戰鬥經過

1、西山主陣地戰鬥

西山位於孝陵路北的一座小高地，橫垣南北，爲中山門外的重要屏障，由我一旅一團第二營守備，營長姚明德。當時營的防禦布署如下：第一連（連長高振芳）爲左翼連，西山北端；第二連（連長王鏢千）爲右翼連，西山南端（含京杭公路），並派出一名排副帶領強幹的士兵數名，設伏於孝陵衛西公路橋下涵洞內，以側射火力消滅進入我西山陣地前沿之敵，並在橋東公路中間埋設大捆引火炸彈，阻止敵戰車前進。第三連（連長黃光翊）爲前哨連，守衛農業實驗場一帶前哨陣地，並向前方派出遠程哨兵偵察瞭望，

在與敵接觸之前，將西山前的高級官員住宅一律破壞，免敵利用。重機槍連（連長湯國俊）在第一、二連間的隘路路口選擇陣地，掃清射界；迫擊砲排（排長姓名失記）於西山中部高峰選修砲位，消滅孝陵衛以北、林森公館以東隱蔽地帶之敵；戰防砲排於孝陵衛街西、西山公路旁選修砲位，阻擊敵戰車西進，營指揮所在西山中峰第一、二兩連陣地中間之後。

11月7日下午，營長騎摩托車沿京杭公路到前方視察，離侯家塘不遠，發現少數敵兵已到路北高地，立即返回營部命令各排進入陣地，充份準備，嚴陣以待，並向團部報告當夜無事。

12月8日夜八時許，遠程哨兵李殿英急忙回來報告，敵人大部隊經高橋門向西前進。天尚未明，前哨連報告，前哨陣地前發現少數敵兵。九時左右，敵人向我前哨陣地兩翼包抄進犯。營長命令前哨連竭力抵抗後，從西山主陣地右經孝陵衛東南撤到五棵松地帶抵抗。戰鬥中俘虜冒進之敵兵五名，因不懂日語，送團部審問。下午五時，紫金山東麓，槍聲密集，已與敵人接觸。六時，命前哨連撤到西山後作預備隊。

12月9日，敵步炮空聯合，向我紫金山、西山陵園、孝陵衛開始進攻。首先用重炮猛轟，飛機臨空投彈，戰鬥異常激烈。進攻西山陣地之敵，被我官兵奮勇擊退。四時左右，望遠鏡觀察，城南之敵，以一路縱隊，經小石山由西向東移動，兵力不詳，可能是調集兵力。我紫金山、西山明天將有一場惡戰，當晚補足各連彈藥，準備翌日戰鬥。

12月10日拂曉，果不出所料，敵人仍以步炮空聯合作戰的慣用戰術，並升起兩個觀察汽球，指揮其重炮、野炮向我紫金山、西山孝陵衛陵園陣地猛轟，發射各種砲彈約千發之多。敵機向我陣地及城內不斷轟炸，彈如雨下，聲震山嶽，硝煙迷漫，蓬折塵飛，攻勢之猛，戰鬥之慘，為連日來所未有。進攻我西山陣地的敵戰車進入孝陵衛街西時，被我戰防砲擊毀兩輛，其餘倉皇逃去。我埋伏公路橋下涵洞內的戰士立即奮勇向前，活捉敵戰車兵三名。經檢查每個俘虜身上均帶有三寸見方的布塊，用五色彩線繫納，有一名還帶一尊小銅佛，因不通日語，送團部審問。戰鬥到下午五時左右，槍炮聲逐漸稀疏，敵人攻勢頓挫，暫時對峙，敵我傷亡均重，敵倍於我；入夜將儲存的彈

藥全部發到連排，並檢查傷亡，重傷送後方，輕傷堅決繼續戰鬥。

12月11日，紫金山、西山、白骨墳全線激戰。我西山陣地前沿挖有寬深的外壕，壕邊設有一公尺多高有刺鐵絲網。當敵步兵前進到壕邊不易通過之時，我守軍以密集的步機槍火力和手榴彈予以痛擊，埋伏在公路橋下的伏兵又以猛烈的側射，將進入我軍陣地的敵兵殲滅殆盡。敵人不肯挫敗，又增加兵力，向我陣地兩翼進攻，我右翼連長陣亡。營長命令三連連長率兵兩排增援並指揮右翼戰鬥。左翼連戰鬥同樣激烈。我重機槍連連長重傷，敵兵已攻到西山腳下，戰況緊急，請求增援。營長命三連一排增援上去。此時，西山陣地，三面受敵，營長命書記員吳屏藩留營部與團部保持聯絡，派營副李維洲赴右翼督戰，自己赴左翼督戰。不料營副剛出掩蔽部，即中彈身亡，營長帶號兵張四維、傳令兵丁子俊赴右翼督戰。為壯士氣，他大聲急呼：“弟兄們，要沉著打，把敵人消滅在陣地前，一個也不能逃。”此時戰鬥非常激烈，敵人拼命進攻，我官兵至死不退。看到營長親臨戰壕指揮，士氣大振，愈戰愈勇，殺聲震天，血肉橫飛，終將敵人擊退。薄暮時，敵人又增加兵力向我進攻。該營在西山佈防時，對西山大小道路，山前山後山腹的交通要道以及地形的開闊隱蔽，官兵均親自視察，了若指掌，因而在戰鬥中無論偵察搜索，傳達聯絡，調度增援和堵擊，均能適應情況，未曾失誤。再加官兵視死如歸、至死不退的戰鬥精神，與敵人反覆衝殺，挫敗敵人幾番進攻，使敵人受到慘重的傷亡，我陣地毫未動搖。

12月12日，敵人繼續進攻，整天戰鬥，但已不如前數日激烈，戰鬥到天黑，陣地無變化。由於光華門曾一度被敵人偷襲，進入城內少數敵人雖被殲滅，城牆外邊據點仍被佔領。我西山孝陵白骨墳陣地過於突出，右後方受到很大威脅，團指揮所稍後移，秦士銓團長命令該營放棄西山陣地，撤到衛崗以東陣地，拒止敵軍前進。午夜十二時，又命令全營立即撤到太平門外崗子腳待命。撤退時，營長在陵園管理處見到團長和副總隊長周振強在一處。二人神情緊張，急問部隊是否撤下來，還剩多少人？營長請示今後的任務和現在的情況，並報告，全營業已撤下，只剩二百多人。周振強說，現在各處電話不通，城內部隊極為混

亂，情況不明；我們決定向江北撤退，你營撤到煤炭港後設法過江。12月13日黎明前，營長帶著剩餘的二百多官兵到達煤炭港時，只見部隊擁擠混亂，沒有船隻，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混亂中無法控制，只有二十多名跟從，沿江上行尋找渡江工具。他們來到上新河，前邊已有槍聲，又回頭向下走去。前邊有人說燕子磯過不去了，又回到下關。此時日上三竿，無數官兵沿江徘徊，一籌莫展，看見無數的浮屍，令人痛徹心肝。不時從遙遠的地方傳來密集的槍聲，再也不能猶豫，營長和幾個跟隨戰士，決心冒死渡江。戰士們抬來一個大木梯和幾塊木板，紮成筏子，用鋼盔、鐵鍬劃到江中。走不多遠，看見前面碼頭有一艘船緩緩下流，木筏急向船劃去。接觸時，前面兩個戰友掉下水去，傳達班長急用鐵鍬鉤出船底鐵鏈，才登上了船。船上人已擠滿，由於枯水時期，漂行很慢。下午四時左右，在離八卦洲不遠的地方擱淺，不能漂行。他們跳下船，泅渡上岸，來到水圍村一家老百姓家。這家人很好，招待吃飯，休息一夜，恢復精神。翌日，戰友們找到一位保長（姓名已忘記），他有強烈的愛國熱忱，痛恨日本鬼子，決定親自送過江去。晚上從蘆葦裡小溪中劃出一條漁船，夜間過江也要擔很大風險，敵人的巡邏艇不停地巡邏，照明燈不時向江面探照。他們隱蔽在蘆葦中觀察，發現敵人每隔一小時探照一次。掌握了這個規律後，就利用探照的間隙，小船迅速離開蘆葦叢邊，劃到對岸不遠處；因潮汐已退，不能劃行，只好下船。保長立刻划船回去。臨別時，營長送他十元法幣，他無論如何也不要。營長說我再也無物報達你了，只有衷心感謝，將來不死會有見面的一天。上岸時，他們不知沙灘的情況，一步踏下去拔不出來，二步又踏下去無法行走，大家只好迅速臥倒匍匐前進，才登上北岸。當時全營官兵七百多，撤退時只有二百來人，隨營長九死一生過得江來的僅三人；團長秦士銓也終因高度近視，撤退中與隨從失去聯絡未過江來，死於亂軍之中。

2、亂石崗前進陣地的戰鬥

12月3日，桂永清命令獨立支隊一團二營營長索本勤率領該營開到烏龍山，死守要塞。烏龍山有一座砲台的炮是老式的，沒有砲彈。二營到達後徹夜構築工事，準備死守。4日下午，由漢口調來徐源泉的41

師，其先頭部隊到達後即派人來到烏龍山聯繫接防事宜。桂永清命令該營於防務交接完畢後開到堯華門，沿鐵路西側構築工事。5日，全營正在構築工事之際，桂永清派傳達兵送來手令，命該營到遺族學校附近構築工事。尚未開工，又命構築前湖、歷步橋一段城防工事，並負責堵塞中山門。全營徹夜工作，於7日完成任務後，連夜前往麒麟門、亂石崗前進陣地，並與湯山、青龍山的騎兵團聯繫，與敵接觸後逐漸從九九高地、體育場、林森公館、明孝陵撤退到太平門內。全營到達防地後，營長命令第五連據亂石崗陣地，第六連據麒麟門陣地，第七連為預備隊。拂曉前，防禦部署完畢後，他騎摩托車前往湯山不遠處，看見湯山退下來的部隊，知道湯山失守，我騎兵團連日逐次抵抗，損失很大，已撤到太平門外徐墳一帶警戒。

8日，由京杭公路進犯之敵，開始攻擊我前進陣地。敵山炮向我麒麟門、亂石崗、九九高地猛烈攻擊。我五連與敵激戰後撤到體育場一線，掩護六連撤退；敵人佔領亂石崗，我迫擊砲集中火力打擊敵人。敵人發現我營指揮所設在九九高地，便集中砲火向九九高地猛轟，掩護其步兵向九九高地右側迂迴。當我七連已撤到中山陵陣地時，敵人已爬上九九高地。我戰士連續投手榴彈，高地上發生激戰，營長從高地退下時負傷。全營從前進陣地順利撤到中山門附近佈防。12月11日下午，總隊部傳達班長桂永清手令，命該營迅速撤到煤炭崗渡江，在徐州收容。該營在前陣地中損失很小，撤退前中山門城防無戰鬥，又因提前撤退，沿途收容一些散兵，這是南京保衛戰中唯一保持比較完整的一個營。

3、紅毛山、白骨墳的戰鬥

紅毛山位於孝陵衛東南，原為87師的防禦地區，該師未能到達之前，由我總隊的一團三營（營長周士泉）代為防守，歸代守光華門城防的我二團團長謝承瑞指揮。12月初，接到防守紅毛山命令後，即偵察地形，選擇陣地，構築工事，準備迎戰。12月8日，敵方升起了兩個氣球進行高空偵察，指揮敵炮向我總隊前線轟擊，敵機輪番轟炸，步兵發起全線攻擊。此時業已到達紅毛山前的敵裝甲部隊也向我紅毛山陣地發起強大的攻擊。九連、十連當即予以有力的還擊，並組織狙擊手炸毀敵裝甲車一輛。敵人不斷增援，戰況

愈戰愈烈，預備隊十一連亦加入戰鬥，敵我傷亡均重。旅指揮所以營的兵力對戰已顯薄弱，命軍士營營長吳曙青率兵一連，附戰防炮一門，及時增援。經過頑強抵抗，終於遏止了敵人的進攻，保住了陣地。當晚，長官部另調鄧龍光部隊接替了紅毛山的防備營。該營奉命轉入白骨墳之線既設陣地，歸還一團建制。該營為團之第二線，防守下馬牌至白骨墳之間的地區。當時營的防禦部署：九連在右，防守衛崗至白骨墳之線；十連在左，防守下馬牌至鐵匠營之線；十一連為預備隊，控制於遺族學校營指揮所附近，重機槍連及迫擊砲排由營部機動使用。

12月9日，敵砲兵突然向我白骨墳陣地猛轟，同時向我紫金山西山、陵園、孝陵衛猛烈炮轟，對我白骨墳陣地發起強烈攻擊。戰鬥持續到中午，敵我傷亡很重，我全線陣地迄未動搖。戰鬥間歇，當晚，我偵察兵報告，孝陵衛總隊部營房南端有敵人活動，兵力不詳，營連加強警戒，以防夜襲，但未發生異動。

12月10日，敵人在麒麟門上空又升起兩個氣球，高空觀察，指揮其重炮、山炮向我紫金山、陵園、西山猛轟，並將射程延伸至天堡城、中山門、太平門內外，全線展開激烈的戰鬥。我白骨墳守軍與敵白刃相接，全力以赴，一壕一塹，寸土必爭。守衛下馬牌的戰防炮連連長王竣陣亡，全連犧牲。經過整天幾次較量，進攻之敵被我擊退，遺屍陣前未及拖回。我亦傷亡慘重。當日午後，望遠鏡下，突然發現敵裝甲部隊和騎兵在空軍掩護下，出現在我陣地南側，行動顯得從容；令人費解的是，我光華門友軍毫無反應，任其安然通過，而這股敵軍當夜未參加戰鬥。

12月11日，狡猾的敵人連日來傷亡重大，受挫於我西山孝陵一帶陣地之前，未獲進展，遂作佯攻姿態，以牽制我軍行動，將其攻擊重點指向城南；因而光華門、通濟門以及雨花台方面炮聲隆隆，烽煙沖天，戰鬥激烈，情況不詳。

12月12日，敵我整日激戰，敵人隨時隨處強力進攻，我官兵竭力抵抗，至死不退，原地膠著到天黑。六時左右，奉命於十二時開始撤退到明孝陵集結。守衛白骨墳、衛崗的第九連排長李慕超撤退時，已到半夜一時左右。他撤到明孝陵，看不到部隊，據傳在軍校整頓。此時，中山門內外一片寂靜，紫金山一二峰火光沖天，槍聲密集，我三旅官兵仍在酣戰中。到太

平門時，部隊異常混亂，黑暗中無法識別番號。擠進太平門到軍校後，大操場一片空闊，樓上電燈尚未完全熄滅，人去樓空，才知道守城部隊已盡撤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他祇得奔向下關。下關江邊擠滿了成千上萬失散的官兵，人們望著北岸的大江嘆息，彼此毫無辦法，面面相覷。無奈，他和隨從的士兵找到幾根枕木，紮成木排冒死渡江，幸未沉沒，登上北岸。在開封收容時才知道營長陣亡，全營官兵僥倖脫險者沒有幾個。

4、驚險的光華門戰鬥

我防守淳化鎮的51師於9日向南京城郊撤退，跟蹤追擊之敵幾乎同時到達高橋門。我擔任白骨墳工兵學校高地及光華門守衛的87師261旅，於7日才從鎮江撤至堯化門集結，8日拂曉在體育場與敵一度接觸後，即到原防區白骨墳、工兵學校高地與敵展開激戰。光華門外的七橋瓮、中和橋，未來得及破壞，兩千多敵兵和十多輛裝甲車已推進到光華門外。當時，光華門附近只有我總隊代守城防的少數官兵，看到情況萬分緊急，立即將城門關閉，並將沙袋壘到半城牆高，以防敵人衝進。敵人將山炮推進到高橋門向城門射擊，泥沙向外傾下，百餘名敵軍乘勢從沙袋間隙爬進門內，立即被我殲滅後，又將城門堵死。桂永清知道光華門情況緊急，除命工兵團新兵增援外，另命參謀李政鈞持其手令調砲兵入城，設陣地於明故宮附近反擊，並由該參謀監督執行。翌日，光華門附近的敵敢死隊向前衝來，被我工兵團一排新兵阻住，展開肉搏，愈戰愈烈，光華門又被突破，衝進城內之敵約二百多；雖被我守軍殲滅，但有少數敵兵潛伏於我城門瓮洞內死守不退，我步機槍射殺不到，情況依然危急。桂永清急了，親自率領衛士及警衛連一排多人到朝午門督戰，並在五龍橋至光華門御道上壘起了三道沙袋，留有槍口，準備巷戰，還想調睢友蘭團進城增援。團長謝承瑞對桂永清說：瓮洞之敵不多，但我步機槍射殺不到，不如用汽油將這些敵兵燒死，明日我親自率敢死隊衝出城去，將這股敵人消滅。桂永清認為可行，立即打電話給參謀處送來幾桶汽油，團長親自帶領士兵將幾桶汽油背到箭樓上，打開桶蓋，向瓮洞推下去，隨著汽油流出，扔下火種，一時汽油猛烈燃燒，瓮內敵人全部燒死。這時天快亮了，城外敵人

火力依然密集，我城牆守軍居高臨下，仍以熾烈的火力壓制敵人。這時，謝團長親率敢死隊突然打開城門，出敵不意，十多挺輕機槍同時齊發，敵人紛紛倒地。有一名未死的敵兵，被擔架抬到總隊地下室，由軍醫治療後聯繫紅十字會收留；總隊部撤退時他還躺在地上，蓋著軍毯，睜著眼睛，不言不語，別人也都不理睬他。謝承瑞團長在戰鬥開始前就已有病，後又發燒，過度疲勞體力不支，12日夜撤退到挹江門時，出城部隊混亂擁擠，被亂軍踩死。聞者莫不痛惜。少校團副溫秉鐸也在明故宮被炸死。

當唐生智知道工兵學校高地失守、敵人衝進光華門的消息後，極為震驚，嚴厲訓斥王敬九師長，並令其奪回陣地，否則軍法從事。此時，王已將他的指揮所移至富貴山地下室。他的辦公室就在邱清泉參謀長的對面。他沒帶參謀和副官來，整天吸菸打瞌睡。受到唐生智的訓斥後，便打電話叫來防守工兵高地的旅長。這位旅長到地下室後，向師長和邱參謀長恭恭敬敬地行禮後立正站著。王敬九聲色俱厲地問道：“你為甚麼把工兵高地丟了？”旅長說：“我們從上海撤下後，人員只剩一半，加上幾天的苦戰，官兵不死即傷，工兵學校高地只有一連，所以……”再沒說別的。王說：“快去把剩下的人組織起來，完不成任務拿頭來見”。旅長敬禮後就走了。他回去後，即與 257 旅旅長易安華商量，決定趁敵立足未穩之時，黃昏時候由易旅長率領一個加強團，在通濟門外向東北方向進攻深入光華門附近之敵；他自己率領一個加強營，由清涼巷、天堂村協同 257 旅夾攻光華門外之敵，並阻止小經山敵之增援。經過八小時的血戰，才將這股敵軍消滅。光華門內外遺屍遍地，經查皆為日寇第九師團。當光華門吃緊的時刻，憲兵教導團的一個加強排也來增援城防戰鬥。

5、中山陵園的戰鬥

右守備隊第二旅之三團（團長李西開），最初決定為總預備隊，控制中山門及太平門內附近；後因紫金山南麓中山陵園地區兵力薄弱，調任該地區的防務。其防禦的正面，右起陵園南端之林森公館，向北沿中山陵東側、靈谷寺高地至老虎洞南端一帶。當時團的防禦布署是：第二營營長（孫仲獻）為右翼營，據陵園新村至中山陵東南高地，右與第一旅一團聯

繫；第一營營長（鄒作華）為左翼營，據中山陵東側地區，包括靈谷寺至老虎洞南端陣地，左與三旅五團聯繫；第三營營長（盧禹鼎）為預備隊，守在吳王墳（梅花山）、明孝陵東側一帶；團指揮所設在朱元璋墓前隧道內，配屬的工兵連負責構築團防禦地區內營連的重點工事。

12月7日上午，團長與中校團副彭月翔、少校團副朱道源巡視各營陣地，在陵園新村見到幾十處高級官員的別墅，都已人去樓空，只有張學良別墅還有少數人留守，別墅內存放著大批珍貴的古文物和書籍。汪精衛的別墅內有花園、游泳池、網球場，餐廳裡存放中外名酒和數不清的山珍海味、名貴食品，令人感嘆。

12月8日，由京杭大道西進之敵突破湯山，外圍守衛部隊已陸續後撤。我騎兵團也損失很重，已由麒麟門、仙鶴鎮岔路口撤到徐墳一帶，擔任總隊左側警戒。午後，我老虎洞西側、體育場、馬群、亂石崗前進陣地遭受敵人猛攻，戰鬥激烈。至夜半，奉命放棄前進陣地，撤到紫金山、中山陵東側西山、孝陵衛之線的主陣地，徹夜戰鬥。9日，敵人開始向我主陣地進攻，戰鬥異常激烈；直到日落，我陵園新村、中山陵東側陣地迄未動搖。

12月10日拂曉，敵人升起兩個氣球，觀察監視我陣地及部隊調動情況；由於我高射砲射程達不到，又無飛機將其擊毀，致使敵人一目瞭然。官兵眼看著敵人重砲向我陣地任意轟擊，內心痛恨，無可奈何。敵機輪番轟炸，城內城外，到處投彈，步兵在戰車掩護下，向我軍發動接觸以來最猛的一次且帶有決定性的攻擊。我一三兩團的戰防砲英勇反擊，擊毀敵戰車數輛，捉獲戰車兵數名。接近我陣地前的敵兵，均被我以小步機槍及手榴彈擊退，陣前棄屍纍纍，傷亡慘重，我陣地未稍動搖。入夜小接觸，互相對峙。

12月11日至12日夜，紫金山、中山陵東側、靈谷寺、陵園新村、西山孝陵衛至白骨墳等主陣地，整日激戰。因我總隊在孝陵衛編組訓練有五年之久，東郊一帶地形瞭如指掌，官兵素質較好，訓練時間很長，愛國心很強，士氣旺盛，受命之日，即以必死決心，誓與陣地共存亡。此時與敵反覆衝殺，雖越打越少，卻越打越勇，無一後退，且陣地堅固，縱深配備，雖敵人一再增援，但均告失敗，我陣地巋然不

動。12日中午，我中山陵東側、靈谷寺及陵園新村二營大部份掩體，多被敵穿甲彈擊毀，新村許多房屋起火；敵砲兵延伸射程，向吳王墳、明孝陵、中山門一帶縱深射擊，團指揮部中彈，但墓道堅固，未遭破壞，人員幸未受傷。我官兵仍在原陣地與敵人苦戰，一壕一塹幾經得失。五時左右，旅長胡啓儒以電話告團長：“我奉命到下關與三十六師宋希濂聯繫軍務，本旅作戰事宜及四團歸你指揮”，團長未料到他得知中華門不守的消息後即藉故溜過江去了。光華門曾兩度被突破，城門外尚有敵兵盤踞。下午六時，天已昏黑，我右翼一團西山、孝陵園一線，因西山陣地過於突出，右後側受到很大威脅。秦士銓團長命令放棄西山陣地，撤退到衛崗主席官邸以東之線固守，陵園新村及中山陵東側有被包圍的危險。團長急命第一營節節抵抗，退到天堡城、明孝陵東側高地繼續戰鬥。第二營傷亡過重，由預備隊第三營接防，與第一營銜接，佔領明孝陵及梅花山高地，阻止敵人前進。第二營轉移到天堡城南麓為預備隊。快到七時，邱清泉參謀長打來電話：“你團傷亡過重，現由廣東部隊派一營兵力增援，請派人到太平門外崗子腳聯繫。”一小時過後，少校團副朱道源聯繫回來報告：“崗子腳沒有部隊，只見許多士兵搶著出城，聽說雨花台失守後中華門已被突破。”團長急以電話問副旅長溫祖銓及參謀廖耀湘，均無人接；又打電話問邱清泉，也無人接，各處電話業以中斷。此時，團部副官施重華由總隊部回來說：“中華門已被敵人佔領，城內四處起火，軍民混亂不堪，總隊部已經無人。”聽到以上情況，團長立即決定將指揮所轉移到廖仲愷墓南端預備指揮所，繼續指揮戰鬥。夜八時，劉子叔團長來到指揮所怒沖沖地說：“我們還在與敵人死拼，戰事還未到最後一決，桂永清和胡啓儒就先溜了……”李團長請他坐下來，然後說：“此刻指責與事無補，我們還是商量今後的行動。”此時，第一團團長秦士銓也匆匆走進來說：“你們不知道，中華門已經陷落，第一旅電話不通，旅長及旅部人員不知去向，請問諸位今後如何打算？我團幾天來的血戰，傷亡殆盡，第一營剩下二百來人，第二營於十一日下午被桂永清調過江北，第三營營長周士泉陣亡，全營傷亡殆盡，剩餘的仍在中山門及衛崗一帶與敵苦戰”。於是，大家打開地圖，商量今後行動。李西開團長首先提出兩個方案，一是過江北撤，若能趕上

總隊一同行動更好；二是突圍，只有經太平門、堯化門繞道敵後到皖南，能否突圍，無法預料。秦團長說：我手下無兵，無力突圍。劉團長說：我團是剛接來的新兵，幾天來傷亡太多，沒有戰鬥力，又毫無作戰經驗，還是北撤好。於是大家決定渡江北撤。團長即以電話通知各營乘夜悄悄撤到燕子磯設法過江。午夜二時左右，紫金山、梅花山方向不斷傳來槍聲，我山上官兵仍在原陣地與敵兵酣戰中。

13日拂曉，團長到達燕子磯三台洞江邊，只見很多流散官兵，三五成群，由下關方向奔湧而來，驚慌失措，一眼看不到大江南北。哪里有船隻？滾滾激流中漂浮著無數的木板、門窗、木盆，人頭浮沉，呼救聲、掙扎聲令人毛骨聳然，慘不忍睹，江邊部隊混亂，誰也無法指揮。八時左右，忽然傳來槍聲，混亂的士兵又向燕子磯奔逃，團長命令隨從士兵各自設法渡江後在浦鎮集結。此時，鄒作華營長用電線紮成兩個木排後，請團長和大家一同冒險過江。木排只容三五人，用一根扁擔作櫓，大家用手作槳，向北強渡，緩緩向江心漂去，流入無數的浮屍中。突然三架飛機飛臨上空，俯衝掃射，江面一片慘呼，但他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管鎮定地划水，午後才到八卦洲上岸，夜間向老百姓租了一條小船，渡到江北大廠才算脫險。我二旅剩餘官兵，分別撤到下關江邊後，因無渡江船隻，除極少數晝渡脫險外，其餘流散官兵均被敵人殘殺。

6、紫金山二、三峰戰鬥

左守備隊第三旅，最初以旅之第六團守備堯化門，後由48師接替防務，該團轉移到岔路口及紫金山東麓一帶地區。旅之五團（原為補充兵第一團）雖係新兵，經過兩個月的訓練裝備，軍士和幹部素質較好，有相當的戰鬥力，可以獨當一面，因而決定防守紫金山，將其重點保持於二、三峰。當時團的防禦配備：第三營（營長羅玉峰）據第三峰即老虎洞陣地，左與岔路口的六團，右與二旅聯繫；第二營（營長歐陽俊）據第二峰陣地，隨時增援三峰戰鬥；第一營（營長博守彝）據一峰陣地，隨時支援二峰戰鬥；榴彈炮連（連長陳斯健）在一、二峰之間據守陣地，選修炮位；通信兵連（連長石懷瑜）在團指揮所開設交

換所，與總隊部及各營連構成通信網；團指揮所設在天堡城與一峰間的北坡隱蔽部。

12月初，團的防禦地區確定後，各營連即登上紫金山，偵察地形，選擇陣地，構築工事，儲備彈藥給養，準備迎戰。此時，敵人已逐漸逼近南京，從湯山淳化鎮、牛首山一帶隱隱傳來了炮聲，知道我外圍守軍已與進犯的敵軍接觸，團長下令各營連進入陣地，嚴密警戒。當晚，敵人的搜兵和先遣部隊已與我岔路口、麒麟門、亂石崗的前哨部隊發生零星戰鬥，我三峰陣地的官兵嚴陣以待。

12月8日晨，我通信連連長經過砲兵陣地與陳斯健連長說話時，觀測班報告：京杭大道發現一股大隊敵軍，以行軍密集隊形毫無顧慮地由馬群西進。在我們的望遠鏡下也看得很清楚，這是個好目標。連長命令兩門德造榴彈炮直接瞄準，連發擊射，只見砲彈落處，大部隊敵兵紛紛倒地，猶如鍋上螞蟻亂成一堆，未死的瘋狂逃跑。我砲兵首次開炮得勝，大家齊聲歡呼。過了一會，敵人飛機飛臨上空，向我紫金山、西山、孝陵衛陣地輪番轟炸，砲兵發射大量砲彈，全線展開激戰。進犯我老虎洞之敵，隨著敵機投彈助戰，集中砲兵火力向我軍陣地一陣猛轟後，步兵發起衝鋒。我守軍居高臨下，利用良好地形，憑藉著堅固的工事，目標鮮明，射界開闊，沉著鎮定，待敵兵接近我陣地前，以熾盛的步機槍火力和手榴彈將大部敵兵消滅在陣地前。敵人橫屍遍地，傷亡慘重，當天未敢再犯。

12月9日拂曉，我砲兵觀測班發現，約有百多名的小部隊，在我總隊部營房南端架槍休息；因晨霧未散，視線不清，以為是自己部隊。不多時，視線漸明，仔細觀察，服裝鋼盔與我顯然不同，隨之發現一面太陽旗插在旁邊，確是敵兵，令人大為驚奇。不知這股兵從甚麼地方偷進到我軍後方。我山上砲兵立即直接瞄準，幾發砲彈打得這股敵兵屍體橫飛不死即傷，嚎啕狂叫好不痛快。當時我們根據情況判斷，可能因我友軍到達光華門防區時間較晚，陣地尚未鞏固，敵人已衝到光華門；這小股敵人乘夜從我友軍防區接合部插進來，幸而發覺，未釀大禍。八時左右，進攻我老虎洞之敵發射了很多燃燒彈、穿甲彈、煙幕彈，再次發起衝鋒，我三營官兵冒著硝煙火海頑強抵抗。在生死決鬥情況危急之時，得到我左翼營的支

援，以密集側射擊退敵人進攻。午後颳起了一陣東南風，敵人利用風向，又發射更多的燃燒彈、煙幕彈、摧淚彈，發起第三次進攻。戰鬥到最高潮、最慘烈之時，營長羅玉峰、連長胡瑛陣亡，敵我傷亡均重。由於三峰陣地過於突出，增援不易，旅長當夜放棄陣地，退守第二峰東麓一帶固守。

12月10日，敵人步炮空聯合，集中兵力，對我紫金山發動了強大的攻勢，妄圖一舉攻克南京。其重砲在氣球觀察指揮下，傾瀉了近千發各種砲彈，全線展開激戰。攻佔我三峰的敵軍亦向我開始進攻。紫金山是由西向東傾斜的山脈，形成三個山峰，二峰為我第二道防線，正面不到二百米。左翼有層巒疊障的山峰為依托，敵人無法從左翼迂迴；我右翼有二旅仍堅守中山陵東側陣地，可以側射支援，敵人從山下仰攻，前進不易，每次發起進攻均被擊退，遺屍遍地，傷亡很重。我二營營長歐陽俊負傷，連長張仲獻陣亡，官兵所剩不多，戰鬥到日落之時，我二峰及山下各團陣地，均無變化。

12月11日至12日，南京全線激戰，城南雨花台、中華門方面更為激烈，炮聲隆隆，從紫金山高峰望見火光四起，煙塵迷漫。十二日午後二時，雨花台失守，敵我在中華門一帶激戰，情況不明。快到日落的時候，敵人攻勢頓挫，我亦無力反擊。戰鬥暫時緩和，炮聲暫停，步機槍聲時起時落，逐漸稀疏。戰鬥間隙之際，我急欲回天堡城北坡連部安排一下後勤事宜，恰好在第一峰遇見馬威龍旅長向東走來，神色有些慌張，未等我開口，便對我說：“從現在起，你連配屬於團部及各營的通信排，直接由各營營長指揮，你帶領連部人員和勤務兵到太平門徐墳附近的路東待命，而後行動我派傳令兵通知”。我問旅長是否有部隊接防，他說現在不要多問，趕快按我的命令行動就是了，說完向東走去。紫金山戰鬥從一開始就由旅長指揮，團長在掩蔽部很少出來，我自然按旅長指揮行動。當時，我對旅長的指示有些不解，因為我山下一二旅官兵仍在原陣地固守，沒有變化，光華門仍由我一旅二團和友軍87師固守，敵人仍被拒於城外，而且我們戰鬥之前就是奉命死守，與陣地共存亡，因此我沒有往撤退方面想。回到連部後即以電話通知各排按旅長的命令行動，遂即帶領連部人員及勤雜兵二十多名撤下山來，即與旅長失去聯絡，更不知配屬營團部

的四個通信排的情況。後在開封收容時也未見到幾個我連的官兵，毫無疑問，除陣亡外，不是沉沒於長江便是被敵人屠殺。我帶領著沒有武裝的二十多名士兵勤雜人員，於 13 日拂曉到達下關時，只見江邊擠滿了無法渡江的流散官兵，望著浩瀚大江，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我和我的二十多名士兵，只有冒死渡江任其自生自滅，但僅我一人神話般脫險。事後知道馬威龍旅長撤退前已與葉肇、鄧龍光取得聯繫，決定由太平門經堯化門通過敵後間隙向皖南突圍。五團團長睢友蘭得知撤退消息後，落日之前即與副官宗某到難民區，六團團長王化藏入民間，後來化裝脫險。三旅二團六營重機槍連長郝文藻由岔路口轉移到陵園時，只剩二十多名戰士和一挺重機槍，在陵園戰鬥到 13 日拂曉時才知道撤退了。他通過熟悉的小道到達下關後被俘，待集體押送到孝陵衛擔挑軍品時乘黑夜逃脫；後經當地老百姓救護，換上便服，晝伏夜行，經過多日的困難和危險才到達皖南。我守衛紫金山第三旅的官兵，孤懸在山上，撤退的消息知道得較晚。山下部隊撤退時，他們還在一二峰與敵鏖戰，剩餘官兵的下場，按照敵人的敘述“……穿著新棉軍服，面色紅黑的士兵仍守在戰壕裡，被一個一個地槍殺了。”這都是炎黃子孫，中華英俊，多半是入伍的新兵，為保衛祖國，捍衛南京，貢獻了自己的生命。他們血沃鐘山，暴屍疆場，若楓葉之艷艷，如松柏之蒼蒼，其精神將永世流芳。

7、桂永清險遭滅頂

12 月 12 日下午，唐生智召集保衛南京的各軍師長下達了撤退命令之後，軍師長們即急忙離開總部。這時消息業已泄出，除了總隊和 87 師仍與敵人鏖戰，前線官兵還不知道。有些消息靈通的後勤人員，已開始焚燒文件、物資，收拾隨帶的東西奔向下關。桂永清離開長官部後，首先奔到住在城內的直屬團、營和一旅部傳達撤退的決定。要求各旅團以少數部隊掩護，其餘分向下關、三義河、煤炭崗各自集結，用一切可以渡江的工具橫渡長江後，在津浦線的滁州收容；除隨身攜帶的武器外，其它武器、裝備、物資全部銷毀。此時，中華門業已失守，城內秩序大亂；他回到富貴山地下室後，召集參謀處長萬成渠、副官處長余易麟等說明情況，便命副官處人員即刻撤到三義河，除參謀只帶少數重要文件外，其它全部銷毀後向下關

撤退。吩咐完畢後對參謀長邱清泉說：“我們一同走吧”。邱說：“您先走，我暫時留一下，和旅團聯繫後再走”。桂說：“那也好，處理完畢後馬上到三義河，我們一同過江，還要組織收容工作”。說完，帶著衛士及余易麟等離開地下室。走到三義河時發現沒有渡船，只找到工兵團紮下的一個木排，就同余易麟及衛士乘坐木排向浦口劃去。天黑人多，劃行很慢，半夜時候才到北岸，但不是浦口，是浦口下游的岸邊。這裡蘆葦一人多高，江邊平坦如紙，淤泥光亮如鏡。桂不知深淺，和一個衛士先跳下去，腳剛著地立即下沉，愈陷愈深。木排上的人看到這種情況也慌了，立即解下兩個人的綁腿扔下去，才把兩人全力拉上來，遂即判明方向，來到浦口。時已天明，找不到車輛馬匹，桂永清身體肥胖，鐵路線上又不好行走，祇得沿公路走到滁州，才見到唐生智，便命他在開封收容。

南京保衛戰開始之前，桂永清曾在三義河、下關、煤炭崗準備了一些民船，後來都被 36 師全部繳回，開往上游北岸。總隊撤退較晚，官兵到下關、三義河煤炭崗時，已是半夜，戰士們渡江無術，少數官兵抱木泅渡，幸得脫險，其餘流散官兵，全部殉難，至今思之，餘恨難消。

（附註：

1：關於桂永清渡江經過，總隊劉庸誠參謀根據桂的機要人員高旭林、郭孔新的敘述記其詳。我連學兵、後來被徐秉清選拔去當桂的衛士劉正興證其事實，桂永清並沒有棄師先過了江。

2：參謀長邱清泉、輜重兵團長郭岐、二旅少校參謀廖耀湘，也是藏匿民間，化裝脫險，郭岐還寫了篇日寇佔領南京後大屠殺的情況。

3：關於二旅旅長胡啓儒先期過江後的情況，一團通信連總機班長彭嘉述說，他在十三日浦口車站看見他帶著夫人上了車。

4：有少數士兵由難民區逃出來的，如自動車隊的學兵李青雲、秘敬儒、續國璋等，冒充南京江南汽車公司司機身份，被日寇抓去開汽車期間逃脫後到重慶戰幹一團。1940 年春，我在軍委政治部交通處工作，奉命去戰幹團本部汽車隊，聽他們說親眼看到日寇多次集體屠殺中國人：或將屍體拋入江中，或挖溝填埋，或焚屍滅跡，種種慘不忍睹的暴行，使他們膽戰心驚，朝不保夕，決心設法逃出賊窩，利用孝陵衛一帶軍民深厚的感情，得到百姓幫助，終於安全到達

大後方歸隊，繼續參加抗日聖戰。有幾人至今還活著和我取得聯繫，大家都認為是此生幸事，見面後感到無限親切。）

8、工兵團通信兵連之覆沒

10月中旬，工兵團通信兵連長施有仁率領連骨幹到皖北阜陽接收新兵。12月8日過江住昆廬寺。此時，日寇已到麒麟門附近與我前哨接觸。團長楊厚彩命令通信連架設線路。施說，我連全是新兵，未進行一天訓練，無法完成任務。團長說，我們工兵部隊與你連是同時接來的新兵，都要構築工事，埋設地雷；你要使用骨幹，完成任務。連長沒話可說，硬著頭皮去架設線路，開設總機。12月12日10時左右，接到團長命令，率領全連沿著中山大道，經新街口出挹江門後設法渡江。沿途安靜，將近挹江門時，看見36師士兵荷槍實彈地守在門口阻止出城。連長不了解情況，說我們是奉命出城，為甚麼不讓出城？怎麼說也不成，只好帶著全連在馬路邊休息。他幾天沒睡覺，在休息中睡著了，夢中被傳令兵推醒，才曉得36師已經撤走，臨走時將大量拿不走的彈藥堆積在城門洞內，放火燃燒，城門無法通過。無奈他帶領全連官兵走上城頭，利用“被服線”將人係下城外。一到江邊，便找了上船的木板，紮成筏子，準備渡江。因為人多，沒有登上幾個人，筏子便沉入水底；適逢通信營一班人也找渡江工具，便將筏子讓給他們，另找渡江工具。江防部隊混亂擁擠，一連人幾乎衝散。他帶領剩下的不足二十名士兵，沿江向上新河走去，在江邊截住了一個木排，指揮筏子上的士兵用鋼盔和槍托向岸猛劃。上岸後，才知道這裡是江新洲，筏子過的是夾江；於是，跟他上岸的士兵，只好又用蘆葦紮成筏子再次過江。他自己覺得是北方人，不諳水性，未敢冒險上筏。士兵們說，過江後找船來接。他只好答應，未作絲毫希望。此時，日寇已到下關附近，約黃昏時候敵艦放下汽艇，沿北岸向大勝關開來。他心急如焚，百思想不出渡江辦法，比伍子胥過昭關還難。結筏過了江的士兵，在北岸找到兩條小船來接。他們大喜過望，趕快上船。因為來時順風，兩個人拉了兩條船順風過來；但去北岸是逆風，二十多人將船撐開離岸，卻很難。士兵於蘆葦叢小便時，發現在該處隱藏的漁民數人；便抬出桅桿兩根，插在船上，扯起風棚，才順利地開到北岸。上了岸，此地守軍是78師，連長是他黃埔八期同學，很順利地通過防線，在滁洲北沙河登岸。

飲恨長江

(一)

1937年12月12日，守備紫金山的教導總隊第五團與敵人激戰了一整天，仰攻之敵，伏屍纍纍，攻勢頓挫，未獲寸展。我團亦因傷亡很重，沒有援兵，祇得死守，無力反攻，敵我形成對峙狀態。日落之前，紫金山一二峰仍在我軍固守中。苦守陵園、西山、孝陵衛、白骨墳陣地的我一二旅官兵，經過五天五夜的血戰，傷亡嚴重，仍在頑強戰鬥，寸步未退。隨著夕陽西斜，猛烈的砲火逐漸停止，步機槍聲也漸漸稀疏下來。在戰鬥間歇之際，我正想回到天堡城北坡連部安排一下後勤事宜，恰好在第一峰遇到了馬威龍旅長。他滿臉煙灰，混身泥土，神情有些緊張；但精神飽滿，並未顯出連日來激戰的疲勞。我習慣地敬了個禮。還未等我開口，他就命令我帶連部官兵到太平門外徐墳附近的崗子腳路東待命。我率領炊事班及勤雜人員到達指定地點。此時，金烏西墜，暮色蒼茫，已過黃昏時分，遠山近水全被夜幕所籠罩，眼前景物模糊不清。為了夜間容易與旅部來人聯絡，我把隊伍安置在視野開闊沒有隱蔽的路側，派出崗哨嚴密警戒；同時派傳達軍士二人，在公路上瞭望巡視，專等旅部來人。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不但看不到旅長派人來，通往堯化門及下關的公路上也沒有部隊來往。週圍雖然平靜，聽不到槍聲，但我所帶的二十多名勤雜兵，除了幾只手槍外，沒有武器；萬一發生情況，毫無自衛的力量；如果不很快加入部隊，後果就不堪設想。但旅長有命，叫我們在這裡等待，豈敢擅自行動。大家坐立不安焦急如焚，有人判斷可能是撤守，我認為不會。如果是撤守，不論由下關過江還是由堯化門繞道敵後突圍，太平門是必經之路，但現在仍未見有部隊出城，看不出撤守的跡象。除了設法找到部隊外，別無其它的選擇。但我認為這個時候應當適應情況，不宜這樣等待。我決定直接向總隊部聯繫。總隊指揮所就設在富貴山要塞地下室，徒步往返也不過一小時左右，便寫了簡要的報告，派傳達軍士送去。不到片刻，他急急忙忙跑回來說：“太平門外部隊擁擠不堪，秩序混亂。城門已被進出部隊阻塞，水泄不通，無法進出”。我問進城的是哪個部隊？他說大多數是我們教導總隊的，聽說奉命到軍校大操場集合整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心中頓覺踏實了。立即帶隊向太平門走去。還未臨近城門，就聽到人聲嘈雜，老遠望見黑壓壓一片，聚集在太平門外，停止不動。我

把隊伍安置在較為偏遠的地方，從人群中慢慢擠到城門洞跟前。在友軍手電燈光下看到的情況和傳達軍士的報告一樣，進出部隊互不相讓，彼此皆以開槍相威脅。我立即感到情況嚴重，一旦動起武來，勢必造成慘痛的悲劇，便大聲說：“我們奉命進城整理，請讓我們進去後你們再出來”。話未落地就有人說：“我們今晚奉命出擊，任務緊急，如果耽誤時間，就要貽誤大事，你們進城整理晚點也不要緊”。聽得出是兩廣口音。我知道鄧龍光、葉肇的部隊也調來參加南京保衛戰，因而信以為真，便大聲向入城部隊說明情況，請大家顧全大局，讓友軍先出城去執行任務，以免貽誤軍機。經過一番調解，教導總隊的官兵從城門洞裡退了出來，城門外的也向公路兩側分開，讓出城的部隊順利通過，一場武裝衝突轉瞬間得到避免。此時，出城部隊像潮水一樣蜂擁而出，秩序混亂，不成隊形，一波接一波奔騰而出，不知道甚麼番號，也不知人數多少。持續約有兩個小時左右，才不見有後續部隊出來。此時城門洞開，空無一人，奇怪的是原來要進城整理的部隊，此刻也不知去向。回頭一看，我的二十多人依然集結在原地沒有失散；我才明白，所謂奉命出擊執行緊急任務，不過是飾詞，撤退才是真情。我判斷廣西部隊大概搶在前頭，其他部隊依次跟在後面；當然不能肯定其中沒有教導總隊，無怪持續了這麼長時間，才全部撤光。我想跟隨友軍一同突圍，已經趕不上了。這時我頓感情況嚴重，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但事已至此，總不能無所作為。經過冷靜思考之後，覺得南京已盡棄家，個人生死無所謂了，還有甚麼猶豫可怕的，何不進城去看看，究竟有沒有自己的部隊還在城裡，真是不見黃河不死心，便毅然帶著二十多人進了太平門。回想八年以來，為了培訓國軍的優秀幹部，為了建立一支國防軍的示範部隊，不知多少次進出太平門，留下了多少腳印，今晚可能是最後一次。但願有一天，百萬貔貅伏強敵，旌旗凱歌下江東，如果不死，重來此地，悼念諸先烈，也算是遂了投筆從戎的志願。

（註）（1）12月12日下午五時左右，馬威龍必然奉到放棄南京的命令，並與鄧龍光、葉肇聯繫好一同突圍。但他給我下命令時含糊其辭，未將實情告之，使我與各排失去聯絡。至今思之，深以為恨。（2）紫金山上的官兵經過幾天幾夜的苦戰，傷亡慘重，疲勞不堪，糧彈供應不及，無力

突圍，他只帶幾十人突圍。（3）1939年5月馬威龍任46師138旅長職務，我們在河南開封與日寇土肥原部激戰，在羅王車站陣亡。

（二）

當我們進到太平門的時候，迎面看到軍校大禮堂的時鐘已是午夜十二時以後，沿富貴山東西兩側及黃埔大院週圍，不但沒有部隊活動，連人影都看不見。一片空闊，寂靜欲死，一望而知南京業已撤守，只剩下一座空城。我們進城歸隊的希望已徹底幻滅，此刻還有甚麼躊躇。我說：“弟兄們，走！直奔下關，幸運的話也許還能跟部隊過江”。便命砸碎行軍鍋灶，扔掉一切東西，一律輕裝，以強行軍的速度向挹江門奔去。路過成賢街北端，我想起了連部還有一位戰士留守，放心不下，順便去看一下，萬沒想到這個皖北農民子弟，像失群的孤雁仍在連部沒有離開。一見我就問：“連長，怎麼樣了？”我說部隊撤了，快跟著走！他楞了一下，挎起自己的二十響自來得手槍，順手抱起一架僅有的德式總機，猛向地下一摔，便加入了部隊。這個戰士一瞬間的行動，是何等的堅強勇敢，表現了一個軍人的英雄本色，流露出對國家的熱愛，對自己任務的忠誠，對敵人的仇恨，不愧為炎黃子孫，皖北好漢。我心裡想：目前日本鬼子如此猖狂，如此囂張，如此殘暴，遲早會以失敗告終。中國人民是不會屈服的。我軍三個月來在南北戰場上，英勇作戰，給日寇以意料不到的打擊，已為持久抗戰並獲得最後勝利打下了不可動搖的基楚。敵人今天雖然佔領了南京，表面上似乎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不可逾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終被埋葬在萬丈深淵裡。只要我們不惜重大犧牲，堅決拼命到底，如果不死，必會看到日寇可恥下場。當我們走到鼓樓附近時，看到零零散散的散兵，仍然荷槍實彈，武裝齊全，在微弱昏暗的路燈下，從新街口方向往北走來，心情沉重，默默無言。都是從火線撤退下來，失去隊伍，無處投奔，只好指望到達下關渡過長江去。我們所經過的大街小巷都關門閉戶，熄滅燈光，一片黑暗。全市被戰爭的恐怖氣氛所籠罩，亡國之痛，令人淚下。這時候，中華門方面的情況不明，莫愁湖、水門西一帶聽不到槍聲。路過三牌樓，看見當年修建的宮殿式的鐵道部、交通部業已燒燬，餘火

未熄，臨街房舍，多被敵機炸毀，一片瓦礫。快到挹江門時，遠遠望見潰退下來的官兵，聚集在挹江門內，足有一里多長，我們也順序加入了出城的行列。等了很久不見活動，從前頭傳下來消息說，挹江門業已堵死，前邊出不去，後邊向前擠，人聲喧譁，混亂不堪，很多人被踩死踩傷，呼叫連天。我看眼前的情況，出城既不可能，過江更是無望，如果這樣聚成一堆，天一亮，被敵人發現，別說敵機轟炸，就是一陣排炮，也將被全部消滅。這裡不是停留的地方，便把隊伍帶到挹江門東邊偏僻處坐下來和大家商量辦法。戰友們都叫連長拿主意，真是天曉得，連長還不是和大家一樣的嗎？還能想出甚麼出路。我說：“我們現在都是瓮中之鱉，除了一死報國外沒有別的選擇。紫金山本來就是我們光榮犧牲的地方，而今叫我們不明不白地撤下來，又無明確指示，事到如今，報國有心，殺敵無力，既然已到絕境，又何惜一死。我個人絕不甘當俘虜，如果大家還有甚麼辦法就自尋出路，否則只有和敵人最後一拼，以死報國”。戰友們堅決表示，活在一起，死在一起，都不離開；自尋出路，實際上沒有出路。我看到這種情況，非常激動，忽然想起了歷史上的田橫，有八百壯士殉難，我這個小小連長有何能何德，今天還有二十多名戰友同生死共患難，實在太光榮，死得其所，死而無憾。我們分析了當晚的情況，認為敵人和我們激戰了一天，受到慘重的損失，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日落之後也得喘息一下，即使發起進攻，一般也要在拂曉。另外，我軍夜間撤離戰場，行動秘密，敵人未必知道。即使判斷我們撤守，黑夜進城，將冒埋伏、狙擊、巷戰的危險。怕死的日本鬼子在天亮之前，進城的可能性不大，現在的時間空間都是屬於我們的。既然和敵人作最後的一拼，就得做充份的準備。沒有武器，就近檢起被遺棄的槍支手榴彈，選定適當的位置，待敵人接近時就和他死拼。準備妥當之後，就坐下來休息。俗話說，一夫拼命，萬將難抵，把生死置之度外之後，反而覺得膽大氣壯，無所畏懼，而飢餓疲勞更是不在話下了。

（三）

情況的變化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不多久，挹江門起了火，霎時間火光沖天，一片通紅，老遠望見火光下想要出城的部隊，依然聚集在挹江門內。這場

大火燃燒了一段時間後漸漸熄滅下來，我們急於知道一些新情況，又無目的地來到挹江門附近。這場大火如何引起的，我傾耳靜聽了人們的紛紛議論。有人說直到現在，下關一帶聽不到槍聲，說明敵人的部隊還未到來，沒有和我們接觸，斷定不是砲火引起的。也有人似乎知道真實情況，直接指出：守備下關一帶的36師為搶先過江，把城門堵死，不讓城內守軍出城，最後撤離時放起一把火來。你一言我一語，把心中的怒火轉移到宋希濂將軍身上。我認為在這個時候談這個問題已經沒有意義，更不應毫無證據地指責別人。正想帶隊離開此地，不知我的哪位戰友說，我們為甚麼不從城頭縋下去？接著就有幾位戰友向我提出這個建議，真慚愧，我怎麼就沒想起縋城這個辦法呢？就說，大家認為縋城這個辦法可行，不妨試試。於是，在挹江門東邊二百多米處登上城頭，往下一看不算很高。我叫准尉排副董玉林先下去，接著戰友們一個一個縋下去，最後我和准尉特務長李晉九也下去了。隊伍集結在城牆根下沒有失散，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折磨了一夜，在絕望中出得城來；然而，在這樣混亂撤退的情況下，能否渡過長江，更難預料，只能看運氣了。

（四）

12月13日晨，黎明前的黑暗漸漸消逝，挹江門外的景像已歷歷在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挹江門外沿城根一帶的住房，已被大火燒光，煙霧迷漫，一片瓦礫，被燒死的官兵焦頭爛額，慘不忍睹。一股血腥氣味撲面而來，令人掩鼻。通往江邊的馬路兩側，盡是無法過江的散兵，很多還能救護的傷兵躺在路邊呻吟嘆息，任其自生自滅。踩死踏傷的屍體，橫豎躺在地面，血跡斑斑，令人酸楚。在許多屍體中，認了出通信營無線電排排長華有睿同志。我們正在奔向下關江邊之際，忽然聽到後面一陣嘈雜，不知挹江門為何打開，一股人流像春潮一樣，從城門洞內奔騰而出，轉瞬間蜂湧到下關江邊，匯入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大家望著波濤洶湧不見北岸的大江，沉痛地說，早知如此，何必撤下火線？這時候太陽已經爬上山頂，微弱的陽光雖然照射在人們身上，哪能感到一點溫暖？突然間，一陣密集的步機槍聲夾雜著微弱的號音，從遙遠的東南方向傳來。江邊的人群頓時緊張起來，紛紛

四散。有的原地臥倒，準備射擊，有的急忙躲進民房，有的離開江邊不知去向。我和我的二十多名戰友，就近進入了下關水泥廠，以門牆為依托準備抵抗；但在一陣密集槍聲之後，卻又沉寂下來。一場虛驚雖然過去，而慘酷的屠殺和搏鬥，很快就要到來。面對長江，一籌莫展。我看見不少官兵還帶著武器，總覺得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豁出命來，從新河方面衝殺出去，縱然犧牲也讓敵人付出代價，便大聲疾呼：我們已到最後關頭，沒有別的出路，如果大家願意的話跟著來！從新河方面衝出去，一時成百上千的官兵跟了上來，向上新河方面衝去；但畢竟是臨時集合，一片散沙，難得統一。一時激動之後，許多人躊躇不前，還未到上新河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實在令人喪氣，只好又回到下關。江邊的官兵依然無計可施。快到中午的時候，忽然發現江面上無數的浮屍隨波逐流，從上游漫江而下；間有未死者仍在水中掙扎，旋被波濤吞沒。大家知道，是上游戰鬥失利了，無法過江的官兵均被敵人逼到江中。景象之慘，令人驚心動魄，目瞪口呆。大家都意識到眼前的慘景很快會臨到自己頭上，再也沒有躊躇的餘地了，立即作出了自己最後的決定。有的奮身一躍投入江中，有的抱木泅渡，有的離開江邊。我身旁的戰友也要不顧死活，設法過江。俗話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如果現在都是在兩軍陣前，生死決別之時，相信大家都會奮不顧身與敵死拼；但在眼前的情況下，我無權命令他們。我說，大家既然決心過江，那就趕快行動；有人僥倖過去，把我們的情況向部隊報告。這樣，我們一同下紫金山，出挹江門，共患難同生死的二十多名戰友，便各自準備過江，以後再也沒有見面。

（五）

江南 12 月的冬天雖不似北方那麼冷，但若冒寒冷的天氣泅渡長江，就是善識水性慣於游泳的行家，尚且望而生畏，何況不會游泳、光憑一塊木板的浮力，要渡過長江，縱不能說是兒戲，也會被認為是神經失常，但在生死關頭就不能以常理論。12 月 13 日，下關江邊幾萬無法過江的官兵，大都不會游泳，也並不是連一點常識都沒有。他們奮不顧身地下水過江，只是一個念頭，就是寧可被水淹死，也決不投降敵人。寧可死而榮，不為生而辱，死生之間，選擇分明，大義

凜然，表現了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品質和英雄氣概，真可說驚天地動鬼神。實際上，僥倖過得江來的實在少得可憐。別說九死一生，就是百分之一二都沒有。我的親身經歷就是鐵證。我過得江來，似乎是神話般的、戲劇性的。事實如此，毫無虛構。

當我的戰友分組準備過江，將要生離死別的俄傾間，大家依依難捨失聲落淚了。我忍著奪眶欲出的熱淚說，好漢眼淚不輕彈，為了國家的生存，為了報仇雪恥，不要難過，更要堅強，和長江拼搏，但願後會有期，不是永別，快去行動，不要耽誤。就這樣，在下關江邊大家分散了。我和我的那個留守戰友，共紮一個木排泅渡，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的浮渡長江是形同兒戲，凶多吉少。當時這樣做，與其說是求生，不如說是換一個死的地方、換一個死的方式罷了。木排下水時全身浸在水裡，只露出頭來，時沉時浮。轉瞬間漂到江心，匯入浮屍的洪流中；雖然盡全力支持，畢竟江流洶湧，眼看就要沉沒，在危急中看到一條大木船緩緩下流。我二人覺得有了救星，便拼命向木船劃去。在靠近船身的時候，聽到有人喚道：“連長快上來”。話未落地，一根竹桿伸到面前，我順手握住一躍而上。再將竹桿伸下去時，木排已衝過船頭好幾米。我望著未能獲救的戰友隨波流去，一陣心酸，不禁淚下，感恨不已。原來，救我上船的，是我團榴彈炮連通訊班的軍士。我當排長時，他在我排受過技術訓練，又在一個營房多年，彼此熟悉，若不是鬼使神差，怎麼會在生死俄傾之間，竟相逢在大江中流，救了我一命，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說不是命運，也算是奇跡。這條木船原是下關碼頭的躉船，士兵們砸斷鐵鏈作為渡江的工具。船體較大，船上人多，又值長江枯水季節，能否靠到北岸很難預料，如再往下流，就入敵區，豈不自投虎口，白白送死。人們的心情比在岸上更為沉重，幸而船在緩漫的漂流中，漸漸地離開了江心靠向北岸，終於無力行駛，在離沙灘不遠的地方擱淺了。距沙灘雖然不遠，但對於不會游泳的人來說，這一百多米的水域，還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大家還是束手無策。此時太陽已是西移，江面上仍有浮屍漂下，南岸不聞槍聲，敵人的大型兵船還未進來；但在遙遠的下游，隱約看見有兩三隻小船在活動，越來越近，肉眼就辨別出來是敵

人的武裝汽艇在向上行駛。大家緊張起來，會點水的跳下船去泅水逃生，大多數在船上不知所措。我對我的戰友說：現在只有不顧死活向沙灘泅渡，寧可淹死，也不能不讓敵人機槍殺光，於是跳進江中，各自浮渡。畢竟躉船擱淺的地方，已不是深水，憑自己剛學會的一點游泳本事奮力泅渡，漸漸覺得腳已著地，知道沒有多大危險，便挺身起來走上沙灘；回頭看見跳船浮渡的官兵多已漂到下游，走上沙灘的才不過數十人，其中就沒有救我的那位戰友，使我萬分難過。我在江中快要沉沒的頃刻，他救了我，又怎麼料到他竟先我而死。我想，人的生死禍福真有甚麼上帝安排的話，那麼這個上帝又根據甚麼標準來安排？天公無情人有情，我將永遠懷念他，終生不忘。當我走上沙灘時，滿以為渡過了大江，正向岸走去，誰知前面還有一條夾江攔著去路。我嘆了一聲：“罷了，罷了，命中註定水裡死，不會讓你岸上活”。但我又想，上海戰場沒有打死，紫金山上沒有陣亡，大江中流遇到救星，難道小小夾江，使我喪生魚腹不成？雖說君子不能與命爭，難道非聽天由命不可？我仔細觀察了一下夾江水勢的緩急和江面的寬窄，也考慮了自己的疲憊體力，似乎還有勇氣和信心，便選定了自己認為比較合適的地方，跳下水去開始泅渡，儘量保持體力，順著水勢向岸邊浮去。經過幾次的危險，終於渡過夾江，面前是一片泥潭，再過去就是茂密的蘆葦，蘆葦盡處便是長江北岸。我高興地走上泥潭，誰知道一片表面乾燥而龜裂的泥潭，竟是深不可測的萬丈深淵，後腳未拔出來，前腳又陷下去，越陷越深，幾乎拔不出來。我這個生長在大西北的老甘，不但未經過，也未聽說過江泥的危險。我想當年孫悟空取經途中，未必遇到這樣的魔障，好不可怕，好不危險。但情急智生，我立即臥倒，匍匐前進。還沒越過泥潭，又聽到空中飛機的聲音。敵人兩架水陸兩用飛機，溯長江向西飛來，先是在江上掃射一陣，隨後向這泥潭俯衝掃射，來回兩次之後，向東飛去。子彈打起的泥漿飛濺滿身，幸未命中。飛機去後，繼續爬過泥潭，進入葦塘，深處沒頂，淺處齊胸，幸有蘆葦的扶持，才安全登上北岸。江邊丘陵起伏，只有一條崎嶇小路通往東西，數十里內不見村落人家，更無行人往來，看情況敵人還沒有來這裡。回顧前後左右，在空闊的江邊，只有孤零零的我一個人。剛纔過夾江爬泥潭越葦塘的

戰士，怎麼一個也不見了，如果上了岸，不可能轉瞬間走的無影無蹤，一定是疲勞不堪力盡氣竭，不是陷於泥潭，便是在茂密的蘆葦叢裡結束了生命的最後一息。這時，太陽快要落下山頭，一陣晚風吹來，混身發抖，覺得飢餓疲勞憤恨傷痛，一切惡魔向我襲來。我無力抵抗，顧不得一身淋漓倒在江邊；經過片刻的喘息，才覺得有點清醒。正在迷惘不定之際，又聽得密集的槍聲從江面傳來。定睛一看，敵人的那兩三隻武裝汽艇已駛到眼前，來來往往在江邊掃射。我們所乘的那條躉船依然靜靜地躺在原地，船上二百多名喪失戰鬥力的官兵，全被敵人掃射在江中，無一幸免，真是滾滾長江，淘不盡民族仇國家恨，灑一掬熱淚，弔戰友們安息。如果死而有靈，魂兮歸來，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千秋萬代，永慰忠烈。我們後死之人，必定要復仇雪恥，光復首都，就有如後浪推前浪的滔滔大江。我檢查了一下週身，發現自衛小手槍不知丟落到何處，此時一無所有。我打起精神，扔掉水漬漬的棉褲，擰乾了上衣，沿著崎嶇小路，一口氣跑了兩三里，才覺得身上有點熱氣。我想找到一家農民，同胞們會給我一碗飯吃。正在行進之際，看見前邊有兩個軍人並肩前進，爲了搭伴同行，急忙向前趕去。剛到前面，就有人叫道：“連長，是您”！他們看到我狼狽的樣子，便問我是怎樣過江的。我說，一言難盡。我看他們面很熟，但叫不出名字。便問：你們這樣整齊，想必不是泅水過江。他說，我們在八卦洲蘆葦叢裡找到一隻小船，由農民送過江來，總算幸運。他們看見我一雙赤腳血跡模糊，立刻打開背包，取出一雙布鞋給我。原來這兩位戰友是總隊騎兵連的，一個是上士，一個是上等兵，都是保定人。在這空山曠野，孤獨苦難之際，遇上了自己部隊的戰友，真不相信我有這樣的造化。大家邊走邊談倍覺親切。黃昏之前，在山溝裡找到一家農民。他們買米做飯，我烘乾了衣服，一頓白飯，勝似山珍海味。本想休息一下，恢復體力後再找部隊；但我忽然想起有人說過，戰場上曾發生過有些歹徒喪心病狂，竟然強繳前線掉隊士兵的武器，甚至因此而害了性命，同時警惕敵人可能已到浦口，天亮以後情況無法預料。因此，我想克服一切疲勞，離開此地，絕不能停留，便和兩位戰友連夜奔向滁洲。

(六)

12月14日，大約下午四時左右，我們一行三人經過一天一夜的行軍，到達滁洲車站。站上除了一些零星歸隊的士兵和逃難的老百姓外，連販賣小吃的都沒有。好像敵人的鐵蹄很快就要踏到這裡來。據說中午有敵機三架，在這裡胡亂投了幾顆炸彈，都落在附近的稻田裡，沒有造成破壞。站台上教導總隊在“臨淮關收容”的告示。正好在站台的另一岔道上停著一列火車，據說是路局撤退的最後一輛工程車。車上人已擠滿，無法上去。我們只好準備徒步歸隊。就在這個時候發出了空襲警報，車上車下，紛紛疏散。我對二位戰友說，不趁這個機會上車還待何時？於是我們就爬上了車，沒幾分鐘，又有敵人轟炸機三架出現在上空，緩緩向東南方向飛去。敵機去後，人們又擁到車前搶著上車，沒有爬上多少，列車就開動了。我們僥倖坐上火車，免除了徒步行軍之勞。在車上，我的戰友說：“太僥倖，多危險？”我說，不是我在冒險。這個小車站，沒有重要的軍事目標，中午空襲只不過是破壞車站設施，阻撓鐵路運輸。現在天快黑了，必定是返航飛機路過，沒有投彈的任務，還怕甚麼？車過張八嶺時，遠遠看見許多官兵，身穿新棉軍服，在山嶽地帶構築工事，佈置陣地。他們在大敵當前、從容不迫準備迎敵的精神，令人鼓舞。據說這是由浦口撤到此地的胡宗南部，是和我們一同轉戰京滬的友軍。我想他們一定會狠狠地打擊敵人，祝他們勝利。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重上戰場，和他們並肩作戰。

12月15日上午10時左右，列車到達臨淮關，得知總隊又改在河南開封收容。我們心中有數，便先去洗澡理髮，清除一下多日的灰塵，然後大塊魚肉填飽了肚子，才覺得心情舒暢，精神振奮，幾天來的疲勞，很快消失。當我們在車站準備去開封時，看見我們的總隊長桂永清也進站來了，才知道他還留在這裡。他穿著呢軍裝，中將領章，神情很是沮喪，面部沒有表情，後面跟著上校副官處長余易麟、少校副官章誠公、衛士劉正與及幾個隨從人員。我向前行了個軍禮，還未向他問好，他開口便問：“石連長，你帶回多少人來？”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便說，我差點淹死在江邊，總隊長您帶回多少人來？他聽了我的回答似乎也很難為情，沒再多問，把手一揮說：馬上開車了，快上車吧！我和二位戰友上了另一節車廂。在列

車行駛當中，我想剛纔對總隊長的回答，雖然是直言直語，實話實說，但一時措詞失當，有失禮貌，頗感內疚，深自責備沒有一點涵養；但南京的撤退情況，他不是不知道，也是親身經歷的。唐生智司令長官表示死守南京，惟恐有些潰退下來的士兵擅自過江，影響軍心，事先命令守備下關的宋希濂將軍，把各部隊預先控制的民船開到江北上游。保衛南京的部隊，除了36師有優先過江的機會，徐源泉部在上新河控制一些船隻，安全地撤到北岸外；鄧龍光、葉肇的部隊由堯化門繞到敵後向皖南突圍，其他各軍、師、團、營因傷亡很大，無力突圍，都聚集在下關；但無渡江的船隻，又沒有指揮渡江的部隊，長江天塹又怎能插翅飛過？好多無法渡江的官兵，後來全被敵人先後屠殺。據聞，桂永清也是由工兵營的士兵紮了一個木排過江，並且陷在江泥中，由士兵連拉帶拖才免滅頂之災，怎麼又問我帶多少人出來，豈不是明知故問。

16日清晨我們到了開封火車站，河南綏靖公署主任劉峙派參謀羅會興等到站迎接，為我們安排住地及給養。沒幾天，在開封收容的近兩千人開到武昌。1939年1月，總隊番號撤消，改為陸軍第16師，由李良榮任師長，桂永清調任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總隊部幹部除一部份仍在部隊外，大多調幹部訓練團。我繼續在師通訊營任連長。五月下旬，部隊在湖南衡山還未整補就緒，就又奉命參加了河南的蘭封戰役。

註：羅會興和我同在一連，任排長，江西人，後來劉峙調他為隨從參謀。

當我近九十高齡，開始寫這篇回憶的時候，心潮起伏，思緒萬端，仿佛又置身當年戰場，看到戰友們英勇殺敵、壯烈犧牲的情景，看到下關江邊的士兵，被阻於天險蹈江殉國的英雄氣概，想到多年的同事、同學和戰友為國家捐出自己的生命，不禁淚如泉湧，懷念不止，無法握筆繼續寫下去。下面幾首小詩作為本文結束：

- 一、 血沃鐘山松林碧，屍填長江魚龍驚，
一江春水千古恨，十萬雄烈中華魂。
- 二、 大江東去浪滔滔，血戰鐘山恨未消。
九死一生越天塹，國仇不報妄自豪。
- 三、 龍盤虎踞六代雄，一朝血雨沃江東。
勢窮力竭孤忠盡，忍看鐵蹄入帝閭。

(註：唐生智司令長官命令宋希濂和胡宗南的部隊阻止南京守軍出城過江，對違令者可以射擊制止。36師撤退時，教導總隊的許多官兵就親眼看見他們堵塞了城門。)

大陸學者

對國民黨抗戰功績的

頌揚

宋復中

見到《黃花崗》第五期所刊《大陸學者痛說蔣介石》一文，本人深為大陸歷史學者的覺醒感到欣慰。眾所周知，中共建政的頭三十年中，大陸上學術界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只能以「蝸步」來形容，中共修纂的黨史、革命史論著對蔣介石領導的全民抗戰史實與戰績一筆抹煞，連現代史、通史類著作也全面予以貶抑，說些「國民黨片面抗戰，不斷大潰退」之類的謊言，直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黨校編印的《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還以十多頁的篇幅聲稱：「國民黨對日妥協，對內反共，甚至縱容部下投降日本，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惡局面」，其結論曰：「它沒有也不可能起到指導抗戰走向勝利的作用」，由此筆鋒一轉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逐步成爲中國抗戰的主戰場，對戰勝日本侵略者起了決定性作用」。

恣意貶抑國民黨的抗戰功勞，而且謊言重複幾十年、重複幾千次，其惡果乃是貶抑整個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歷史地位。三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曾景忠教授在《抗日戰爭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發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述評〉一文，慨嘆：「近些年來，中國學者深感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不重視中國抗日戰爭，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恐怕與既往大陸著作只把正面戰場中國軍隊的抗敵說成不斷大潰退不無關係。如果要外國學者承認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同時又貶損中國正面戰場的抗戰，這只能是南轅北轍！」對於「中共主戰場論」，曾教授直言「中國抗日戰爭戰場是一個統一戰場，不能把抗日戰爭看成兩國三方的交兵。有關正面戰場地位的評價，說穿了也就是對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處地位的評價。顯然，在中日兩國交戰中，國民政府是中國國家主權的

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份軍隊和根据地統屬於國民政府之下，因此，日本進攻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它對敵後掃蕩清鄉作戰不僅規模不及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而且目的僅限於鞏固佔領地。它要解決『中日事變』，主要是與國軍作戰。它妄圖以武力進攻，逼其投降。戰爭初期逼使國府由南京而武漢又而重慶撤退，戰略相持階段發動多次戰役進攻，尋殲國軍主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從緬甸進攻，東西夾擊，使國府腹背受敵，後還妄圖進攻四川，在在都是妄圖消滅或壓迫國府投降。但國府並未爲其所屈，堅持抗戰到底，最後代表中國對日宣戰，受降的也是國民政府。國府曾部署部份軍隊留置敵後作戰，但主要是在正面戰場作戰，不論在戰略防禦階段還是戰略相持階段，都不斷抗擊日本侵略軍，直至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處於主體地位，這應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貶損正面戰場的地位和戰績，也就必然貶損整個中國的抗日戰爭」。這位「翰林院編修」層級的中共官方歷史學家，率直表明了：抗戰是國府領導的，主戰場是國軍承擔的，其輝煌戰績是不容抹煞的。這一切，不啻荒漠中的甘泉。

自八十年代以來，台灣及海外史學界與大陸同行頻繁交流書刊、座談研討，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的《中華民國史料初編——抗日戰爭時期》、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緯國主編之《抗日禦侮》、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所編《抗日戰史》等，陸續打開了大陸史學界封閉三十餘年的心扉。另有一批思想開明渴求真理的大陸學者走出國門，從美、日等國的解密史料中探討歷史真相，所以長期被扭曲的歷史事實得以逐漸恢復她的真貌。有關「國民黨抗戰」這個敏感話題是一批年輕的大陸學者上世紀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來的。這一股研究熱潮隨著中共藉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對台灣施以新的統戰攻勢而蒸蒸日上，從而引起全民反思。這是中共當權者始料所不及的。大陸拍攝的《血戰台兒莊》電影使年輕一代覺悟到：原來抗日戰爭是國軍官兵浴血奮戰所取勝的；到《血戰崑崙關》電影上映後，中共當局急忙下令將這股頌揚國軍抗戰功績的電影、書籍立刻降溫。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於兩岸、美、日官方史料的陸續解密，許多昔日的陳辭濫調漸漸被廣大學者所唾棄，而新的論點與研究領域則起了廣泛的共鳴，茲從犖犖大端中列舉以下數例以饗台灣的同行們：

已往中共的史學論著對發生在九·一八到七·七期間的九·一八事變、江橋抗日、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與綏遠諸役都是忽略不提的，而是集中力量批判國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還把張學良臨陣脫逃解讀成「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卻沒人去追究爲何張學良在東北

不抗日、在熱河不抗日，忽然要躲到三千里外的陝西呼籲抗日了？但是，近幾年在大陸舉行的大型研討會上，不少學者指出：迄今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明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時給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個別的回憶委實難以置信；有些學者指出：過去用以表明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證據」，均係蔣氏處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地方性衝突的方針，而絕非九·一八事件爆發後下的命令，張學良本人則是自覺、自主抱不抵抗態度的。從蔣張的親密關係看，倘若張想抵抗而蔣不同意，張可以違令奮起抵抗，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中東路事件就是張學良擅作主張應變的對外戰爭；錦州之役，蔣介石與中樞數次令張抵抗，張卻悄悄開溜，更是明證。（見《抗日戰爭研究》九一、九二年所刊〈九一八事變六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和蔣介石〉等文）。

對於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抗戰，過去總說是十九路軍孤軍抗戰，因蔣介石作梗破壞，迫使十九路軍撤退云云，直至一九九六年，重慶大學出版的「高等學校文科教學用書」《中國現代史》還胡扯什麼「南京政府不准海軍、空軍配合十九路軍作戰，藉口稅收減少而停止發餉，十九路軍苦戰月餘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被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及對日妥協政策所斷送」。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軍事歷史研究》所載余子道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與淞滬抗戰〉和《歷史研究》九二年第三期所載金再及文〈南京政府對一二八事變的方針〉均指出：說十九路軍抗戰是蔡廷鍇等違抗南京中樞命令的結果，是不符事實的，當時中樞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抽調第五軍增援淞滬便是證據，乃以抵抗求妥協。不能戰焉能和？

已往中共官方論著總把長城抗戰說成是蔣介石「應付輿論、爭取和談妥協的權宜之計」，但是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印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則認為，何應欽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後「秉承蔣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長城線布防，期望阻止日軍前進」，基本上算是符合客觀史實。

關於綏遠抗戰，二〇〇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硬說是基於中共「八·一宣言」與毛澤東致傅作義函的影響與領導，但《抗日戰爭研究》九三年第四期刊余子道〈綏遠抗戰述論〉與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史》一書都指出紅格爾圖大捷與收復百靈廟是在傅作義指揮下取得的勝利，綏遠抗戰格局的特點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體的抗戰局面：晉綏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和傅作義的晉綏軍是這一格局的基礎，蔣介石是支持綏遠抗戰的，中央軍是綏遠抗戰的重要組成部份。

對於蘆溝橋至武漢會戰，已往中共宣傳品均以「軍事潰敗喪師失土」一言以蔽之，但八十年代何理的《抗日戰爭史》則認為國軍的「戰略防禦大量消耗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關於中國『不堪一擊』的政治宣傳……中國軍民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的防禦作戰，使敵人損失兵力七十萬人，在軍需補給上也發生了嚴重困難……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速戰速決的企圖，使其侵略計劃屢屢落空」，這是大陸學者站在中國人立場評述抗日戰爭的劃時代轉變，他們不再同日本鬼子站在一起辱罵中國政府與中國軍隊了。

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與塘沽協定的簽訂，《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認為是「蔣介石懼於日本的武力」的產物，但是《史林》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李華興的《蘆溝橋事變：歷史的轉折》、《抗日戰爭研究》九七年第三期蔡德金〈對蘆溝橋事變幾個問題的思考〉《軍事歷史研究》九七年第一期楊立強〈抗戰初期國民黨中央統帥機關決策幕後〉等文章咸認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要求各地部隊「確實準備」的密電，「實際上是秘密的全國動員令」。蔣介石令廿九軍增援華北，全軍整備動員，各地實施戒嚴，準備宣戰，由此可見他的主戰態度；「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軍交涉并多次達成協議，不是蔣介石的意旨，而是背著南京中央政府與日本交涉的」；還認定「在中央統帥部內部存在著以蔣介石為首的主戰一方和以徐永昌為首的主和一方」。即便《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等官訂教科書也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雖然仍受國民政府管轄，但在實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

關於八·一三戰役，過去認為國軍被動應戰，然而《近代史研究》八六年第六期〈八一三淞滬戰役起因辨正〉與《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三期〈淞滬抗戰中國主動的進攻與日軍的主要作戰方向的改變〉均認為，淞滬戰役是中國主動發起的，日軍挑起虹橋機場衝突後，國府制訂了開戰措施和大戰計劃。廣西師範大學九五年出版馬振犢《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一書指出，八·一三戰役國軍主力集中到淞滬戰場，把侵華日軍主力吸引了過來，使淞滬戰場代替了華北戰場成為日軍侵華與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此舉改變了日軍進攻方向，延遲了武漢的陷落，促成了日後三次長沙大捷，無疑挫敗了日軍沿長沙西進的既定戰略，確保了陪都重慶的安全。

關於堅持四個月的武漢保衛戰，歷來中共史著都刻意指摘蔣介石「判斷失誤，部署不當，舉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極應付，處處薄弱，罅隙百出」，然近年絕大多數大陸著作都對國軍沿長江兩岸抵禦日軍作出正面評價「敵我雙方都

損失嚴重，中國軍隊對敵人進行了有力抵抗，給敵以重創，使日本的戰略進攻被迫停止，成為抗戰的重要轉折點」。

已往大陸論著強調國府失守武漢以後在正面戰場上是「消極避戰，保存實力，避免大戰，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但是近十年資深教授中似乎很少有人重彈此濫調。《史學月刊》九二年第三期刊出江于夫〈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前國民黨抗戰問題再探〉一文指出：武漢失守後，國府并未消極抗戰，她組織了南昌會戰、兩次長沙會戰、隨棗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晉南會戰等九次大規模戰役，佔整個抗戰期間廿二次會戰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有些還是攻勢作戰，在敵強我弱形勢下，大多數戰役取得積極戰果，這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三九年十一月至四〇年三月發動冬季攻勢，以八十多個師實施攻勢作戰，遍及皖南、贛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綏西，共斃傷日偽軍數萬人，打擊了日軍囂張氣燄，消耗了敵軍大量兵力。《抗日戰爭研究》九四年第二期的雒春普文〈閻錫山與第二戰區的冬季攻勢〉則指出，二戰區開展冬季攻勢的同時發生了晉西事變，足證抗日與反共并非絕對排斥的，「閻錫山在參與反共的同時，沒有完全停止抗日」。

對於一九四四年的抗戰，已往大陸史著均恣意渲染豫湘桂大潰退，絕口不談國軍兩個精銳師被史迪威調去印度以致華中軍力空虛。《近代史研究》八九年第三期張力〈中國軍隊入緬作戰與盟國戰略的複雜關係〉一文則指出國軍反攻緬北全殲、重創日軍各兩個師團，打通了中英公路，對盟軍全線反攻貢獻極大，但由於致力於國際戰場而使國內豫湘桂戰事失利，一千多萬平民流離失所。中共《黨史研究》九五年第五期賀新城〈論中國抗戰的戰略反攻〉、《抗日戰爭研究》九五年第三期劉五書〈論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都指出，不能因為豫湘桂局部失利而掩蓋國軍在緬境與西南的勝利，事實上日軍的一號作戰并未能達到摧毀美國空軍基地與迫使國府投降的目的。《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四期蘇盾的〈重評一九四四年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文認為「一九四四年正面戰場已形成東守西攻的戰略態勢，隨著滇西戰場的勝利，中國戰場擺脫了遭受東西夾擊的局面，為四五年東線戰場反攻奠定了基礎。從東西兩線得失看，整個正面戰場還是得大於失。

《中國復興樞紐》一書盡情歌頌了國軍第一〇五師和五十七師死守常德的輝煌戰績，前者師長戰死，後者軍官傷亡達百分之九十五，連後勤人員亦全部投入一線戰鬥，守城部隊全部壯烈犧牲。常德失守六日後終被援軍收復，說「大潰退」，顯然對浴血奮戰的前輩軍人不公。

關於衡陽之戰，已往總是說方先覺無恥降敵當了當了漢奸云云。九六年第四期《抗日戰爭研究》刊出〈論長衡戰役第二階段戰役〉一文，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堅守衡陽四十晝夜作出充份肯定。

已往史著往往渲染日軍長驅直入攻到貴州獨山，歸咎於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四期李剛〈豫湘桂會戰之黔南作戰〉一文則指出蔣介石制定的「確保黔邊，屏障陪都，相機擊破敵人」戰略方針是卓有成效的，日軍孤軍深入，兵力單薄，故其進攻迅速、撤退也迅速。同一期上趙可的〈靈寶戰役述評〉指出四四年豫湘桂戰役中的靈寶戰役阻擊了日軍西犯潼關威逼關中的攻勢，從而穩定了西安與大西北後方，戰事十分激烈，故不能用「大潰退」「不戰而逃」等字眼醜化這一重大戰役。

對於美軍將領，中共歷來是吹捧史迪威而貶抑陳納德的，蓋因前者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上力主軍援中共的八路軍，而後者則對蔣介石比較親近。近年大陸學者漸漸學會以國家民族而非個別政黨的利益來評價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如《近代史研究》八八年第五期金光耀〈試論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一文指出，陳納德應蔣介石要求，把對日軍發動空中攻勢作為在華助戰的首要目標，希圖使美國空軍成為中國戰場的主力，然史迪威則只把空軍看作地面作戰的輔助力量，致使陳納德發動大規模空中攻勢的希望化為泡影，從而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這一原來純粹的軍事問題，就與政治問題牽連在一起了」。這樣的結論，對蔣介石在抗戰後期要求羅斯福總統撤換史迪威之舉，作出了明晰的解釋。

已往大陸史學著作一味埋怨國府「沒有以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而單純實行消極防禦陣地戰」。然而《歷史研究》九五年第四期王建朗〈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外交綜論〉一文則指出，從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到武漢會戰持續十五個月之久，國軍以劣勢裝備、用血肉之軀抵抗日軍進攻，其重要戰略意義乃是掩護國力西移，為持久戰建立西南西北抗戰基地，倘指責其過多過大過快的損失，似非公允。事實上徐州、長沙會戰都採用過運動戰、游擊戰配合陣地戰的戰法。有人批評國府抗日仰賴外援，事實上弱國抵抗強國不能不爭取外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府「苦撐待變」是無可厚非的，當時國府在外交上爭取友邦、孤立敵人，這才得以反敗為勝。

過去大陸史著往往拾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之餘唾，口口聲聲蔣介石「避戰，躲進峨眉山觀戰，坐山觀虎鬥」等等，但大陸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在《抗日戰爭研究》九二年第二期所刊〈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統一〉一文中指出，「蔣介石實行的還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許多學者認為，毛澤東等中共早期領導人著作中對國軍抗戰表現的歪

曲，是出於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激烈政治鬥爭環境的需要而作出的宣傳與報復，未必盡合事實。例如已往總說武漢失守後蔣介石就積極反共消極抗戰，但是抗戰與反共這兩者并非積不相能的：就國民黨而言，抗戰固可以聯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戰。有反共不抗戰而至投降者，如汪精衛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堅持抗戰不投降者，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編按：問題是蔣介石為什麼要既抗日又反共，問題更是在於中共究竟有沒有真抗戰，甚至是專打友軍、不打敵軍，豈但是游而不擊、而且是一心擴張以準備打天下？如果是這樣，則堅持抗戰的蔣介石也要反共，到底對不對？）揆諸史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軍與日軍多次會戰，還主動發起攻勢，這能說她「消極抗戰」嗎？真相是愈辯愈明的，在今日大陸的史學界，無論老、中、青，仍然頑固地堅持郭沫若陳伯達等人的陳腔濫調者已經為數不多了，因為後者早已在中共自己營壘中被鬥倒鬥臭，前者則被大陸學術界視為「四大不要臉」之一。隨著郭陳之流的身敗名裂，大陸史學界已經擺脫了長期的思想桎梏，因而對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整體評價會日趨理性化、科學化，海峽兩岸學者在歷史研究上也會產生更多的共識。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極左派對大陸綿延三代民眾的歪曲宣傳，刻意將歷史研究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業已形成一種積重難返的局面。以上摘引之撥亂反正言論至今仍僅限於資深研究員、教授的層面，他們比升斗小民、芸芸眾生更多接觸官方密件與國外、境外文獻，所以思想日趨開明、觀念也不同凡響。可是，在大陸鋪天蓋地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通俗雜誌、近代史辭典、名人辭典等等，至今仍堅持郭沫若、陳伯達等左王的歷史觀，後者雖在毛澤東時代早已被鬥臭，但他的主要論點與提法仍被大量沿用於低層次的近代史出版物；而從大陸的中央至各省市，教育部門及編寫教科書的部門一向是極左派的頑固堡壘，其主事人等迄今死抱著「寧左勿右，左是觀點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的態度，甚至最近還鬧出國務院教育部發出教學大綱指示各地教科書編纂人員「不再視岳飛文天祥為民族英雄」的大笑話；在福建晉江，大漢奸施琅的紀念館之規格遠遠超逾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紀念館，端的是黑白顛倒、忠奸不分。職是之故，欲把高級研究員與資深教授的研究成果融合到各級教科書中，還需要一段漫長而艱巨的歷程，這也進一步說明，海峽兩岸的統一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在日益興盛的現代史撥亂反正潮流中起著尖兵作用的，乃是以辛灝年(高爾品)教授、謝幼田教授為首的五十多位大陸留美學學者，他們本可在大洋彼岸錦衣玉食，「國家事管他娘！」然而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良知良能，他們慷慨輸款在紐約創辦了《黃花崗》季刊。他們原本就是大陸有名的

專家學者，或電腦專家、跨國公司高級行政人員等等，但卻孜孜不倦地澄清了一個又一個的中國近代史疑難，又透過講學、出席研討會等機會，以真理的雨露滋潤大陸的同行們。這五十多位大陸旅美學學者，與泛濫歐美臭名昭著爭錢爭名內鬥不已的某些所謂「民運份子」截然不同，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良心。從他們身上，世人可以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

(二〇〇三年三月卅日於華南某邑)

當代老嫗歌

(封底配詩)

阿冰

她不是“舊中國”的祥林嫂，
祥林嫂的歲月——哪有“解放鞋”往腳上套？
她也非毛時代“走紅”的貧農老大娘，
那年頭——祇有“黑白”，哪有“彩照”？

她祇能是“改革開放”時代的老孤寡，
在繁榮的陰影裡佝僂著身子把柴火挑：
她駝著的，是她繼續貧窮的“好日子”，
她喘息著的，是她內心的苦和嚔……

啊，從珠海，到上海，再到青島，
改的和放的真是比“反動派”的台灣還要好；
從京郊到陝川，再到兩湖、雲貴和皖贛……
但見得：共家暴富官家笑：

有權的，玩的是賣官、升官和出洋的票，
有錢的，走的是通權、通神和通洋的橋，
斷了活路的姐妹們賣的是千千萬萬個貞操啊，
缺了良知的知識人玩的是又罵又拍的假清高。

難怪中國“泛榮又媚盛”，
祇因為處處都在買笑、賣笑和搞笑；
難怪中國歲歲都在呼喊著陳勝和吳廣啊，
祇因為還有太多苦恨的妹妹和老嫗……

再看一眼她吧，這可憐的老嫗，
她怎會沒喊過：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她怎能沒巴望過：共產黨也能改得對她好？
可她被榨乾了的靈肉啊，又怎能夠等得到？

2003，7，1，紐約

張育明教授

《血淚年華》

簡介

張育明教授的血淚年華，就是中國大陸人民的血淚歲月，復辟時代……

編者



血淚年華封面

自從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陷六億人民於水深火熱、生靈橫遭塗炭之後，我就有個願望，就是把平生直接、間接身臨其境，耳聞目睹過的一些重大事件，整理出來作個記錄。

我個人畢竟只是個臨床醫生，不懂文藝寫作，只能忠實記錄歷史，但也非常困難，深感力不從心。然而人到黃昏，淨化個人心靈，升華平生經歷，捫心自問之後，總覺得自己對歷史負有一定的責任，因此好歹作個記錄的願望在我內心深處強烈地與日俱增，終於提筆成文。為力求遵照先賢「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教導，故此曾數易此稿，才終使願

望變成現實。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誠哉斯言也。

七十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是轉瞬之間，其中所發生的突出事件，在當時的一些人眼中可能算是輝煌，但對另一些人而言簡直就是淒楚和禍害。無論是甚麼，到頭來都是過眼雲煙，如飛而去。即使如此，一切真、善、美的事物，總會留給後人些許教益。

人們的行為即或不能全然遵照歷史和旁證的教訓，絕對地服從人類良知、理智與倫理規範，總應該吸取自己失誤的教訓，以刻骨銘心的經驗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一個不能正視自己錯誤並悔改的人，宛如一個醉漢駕駛一輛煞車完全失靈的破舊卡車，在崇山峻嶺之中橫衝直撞，這樣的人能有好結果嗎？照樣，一個不能從滄桑多變的災難中吸取教訓、改惡向善、改弦易轍的民族，還能有甚麼光明的前途？從一九二八出生到一九九八年的今天，我大半輩子都在飢寒交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度日如年的酷寒歲月中，屈辱地掙扎著、摸索著，苟全地活在世間。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寫日記是件極端危險的事情，有不少知識分子就是因為日記中的隻言片語或當局的斷章取義而慘遭監禁或殺害。因此我從未寫過日記，不只是國事就是家事也從無記錄。這本《血淚年華》的內容完全依靠我個人和家人的回憶，缺失漏誤在所難免，只有請求師友同道和讀者給予指正和諒解。

在我生活過的這七十年血淚歲月中，所經歷的民族浩劫和磨難，即或不是絕後，也可謂空前，其悲壯、慘烈、荒謬、血腥，在人類歷史上，很難找到可比的片斷。雖有些精彩巨作已問世，但因我個人既擔任過大學執教的醫生和教師，亦曾長期地深入太行伏牛山區、黃河岸邊等迄今仍然過著相當原始生活的基層人群中去，有機會對生活在各個階層的人物與群體有直接深入的接觸和體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芸芸眾生，即使過的是飢寒交迫的牛馬奴隸生活，卻仍然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所遭遇慘絕人寰的血淚景象，很難從我心中消逝。落魄遭難人的呼救聲縱然微弱，但堅強有力，落地有聲，可逕達天庭。如此淒厲的哀號焉能從人間無端消逝？它必須在人類歷史上佔有一頁。有不少絕望的人在彌留的剎那間，雙目直盯著我這個惟一能站在他們身旁、生活在他們中間的醫

生，留下他們久久封藏在心上的一句話，告別人間。當我艱難痛苦得幾乎難以活下去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寫成這本書的意志。這些人的囑托也是我被置之死地而後生存下來力量源泉中的一個組成部份。

作為從熊熊燃燒的烈火中被抽出來的一根乾柴，遭受滅頂之災卻幸存下來的人，在道義、良知上負有責任，把這篇鄉土氣息濃厚、寫作水平不高卻是用血淚譜寫出來的史詩樂章，演奏出來給大夥兒聽聽。

王明道先生生前，從我青少年起就曾當面多次諄諄教誨：「一定要學會讀書、讀事、讀人。」在勉強活過來的歲月中，我未敢忘記他老人家的話語，有心地這樣做了，如此才有本書的形成。一九八五年元旦在他們夫婦上海居所，我們夫婦攜長子恩諭、幼子恩城和他們一同過節時，老人家一再叮囑我，一定要把這本書寫好，並謹守三個原則：一真實；二榮耀神；三造就人。

《血淚年華》這本書，沒有斥責，沒有控訴，更不是甚麼傷痕文學，只是把一些真人實事說出來，鋪綴成文。為了維護本書的乾淨亮堂，所涉及的人，完全是真名實姓，有些仍然在世，如有冒犯，希望諒解。但是我可以無愧地說，凡我親身經歷過的事都是千真萬確的，絕不隱諱、渲染、歪曲或虛構。一些聽到的傳說，在情節上或有些出入，但絕不損及這本書的真實性。

大自然留給人類繼續麻木不仁的時空已經不多。一切歷史過程都可以從正反兩個方面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以增長人的智慧並促進人類文明，關鍵在於人自己是否能清醒地善於總結經驗並認真吸取教訓，舉一能反三。一葉可知秋，期盼這本洪荒歷程有助於讀者闖過暴風驟雨，戰勝邪惡誘惑，並可在深沉寒夜朦朧中識別出魚肚白微芒的方向，探索出人間正路，徹悟出永恆的真理，揣摩出生命歸宿。

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顆恬淡寧靜、虛懷若谷的心，定會有所領悟；從而在熙攘、淒惶，甚至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人群中，點燃幾盞燈火，以光照炎涼多變的世態。在這好歹總得活下去的塵世上，不只求自己善始善終地走完有意義的人生路程，還能對人世的完美留下些許痕跡，這就是我的祝禱和希望。

同時我也祈求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真神，使用這本用血淚寫成的書冊，給陰暗的大地填充些亮光，給

哀痛中的孤苦略送些溫暖，讓黑暗中摸索的迷失者離開歧路，我這充滿血淚的心神連帶著我這七勞八傷的軀體就滿足了。

在此還必須感謝劉賓雁先生，當他在寒舍稍事停留，看過本書的幾頁草稿後，就緊緊拉住我的手，用沉重的語言囑咐說：「一定要努力把此書寫完！」當我一再表明自己只是個醫生，不懂寫作時，劉先生鼓勵我說：「契訶夫也是個醫生，你只管寫下去！」前文化部長、我們河北省中學老同學王蒙老弟讀過部份原稿後，樂呵呵地說：「這真是文如其人啊！」此外在基督裡的許多中西弟兄姊妹也曾多方鼓勵我，一定要把這本書寫成！其中有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伯父和春方高級工程師，用我們保定家鄉話對我說：「你就順服聖靈的感動，如同行雲流水一樣地寫下去，揀到籃子裡就是菜，先完成了再說別的！」內地會老同工戴紹曾兄長（James H. Taylor III）也多次叮囑我，一旦中文稿完成就儘快譯成英文。主內長者艾得理牧師（David H. Adeney）生前多次囑咐要儘快寫出來，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大半生在保定傳道的主內長輩百風老人羅福瑞教士（Miss Florence Logen），生前親手當著她九十高齡的妹妹 Lorna，把她積存下來的自一九〇〇年以來傳道人在中國的腳蹤近千張照片交給我為本書使用；青年時期熱心在東北、華北傳福音、有時讓我為他當翻譯的戴保羅（Paul Davidson）也供給我許多舊日照片，並以近九十高齡還不斷給我寫信或打電話，催我從速寫成此書；有些寶貴相片是內地會加拿大籍傳道人、我們流亡中學查經班老師紀玉英教士（Ivy E. Grasley 現在為 Mrs. Owen）所提供的。邊雲波兄長叫著我的名字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如果咱們這幾個人不寫，有關這幾十年的事情就只能埋沒下去了！」王國顯兄長還在百忙中給我寫了封長信，囑咐我在這場屬靈的爭戰中應注意的事項。多年來江守道兄長、滕近輝兄長、於力工兄長、饒孝楫弟兄、趙天恩弟兄和林治平弟兄等，均以渴望的心情當面鼓勵或寫信鼓舞，希望早日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在多次有機會應邀在中美文化團體說話的場合中所認識的全泰助教授，在讀過本書的少量原稿後，竟然把這些原稿就教於中國文化教育大師陳公立老夫子。陳公不但直接來信叮囑「克服一切困難，一定要完成本書的寫作！」而且還以九十八歲的高齡之身，親自握筆題署

書名《血淚年華》墨寶，使我這個晚輩後生誠惶誠恐。

最後我以「我愛中國」的短文，作為本書的提要 and 引子：

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不是因為她幅員遼闊，山川壯麗，江河奔騰，歷史悠久；

我愛中國，不是因為她有奔馳在呼倫貝爾蒙古草原上的駿馬，翱翔在珠穆朗瑪峰世界屋脊上的雄鷹，安臥在川藏高原竹林深處的熊貓，或者是從宇宙空間隱約可見的萬里長城；

我愛中國，因為她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哺育了中華民族芸芸眾生；

我愛中國，因為她飽經滄桑，屢遭水火，誰能訴說她是怎樣一次又一次地漫步黃昏，又衝向黎明；

我愛中國，因為她是我的祖國母親，是我生長的地方；

我愛中國，因為她用志士鮮血染紅的腳蹤，山野間大道旁餓殍的呻吟，孤兒寡婦的含辛茹苦，滿臉皺紋的母親倚門而望盼子歸來的心神，一波接一波扶老攜幼的人群在泥沼中漩渦裡絕望的掙扎，還有那飲恨九泉千萬雙閉不上的眼睛；

你想不到、他說不出的人間淒愴景象譜寫出來的史詩樂章；

告誡人們，那一條是人間正路！

〔《血淚年華》一書，可從「使者書房」電話購買：1-8006243504，或用 FAX 訂購：1-7176876178〕

《血淚年華》選載之一

共產黨炸水庫淹農村 千萬人喪命

那天下午來了兩個三十歲左右黑瘦黑瘦的青年，談語之間發現他們粗通文字，思維明確清楚，經過自我介紹，才知道他們是弟兄倆，和我們家是世交。其中的弟弟因為只有一舉丸，想讓我看是怎麼回事，我當即予以檢查並詳細告知他的情況。弟兄倆見我很誠懇地為他看病並指出方向，也就推心置腹地開始說

話了：「你離開家時，我們還沒出生，到現在快三十年了，咱們哥兒們自然不認識，不過父輩都是小黃陀的近鄰好友。」當我問了小黃陀村如何變成沙荒時，弟兄倆同時嘆了口長氣後，哥哥慢條斯理地回答說：「那是一九六三年，春夏大旱之後，一入秋連著下了半個月的滂沱大暴雨，一個夜晚，人們剛入睡，忽然被颳大風一樣的慘叫人聲所驚醒，有的人，在房頂上看見洪水如同大山一樣風馳電掣地傾倒下來，剎那之間，房倒屋塌，人們都陷入汪洋大海之中，那時誰也顧不了誰，呼爹喊娘，哭叫求救聲亂成一堆，大家在一眼望不到邊的滔滔洪水中掙扎著，淒慘之狀令人髮指。淹死的人可就海了去了（保定土話，意即極多）。事後才知道，河北省委奉毛主席命令，為確保北京市首都的安全，炸開了太行山西大洋水庫，淹沒了農村，保住了北京、天津、保定三個大城市和京廣、京津兩條鐵路。大水過後日頭又曝曬，那個腥臭味兒蒸得人腦漿子痛。蒼蠅、蚊子、綠頭蠅多的能把太陽遮住，活過來的人，不是發燒、咯血就是爛舌頭、爛嘴，紅眼病、天沒黑就乾瞪兩眼，看不見東西成睜眼瞎子（夜盲），幾乎人人都上吐下瀉拉肚子，差不多家家都有病人，天天在水地裡埋人，可真夠慘的！上級光顧說炸開水庫前十二小時，已經在話匣子裡（收音機）通知叫農民轉移到安全地帶，他們就不想想老百姓吃鹽的錢都是用雞蛋換的，那來錢買匣子啊！就是聽到了，這種大平原地帶，半天之內全家老少能轉移到哪裡去呢？農民又不許進城。公社幹部們可好，一個個騎車子都走了，百姓們當時還真不明白為甚麼公社機關都關門上鎖走開了。小黃陀只有宋大哥，因為在縣商業局工作，他在當天下午回家來把大嫂子和兩個孩子都送到保定城裡去了。事後問他為甚麼不告訴大家，他說這是黨內機密，誰敢說出來？如果說幾十萬農民逃起來荒來，農村秩序如何維持？百萬農民進了保定城，不用說吃飯，連水都沒得喝，如何處理？只好讓老百姓聽天由命吧！」

那個哥哥說到這裡臉色沉重地嘆了口氣接著說：「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就明說，炸毀西大洋水庫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我們共產黨人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唯物論者，不是甚麼行善的慈善家，就算保定地區全部農村都沖沒了，還不是幾間土坯房，怎能和北京天津大城市的工廠價值相比？農民如何能和工

民間故事

連載

申雪

人幹部首長們相比？這百十萬農民就打著淹死完了，河北省還有好幾千萬人，仍然是地少人多啊！細算起來幹部們說的是在理，農村這點破舊窩棚樣的草堂茅舍，大字不識的一群芸芸眾生群盲能值個甚麼？打江山的時候需要這堆肉和國民黨拼命，今天坐江山了，這堆肉群文盲就變成共產黨的纍贅了，所以毛主席說：「今後的嚴重問題是教育農民」。

那個弟弟迫不及待的氣憤著說：「不識字的老百姓也是一條人命啊！挖水庫都是農民自己帶著自家的山藥乾，拖著水腫並直往外冒血漿的兩條腿，頂著寒風酷暑挖出來的，可是老百姓一點光也沾不上，天旱時水庫裡缺水，爲了維持城裡人大幹部們吃的活魚，從來沒有放過水來澆旱地；大田旱得都龜裂成乾縫，莊稼苗都乾死了，路上的浮土一尺厚，吃水的井都乾涸了，老牛悶得都喘不過氣來，莊稼人都難過死了，那個幹部下來說個長短；暴雨下來了，莊稼的地都內澇成災了，水庫也放水了，使莊田淹得更狠點。山洪暴發，爲了保護大城市和鐵路，只好把水庫炸開淹沒了廣大農村，事後又讓老百姓帶著自己的乾糧去修補炸壞的水庫。總而言之，翻過來調過去，莊稼人總是吃苦受罪，永遠沒有好過的日子！」面對這弟兄倆的申訴，我連頭都不點，有時在屋內走動，安排一下書本，好像甚麼也沒聽見的樣子以防不測。

（接本頁右下）

了。但令人驚訝的是，周恩來把頭側轉向一邊，裝做沒看見，頓了一下，接著講話。後來周恩來的警衛把那個挨打的同學帶出去了。

當時在座的同學都楞了，不理解總理怎麼能對眼前的事視若無睹？後來傳出種種周恩來助紂爲虐的惡行，因小看大，回想起來，覺得周恩來的確很虛偽。

春季里來擠車船
小妹妹打工離家鄉
全家辛勞欠稅款
茫茫人海走遠方

夏季里來打工忙
沒日夜勞累少睡眠
夢里又見爹娘面
流淚家書報平安

秋季里來查証繁
心驚慌抓去再罰款
城里繁華似天堂
打工勞苦受驅赶

冬季里來盼回鄉
血汗錢克扣幾時還
整年辛苦缺指望
早日歸家見爹娘

打工四季歌

彭德懷司機談毛岸英

彭德懷落難後，他的司機也被發配到北京一家工廠的汽車隊。毛澤東之子毛岸英赴朝前曾在這家工廠擔任過幾個月的黨總支書記。毛岸英死後，廠裡的人都以毛岸英爲榮。

彭德懷的司機也深受彭德懷影響，爲人豪爽，口無遮攔，本性難改。在自己相好的小圈子裡，常掀毛「太子」的屁股帘，說些與官方「高大全」版本不同的事。後來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知道了。

據彭德懷的司機講，毛岸英爲人孤傲，目空一切。彭德懷好下棋，但有個毛病愛緩棋。是人都讓彭總三分。毛岸英與彭德懷下棋，彭總一緩棋，毛岸英把棋盤一掀，扭頭就走，絲毫不給面子。把彭德懷氣得坐著喘粗氣。志願軍司令部進入朝鮮後，常要躲避敵機轟炸。毛岸英不以爲然，說：「李德勝（毛澤東的化名）在延安時就不怕胡宗南轟炸」。他以為他是真龍天子，刀槍不入，滿不在乎，不聽人勸，終被炸死了。

彭德懷的司機姓鞠，人稱老鞠。老鞠說廬山會議是官報私仇。毛澤東的意思明擺著：「我兒子死了一—你死（彭德懷死）都不能死我兒子」。彭德懷平反後，老鞠給最高人民法院的黃火青開車去了。

周恩來裝看不見

文革時周恩來在大會堂接見聯動（老紅衛兵）。被接見的有 30 多人，大家圍坐在周恩來身邊聽他講話。這時有兩個同一學校的紅衛兵吵起來了。一個紅衛兵罵另一個紅衛兵「小流氓，你怎麼也來了，滾出去」；並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周恩來看見也聽見（接本頁左下）

人口龐大的漢族應……堅強地站立起來，
團結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一道，舉起右手推倒中
共專制主義的高牆，舉起左手阻止任何分裂國土
的企圖。建立一個所有民族和睦相處、共和共榮
的民主中國……

— 引自本文

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從沙甸慘案談起

劉國凱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此文資料詳實，說理充分，是難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好文章。

最近，網絡上有人從美軍轟炸巴格達，扯出三十幾年前中共軍炮轟雲南沙甸回族村引起種種議論。由

於有位表親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雲南個舊工作，致使我很早就聞說沙甸慘案。當然僅僅是口頭相傳。中共當局對一切都是實行黑箱操作。無論是當時的平叛和後來的「平反」，都沒有對社會、人民作出明確的交代。民間也只能以民間故事的方式輾轉相傳了。

我對把美國進軍伊拉克和共軍毀滅沙甸聯繫起來思考缺乏想象力，但一個沈睡三十多年的「民間故事」被重新提起，卻使我對未來不無擔憂。因為困擾中國社會首屈一指的固然是專制政治，但民族糾紛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份。沙甸慘案是一個早已逝去卻又有可能捲土重來的噩夢——如果我們不及早盡力設法杜絕的話。

一、沙甸慘案「平反」之質疑

三十多年前從表親那裏聽來的「民間故事」，大致與當今網絡上所披露的相若。回民因不滿政府的某些舉措而實行的抗拒行動，漸次升級為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當局派一個排的無武裝解放軍宣傳隊進村說服，但不料全遭村中回民極端分子殺害。當局震怒，派兵包圍村莊，勒令交出兇手，被拒。遂武裝進擊。開始使用武力有限，但竟遭殺傷擊退。更怒，以巨炮轟之。除在規定時間之前離開村莊者（多為婦孺）外，均在炮轟中喪生。

肯定中共政權是個應予終結的專制政權，並不意味著可以不作具體分析地絕對否定這個政權任何時期的任何事務。

沙甸慘案的起因，是回民對當局某些傷害其民族風俗習慣、宗教感情的作法，予以反彈。這無疑是自然的應當的。就算回民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也不足為奇。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允許國內各地民衆成立國中之國。即使是當今的歐美民主國家，也不可能讓其國內各州各縣分組成無數個小國。

如果漢族地區的民衆以宗教名義或地域名義成立「道教共和國」、「佛教共和國」或「梅縣共和國」、「洞庭共和國」之類；毫無疑問，共產黨會立即雷霆萬鈞地予以武力鎮壓。然而對沙甸回民的這一行動，共產黨還只是派無武裝解放軍去進行宣傳說服。

年青的一代是不會明白那個混亂時代的種種奇怪現象。共產黨軍隊有時會兇狠地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掃射，偶爾又會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然這不是隨機的。何時兇狠掃射，何時「宣傳教育」，皆有其緣由。回民要獨立建國，當然不被允許；但涉及所謂「民族政策」，共產黨擺出了溫和的姿態。

回民極端分子對無武裝的共產黨軍人，採取了慘無人道的殺戮；噩耗傳來，同胞們的那份震驚狂怒可想而知。不必懷疑，如果此行是一批漢族民眾，那麼共產黨軍隊將會立即把他們殺個精光。但由於此行是回民所為，又是涉及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共產黨只是命令軍隊包圍村莊，勒令交出兇手。可是回民非但不交，而且回以猛烈的槍彈，這就終於導致了炮轟。

如何判定沙旬回民起事的性質？應分兩段來看。在未慘殺無武裝軍人之前，是一場宗教訴求、宗教騷動。鑒於其中強烈的宗教情緒和沒有民主政綱，故不能評價為民主革命。在慘殺之後就演變為一場宗教暴亂和惡性刑事犯罪。

僅僅四年以後，共產黨就為之平反了。撤銷其「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定性，給予死者家屬撫恤、傷殘者治療救濟等。所謂「反革命」者根本就是共產黨的陳詞濫調。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治療傷者亦屬應該。正如目前人們直接從新聞報導中看到美軍對伊拉克傷兵的救治。可是對那幾十個被慘殺的無武裝軍人如何定論交代？誠然，我們堅決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並就整體而言確認中共軍隊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工具；但是，不能說任何一個中共軍人所作的任何一件事，都負有專制罪孽。更不是說中共軍人的生命就該受到非人道主義的對待。

普通的中共軍人大多是平民子弟。當他們無武裝地去進行「宣傳工作」時，儘管其中不乏政治欺騙，儘管你可對他的政治宣傳嗤之以鼻，但你卻沒有絲毫理由去傷害其生命。慘殺這些動口不動手的軍人，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極端惡性的刑事犯罪。沙旬回民的起事當然不是什麼「反革命」；但是，連暴亂都不是，什麼罪責都沒有；那豈不是說，幾十個無武裝軍人活該橫死？這是什麼邏輯？

以巨炮轟平舉事回村的做法，是錯誤的、暴戾的。決策者應受到調查處罰。但這不等於說，那些殺

害無武裝軍人的暴徒，就沒有罪過，就應給予平反。在已給予足夠時間讓其離開而拒不離開，那就是認同了殘殺行為並以武力拒捕。殺人犯武力拒捕和贊同殺人並與殺人犯一起武力拒捕，在拒捕的交火過程中身亡就是死有餘辜或咎由自取，有什麼反可以平？

從這件事情的始末，我們可以窺見共產黨政權的陰森無情。它不但視民眾生命如草芥，而且有時還會視為其效力者的生命如草芥。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它們可以把自己的士兵送上祭壇。有人會辯解說，給沙旬暴亂回民平反和給無辜被殺的解放軍以革命烈士榮譽並優撫其家屬，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既然沙旬暴亂者無罪，那無辜被殺的軍人又怎能被稱為烈士？如果真的「並行不悖」，那只能說明共產黨政權已完全墮入了耍弄權術的可鄙的實用主義泥坑。

然而，甚為可悲的是；共產黨的實用主義，非但不能收到其預想的效果，而且適得其反。

它本來想通過這樣一番表演，達到籠絡回族的政治目的；可是事情的後續發展，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樣。平反的結果，使殘殺無武裝軍人的暴徒罪犯，在某些回民的心目中成了民族英雄，受到永遠的紀念和讚頌，並由此引伸為一種永不消淡甚至愈加濃烈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結。

世界上各個民族有著不同的行事風格。有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反省精神，有的少一些，有的簡直全無。什麼時候，什麼事情，他總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執拗強硬；以至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關係總是處於緊張之中。民族意識極其淡薄的華夏民族，則大異其趣，在民族關係上甚能包容忍讓。有時甚至反省過頭。「大漢族主義」云云，實在是太「擡舉」了它。說來對那些反省精神極差的民族，其實不應過於忍讓。有時確需嚴辭以對，使之懂得與其他民族的相處之道。否則，一味遷就忍讓，貌似愛護它，其實最終會害了它。一個小民族（這小是指其人口較少）在長期的遷就袒護下，會滋長出一種民族優越感，行為更加不知節制甚至肆意胡來。這樣，最終也可能為自己釀下苦酒。

回過頭來檢視當年中共軍隊的炮轟行為，則還是極須予以抨擊的。殺人犯們拒捕當然應該嚴懲，但方法上不應如此。中共軍沒有精靈炸彈；即使有，在密集的民房區也不合用。應採取的辦法是長期圍困。給

予足夠的時間，極盡宣傳勸導；讓所有受裹脅蒙蔽者，在醒悟後願意出來的，都可以出來。對於企圖武裝突圍的殺人犯，則予以捕捉或擊斃。直到在拒不投降的殺人犯們彈盡糧絕、饑渴倒地之後，再上前輕而易舉地予以捕捉，送上法庭；經審判確認其罪行後，判處死刑，予以槍決。這樣才能既不傷無辜，又能嚴肅法制，準確地懲辦罪犯。既不必搞什麼平反，也讓某些偏執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宗教狂熱分子，不能公開把殺人犯奉為民族英雄。我想，一個民主的中央政府一定會這樣處置。

可是，中共政權畢竟是一個不講法制，漠視生命的專制政權。它舉措失當，激怒回民于前；又失察該地回民之兇悍，令幾十名軍人無辜送死于後；其三狂怒之下，轟平回村，深種民族仇恨；最後，竟為籠絡回民，搞所謂「徹底平反」，棄社會公理如草芥。縱觀中共所為，舉措失當、進退失據、暴怒抓狂，實在是顛頂之致、昏亂之致。沙甸慘案是中共錯亂民族政策的一大縮影。

二、西藏亂局的始作俑者

沙甸事件，儘管慘烈亦只局限於南方一隅；而牽扯面大、連綿不絕的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騷亂，則給社會帶來極大困擾和損傷。由於共產黨的刻意隱瞞和朦朧，人民不能瞭解許多事件的真相和具體細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事情的基本脈絡，去檢視中共政權幾十年來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和失敗。

如果說，新疆問題因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剛性訴求和恐怖行動，而難以妥協化解的話；那麼，西藏問題激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共產黨自己。

與藏族相處，只要舉措適當，其實並不十分困難。儘管藏族驍勇的先民曾於公元 670 年大敗盛唐名將薛仁貴於大非川，還曾兇悍無比地於公元 763 年攻陷殺掠過中唐的首都長安。但現代的藏族，則今非昔比。從公元九世紀開始綿延不絕的內部分裂，從十世紀開始盛行不衰的藏傳佛教（尤其是十四世紀興起的黃教），使藏族民性趨向平和，人口繁殖困難。公元七世紀的強盛時期，其人口已近三百萬；經過千多年的繁殖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的統計數卻僅為九十一

萬。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亦只一百三十七萬（康藏地區）。

二十世紀上半期，藏區發生過幾次較大的武裝衝突。一次是世紀之初。起因是 1905 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被殺，清政府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剿。趙節節取勝，而其所恃僅五營邊防軍。1909 年清庭增調四川知府鍾穎率川軍入藏。鍾穎所部僅兩千人，一路斬關奪寨，次年初便兵陷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驚懼逃往印度。

第二次是三十年代初，西藏上層分子乘中原混亂之機，進軍西康、青海，企圖擴大自己的地盤。開始頗有斬獲。占甘孜、瞻化，屯兵歇武、通天河一線，切斷玉樹、西寧間的聯繫。但不久青海軍隊結集反攻，藏軍節節敗退。川軍也參與反擊。藏軍大敗。前階段所得地域皆失。青川聯軍銜尾直追至金沙江岸。

第三次就是 1950 年 10 月的昌都之役。僅一天就決出勝負。中共軍大獲全勝，藏軍土崩瓦解。被殲五千多人。

從這幾次武力交鋒來看，西藏沒有給內地製造大麻煩的武力本錢。那麼，西藏上層人士的心態情緒又如何呢？應該說西藏人士的心緒是十分複雜的。因為印度和中國像兩條繩索逆向地拉著西藏。

藏族人種屬蒙古利亞人種，中原諸族亦屬蒙古利亞人種，而印度屬雅利安人種。漢語藏語同屬漢藏語系，而印度語屬印歐語系。但是，藏族是宗教民族，西藏政權是政教合一的政權。而藏傳佛教系發源於印度。更為重要的是，西藏文化與印度文化有極大的關係。考中國境內幾個較大的少數民族，就數藏族的文化最為悠久。以文字為例，維吾爾族文字至公元十四世紀才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定型下來。其於公元八世紀所使用的粗糙古突厥文字，和十世紀使用的粟特文——回紇文字都湮沒於歷史。蒙古族的文字于十三世紀初才由維吾爾人塔塔統阿為之創制，至十三世紀末再由藏人八思巴為之改制。滿族更遲至 1599 年由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等仿蒙古文創制。但由於這套倉促創制的文字並不成熟，入關之後又受到高度發達的漢文化的衝擊，故終湮沒於歷史之中。而藏族的成熟文字比他們都早得多。公元七世紀松贊干布時期，大相吞米桑布紮赴印度從婆羅門李敬學文字學、修辭學和梵文天成體。學成後以梵文五十聲韻母為藍本，創藏文

三十聲母、四韻母以及拼音造句規則。此外在書法上還研製了楷書、行書和草書。這套文字一千幾百年沿用至今。可見藏族的文化底蘊不但非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可與之媲美，而且與印度文化有深厚的淵源。應該看到，在文化倫理上，印度有一條無形而有力的繩索在拉著西藏。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卻有另一條有形的繩索在拉著西藏。從唐代開始的和親到元代的「宣政院」，從明代的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到清代的駐藏辦事大臣，世界屋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日趨緊密。可是，由於崇山峻嶺的阻隔和高原氣候的迥異，西藏非但與內地省份天差地別，甚至與新疆內蒙亦大相徑庭。無庸諱言，這個沿雅魯藏布江河谷散佈，地理位置與世隔絕，而其文化傳統悠久且又獨樹一幟的民族，當有著深潛的獨立意識。然而現實政治卻一直制約著這一意識。鑒此，這個民族的精英分子心情是複雜的。當他們內心的意願不得不服從現實政治時，其心境當非暢快。

源自於拓展疆土的強者心態，中原王朝不容西藏脫幅。但一旦中原王朝衰微內亂，西藏就有相應的動作。二十世紀上半期藏方主動挑起的兩次軍事衝突便是說明。然而已被數百年藏傳佛教洗去了剽悍之氣的藏族軍旅，根本不能重振當年松贊干布的軍威。內亂之中的中原政權僅以偏師便粉碎其企圖。藏族精英不得不一再面對現實。

1910年鍾穎率川軍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至1912年返回拉薩。從1912年到1918年藏川邊區時有衝突，勝敗互見。為此，1919年11月北京中央政府派朱繡等到達拉薩，直接與達賴喇嘛會談。1920年4月代表團起程回京。在送行宴會上，達賴喇嘛說：「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唯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共和。至於《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不管達賴喇嘛的這番話是否由衷，但它起碼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無論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引力還是日不落大英帝國的壓力，抑或兩者相加也不及來自中原華夏政權的牽力。

1930年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員進藏晉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她(此為一女性官員，名劉曼卿)說：

「過去中國均漠視西藏，棄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尙望始終如一，繼續不斷，更進而為實際之互助。」「至於西康事件，請轉告政府，勿遣暴厲軍人，重苦百姓，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隨時可以撤回防軍，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中國只須內部鞏固，康藏問題不難定於樽俎」。如果說十年前達賴喇嘛的那番話還有點外交辭令的痕跡的話，那麼這次他對劉曼卿所言就確為心聲了。他既責備了中央政府，又承認現實，並提出相當具體的建議。尤為值得注目的是：全然沒有訴以脫幅中國的意向。儘管他心靈深處可能潛藏著這個意向。

1933年，五十八歲在位三十八年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從此時到1950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正是日本侵華、二次大戰和國共戰爭接踵而至的國難歲月。儘管其間亦不乏事故(如西藏當局曾擅自成立「外交局」)，但西藏終究未提出獨立訴求，世界輿論對西藏問題亦遠未沸沸揚揚。

以上簡扼回顧這些史實係用以說明：在中央政府權威式微之時，情勢尚且如此；那麼一旦中央政府強大，西藏問題更無呈鼎沸之理。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所擴張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確遠遠超過昔日。但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西藏問題卻呈爆炸之態，乃至在國際上都掀起軒然大波，苦了漢藏百姓，也困擾了中共政權自己。而事態所至如此之根源，全系中共政權的顛覆錯亂。

當代史範圍的西藏變故已為大眾所熟知，無庸贅述。其發端在於中共在康區進行的所謂「民主改革」，引起西藏全境上層分子的恐慌和強烈反彈。藏方謂之「武裝抗暴」，中共稱之「平定叛亂」。事變導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大批藏人出走。這麼多年來，出走在外的藏人和藏區藏人遙相呼應，不斷發出獨立聲浪並訴諸激烈行動；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聲援和經濟支持，使經久不衰，代際相傳。

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極為落後于世界進步潮流，對之予以改革于道理上完全成立。且不說由集古今中外專制政治之大成的中共政權，去對它實行「民主改革」是多麼滑稽可笑；僅從具體作法和時機抉擇上去考量，亦大有問題。

民主改革的真諦在於造就社會正義。因為，各種非民主體制，都是使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佔據乃至壟斷了社會公權力，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致使廣大民衆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被盤剝的境地，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人類社會的進步力量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在為民主改革奮鬥，而至今仍遠未在世界範圍內完成，可見這項工程是多麼的複雜艱巨。它既會遭到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抗，也會發生本已被推翻的專制主義在「民主改革」的旗幟下借屍還魂的奇特現象——如中共一類共產黨政權。

要在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經濟為主的藏區進行民主改革，毫無疑問會遭到絕大多數僧侶階級、領主階級的憎惡和抗拒。即使實施這項改革的，不是那個專制主義的中共政權，而是個真正的民主政權也罷。因為關鍵在於如果在藏區實施「民主改革」的不是藏族人士，而是與藏族有千年齟齬的漢族的話；那麼，無論改革的主導者是多麼的真心誠意，也都難以被將在民主改革中獲得利益的藏族平民所接受理解。而藏族上層分子則極容易把針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說成是對整個藏民族的欺凌傷害。宗教文化語言的隔閡和千年劍與火的記憶，都使大多數藏族平民寧願相信剝削壓榨他們的僧侶、頭人；也不會去相信「石頭不能作枕頭，漢人不能作朋友」的漢人。所有由漢人主導的藏區民主改革，都有可能被扭曲，被妖魔化，或在實施中走樣。

更為嚴重的是，中共政權欲在藏區所實施的，絕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假借民主改革之名，把它的一黨專政政體推廣到西藏。「臥榻之側，豈容鼯息」。中共政權不能容忍在它統治的疆域裏，生存著另外的自成體系的政治勢力。一個真正的漢族民主政權，若要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當會審時度事，謹慎為之。說實在的，為人作嫁衣裳，何須急不可耐？「皇帝不急太監急」，越俎代庖，徒招誤解，真是何苦來哉！而中共則不然，由於它所要進行的並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把它的絕對政治權威擴張到整個藏區，故「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同時在作法上，即使中共在康區行為方式的粗暴程度，只有它在漢區的十分之一，也絕難以被藏人接受。

還有個說法，二十多年前中共紅軍經過川邊藏區時遭藏族騎兵襲擊，疲憊不堪的中共紅軍傷亡慘重。

這段血仇在某些中共將領中記憶猶新，故康區平叛令一下，報復性的殺戮一發難收。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動蕩降臨整個藏區，相隔近半個世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又走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老路——出逃印度。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兩年就返回拉薩，而十四世達賴喇嘛則從此「浪迹天涯」。西藏問題的高分貝喧囂，從此困擾了中國也困擾了世界。

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在西藏鎮壓行動的指責，因六四屠殺和西方人對西藏的主觀美化而與日俱增。外國人很自然地推測：一個漢人的政權竟能有計劃地屠殺本族人，那麼它一定會更血腥地屠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殊不知，古往今來的漢族統治者，從來都是對本族人民最兇狠的。中共當是很卓越地繼承了這一傳統。西方人對西藏藍天白雲、高山流水那詩情畫意般的嚮往，促使他們更為痛恨共產黨對這一未受當代各種功利主義塵埃污染的人間美境的破壞，而忽略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反民主性質和文化科學的落後性。以這種推測和痛恨為基礎，他們大力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使西藏問題更為膠著棘手。

當然，中共政權亦極力為自己辯解。它不遺餘力地強調西藏原政權的反動性、殘酷性。為此它的御用文藝人士製作了一部電影「農奴」，再加上鋪天蓋地的宣傳，力圖使人們相信：在他們所主導的民主改革前，西藏社會是一個多麼黑暗、野蠻、殘酷的農奴制社會。可是，在世人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超級的「放羊孩子」：它那數不清的謊言，早已徹底自我毀盡了信譽。人們對它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或許，曾在某一期間內國內的民衆會在某一程度上信其所言，但隨著「改革開放」，許多真相的披露使人們省悟了。如果說從前曾大肆宣傳的劉文采式「收租院」的慘絕人寰，在很大程度上為虛構之物的話；那麼，憑什麼擔保共產黨對前西藏社會所作的描繪能是真實的呢？此外，即使前西藏社會確實缺乏人道因素，但與中共激變藏民後又殘酷「平叛」相比，哪一樣離人道更遠？

為了安撫沒有出逃的藏民，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它在西藏施了仁政；數十年來，中共政權向西藏傾瀉了巨量的金錢和物資。它修復了許多在平叛中毀損的寺院。布達拉宮更是被修整得金碧輝煌。藏民族得到中共政權的特殊優待。實行全體公費醫療。西藏社

會，尤其是拉薩等主要城市的消費形態急速升級，遠遠超過內地同級城市。如拉薩市的手機人均擁有率居全國之冠。1994 年中共舉行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決定對西藏作包幹式的對口支援。即由內地某個省份或城市，固定以資金、物質、技術、人力支援西藏某個地區或城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來看，內地支援西藏的數額是極為驚人的。例如從 1990 年到 2002 年中共政權在西藏總共投入 650 億(人民幣)，平均每年 50 億。若以西藏藏人 200 萬計算，每人每年可得 2500 元，足夠一個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國家統計局還有個數據是：1999 年西藏的生產總值為 105 億，同樣以 200 萬人計算，人均產值為 5250 元，遠低於全國平均值。但 2000 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竟達 6908 元，遠高於全國平均值 5854 元。當然，中共政權向西藏投入這麼多錢，並非都平均地惠及每一個藏族人民。其中相當一部份是用來參養那班藏族共幹。然而甚為可悲的是，這些浸透了內地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並未能買到西藏的心。多年來西藏層出不窮的騷動和爆炸事件，為此作了最清楚的說明。

西藏社會當然是應該予以改革，但這個改革應有兩點須予以遵循。一是，大幅度、帶根本性的改革，必須是由藏族人士自己去主導。二是，外部只應起促進作用。這個促進可以是施加壓力，可以是局部性的、單項性的改革。例如通過普及教育，提高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使之逐漸認識到政教合一制度的落後性，進而產生改革的要求。又如，通過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協議，擬訂漸進改革的大致日程，同時還可以借助國際進步力量對其觸動。再如，從接近漢區的藏區逐步進行有限改革——「改土歸流」，從削減、限制土司頭人的司法權、行政權、財經權，到完全以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取而代之。二十世紀初清朝邊務大臣趙爾豐，就曾在川藏邊區實行過類似的改革，頗有成效。只不過趙爾豐在辛亥革命前夕調任四川總督，因反對革命，死于任上。其在川藏邊區的改革業績亦似湮沒，不無可惜。一個封建官吏尚且有此建樹，而共產黨則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則確實是發人深思的。

三、南轅北轍的民族政策

中共反對國土分裂的意向是明確的。但閃光的未必都是金子。在中國民主運動參加者的群體中，對藏獨、疆獨等所採取的態度是分歧的。有的朋友抱以淡化、不明確表態的策略，給自己留有充份的回旋餘地；有的朋友則採取同情乃至支持的態度；有的朋友甚至認為，只要能多一份力量去打擊中共，聯絡藏獨、疆獨等一起幹又何妨？而我則採取明確的反對各種「獨」的態度。我沒有精確統計過，我這種態度在民運隊伍中所占的比率。但願不會是少數派吧！

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我反對分裂與中共的反對分裂只有外在的相似，而有著內在的不同。我是希望一個民主公正的社會制度，在那 95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麥克馬洪線以南 1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被中共拱手讓給了印度，故早已不是 960 萬平方公里了)。而中共則是要使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格局，牢牢抓住每一寸國土。

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中國不至在共產黨手裏崩裂掉，希望實現民主轉型後的國土仍有 950 萬平方公里。可是，現實令我十分憂心。因為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舉措是南其轅而北其轍。這些舉措可歸納以下幾個方面。

(1) 不必要地人為地製造「少數民族」。

儘管世界將來有一天終會走向大同，地球村終將建立，但那畢竟是相當遙遠的事情，幾代人之後都仍不會實現，遑論當今。在一個國度中，是民族成份較為單純好還是較為複雜好呢？我是屬意前者的。因為，民族成份較單純可使產生民族糾紛的機率低些。但是，當多民族的現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存在時，我們就應在予以面對的同時，儘量設法使事情簡化一些。可是共產黨的作法則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議的，因為它在不遺餘力地把事情複雜化。它搞出了 55 個少數民族。而且還要為許多沒有文字，而實際上已接受漢文化，講著類漢語方言，使用漢字的少數民族製造文字。從而催生強化了這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這裏有一個典型是廣西壯族。壯族原名僮族，源出百越。百越的大多數——東越、閩越、南越以及廣西東北部的西甌，均已同化於漢族。而廣西西南部山區的餘部由於地理原因，致使接受漢文化遲了一個節拍，還保持了若干百越痕迹，但它離完全漢化亦只一

步之遙。可是，共產黨硬是要搞出一個壯族，創造壯文，大張旗鼓地劃分族別。許多早已講漢語、習漢字，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人們，亦只因姓韋姓覃等，就被劃入了壯族。一些有族譜可查來自湘鄂甚至中原的人士，僅因久居壯區或沾了一點壯族血統，都統統被劃入壯族。於是西南邊陲一下出現了個原來若隱若現，而今則驟然顯山露水，人數一下從七八百萬膨脹為一千四五百萬的少數民族——壯族。有四千多萬人口的廣西，僅因有千多萬壯族人口，而稱之為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千萬生造出來的壯族的份量，竟然重於三千萬漢族，中共民族政策的錯亂由此可見一斑。

滿族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三百多年前滿族入關後，出於種種原因都不得不接受漢文化，而放棄它那剛創制不久的、粗糙的滿文。三百多年下來，滿族已全盤漢化。不僅僅是語言文字漢化，甚至連倫理心態都已漢化。這也就是昔日金國、元蒙傾覆時，其遺民大多都經歷一段困難的日子；而滿清傾覆，滿人大多都平穩度過的原因之一。儘管辛亥革命前革命黨為喚醒人民，曾強烈抨擊滿清入關前後對漢民族的殘酷殺戮；但革命成功後，就立即主張民族和睦，善待滿族同胞，其原因之一也就是滿族其實已與漢族無異。應該說，在全國這麼些少數民族中，滿族是最不會產生民族問題的。但不料近年已有不良端倪。滿族優越論的分貝漸次升高。

這裏面除了某些滿族人士的所為外，還有其他民族極端分子的挑動。他們除了自己身體力行外，也寄希望於滿族出來為中國製造民族問題。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也還是中共。正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為他們造就了基礎和提供了舞臺。中共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使許多早已心歸中華的滿族人士複萌其民族意識，並作進一步訴求。謬誤的民族劃分方式，使許多以漢族血統為主、滿族血統為次的人士都自報滿族。原已消彌無形的滿族，人數又一下高達千萬。

這些年來，漢族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率逐年下降，六七十年代漢族所占比率一向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世紀之末已降至百分之九十一。其原因之一就是申請改變自己族裔的人數劇增。日本《朝日新聞》曾報導，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人從漢族主動改變成其他族裔者達五六千萬之鉅。如果說

此舉只是某些人想獲得優惠利益，那事情尚小。而如果這種情況為某些少數民族的胸懷「壯志」者施展其「鴻圖抱負」造就了社會基礎，那對我們國家造成的隱患實難估量。

(2)不恰當的民族優惠政策，強化少數民族的特殊群體感和民族優越感。催生著他們的分裂傾向和獨立訴求。

對少數民族應不應該給予優待？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兄弟民族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從人道主義出發，從兄長對弟妹們愛護幫助的角度出發，都應如此。可是凡事都有個限度，否則就會變質走樣適得其反。

基於愛護幫助角度出發的民族優惠政策，其宗旨應是促進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對主體民族的友愛。但現在中共的民族優惠政策所得到的結果，是少數民族自認比漢族優越。在民族雜居地區廣泛發生少數民族欺侮、侵害漢族民衆而逍遙法外的事件。甚至漢族婦女被少數民族歹徒強姦的惡性刑事案件，警方都不敢放手查處，據說是要「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避免引起民族糾紛，云云。

以高考加分、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國企工人錄用時保留比率等為體現的民族優惠政策，是可以適當實行的；但司法上的優惠——實則司法不平等，一則萬萬不可搞。這不僅僅是因為它與普世的人權理念相抵觸，更可怕的是會給社會造成極大的乃至難以修復的內傷。僅翻翻中國歷史就可知道它可怖的結果。石勒、石虎實行了殘酷的民族欺壓虐殺政策，而結果是在一場民族報復的大動亂中，他們所屬的民族(羯族)二十多萬人全族被殺。金國的猛安謀克制和元蒙的四等人制，曾把廣大漢族民衆壓在深淵；而他們的政權一朝傾覆，其遺民亦承受災難。固然，當今的社會文明水平使如此大規模的民族報復不會重現，但社會失序之時，小範圍的報復事件實在難免。它給當事人所產生的肉體心靈傷害，給耳聞目睹者心中所留下的陰影，是長久難以彌合消除的。

2001年6月，陝西長安大學所發生的事件令人震驚。事件的起因本是小事一樁。一群維族學生深夜在宿舍高聲喧鬧，漢族學生表示不滿，不料竟遭維族學生毆打。由於在此之前的幾年中，該校已發生多起維族學生欺侮毆打乃至強姦漢族學生而未受懲處的事

件，漢族學生早已積憤在胸。此次維族學生又要橫蠻，終於激起漢族學生極大憤怒，遂聚眾還擊。維族學生在校方保護下撤走。繼而警方出動防暴警察毆打漢族學生。漢族學生更怒不可遏，在校內集會示威，直斥校方為漢奸。可見，司法上的不平等，對少數民族的袒護，非但不能為社會帶來祥和，還會製造民族間的嫌隙和嫉恨，為禍深遠。

任何人不能有太特殊的利益。絕大多數人的心智能操水平不可能正確對待特殊利益的寵護。換言之，特殊利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催生更多的、無止境的慾求。中共的民族優惠政策，使少數民族體認到他們是特殊利益擁有群體，從而強化著他們特殊的民族意識。而這又會促使他們抱團去謀求更多、更高層次的特殊利益。對於一般人中的品質惡劣者，這個特殊的民族地位，可以用來欺侮漢族平民，甚至強姦了漢族女子可以逃脫懲罰；而對於心思更深、胸有「大志」的民族精英來說，這是他們大展鴻圖，謀求民族獨立的跳板和基石。

(3) 打壓漢族的民族精神，傷害漢族的應有權益。

有人會認為此說欠通，因為中共在其意識形態業已破產的今天，所持僅民族主義一項，並以此來營造它那個專制政權的合法性的。故此，它怎麼會打壓漢族呢？

這種看法系為表象所迷惑。不錯，當今中共是在打「民族主義」牌，可是，這個「民族主義」牌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很簡單，無非是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人必須愛國，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而愛國就是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愛中共政權。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中共政權利用晚清之際西方列強曾幾次進兵中華國土的歷史事實大做文章。說什麼西方帝國主義從來就有滅亡中國之心，至今而不衰。近年來的銀河號事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等，都被中共利用作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欺侮中國的證據，挑動民衆把矛頭指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中共政權利用民族主義營造其政權合法性，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以此塗污西方民主國家，力圖使人民群眾憎惡之，從而抵擋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專制制度的批評所產生的壓力，抵消國際進

步社會對中國民主進程的關注所在中國人民之中產生的正面影響。

其實，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早已進入歷史。當代的西方國家與百多年前相比，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幾經社會大波，它們都建成了堅固的民主制度，徹底拋棄了海外殖民的作法。它們再沒有侵略欺侮中國之心。

中國的危機絕不來自國外，絕不來自西方民主國家。甚至也不來自蠶食中國南海島嶼的南亞諸國，而是來自國內。一是來自中共專制政權對全社會的戕害，二是來自中國境內某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以分裂國土為表徵的獨立訴求。

面對這種情況，凝聚漢民族的民族精神極有必要。一旦分裂狂濤捲起之時，只有一個堅強的漢族存在才能挽狂瀾於既倒。否則，國土必定分崩離析並絕無恢復之望。而中共之打壓漢民族的民族精神，消蝕漢民族的民族意識，正是在客觀上為將來中國之崩裂埋下伏筆，製造條件。

中共主要幹下哪些打壓漢族民族精神、傷害漢族應有權益的事情呢？所有不恰當的民族優惠政策，尤其是司法上的不平等，都可歸於此類。此外，還有一樣危害尤深的是，抽掉漢民族的精神脊梁。其具體表現之一是褫奪岳飛、文天祥民族英雄的稱號。

中共的理論是：中華民族由 56 個民族組成。岳飛抗擊的是中國滿族的祖先。文天祥抗擊的是中國蒙族的祖先。滿族蒙族都屬中華民族，這是「家裏打架、兄弟睨牆」，故岳飛等談不上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那麼是否可以把岳飛等定為漢族的民族英雄呢？中共認為也不行。因為那同樣會「刺激、傷害」滿蒙等少數民族的感情。在中共的詞彙庫裏，漢族一詞須儘量少用，應儘量用中華民族一詞。甚至「漢族」一詞本身就已略帶貶意。它似乎總與挨批判的「大漢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中共認為，定漢族的民族英雄，就會離間、分化了中華民族，極不利於民族和睦、民族團結。

好個悅耳動聽的「民族和睦」、「民族團結」曲調！無視西藏特殊社會狀況粗暴地「改革」於先，又大動干戈地「平叛」於後，這是「民族和睦」嗎？大把大把地將漢族人民的血汗錢，扔進西藏這個無底洞，是「民族團結」嗎？用巨炮轟平回村是「民族和

睦」嗎？默許回民把大規模屠殺無武裝漢族軍人的主謀奉為民族英雄是「民族團結」嗎？……

魯迅先生說：滿清殺盡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廉恥。是的，我們並不確切知道古代漢族人的氣質。而我們瞭解到當代的漢族人，大多是懦弱、無能、窩囊。象嶽飛這樣忠肝義膽、勇武剛強之士，實在是我們民族的精華。在抗擊外來的侵害虐殺之時，我們民族是多麼需要有這樣的人挺身而出啊！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沒有這樣的脊梁，就算有再多的肌腱，身體也站立不起來，只會是趴在地上的一堆肉。他們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希望。他們的精神激勵著後世的人們為挽救民族危機、國破家亡而奮起戰鬥。當年裝備落後的馮玉祥軍隊，就是唱著河南梆子調的岳飛「滿江紅」，與裝備精良的日寇，在中原大地上浴血奮戰慷慨捐軀的。中共政權褫奪岳飛等民族英雄的稱號，無異抽掉我們民族的脊梁。不但使我們這個民族失去那份瑰麗而稀少的記憶和豪情，也使我們民族今後再面臨災難時失去了正義衝動和獻身精神。

四、中共民族政策錯亂緣由之剖析

中共政權的創建人、歷屆最高領導人都是漢人。人們甚至可以認為，中共政權就其民族成份而言是個漢人政權。這樣一個政權竟會如此打壓漢族的民族精神，損害漢族人民的應有權益，粗看之下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只要稍作深入的剖析，就不難洞悉內裏的緣由。

(1) 中共的外來性和民族感情之闕如

跟中共纏鬥近三十年而終究敗北的中國國民黨與之截然不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土生的黨。中國共產黨則是在外國勢力指導下成立的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它的大多數創建人、領導人，都參與了推翻滿清的封建、民族雙重統治。故此，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族精神的政黨（當今之臺灣國民黨則作另論）。中國共產黨的所有創建人，都沒有參與世紀之初推翻滿清王朝的艱苦鬥爭。他們沒有這份榮譽，沒有這份記憶，也沒有這份感情。如果說我們對此或許可以諒解的話——因為從年齡上看，他們似乎還趕不上這場波濤（辛亥革命時毛澤東 18 歲，說來還是應趕得上

的。現在許多共產黨元老自報其參加「革命」之時都是十五六歲）。——那麼對中共系在外國勢力指導支持下成立就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因為這是導致中共此後行為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代日本侵華，民族危亡在即。國民黨在民生凋蔽、百廢待舉之時，既要擺平國內派系爭端，又要舉兵抗日，真是心力交瘁。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在幹什麼？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搞暴動，搞割據，並把它的割據地稱之為「蘇維埃政權」，還高呼「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近年來，總算某些有骨氣的文化人，站出來揭露了歷史的真相。共產黨抗日的謊言被戳穿，國民黨抗日的業績被肯定。國民革命軍三百多萬人犧牲戰場，共產黨從來不敢涉及它的軍隊有多少捐軀抗日沙場。國民革命軍 267 名少將以上軍官為國捐軀。而共產黨僅一名左權死於逃避日寇掃蕩的路上。共產黨的御用文藝人恬不知恥地拍攝「大決戰」之類的電影，歌頌共產黨擊敗國民黨的「十全武功」。然而他們終究不能拍攝出共產黨抗擊日寇的大戰陣，只能拍攝「地雷戰」、「地道戰」之類的肥皂劇。如果說共產黨沒能趕上辛亥革命，我們可因其年齡予以原諒的話；那麼，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所為，就只能令我們齒冷心寒。但是共產黨不以為恥，反竊喜自得，並終究按捺不住，溢於言表。1970 年，日本社會黨黨魁佐佐木來訪時，對當年的侵華頗表歉疚。不料毛澤東笑言安撫之。並道：「我們應該給你們發個大大的獎章，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

共產黨，這個在民族危亡之時，對艱難的抗日戰鬥作壁上觀，並趁機坐大者，自然根本沒有抗日情懷的記憶，沒有慷慨悲歌的民族感情。共產黨不遺餘力地打壓漢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實在是有其內在的邏輯根據。

(2) 漢族民衆是共產黨最主要的敵人

中共政權的敵人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嗎？當然不是，那只是它為了抗拒國際進步社會抨擊它而抹黑之的「塗鴉」。中共政權的主要敵人是藏獨、疆獨之類嗎？也不是。藏獨之類充其量只能壓縮共產黨一黨專政格局的覆蓋面。就算藏獨之類真的成功，共產黨也能仍在五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裏施展其權威。

最使共產黨寢食不安、心懼腦恨的是人數巨大的漢族人民。幾十年來，共產黨已與漢族人民結下深仇。從五十年代以來的歷次運動，關管殺「階級敵人」和知識分子，到文化革命把工人農民也推上揪鬥台；從六十年代餓殍遍野的大饑荒到九十年代的大「下崗」；從五十年代鎮反的大處決到六八年的大屠殺和七零年的集體槍決，再到六四屠城，共產黨欠下中國漢族人民太多太多的賬乃至血債。共產黨時刻向漢族人民投以搜索警惕的目光，時刻防範漢族人民向它索賠索命。毫無疑問，漢族人民是中共政權的頭號敵人。如果一旦他大舉起事，共產黨的權勢將不僅僅是萎縮，而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傾覆瓦解。共產黨非但不能繼續在中南海這昔日的帝苑皇宮裏號令天下，而且有可能會流落街頭，甚至接受審判。

然而，能使共產黨暗中欣慰的是，漢族竟是這樣一個缺乏血性的民族。它健忘、它散漫、它怯懦、它自私。如果說毛共時代是以瘋狂的屠殺鎮壓來嚇破漢族人的膽，使之俯首貼耳的話；那麼，鄧江之流則是在繼續揮舞大棒的同時，輔以腐蝕漢族人民的心智，使之更加健忘，忘掉共產黨作的萬般罪孽；使之更加散漫，各人只顧自己；使之更加自私，罔顧社會公平和正義，爲了多攫取利益而互鬥不休，而且自私散漫的人又必定是怯懦的。漢族雖有巨量的人口，但由於它是這麼一副德性，故只是一個極爲虛弱的巨人，氣喘心跳、四肢無力，連站都站不穩，談何向專制主義的高牆出擊？

不能讓漢族人具有英雄氣概。岳飛雖系以抵抗女真入侵的業績被尊爲民族英雄；但英雄氣概一旦被推崇繼承，其鋒芒所指未必只限於外族入侵。剛強勇者犯上作亂司空見慣。何況嶽飛就有潛越不軌。他置金牌於不顧並責問聖上。此行若楷模後世，實屬堪慮。

中共打民族主義牌是很講究火候的。它「塗鴉」西方民主國家，目的在於損毀它們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像，誘使中國民衆憎惡它們，使已經建成政治清明、社會公正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示範力、影響力消解在中國人民對它們的偏見和誤解之中。而如果中國人民被它煽動起來的偏狹民族情緒超過了它設定的程度，它就要予以控制和壓縮。例如對民衆要遊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欺侮，

中共政權就要予以拒絕和制止。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是聚集民間力量、激發民間能量的重要途徑，是一劑醫治漢族虛弱巨人症的有效藥方。老謀深算的中共，洞察民衆針對「霸權主義」的遊行示威，很有可能成爲另一類更大規模的街頭政治的熱身運動。誰能擔保那持續行動起來的民衆，那源源不絕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不會轉而針對民怨已深的腐敗吏治呢？故此，對漢族這個虛弱的巨人，要儘量使它繼續虛弱下去，昏睡下去。共產黨政權的壽命系與漢族所患的昏睡症、虛弱症同樣長久。

(3)中共政權過份優惠少數民族的緣由

共產黨強調其政權合法性、優越性的理論之一，是把被它顛覆的政權說得一無是處。

在漢族內部，它說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舊社會暗無天日，人民群眾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共產黨除了繼續彈這個調子外，還要多一個調子，就是大講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國民黨政權都搞大漢族主義，對少數民族實行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云云。爲顯示自己與它們不同，共產黨便在時時鞭撻大漢族主義的同時，對少數民族慷慨地給予種種特殊的優惠待遇。

然而，一個兇暴歹徒要裝成慈悲善人也是夠辛苦的，一不留神就會原形畢露。康區平叛、轟平回村等都暴露了它的猙獰面目。發完狠後，它突然又醒悟到自己是裝善人的，於是對剛被它肆虐者又擺出可恭的笑容，並奉上佳肴鮮果。轟平的村莊、清真寺、佛教廟宇，都不計工本地高規格修復起來。藏族實行全族公費醫療，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以上講的兩個緣由還不是最根本的，它們只可視爲中共政權的統治權術。更爲根本的則是中共對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強勢少數民族實行「招安」。中共對漢族不實行「招安」，對漢族中所有起自民間反對中共專制主義的人們一律嚴懲不貸。七九民運被鎮壓了。八九更是血流成河。九十年代的幾批組黨活動者都判以重刑，甚至幾個青年學子成立新青年學會都要關進監獄。中共政權與漢族民衆的矛盾沒有迴旋餘地，只有絕對的鎮壓。

然而，中共政權與少數民族有迴旋的餘地。少數民族精英分子與中共政權的鬥爭主要並不表現爲政治

鬥爭，而表現為民族鬥爭。從來沒有哪個少數民族的精英分子站出來，領導他們民族的群眾向中共政權抗爭說：我們反對專制主義。我們要求在我們民族聚居區建立民主體制。幾十年來，發自少數民族地區的聲浪，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到雲南小小回村的伊斯蘭共和國，聽到的都是要求獨立的呼喊。

「獨立」麼？不行！但有話好商量。中共政權明白，獨立只是要脫離它的統治，而不是像漢族中的那些「不穩定因素」要終結它的統治。來吧，我們做個交換吧！你們不搞獨立，我給你們優惠和特權。

這特權從宏觀來看，是把政府搜括漢族民衆的血汗錢，不斷地扔進少數民族地區。從微觀上來看，是讓少數民族平民高漢族平民一等。維族商販在深圳都可以跨著腰刀招搖過市。你有疑問嗎？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維族人帶刀上街是他們的風俗習慣，不犯法，即使在深圳我們也應給予尊重。這是為了搞好民族團結——一位派出所長如是回答疑問者。雲南個舊農貿市場上幾個漢族商販，被強奪攤位的少數民族商販圍毆一頓。告到市場管理部門。反遭一頓訓斥：「人家是少數民族，您們懂不懂黨的民族政策」？

這類事件時時發生於全國許多地方。少數民族這個詞在美國和在中國有著截然相反的涵義。在美國，少數民族(常稱為少數族裔)是個暗淡的名詞。它意味著會被主體族裔(白人)歧視，意味著可能遭受警察的苛待和無端的攔車檢查。在中國它是個閃光的名詞：意味著享有較高的民族地位，受到優待和豁免，意味著主體民族(漢族)平民對他的畏懼，意味著警察對他的袒護。從政權結構來看，是少數民族的精英分子，可以通過提出獨立訴求再予以放棄，便可得到共產黨的接納栽培，委以職位，或保送到高校「鍍金」，然後回去委以官職。西藏區區兩百多萬藏民，竟有六萬藏幹，可見共產黨的招安措施確實到了何等不惜工本的地步。

五、未來民主政權民族政策之芻議

(1) 中共政權與民主政權誰更有能力處置好民族問題？

即使是已高度文明的當代，無數事實也證明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建立和睦的民族關係是多麼的不容易。鑒此，有人認為，無論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使

用了多少武力或扔入了多少資金，也無論共產黨怎樣作賤漢族民衆和擡高少數民族的地位，都不可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保住了國土，中國沒有分裂，你們民運分子不當家不知米貴。如果按你們那一套，搞言論自由，什麼鼓吹民族獨立的言論都可以宣揚。搞民主選舉，主張民族獨立的少數民族精英分子，都被選為他們那裏的行政長官，這樣搞法國家不分裂才怪哩！

其實，這類論調並不新鮮。即使是在漢族地區，有人亦說，沒有共產黨馬上天下大亂。別看共產黨幹部貪污腐敗，如果沒有共產黨來鎮住，社會秩序立即崩潰，國家立即完蛋。於是乎，結論是共產黨功不可沒，共產黨政權應予長存。

有這樣一個事實提請持上述觀點的人士留意。北京八九民運時期，整整一個五月間，北京的政權機關近於癱瘓。公安機關對社會治安撒手不管。而恰恰就是在這段期間，北京治安良好。連小偷扒手都「罷」偷「罷」扒。

看來，共產黨的嚇人戰術也是有發展的。從前是誰敢說共產黨不行，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要予以嚴懲。嚇得人不敢說話。現在是誰說共產黨不行，誰就是想要中國完蛋。沒有共產黨，哪個治理得了中國？要想過日子就趁早閉嘴吧。當然，這個發展亦說明共產黨還是在變化的。起碼從以前鎮壓型恐嚇發展成現在欺騙型恐嚇。

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是否真非共產黨莫屬？已有的事實是，共產黨作的根本不成功。它已把西藏問題胡弄成了國際問題，還不及當年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而且現在中國沒有分裂，並不見得按照中共那一套搞下去以後不會分裂。

不錯，民主制度的體現之一就是言論自由，截然區別於中共專制政權的言論鉗制。但是，所謂言論自由並不是毫無限制地胡說八道。在西方民主國家法律規定不得發表種族歧視的言論，不得無事實根據或捏造事實誣衊他人，否則都可入罪予以處罰。言論自由是指：人們可以有根據地陳述事件或批評他人；可以闡述自己各種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可以對任何事情發表自己的感想看法。毫無疑問，在民主制度下，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人們有訴求獨立的言論權。他可以闡述本民族獨立的理由和好處。但是有一條，他

不可以號召使用暴力。因為訴求獨立是一種政治主張，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而號召使用暴力則不屬政治主張，超出了這個範圍。在言論的範圍內，其他人可以與之針鋒相對地闡述獨立的不好處和法理上的欠缺。而當你號召使用暴力時，就關閉了討論的窗口，那麼下一步將是依法對你進行處置了。

民主制度的另一個主要體現是民主選舉。在這種架構下主張獨立的少數民族精英是有可能選上去。此後有兩種可能。一是他以此撈取選票，上臺之後並不真去實踐。二是確實把他的獨立主張付諸現實。這又有兩種作法。一是與中央政府談判個沒完，二是伺機使用武力，就象俄羅斯的車臣那樣。不能因噎廢食。不能有車臣之類的變故就拒絕民主而選擇專制。

就中國而言，在處置民族問題時，民主政權起碼有以下三個方面，優於中共專制政權。

第一，當今世界民主是主流。經濟文化發達的歐美民主國家主導著世界。中共政權儘管意識形態業已淡化，不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但其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終與西方國家齟齬。更兼六四大屠殺人們記憶猶新，還有鎮壓法輪功、重判組黨活動等一系列專制暴行接踵而來，使西方國家朝野均對中共政權充滿疑懼反感，甚至有時會對中共政權作過份抨擊，或在國際交往中給以顏色。這使中共政權惱怒得大罵霸權主義之餘，在處置民族事務時不得不有所保留。

民主政權則不然。它在政治觀念上與西方國家沒有衝突。西方國家會以較平實的心情來看待中國的民族事務。民主政權也不必考慮因對民族問題的處置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導致本政權的失衡瓦解，從而能無包袱地去依本國的法律法規照章行事。

第二，無論是民選出來的漢人中央政權首腦和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首腦，一般來說思想素質都會較高，都會以較理性務實的方式處置民族問題。較能以民族的長遠利益著想，不會貿然採用極端方式。

第三，在確實需要採取斷然措施時，民選的行政長官不會有太多的猶豫以至誤事。

中共專制政權以確保其政權的延續為第一要務。對的事情因不符合這一要務則不做，不對的事情而符合這一要務則做之。民主政權當非如此。獲選而上，落選或屆滿而去，一切都照章而行，沒有什麼特殊的

考量，更不需要顧慮下臺後會遭到清算，故其在位之時能有效率地處置民族問題。

(2)民主政權民族政策的理論基礎

政策體現於一系列法令、法規、措施。而政策的基礎之一是理論構建。民主政權在擬定處置民族問題的舉措之前，有必要先在思想觀點上進行理順。現作以下歸納謹供參考。

之一，民族和睦的基礎是民族平等。沒有平等，當生嫌隙、歧視和嫉恨，談何和睦？關於這一點，前面已一再談到，不再贅述。

之二，中國當今的疆域不必從歷史上找根據。它早已形成確定，超過國際法所規定的起碼所需時間，已為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共畫蛇添足，總是說什麼什麼地方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結果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論證之中，到頭來時有難以自圓其說之窘。

之三，聯合國有關決議中的民族獨立、民族自決條款系指原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地而言，一個多民族的主權國家不在此例。當然，這樣的國家也可以實行民族獨立，但與前者分屬兩種不同的性質。它不應，也不會是通過劇烈的鬥爭得到，而應是經過心平氣和的磋商得來。其關鍵是國內有關民族之間達成共識和諒解。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故此，這種民族獨立不應是某一方強加於全局，更不能訴諸暴力。

之四，善於區別民族融合與強迫民族同化。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民族構成較單一的國家產生民族糾紛的機率總低於較複雜的國家。中國是個民族構成甚多的國家。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使民族之間的界限愈來愈小，而不是使之愈來愈大。但在此過程中不能強迫，而應出於自願，出于社會的自然機制。每個民族的文化風俗傳統均可在自願的前提下保留，也可在自願的前提下揚棄。政權機構不應干涉。

之五，在充份的民主制度下，無所謂民族自治。中國公民依中共政權劃分成了 56 個民族。中國疆域內既有相對的民族集居區，亦有更多的雜居區。民族自治在集居區尚可解釋，在雜居區就很費周章。例如廣西四千多萬人口中，漢族兩千多萬，擴大化成的壯族一千多萬，還有幾百萬其他民族，怎麼廣西就成了壯族自治區？把漢族和其他民族擺在什麼地位？又如內蒙人口中蒙古族只占百分之二十，怎麼就成了內蒙古

自治區？如果把壯族集居區劃成自治區，那麼雜居區怎麼辦？是否一直要化分成自治村。而同村之中又有不同民族怎麼辦？這樣搞法是否最終要導致民族「淨化」？

民族自治區域的劃分，使人們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在以某個民族為命名的自治區內，該民族為主，他民族為客。這樣容易產生民族隔閡歧見。更為不妥的是，自治表示它有超越普通地方政權的權力；而這往往會被有獨立分裂傾向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用作與中央政府較勁的平臺和實行獨立的基礎。達賴喇嘛的弟弟丹曾曲嘉就曾對採訪他的法國記者說：「我們先求自治，再把中國人趕走……就象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將是個起步」。

實現社會公正和正義，關鍵在於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在於民族自治。多民族的國家可以是民主的，單一民族的國家可以是專制的。這已經為當今世界的政治版圖所證實。

之六，摒棄大一統導致專制，小而分散有利於民主的片面觀點。許多人以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活躍，而秦漢大一統後專制盛行為此觀點的論據。可是只要看看幅員遼闊而統一的美國是何等民主，而分散成二十二個中小國家的阿拉伯世界是何等專制，就可知這一觀點的牽強附會。

(3) 未來民主政權民族政策之芻議

A、任何一個中國公民在沒作特別申請的前提下，一律以其血統中的多數成份來劃分其民族歸屬。但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都有權申請改劃自己的民族歸屬，而不必為其血統所限制。

B、民主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惠，系體現於對經濟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具體作法應是增加對那裏的資金、技術的投放，以提高該地區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就業比率，從而整體性地改善少數民族民衆的物質生活水平。民主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惠不體現於對個人的優待，故所有針對個人的優待(如高考加分，招生招聘保留名額)應予以取消或加以控制。

C、民主政府尤其應強調各民族司法平等。堅決杜絕任何司法不平等的作法和現象。

D、以漢語普通話為中國的正式語言。所有政府公務員都必須能以普通話發言和書寫。即，達不到此標準者一律不被錄用為政府公務員。

E、少數民族地區經民選上來的地方行政官員，可以不會普通話，但必須配備能以普通話發言和書寫的秘書人員。

F、民族雜居區的所有政府機關文件，均使用漢文和適合該地區的一種或數種少數民族文字。

G、所有公立學校一律以普通話施教。不能勝任此項者一律不被聘用。

H、所有私立學校皆可使用其所願意使用的語言教學。

I、所有公立廣播電臺、電視臺均須使用普通話。

J、所有經政府批准的私立廣播電臺、電視臺均可使用其願意使用的語言。

K、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其所願意使用的語言出版書籍和刊物。

L、無論國營企業，還是私人企業，在招收員工時，均不得因應召者的民族身份予以拒絕。

M、任何人不得以民族歧視的語言對待他人。民主政府定出明確法規處罰違反者！若違反者系政府公務員則須加重處罰。

N、所有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均得到充份的尊重和保護。

O、不設置民族區域自治。全國行政區域級別均作同樣劃分：省、專區(市)、縣、鄉(鎮)。任何行政區內的所有居民，均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不因其民族的不同而有任何的差別。

P、西藏地區考慮到它的特殊性，可設置西藏特別行政區。它與一般行政區的區別，僅在於宗教領袖可以介入世俗行政事務，或宗教領袖可充當行政官員。但西藏特別行政區當局，須訂出改革政教合一制度的時間表。

Q、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訴求民族區域獨立。否則中央政府將堅決予以救平。

人口龐大的漢族應醫治好昏睡症、虛弱症，堅強地站立起來，團結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一道，舉起右手推倒中共專制主義的高牆，舉起左手阻止任何分裂國土的企圖。建立一個所有民族和睦相處、共和共榮的民主中國。

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牟
宗
三

本刊編委余健文博士按：

此文為牟宗三先生 1979 年於台灣東海大學「中國文化研討會」上一篇講辭。由朱建民筆錄而成。後收錄於牟先生《政道與治道》一書，為增訂新版之序言。大陸出版「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 年 1 月二次印刷）及《當代新儒學八大家集之七——牟宗三集》（羣言出版社，1993 年）均有收錄此文，但在大陸版中，此文有近三千字被刪去。刪去的部份編者既不標明亦不作任何解釋。現將大陸版刪去的文字以粗體置於[]內。其中原委，讀者自能判斷。

順帶說明一點，九十年代大陸有所謂新儒家熱，新儒學的研究彷彿成為學術界的一門顯學。然而，如主其事者方克立所言：「要對現代新儒學這種思想文化現象作出正確的歷史說明和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對新儒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現代新儒學批判的主要對象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史觀及共產政權的專制獨裁，牟宗三先生甚至稱之為「魔道」。以魔道來對正道作「理論的分析」，將作者文章隨意刪改，以期達到既定的結論，那是理所當然，不足為怪的。

牟先生此文以通俗的語言，道出現代新儒家的基本義理及精神所在。其中概念的哲學涵義詳見於《道德的理想主義》、《政道與治道》、與《歷史哲學》三書中。現代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並不在於時間上的新。而正在於它能將儒家文化作一深入的反省，從反省中對應時代的問題來講當前之使命——即中國民主政治與現代化的課題。

大陸十多年來對新儒家的研究，每每祇著眼於其對傳統儒學的梳理，及將儒學哲學化的工作。故對牟宗三先生，祇將他視作一個哲學家，對他在《心體與性體》中將宋明儒學重定系統、其自身圓善論及一心開二門道德形上學哲學系統的建構等作重點研究。但新儒家並非祇是一個哲學的門派，新儒家的價值亦並不祇在於解經或作哲學的建構。如此研究新儒家，正如民初學者的「整理國故」，與西方歷史學者的「埃及學」研究一般，將它作為一種已死的學問來作「科學的分析」，絕不能理解新儒家的義理與真精神。一些淺薄的自由主義者見到一個「儒」字就不問因由的跟著亂起哄，甚而將它打成「新權威主義」。然而，新儒家所標示的正是人的價值與尊嚴，其批判的對象正是一切壓制個人自由的專制政權，這與新權威主義有何相干？

故大陸新儒學的研究，絕不能把握到新儒家的真精神。祇讀幾篇大陸學者的新儒家論文，而對新儒家大加批判，則祇能是武斷之論。我以為要能真切體認到新儒家的精神，必須以敬畏之心認識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師的聖賢人格。因為他們以生命向人們顯示了儒家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生命方向的光明面。

正文：

各位先生，我們原先訂的題目是「儒家學術的發展及其使命」，這是個大題目，而限於時間，祇能長話短講，綜括地集中於幾點上，來談這個問題。

1. 儒家的常道性格

首先，我們要表明儒家這個學問具有「常道」的性格。儒家這個學問，從古至今，發展了幾千年，它代表一個「常道」——恆常不變的道理。中國人常說「常道」，它有兩層意義：一是恆常不變，這是縱貫地講它的不變性；一是普遍於每一個人都能適應的，這是橫地講、廣擴地講它的普遍性，即說明這個道理是普遍於全人類的。「常道」沒有什麼特別的顏色，就如同我們平常所說的「家常便飯」；它不是一個特殊的理論、學說，儒家的學問不可視為一套學說、一套理論，也不是時下一般人所說的某某主義、某某「ism」，這些都是西方人喜歡用的方式。凡是理論、學說，都是相對地就某一特點而說話；局限於某一特點，就不能成為恆常不變的、普遍的道理。儒家的學問更不可視為教條（Dogma），西方的宗教有這種教條主義的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飯」絕不可視為獨斷的教條。又有一些人講孔子，常為了要顯示孔子的偉大，而稱孔子是個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哲學家、科學家、……，把所有的「家」都堆在孔夫子身上。依這種方式來了解孔子、了解聖人，是拿鬥富的心態來了解聖人。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在推尊孔子，實際上是在糟蹋孔子。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成為那麼多專家。凡是拿這種心理來了解孔子，都是不善於體會聖人的生命，不能體會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道理安在。

常道不可捨棄

我們今天把儒家的「發展」與「使命」連在一起講，而講的重點則在使命上。使命是就著眼前說，在這個時代中，儒家擔負什麼樣的使命、責任。然而儒家並非今天才有，因此在談它的使命之前，我們亦當該照察它過去的發展。在過去兩千多年歷史中的發

展，儒家這個學問既然是個常道，則在每一個時代中，當該有其表現；發展到今天，儒家這個學問又要負有什麼責任呢？這是個嚴重問題，在今天問這個問題，要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來得嚴重。何以會如此呢？因為我們今天談儒家的使命，似乎還可再反問一下：儒家本身今天是否還能存在呢？能存在，才能談使命，若自身都不能存在，還談什麼使命呢？若是儒家本身都若有若無，幾乎不能自保，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談什麼當前使命、責任呢？

在以往的時代中，沒有這個問題；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就有這個問題。以往一般人，不論是士、農、工、商，提起聖人，沒有不尊重的，提到聖人之道，每個人都能表現相當的敬意，沒有不肅然起敬的。不但整天捧著聖賢之書的讀書人是如此表現，即使是農、工、商，亦莫不如此。但是在今天講聖人之道，就沒有這個便利。今天這個時代，先不講農、工、商，即使是讀書人亦很少有尊重聖人之道，亦很少有了解聖人之道。在以往，從小即讀四書五經，今天的讀書人卻是愈往上讀，離開四書五經愈遠。知識份子把儒家這個常道忘掉了，很難再接上去。事實上，也許農、工、商對於聖人之道還客氣些，還保留一些尊重，知識份子反而不見得有此「雅量」。因此，在今天講儒家在當前的使命，尤其成了個嚴重問題。要是大家都把聖人之道忘掉了，認為它是不適應時代的落伍之學，那麼這種被時代拋棄的學問還談什麼當前的時代使命呢？

我認為這祇是這個時代所表現的一個不正常的變態現象；落實地看，並不如此，所以我們仍可講儒家在當前的使命。我之所以要指出這些不正常的現象，乃是要大家正視、嚴重考慮「儒家本身存亡」的問題。儒家這個常道落到今天這種若有若無的地步，幾乎被世人忘卻、拋棄，這是不合理的。既然是常道，怎能被忘掉！怎能若有若無！常道而被埋沒，這是任何人良心上過不去的。假若良心上過得去，這就不是常道。既然是常道，我們就不能讓它被埋沒下去。這是就儒家本身存在的問題而言，另外就是牽涉到外界的作用、使命來講儒家當前的使命，也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難講。因為現在來說儒家的使命，不祇涉及它本身存亡的問題，還得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特殊問

題，才能顯出「使命」的意義。尤其是牽涉到現代化的問題。

中國從清末民初即要求現代化，而有人以為傳統儒家的學問對現代化是個絆腳石。因此，似乎一講現代化，就得反傳統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事實上，儒家與現代化並不衝突，儒家亦不祇是消極地去「適應」、「湊合」現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積極地盡它的責任。我們說儒家這個學問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積極地負起它的責任，即是表明從儒家內部的生命中即積極地要求這個東西，而且能促進、實現這個東西，亦即從儒家的「內在目的」就要發出這個東西、要求這個東西。所以儒家之於現代化，不能看成個「適應」的問題，而應看成「實現」的問題，唯有如此，方能講「使命」。

2. 儒家第一階段的發展

我們在此先照察一下儒家在過去兩千多年中的「發展」。大體說來，可分成兩個階段，今天則屬儒家學術的第三階段。這是個大分類的說法。

儒家學術的第一階段，是由先秦儒家開始，發展到東漢末年。兩漢的經學是繼承先秦儒家的學術而往前進的表現，而且在兩漢四百年中，經學盡了它的責任，盡了它那個時代的使命。從漢武帝復古更化說起，建造漢代大帝國的一般趨勢，大體是「以學術指導政治，以政治指導經濟」，經學處於其中，發揮了它的作用。因此，不能輕視漢代的經學，它在那個時代，盡了它的責任、使命；盡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則是另外的問題，至少在漢朝那種局面下，儒家以經學的姿態出現，而盡了它的使命。

先秦儒家與先秦諸子齊頭並列，至漢朝，以經學的姿態表現，一直發展到東漢末年，即不能再往前進了。漢朝大帝國亦不能再往前發展了。這已是絕路，任何人出來也沒辦法；照前人的說法，即是「氣數」盡了。當時郭林宗即謂：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此即表示那個時代要「峰迴路轉」了；順著以前所定的那個模型，已走到盡頭了。「氣數」不是可以隨便說的，一個力量興起，必得維持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說氣數。在東漢末年那個關節上，說「氣數」才有意義，說「峰迴路轉」也才有意義，在此方

顯出無限的蒼涼之感、沈穆的悲劇意味。若祇是一些小彎曲，亦用不上「峰迴路轉」這種形容，必在看著就是死路，然而卻絕處逢生，在絕望至死之際，忽有一線生機開出，這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種情形好比修道人所說的大死大生。

這個「峰迴路轉」，開了另一個時代，即是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個長時期。照中國文化的主流、照儒家的學術而言，這一大段時間算是歧出了，岔出去了、繞出去了。儒家的學術在這個時代中，暗淡無光彩。魏晉盛行玄學，乃依先秦原有的道家而來；儘管道家是中國原有的，但不是中國文化生命的主流，因此仍屬中國文化之「旁支」。玄學雖屬歧出者，但仍是繼承中國原有的道家，至於東晉以下，歷經南北朝、隋、以至唐朝前半段，這一個長期的工作則在於吸收佛教、消化佛教，佛教則純屬外來者，當時即初以道家為橋樑來吸收佛教。

南北朝兩百多年，中國未得統一。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則是五胡亂華，在這兩百多年的混亂中，處在當時人，不是很好受的。我們今天處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由民國以來，至今不過六十多年，這六十幾年的不上軌道、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在歷史上看來，並不算一回事。所以大家處在這個時代中，應該有絕對地貞定的信念，這種不正常的現象總是會過去的。

從南北朝到隋唐，佛教不但被吸收進來，而且被中國人消化了，這等於消化另一個文化系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長期的吸收、消化中，佛教幾乎成了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充實了我們文化生命的內容。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事實；至於進一步衡量這個作用的價值、利弊，則屬另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暫不討論。

文化生命不可摧殘

從魏晉開始，乃中國文化的歧出。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又一村」即指的是此一歧出的階段——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到了唐末五代，這也是中國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五代不過佔五十多年，卻有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每個做皇帝的，原先都想萬世一系地往下傳，而今每個朝代卻至多不過十幾年，可見五代這段時期是個差勁的時代，更重要的是這個

時代的人喪盡了廉恥。所以，一個民族糟蹋文化生命，同時就牽連著糟蹋民族生命。什麼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這裡所表現的即是人無廉恥。五代人無廉恥，代表人物即是馮道，[亦如今日大陸上有所謂的「四大不要臉」，其中領銜的即是郭沫若與馮友蘭。]你想，誰願意不要臉呢？誰能沒有一點廉恥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難道就自甘下賤嗎？但是，五代這個局面就把人糟蹋得無廉恥。[大陸上，黃帝的子孫，那能沒有廉恥之心呢？為什麼能夠出現「四大不要臉」呢？難道說郭沫若、馮友蘭就願意不要臉嗎？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才使得人無廉恥。這「四大不要臉」不過是因為他們較有名氣，易受注意，而特別舉出來。事實上，豈止這四個人而已，一般人誰敢有廉恥之心呢？共黨在內部批鬥時，常以「風派」抨擊他人；其實，那一個人不是風派呢？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今天鄧小平要現代化，誰敢說不現代化？以前毛澤東要文化大革命，誰又敢說不文革？誰敢出來說句反面的話呢？他們還對那些投機的人名之曰風派，事實上，那個不投機呢？這句話在自由世界說，是有意義的，在那個極權的世界說，是沒有意義的。有的人聽了這些話，還以為共產黨在講氣節、講廉恥。「氣節」、「廉恥」，在自由世界的人才資格說，這些名詞也才有意義，在那個專制暴虐的政權下，說這些話都是沒有意義的，完全不能表意的。又如說共產黨以前在海外宣傳大陸沒有失業，而謂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沒有失業，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則到處有失業問題。頭腦簡單的人聽了，還誤生幻想，以為不錯。其實，這祇是耍文字語言的魔術，專門騙那些頭腦簡單的人。試問，你有不失業的自由嗎？你有不工作的自由嗎？在自由世界，才有失業、不失業的分別，才可說有氣節、講廉恥。因為人們有自由，法律上保障人的獨立人格，承認人的尊嚴。有了自由，人即須負責任。再深一層說，人有道德意志、自由意志，才能談有氣節、有廉恥的問題。在大陸上，誰敢說我有自由意志呢？所以，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

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地摧殘、斲喪人的廉恥。孟子說的好：「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然而，說是這樣說，現實上人到了生死關頭，誰不害怕呢？要承認人有自由意志，才能表現「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假定人沒有自由意志，連這句話都不能表現。你想死，我還不讓你死呢！以前的人可以出家，今天在大陸上，往那裡出家呢？以前的人可以不作官，今天連不作官的自由也沒有了。你沒有不參加政治的自由，你沒有不參加人民公社的自由，你也沒有不接受政治洗腦的自由。在那種統治下，人喪失了自由，想要「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你都做不到。

中華民族發展到今天，大陸的同胞被共產黨圈在人民公社，不能講廉恥，不能講氣節。這個就是作賤人的生命，作賤文化生命，同時亦即作賤我們這個民族生命。這個生命被繼續作賤下去，是個很可悲的現象。問題即在於共產黨能夠作賤到什麼一個程度？人性究竟還有沒有甦醒的一天？人性能否覺悟，而發出力量把共產主義衝垮？有沒有這麼一天呢？我個人對此一問題，不表悲觀，但也不表樂觀，我希望大家注意到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需要隨時警覺。說起來，「人之初，性本善」，在太平年間這樣說是很容易的，若是現實上沒有表現出善，我就通過教育等方法使你容易表現；但是這句話在今天這個時代，就不那麼容易。不過，我相信人性總有復甦的一天，至於拉到多麼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就很難說。]我說這個意思，就是要加重這個觀念——文化生命不能隨意摧殘，摧殘文化生命，同時就影響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能摧殘太甚，一個民族是經不起這樣摧殘的。就好像一個人得些小病是無所謂的，生長中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大病就不能多患。又如一個人的命運不能太苦，人受點挫折、受點艱難困苦，是好的，但是挫折太多、苦太重，就會影響人的生命。

3. 儒家第二階段的發展

上面說到唐末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暗的一個時期，其黑暗之所以為黑暗的原因，即在於無廉恥。說這層意思，也是要大家了解下一個階段——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是儒家學術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對著前一個

時期的歧出而轉回到儒家的主流。理學本質的意義即在喚醒人的道德意識。何以宋人出來講學，特別重道德意識這個觀念呢？

自清朝以後，以至於民國以來，提到理學家，一般人就頭疼，如同孫悟空聽到金箍咒一樣。誰敢做理學家呢？可是祇因為自己做不到，就用種種譏諷的字眼來醜詆、笑罵，這是清末以至於今的一個可怪的風氣。其實，道德意識有什麼毛病呢？宋明理學家主要就是要喚醒道德意識，這又有什麼不對呢？有什麼可以譏笑的呢？宋明理學家之所以重視道德意識，主要即因他那個社會背景、時代背景就是唐末五代的那個「無廉恥」。人到了無廉恥的地步，人的尊嚴亦復喪盡，這就成了個嚴重問題。亦即所謂文化生命沒有了，就影響到你的自然生命。這句話，大家聽起來似乎覺得有些因果顛倒。其實不然。一般人說民族生命、自然生命沒有了，就影響文化生命；我現在倒過來說，文化生命摧殘得太厲害，你的自然生命也沒有了，一樣的受影響。[抗戰以前，共產黨在江西盤據了一段時間，等到剿共把他們驅逐出去以後，這些地區好幾年不能復興，即是被共匪摧殘得太慘。所以，]一個地方窮，不要緊，祇要有人去努力開墾，明天就富了；若是把人的生命糟蹋了，沒有人種田，則成了嚴重問題。

我舉這個例子，即說明文化生命摧殘太甚，自然生命也不會健康旺盛。[所以今天大陸上，共產黨摧殘文化生命，使人成為白痴、成為無廉恥，究竟將來影響到什麼程度，就很難說。想起來，這是個很可怕的現象。一個不正常、變態的暴力，若想把它恢復過來，並不容易。甚至到最後，他們本身亦不會覺悟，有個結果，就是發瘋。在過去也有這種經驗，老輩的人說過，當年太平天國洪秀全、楊秀清等人打到南京，本來就己不正常了，但他還有戰鬥力，還是不好對付，殘暴地用兒童做衝鋒隊，這和共產黨用人海戰術一樣地可惡。到了太平天國覆亡後，轉成捻匪，結果那些殘眾都發瘋。當年聽老輩談這些事，心中就有非常多的感觸。一個太平天國鬧了一下，就糟蹋中華民族如此之甚，而今共產黨統治大陸同胞、黃帝的子孫，以那種方式來統治，統治那麼久，對中華民族生命的摧殘當然更甚。這不是個大悲劇嗎？聖人說要悲天憫人，這才是可悲可憫的事。]所以，廉恥不可喪

盡，不可任意地斷喪。人的生命不可完全感性化、完全形軀化、完全軀殼化。完全感性化、完全軀殼化，就是老子所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人的生命不能完全感性化，即表示隨時需要文化生命來提住。代表文化生命的廉恥、道德意識，更不可一筆抹煞，不可過於輕忽。所以理學家出來，儘量弘揚儒家，對治唐末五代無廉恥而講儒家的學問。至此，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長時期的歧出，中國文化再回到它本身，歸其本位；而轉回來的重點則落在道德意識上。

儒家的學問原來講的是「內聖外王」，宋明儒則特重「內聖」這一面，亦即強調道德意識，講求道德意識、自我意識的自我體現。「內聖」是個老名詞，用現代的話說，即是內在於每一個人都要通過道德的實踐做聖賢的功夫。說到聖賢，一般人感覺高不可攀，甚至心生畏懼；實則道德實踐的目標即是要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做聖賢的功夫實即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人品，這是很平易近人的，沒有什麼可怕。我們對「內聖」一詞作一確定的了解，即是落在個人身上，每一個人都要通過道德的實踐，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這一方面就是理學家講學的重心。可是儒家原先還有「外王」的一面，這是落實在政治上行王道之事。內聖、外王原是儒家的全體大用、全幅規模，《大學》中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即同時包括了內聖外王；理學家偏重於內聖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夠，至少弘揚不夠。這並不是說理學家根本沒有外王、或根本不重視外王，實則他們亦照顧到外王，祇是不夠罷了。

我們今天說宋明儒雖亦照顧到外王而不夠，這個「不夠」，是我們在這個時代「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在當時，理學家那個時代背景下，他們是否一定覺得不夠呢？這就很難說。固然理學家特別重視內聖的一面，然他特別重視於此，總有其道理；在他們那個時代中，或許他們亦不以爲這種偏重是不夠的。外王方面，在那種社會狀況、政治形態下，也祇好如此，不能再過份的要求。我們得反省一下，外王方面開不出來，是否屬於理學家的責任呢？事實上，政權並不在理學家的手中，他如何能負這個責任呢？政權是皇帝打來的，這個地方是不能動的，等到昏庸的皇帝把國家弄亡了，卻把這個責任推給朱夫子，朱夫子

那能承受得起呢？去埋怨王陽明，王陽明那能擔當得起呢？所以，批評理學家外王面不夠，這個夠不夠的批評是否有意義，也得考慮一下。在那個時代，那種政治形態下，也祇好這樣往前進了。外王方面夠不夠，不是理學家所能完全決定的；不是他能完全決定的，也就表示不是他能完全負這個責任的。我們把這個責任推到理學家的身上，這是「君子責賢者備」的批評，這是高看、高抬知識份子，這也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說的：祇有知識份子才有資格責備知識份子，祇有王船山、顧亭林才有資格責備王陽明。祇有在這層意義下，我們才能責備理學家，謂之講學偏重之過，不應祇空談心性，仍應注重外王、事功。這還是在講學問之風向的問題上說的。

4. 儒家的當前使命——開新外王

以現在的觀點衡之，中國文化整個看起來，外王面皆不夠。就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來看，以今日的眼光衡之，確實在外面不夠，顧亭林那些人的要求外王、事功，也是對的。今天仍然有這個要求。可歎的是，今天不僅外王面不夠，內聖面亦不夠，儒家本身若有若無。但是儒家若為常道，則人類的良心不能讓這個常道永遠埋沒下去，這得訴諸每個人的一念自覺。

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新外王」是什麼意義呢？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則以夏商周三代的王為標準。照儒家說來，三代的王道並非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境界乃是堯舜二帝禪讓、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儒家的政治理想乃以帝、王、霸為次序。帝指堯、舜，堯舜是否真如儒家所言，吾人不必論之，但此代表了儒家的理想則無疑，以堯舜表現、寄託大同理想。三代則屬小康之王道。春秋時代的五霸則屬霸道，以齊桓公、晉文公為代表。從前論政治，即言皇天帝霸之學。齊桓、晉文的境界雖然不高，但比得秦漢以後的君主專制要好；君主專制以打天下為取得政權的方法，在層次上是很低的。當初商鞅見秦孝公，先論三皇五帝之學，孝公不能入耳；而後言王道，仍嫌迂闊；最後言霸道，乃大喜。可見前人對於政治理想是有一定的次序。秦孝公

之喜霸道，乃因它能立竿見影，馬上見效，而儒家的學問往往不能滿足這一方面外王、事功的要求。早在春秋戰國，即有墨家因此而批評儒家，祇承認儒家維持教化的責任。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亦批評儒家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後來南宋陳同甫與朱子爭辯，亦是基於要求外王、要求事功的精神。而實際上，要求外王中，就涵著要求事功的精神。陳同甫以為事功須賴英雄，而講英雄主義，重視英雄生命，推崇漢高祖、唐太宗。到了明末，顧亭林責備王學無用，亦是秉持事功的觀念而發。而後有顏李學派的徹底實用主義。

一般人斥儒家之無用、迂闊，評之曰：「無事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以為不究事功者最高境界亦不過是此一無奈的結局。這些都是同一個要求事功的意識貫穿下來的，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老傳統，在中國文化中是一條與儒家平行的暗流，從墨子開始，一直批評儒家的不足。這個要求事功的傳統再轉而為清朝乾嘉年間的考據之學，則屬要求事功觀念的「轉型」。乾嘉年間的考據之學以漢學為號召，自居為「樸學」，以此為實用之學，以理學為空談、無用，骨子裡還是以有用、無用的事功觀念為背景。

何以謂「樸學」為要求事功觀念的「轉型」呢？因為他們雖然批理學無用，而其本身實際上開不出事功來，這些考據書生沒有一個能比得上陸象山、朱夫子、王陽明；這些理學家都有才幹，都會做事，祇是不掌權而已。然而考據家假「樸學」之名，批評理學無用，背後的意識仍是有用、無用，即可謂之乃事功觀念的轉型。事實上，這種轉型更是無用，故實非事功精神之本義。由此轉而到民國以來，胡適之先生所談的實用主義，以科學的方法講新考據，實仍屬此一傳統，背後仍是要求有用、斥責無用。我們可以看出，儒家這條主流，旁邊有條暗流，這條暗流一直批評儒家無用而正面要求事功，這個傳統從墨子說起，一直說到胡適之所倡的新考據的學風，可謂源遠流長。但是這裡有個根本的錯解，若是真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據內聖之學往前進，才有可能；祇有根據墨子，實講不出事功，依陳同甫的英雄主義亦開不出真事功。希望大家在這裡要分辨清楚。

中國人傳統的風氣，尤其是知識份子，不欣賞事功的精神，乃是反映中華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強，而事

功的精神不夠。事功的精神是個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實，無甚精彩出奇。蕭何即屬事功的精神，劉邦、張良皆非事功的精神，可是中國人欣賞的就是後者。蕭何的功勞很大，所謂「關中事業蕭丞相」，但因其屬事功精神，顯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賞。漢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劉晏皆為財政專家，屬事功精神，然而中國人對這一類人，在人格的品鑑上總不覺有趣味。事功的精神在中國一直沒有被正視，也沒有從學問的立場上予以正視、證成。中國人喜歡英雄，打天下、縱橫捭闔，皆能使人擊節稱賞。[由於中國人在性格上有這種傾向，所以毛澤東才能投這個機，就是因為他不守規矩、亂七八糟，而帶有浪漫的性格。]再高一層，中國人欣賞聖賢人物，不論是儒家式的或道家式的。中國人的文化生命正視於聖賢、英雄，在此狀態下，事功的精神是開不出來的。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這種精神卑之無甚高論，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業樂群，做事仔細精密、步步紮實。英美民族是個事功精神的民族，歐陸的德國則表現悲劇英雄的性格，瞧不起英美民族，但是兩次大戰戰勝的卻是這些卑之無甚高論的英美民族。所以這種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視的。

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在某一方面就是缺乏這種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英雄祇能打天下，打天下不是個事功的精神，故不能辦事，聖賢的境界則太高，亦不能辦事。而中國人欣賞的就是這兩種人，所以事功的精神萎縮，這裡沒有一個學問來正視它、證成它、開出它。所以現在我們想要從儒家的立場來正視它。儒家最高的境界是聖賢，聖賢乃是通過一步步老老實實地做道德實踐、道德修養的工夫而達到的。儒家的立場是重視豪傑而不重視英雄，故從不高看漢高祖、唐太宗，故順著儒家理性主義的發展，在做事方面並不欣賞英雄，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一個很好的消息。

但是在以前那種狀況下，儒家的理性主義既不能贊成英雄，故其理性主義在政治上亦無法表現。儒家的理性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現。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事實上，中國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祇有在民主政治的形態下，才能夠充分的實現，才能夠充分的被正視。在古老的政治形態，社會形態下，瞧不起事功，故而亦無法充分實現。這種事功的精神要

充分地使之實現，而且在精神上、學問上能充分地證成之，使它有根據，則必得靠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出現，事功才能出現。若永遠在打天下取得政權的方式中，中國的事功亦祇能永停在老的形態中，而無法向前開展。這句話請諸位深長思之。

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義，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義、形式條件，事功得靠此解決，此處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而民主政治即為理性主義所涵蘊，在民主政治下行事功，這也是理性主義的正當表現，這是儒家自內在要求所透顯的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科學，科學是就「新外王」的材質條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內容。科學的精神即是個事功的精神，科學亦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英雄不能做科學家，聖人則超過科學家，故亦不能做科學家。天天講王陽明、講良知，是講不出科學的，因為良知不是成功科學知識的一個認知機能。然而科學亦可與儒家的理性主義相配合，科學乃是與事功精神相應的理性主義之表現。科學亦為儒家的內在目的所要求者，儒家並不反對知識，在以前的社會中，那些老知識也就足夠應付了，然而今天的社會進步，往前發展、要求新知，亦屬應當的要求。儒家內在的目的即要求科學，這個要求是發自於其內在的目的。何以見得呢？講良知、講道德，乃重在存心、動機之善，然有一好的動機卻無知識，則此道德上好的動機亦無法表達出來。所以，良知、道德的動機在本質上實即要求知識作為傳達的一種工具。例如見人重病哀號，有好心救之，然卻束手無策，空有存心何用？要有辦法，就得有知識。所以有人說西醫中發明麻醉藥者為大菩薩，菩薩講慈悲，然若祇是空講慈悲，又有何用？發明麻醉藥，使人減少多少痛苦，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薩嗎？所以，不論佛教表現慈悲、或是儒家表現道德動機，要想貫徹其內在的目的，都得要求科學、肯定科學。

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中的材質條件才能充分實現。否則，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條件而孤離地講中性的科學，亦不足稱為真正的現代化。一般人祇從科技的層面去了解現代化，殊不知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的關鍵不在科學，而是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攝的自由、平等、人權運動，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之所在。[共產黨亦可講科學，然而他的極權專制卻是

最落伍的。我們在此要爭取先聲。幾十年來，共產黨罵人反動、不革命，事實上，這些批評都是虛妄的倒打一耙。我們在此要把頭抬起來，要肯認我們這裡才是理想所在，才是進步，才是現代化，這裡才是真革命，一革永革，不像你那邊革了又革，不斷地革，而結果是毫無結果。我們要認清共產黨才是最頑固、最殘暴、最落伍、最反動的。他能代表個什麼理想呢？他那能有什麼現代化呢？所以不要被共產黨耍弄的一些名詞迷惑。]假如在這時代，儒家還要繼續發展，擔負他的使命，那麼，重點即在於本其內在的目的，要求科學的出現，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現——要求現代化，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化。

5. 『中國文化』一詞的恰當意義

上面所談的，乃是儒家的發展及其當前使命，接下來，我們所要談的主題也與此類似，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範圍也稍廣些。就是討論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在討論之前，我們先得對「中國文化」這一個名詞有較明確的了解。上面談過，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以儒家為主，因此，我認為所謂「中國文化」即是以儒家為主流所決定的一個文化方向、文化形態。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這裡提到的中國文化，並不是指以往隨著各時代所表現的那些文化現象、文化業績的一個總集、總和。以往過去的各時代各階段的文化業績以及各時代的風氣、風俗習慣、所表現的種種現象，事實上已經一逝不可復返了。我們不能夠祇是懷念過去，抱著「數家珍」的心理。當然，「數家珍」亦非完全沒有意義、價值，但是我們今天所講則不在此。平常的講法容易將中國文化靜態化，靜態化而把中國文化推到過去某一個階段所表現的那一大堆，這樣想，即容易流於祇留戀過去。然而過去再怎麼好，對現在亦無甚幫助，這樣講中國文化沒多大意義，而且如此亦無法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例如，若問清朝那些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在現代有何意義，討論起來甚麻煩，亦屬不相干的問題。又如問納蘭性德的詞在現代有何意義，雖非必不可討論，但無甚意義，亦不相干。如此討論下去，無窮無

盡，繁複瑣碎不堪，實無甚價值。有些學者討論問題即落在此一方向，常說中國人以前如何，西方人又如何，以此宣揚過去文化的業績，這是在講歷史、數家珍。但對眼前的時代當作一個問題來看時，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些說法是不中肯的，對將來毫無交代。

許多外國人來中國，亦採此種錯誤的態度，而要來台灣「尋找」中國文化。看看臺北的高樓大廈和紐約的似乎也差不多，中國文化在那裡呢？於是中國朋友就帶他們去故宮博物院看古董，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國劇。事實上，文化怎能是件具體的東西，而放在那裡讓人尋找的呢？以這種「考古」的態度來「尋找」中國文化是不對的。他們來此尋找中國文化，就如同去埃及看金字塔一般，希望找到個中國的「金字塔」來代表中國文化。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文化是個活的文化，還要繼續生長的，那能視同於埃及的死文化呢？西方人這樣看，因其有優越感，中國人則不應該有此態度，隨順著西方人考古的態度而跟著轉，這是相當不利於我們的。西方人亦重視「漢學」，然而他們卻是以研究古董的態度來看「漢學」，在這種態度下，「漢學」這個名詞亦包藏了不利於中國文化的輕視心理。可是有些中國人卻以西方人的態度為標準，甚至說世界上祇有兩個半漢學家，而我們中國人祇佔了半個，這是非常可惡的洋奴心理。所以，我們中國人在此一定要肯定住自己本身的存在價值，絕不能不自覺地順著這些怪現象往下滾。

我們不能採西方人考古的態度，亦不能採取以往那種「數家珍」的態度，然則我們當以何種態度來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呢？

「中國文化」乃是以儒家作主流所決定的那個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文化生命的形態，所以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也即是在講這個文化生命的方向與形態的現代意義、現代使命。生命是一條流，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過去、現在、未來是一條連續的流，依此，我們才能談這個問題。我們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代傳下來的，不是那些業績，而是創造這些文化業績的那個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它的形態。

形態即指這個文化生命以什麼方式、什麼姿態、什麼樣式來表現。這個樣式、這個姿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表現了，盡了它的使命；在兩漢四百年亦表現

了，盡了它的使命；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它也表現了，也盡了它的使命；在宋明的階段亦復如此；在清朝三百年又以某種姿態出現。這一條生命流在這兩千多年來的表現，都是彎彎曲曲的，當然其中有正有邪，有向上有向下。雖是曲曲折折的，但總是一條生命流往前進；祇有從這個角度看，才能講這個生命的現代意義，亦即它在這個時代當該做些什麼事情、當該如何表現？這個問題當該如此來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是個死的，而是個現在還活著的生命，還需要奮鬥、要自己作主往前進。若是把我們的文化限在過去，而祇劃定為考古的範圍，直成了死的古董，這樣不是把中國文化看成活的文化，而是視之為死的文化。若是到處去「尋找」、「發現」中國文化，這種態度根本上即是錯誤的，骨子裡即是認為中國文化是死的、現在已不存在了。我們是個活的生命，我們生在現在，有現在的一個奮鬥的方向，也應該有現代的表現，那能以找古董的方式來找中國文化的代表呢？這個態度本身即是個輕視中國文化的態度，是相當不友善的。想要了解中國文化，即應和中國人接近，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地談天、如何地交朋友。若是到處參觀，走馬看花，那能了解中國文化？孔子、論語也不能看成古董，他還是個生命，是現在還活著的生命、智慧，絕不可把他當作古董而看死了。

6. 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開出對列之局

我們了解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流所決定的生命方向後，即可順著上面所講的儒家當前之使命來看這一個生命方向在現代應該以那種姿態來表現。

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亦即其本身的現代化，首先即是要求新外王。王道有其具體的內容，而不祇是籠統地說仁義道德。黃梨洲曾云：「三代以上，藏天下於天下；三代以下，藏天下於筐篋。」這是一句原則性的話，不是籠統浮泛地說的，而是相當的深刻，且有真切感。這句話在今天看來，仍然有意義，而且意義更為顯明。「三代以上，藏天下於天下」，以今天的話說，即是個「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三代以下，藏天下於筐篋」，即是家天下，以天下為個人的私產，[這種情形在以往的君主專制下，還沒有今天共產黨做得那麼絕，共產黨算是做到家了。以

往中國人的理想是「藏富於民」，而共產黨倒反過來把天下的財富集其一身，形成新階級；共產黨可說是家天下的極端，以前是要求藏富於民，現在則成了「藏富於幹部」。]黃梨洲又云：「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有法度，這個法乃是保障「藏天下於天下」，這種法治是多麼的深刻，這才是真正的法治，法家所講的法比起來是差遠了。三代以下沒有真正的法度，有的祇是皇帝個人的私法，[就好像毛澤東私定的法律]。

民主政治能夠表現一些「藏天下於天下」的理想。儒家學術最內部的要求亦一向在於此，但是從未在現實上出現，而今天之現代化亦主要在要求此一理想的出現。此亦即是儒家當前使命所要求的「新外王」。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形式條件，事功在此形式條件的保障下能充分實現，民主政治下才有事功，才能讓你做事；除此之外，還需要科學知識作為新外王的「材質條件」。新外王要求藏天下於天下、開放的社會、民主政治、事功的保障、科學知識，這就是現代化。中國文化發展至今，仍是個活生生的文化，我們不可委順西方人輕視的態度而把自己的文化當成一個被西人研究的古董，我們是個生命存在，仍得往前進、往前奮鬥，在我們前面有不斷來臨的問題有待我們解決，怎能採取那種看古董的態度來了解中國文化呢？我們要自己做主，要繼續生存下去，現代化是我們必得做的事。現代化雖發自西方，但是祇要它一旦出現，它就沒有地方性，祇要它是個真理，它就有普遍性，祇要有普遍性，任何一個民族都當該承認它。

中國的老名詞是王道、藏天下於天下，新名詞則是開放的社會、民主政治，所以，這是個共同理想。故而民主政治雖發自西方，但我們也應該根據我們生命的要求，把它實現出來，這就是新外王的中心工作。

對於這個觀念，當年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時，非常清楚。以後漸漸變形、模糊，而被人忘掉了。當然，這與現實政治曲曲折折的影響有關，我們現在也不必去深究其原因。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即是嚮往這個民主政治，所以孫先生雖出任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在正式選舉時，卻能讓給袁世凱，這就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這個第一步是從現實上的實

行來說是第一步，然而這卻是儒家早已要求的理想。這種王道，黃梨洲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正面喊出的口號即是要求科學與民主，當時是抓住了現代化的關鍵所在；當時除此正面的要求外，反面的口號則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可是後來的發展，一直到今天大陸上的情況，科學也沒出來，民主政治也未實現。享受科學技術的現成的成就，大家都很高興，可是要腳踏實地去了解科學、研究科學，則少有人肯為之。正面的兩個口號沒有發生作用，倒是反面的兩個口號發生了作用。

「反帝國主義」，大家容易了解，因為身受其苦，對它有清楚的觀念。至於「反封建」，大家對於這個名詞似乎都有些觀念，但卻不清楚，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反封建」倒成了個象徵的意義，象徵些什麼、代表些什麼？也很難說。實則這個名詞，不論從中國或西方歷史看來，都祇是個借用的名詞。照西方來說，封建是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各地方民族退而求自保的時代。倘若「反封建」是反這個封建，那麼羅馬帝國未崩潰之前，即不能算是封建；封建時代以後至於今，亦不算封建。那麼你反的又是什麼呢？難道是反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那個散落的狀態嗎？照中國講，封建是西周三百年周天子的封侯建國，作用乃是集體開墾，充實封地，以「拱」周室；封建在這裡帶有積極的意義，與西方的恰相反。然而中國自秦漢以後即無封建，那麼你反封建是反什麼呢？難道是反西周三百年嗎？我們在此可以看出，「反封建」並沒有一個清楚而確定的意義。其實，它祇是一個籠統的象徵的觀念，實即反對一切「老的方式」，而以「封建」一詞代表之、概括之。當時的反封建就是反對過去那些老的方式，而認為五四以前都屬於過去的、老的方式。

然而，什麼是「老的方式」呢？「老的方式」的內容是什麼呢？所要求的「新的方式」又是什麼呢？二者之間的對照與本質的差異點又在那裡呢？

我們把新的方式、現代化的內容列舉出來，即是民主政治、事功、科學等。這一套即是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後所創造出的近代文明，整個這一套內容中間有個共同的基本精神，我們可以用一個名詞來說明，即是「Co-ordination」，可以翻譯作「對列之局」，這就

是現代化最本質的意義。我們也可以用《大學》所嚮往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絜矩之道」來說明「對列之局」：絜者合也，矩即指方形，絜矩之道即是要求合成一個方形，這樣才能平天下。亦可用易經的「保合太和乃利貞」來說明，保合即是合作而成一個絜矩之道，如此方能成個大諧和（太和）。若必欲比他人高，去征服而使他人隸屬於我，即不能成「絜矩」，天下亦不能平。現在這個時代，從希特勒[、史達林，以至於毛澤東]，都想把自己「首出庶物」，把一切東西隸屬於自己，這樣天下永不能平，這是個很顯明的道理。交朋友亦是如此，「與朋友交，久而敬之」。若不尊重對方，這朋友交不下去。尊重對方，即是成兩端，兩兩相對，此即是個「對列的格局」。唯有成個絜矩之道、對列之局，天下才能平，若是一味講帝國主義的征服，是絕對不能平天下的。

7.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轉理性的作用表現而為理性的架構表現

西方經過大憲章的奮鬥，一直奮鬥到今天，英美所表現的現代化的精神，即是在爭這個對列之局。社會上不容許有特權的存在，所以說自由、平等，講人權運動即是重視個體。每一個個體都是頂天立地的，在社會上都是一個單位，你也是個單位，我也是個單位，我怎能隸屬、臣服於你呢？一隸屬、一臣服，即不成對列之局了。現代化主要即是要求對列之局。西方要求現代化是通過階級鬥爭而出現的。階級在西方的歷史中原是有的，所謂四階級：僧侶階級、貴族階級、第三階級（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第四階級（普羅里塔里亞——無產階級）。馬克斯所了解的不屬此類，他所利用的乃是埃及法老政治的路線，不是西方自希臘以來正面要求自由、平等、博愛的階級鬥爭。社會上有不平，當然要鬥爭，然而先得問為什麼而鬥爭，當該是為理想而鬥爭，不能說是為了形成「新階級」而鬥爭；為了報復，卻不是為了理想而革命，這是 [共產黨革命] 的根本錯解。

中國的階級分野不顯明，自春秋戰國的貴族政治崩潰以後，君主專制的形態在政治上雖不合理想，但是下面的社會卻沒有階級；隨著王朝的更替，固然有些特殊的勢力，但是不能成爲一個固定的階級，所以

會有「公侯將相本無種」這種話。中國的社會，基本上是屬於士農工商並列的形態，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話，即是「職業殊途，倫理本位」。士農工商祇是職業的不同，不可視為階級。

同是要求現代化，西方與中國的源泉不同；西方是根據階級鬥爭而來，中國社會則祇是「職業殊途，倫理本位」階級的分野不清楚。中國以前取得政權的方式是靠打天下而來的，政治的泉源是非理性的、是皇帝打來的，旁人不能過問，所能過問的祇是第二義以下的。除了政權來源這一方面不能觸及之外，中國以往在其他方面是非常自由、平等，我們可以說，中國以前祇有「治權的民主」，而沒有「政權的民主」。從考進士、科甲取士等處，即可見治權是很民主的。但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在「政權的民主」上表現的，唯有政權民主，治權的民主才能真正保障得住。以往沒有政權的民主，故而治權的民主亦無保障，祇有靠「聖君賢相」的出現。然而這種有賴於好皇帝、好宰相出現的情形是不可靠的，所以中國以前理性的表現祇是在作用上表現。在此雖是相當的民主、自由，然因政權不民主，此處的民主亦無真保障，所以還是得要求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不能模仿西方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這是因為社會背景、歷史背景不同。民主政治的實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方亦是經過長期的奮鬥而後才達成這個政治的現代化，這是很可寶貴的。西方的社會原有階級的存在，社會中有些不同的力量、有些中流砥柱在那裡撐著，這樣的社會容易成個絜矩之道，容易構成對列之局。階級並不一定就是壞的意思，照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階級是從民族的生命中發出，在文化中有其作用的。（印度的階級則是死的，不能起作用。）中國自秦漢以後，把階級打散了，社會上沒有既成的力量，不容易成個對列之局。下面愈散漫，上面愈容易形成極權專制，當年孫中山先生亦感覺到這個問題，說中國人的自由太多了，如一盤散沙〔此嚴格講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們要肯定社會的力量，此即是要成個絜矩之道，對極權專制有個限制，不能讓他隨意揮灑。西方自大憲章以來，就是爭這個東西。中國本來早已有治權的民主，但是因為政權不民主，則此一民主亦不可靠，所以我們現在再順著這個基礎往前推進一步，要求政

權的民主，把理性的作用表現轉成理性的架構表現，亦即轉成對列之局的表現。這才是中國現代化的正當途徑，不可拿西方階級鬥爭的格式硬套在我們身上。

西方的政治現代化是靠著自然的歷史、社會作其憑藉而摩盪出來的，然而還是得經過長期的鬥爭。我們的社會沒有階級，歷史背景、社會背景和西方不同，所以出現這個東西非常困難〔否則共產黨也出不來。共產黨是徹底反對這個東西的，他們是最反動的，他們要求的祇是科技的現代化，而不是政治的現代化〕。這條路是很難走的，然而我們非得往此走，再困難也得走，〔不能像共產黨一樣虛妄地跨過去；〕如此，即得靠文化的力量、思想的自覺。所以，知識份子思想上的自覺是很重要的，依此而發動文化的力量、教育的力量來創造這個東西；這就是我們現代化的道路。

可是，民國以來的知識份子，在這方面的思想自覺是很不夠的，〔否則，共產黨那能得逞呢？〕這裡需要很大的「克己復禮」。在此沒有很高的境界，卑之無甚高論，就談玄理說是不過癮的。但是我們就需要這個東西，所以要靠大家的自覺。〔平常大家也不聽這些，尤其新文化運動以後，社會上流行的都是社會主義的意識，自由、民主倒成了令人討厭的庸俗名詞，更被共產黨醜詆為小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我們今天遭受到共產黨這個挫折，從三十八年撤退到臺灣，就是要徹底正視這個切身的問題，此即「民主建國」、「政治現代化」的工作。〕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是「對列之局」（Coordination），而所謂反封建，即是反老的那一套。老的方式即是理性的作用所表現的方式，基本上亦可用「Sub-ordination」這一個名詞來代表，亦即是個「隸屬」的方式。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表現，一方面覺得也還不錯，「職業殊途，倫理本位」、治權民主，在這個制度的安排下，大體不錯，亦有相當的合理性，所以我們說中國早有了理性的作用表現；當然，一般人的表現有過與不及的地方，總是不可免的，那是另一回事。然而，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常感到中國文化的不夠，這個不夠的關鍵即在政權不民主，亦即缺乏理性的架構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整個文化在現實上的表現，大體上呈現的即是個「Sub-ordination」的形態。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東方世界祇知道一個人是

自由的。這一個人即是皇帝，[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毛澤東，他可以隨便講話，可以在房間中放線裝書、看紅樓夢，一般人民卻不行。]以前的宰相代表治權，然而宰相有多大權力呢？今天要你做宰相，你就做，明天不要你做，把你殺掉，亦無可奈何、毫無辦法。中國傳統政治在現實上的表現，大體是個「隸屬」的方式，不能成個「絜矩之道」。

我們離開這些現實的政治表現，再從文化理想、學術方面來看。中國以往的學術是向上講的，儒釋道三教，講學問都是如此。儒家講成聖賢，道家講成真人、成至人，佛家講成佛、成菩薩，這都是重個人修養的向上發展。在向上發展的方向中，對列之局是出不來的，所以中國人喜歡講「天地萬物一體」、「物我雙忘」。在第一關上，喜歡講「首出庶物」，把自己透出來，「先天而天弗違」。依儒家講，此乃是先見本體，有如禪宗所說的「截斷眾流」、「涵蓋乾坤」。先把主體透出來，這是講聖賢學問、往高處講的一定方式；這是講道德、宗教，不是在講政治，更不是要每個人都做皇帝。可是一般人不了解這個分際、分寸，而說凡講透顯主體者都是在幫助極權專制。所以首先得把問題的分際弄清楚，講道德、宗教不同於講政治，不可相混。而且，依著道德修養而言，「截斷眾流」、「涵蓋乾坤」的透顯主體祇是初步，最高的境界乃是「隨波逐浪」。莊子亦是如此，往上透的時候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但是莊子齊物論的思想並不是[像毛澤東一樣，]要天下人向他一個人看齊，而是天下一切事物一體平鋪，統統擺在那裡，這是個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但是這個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是在道德修養的境界上說的，它是修養的「境界」，不是政治。莊子逍遙遊的「自由」、齊物論的「平等」，乃是超越意義的自由、平等，並非政治意義的自由、平等，二者的層次全然不同。當然，在最高的境界講自由、平等，據此而下，亦不會反對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所以，道家是反共的一個最好的思想。]**從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儒釋道三教怎麼會幫助極權專制呢？這種誤想、聯想太過甚了。

中國人以前的理想在講道德宗教，學術往高處講，依現在的話說，即是「談玄」。我們現在所講的下面這一層，亦即現代化的問題，在以前那種社會裡

並不成個問題；依著它那種形態，在當時是夠了，也有相當的合理性，所以講學的重點不在科學知識，而在講超越科學知識的道德宗教。但由於缺乏這一層，現代人即可責備以往之不足。以往兩千多年是以在道德宗教方面的表現為勝場，它所樹立的固是永恆的價值，但是現在我們知道，祇在這方面表現是不夠的，學術還是要往前開，還是得順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的理想往前開往外王。要求開出下一層來，則學術不能祇往上講，還得往下講。民主政治、科學、事功精神、對列之局的這一層面，卑之無甚高論，境界不高。中國人原本浪漫性格強，欣賞英雄、聖賢，而不欣賞這種商人的事功精神。事功精神是個散文的精神，既不是詩、也不是戲劇，戲劇性不夠，也沒多大趣味。

從哲學來講，事功精神屬於知性的層面，如黑格爾即名之曰散文的知性、或學究的知性。從人生境界來說，事功精神是個中年人的精神，忙於建功立業，名利心重，現實主義的情調強。而我們中國人要現代化，正是自覺地要求這個事功精神，並且得從學術的立場，給予事功精神一個合理的安排、合理的證成。

8. 中國文化主位性的維持

我們以上皆是從時代的觀點來看中國文化這條生命流如何在今日盡它的使命，由此而論其現代意義。然而我們仍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文化，亦即由其本身看，中國文化是否有其本身的主位性？此則不祇是一個應付一時需要的問題，此乃永恆性、高一層次的問題，不是方才所談那些新外王等的時代問題。

假如中國文化還有發展、還有它發展的動源、還有它的文化生命，那麼，我們不能單由民主政治、科學、事功這些地方來看中國文化的問題，而必得往後、往深處看這個文化的動源、文化生命的方向。這是從高一層次來看中國文化如何維持其本身之永恆性的問題，且是個如何維持其本身主位性的問題。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是以儒家作主的一個生命方向與形態，假如這個文化動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住，則其他那些民主、科學等等都是假的，即使現代化了，此中亦無中國文化，亦祇不過是個「殖民地」的身份。所以，中國文化若想最後還能保持得住、還

能往前發展、開無限的未來，祇有維持他自己的主位性；對於這個文化生命動源的主位性，我們要念茲在茲，把他維持住，才算是對得起中國文化。

這個中國文化維持其主位性的問題，在這個時代中，究竟表現在那些方面呢？就是表現在這個文化的主流與其他幾個大教的比較問題上，亦即表現在「判教」的問題上。

判教首先對著基督教而言，其次對佛教而言，其次對道家而言。中國文化以儒家作主，這個文化生命主要的動向、形態是由儒家決定的，在以往幾千年中，道家並不能負這個責任，從印度傳來的佛教亦不能負這個責任。雖說中國人吸收了佛教、消化了佛教，佛教亦對中國文化有所影響，然而它卻始終不能居於主流的地位。主流的地位是在歷史上長期的摩盪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可以隨便拿掉或替代的，亦不是可以隨意放棄的。在這個時代，首先以基督教為判教的主要對象。信仰自由是一回事，這是不能干涉的，然而生為中國人，要自覺地去作一個中國人、存在地去作一個中國人，此則屬於自己抉擇的問題，而不是信仰自由的問題。從自己抉擇的立場看，我們即應念茲在茲，護持住儒家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信仰自由是個人的問題，然而自覺自己是個中國人，要替中國作主，則要作一個存在的抉擇時，我就不作基督徒。當年甘地即曾接到一位傳教牧師的信，質問甘地的精神很合乎基督的精神，為什麼不作基督徒呢？甘地回答說：我已生而為印度人，我信仰的是印度教、婆羅門教；我所做的事，照你說是合乎基督精神，然而我卻是根據婆羅門教的教義而來的，既然婆羅門教能啟發我、指引我，我又何必一定要作基督徒呢？甘地這句話的確值得深思。]我個人並不反對基督教，亦不反對信仰自由，然而，現在每一個中國人在面臨這個問題時，都應該有雙重的身份、雙重的責任。首先，得了解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這個主流是不能放棄的。若是基督教能使你的生活得到安寧，當然很好，我也不反對信仰基督教，但是在這信仰的同時，身為中國的基督徒亦當自覺到自己有雙重的責任，雖然是信仰基督教但也絕不反對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我不反對基督教、天主教，可是我堅決反對他們拿著基督教、天主教來篡奪、改篡中國的文化，更不可把中國歷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

傳統改成耶和華、摩西那一套，[若是這樣子搞下去，這和共產黨把馬、恩、列、史掛在天安門上奉為老祖宗又有什麼兩樣？]

我不像宋明儒那樣關佛，我雖也辨儒佛同異，但並不反對佛教本身的價值，可是我反對以佛教來貶視儒家。以前內學院將孔子列為第七地菩薩，我就反對。佛家最高的是佛，儒家最高的是聖人，聖人與佛都是無限性的位格，為什麼一定要把孔子列為佛家的第七地菩薩呢？這太沒道理。我不反對佛教，已經很客氣了，可是反過來，你卻要貶視儒家，這就不對。為什麼一定要反對聖人之道呢？聖人之道有那裡對不起你呢？這樣還能算是存在的中國人嗎？

現代信基督教的人最怕人說他信的是洋教，而自辯曰宗教是普世的。事實上，上帝是普世的，基督教卻是西方歷史中發展出來的，這怎樣能是普世的？上帝當然是普世的，就好比孔子講道理也不是單對著山東人講，乃是對著全人類講的。這個分際必得弄清楚，才不愧身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一方面不妨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絕不抹煞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有人罵我們這是「本位主義」。然而，本位主義有什麼不對？每一個民族事實上都是本位主義，英國人以英國為本位，美國人以美國為本位，何以獨不許我們中國人以中國為本位呢？若是這叫本位主義，又怎麼能反對呢？

9. 結語

最後，我們做一個總結，來看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所應做的工作。首先，要求現代化先得有現代化的頭腦，每一個概念各歸其自身，每一個概念都有恰當的意義，分際清楚而不混濫，事理明白而不攪和，這就是「正名」的工作。[共產黨就是]利用名不正來攪亂天下，形成「意底牢結」(Ideology)的災害。這種大混亂是要不得的。通過正名的工作，每一個概念有一定的意義，講道理的分際一點不亂，這樣子，我們的生命便得到一個大貞定。假如中國文化還能有貢獻於人類，即是以此為基礎而可能的。

再進一步，和西方文化相摩盪，即是個最高的判教的問題。在此，每一個文化系統皆有其雙重性，一
(下接第 132 頁 左下)



**中國人不知中華
文化真可悲
中共黨史就是消滅
中華文化的歷史**

高思維

編者按：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深沉反思，值得一讀，值得深思……

一、一個中國人不知《中華文化》的精髓實在可悲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在大陸活了一輩子，竟然對《中華文化》的精神體系的孔子《論語》不甚了了，真是可悲得很。

記得小的時候，那還是在日本統治下的東北，當時我入讀的是《洋學堂》，因此不像南方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鄉同齡人，有幸讀到《四書五經》。

但是，當時我家週邊的鄉鎮還有許多中國人辦的私塾小學，那裡總是有一大群小孩子，每天「之呼者也」地背誦《論語》。我雖然很羨慕他們，但家裡希望我去讀日本學校，能夠在日本社會裡混口飯吃。雖然我從幼就知道中國人的祖宗還有個孔老夫子和《論語》；但講些甚麼，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如果說知道一點點，也就是有關忠孝仁愛，修身、齊家、治國等一些膚淺的概念而已。這就是當時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對祖先中華文化僅有的一點知識。雖然我當時是在日本統治下作「亡國奴」，但也還是知道一點孔子的故事。在日本人的小學裡，有一門「修身課」（相當於中共的「政治課」，也還是學了一些有關中國古代聖賢人物的故事。至於他在中華文化中有甚麼地位和價值，與我有甚麼關係，則是不清楚的。當時，關內的人叫中國人。我們不屬於中國人，所以聽孔子，也是

當外國古代故事來聽的。這大概應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悲哀了。

二、不知孔孟之學是中國人的悲哀

一九四五年「8·15」日本投降了，家鄉解放了。蘇軍按史達林旨意，表面上雖與國民黨有同盟條約，但暗中卻支持共產黨。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從那以後，在共產黨的隊伍裡，確實學了不少東西，得了不少鍛煉；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甚麼？孔孟之道是甚麼？也是全然的無知。共產黨傳輸的完全是「馬列」的一套新的「革命學說」，從不談甚麼孔孟之道，便以為這「馬列」才是受苦受難的中國得救的「法寶」，史達林更是我們的大救星，對當時蘇軍還特別有感情：蘇軍是四五年8月22日從日本人手裡解放了我們家鄉，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還熱心地從事了「中蘇友協」的活動，那時我才十六七歲。過去是日本治下的「良民」，家裡大人不敢告訴我們是中國人。但現在是在中共隊伍裡的中國人了，這個中國人不當「亡國奴」了，卻由於中共的啓蒙，對列寧、史達林崇拜的不得了，沒有他們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我們窮人的解放。當時又加勁地學俄語，好像這是為了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所需要。當然，對於中國，就有無窮的不知道的事想知道。於是南征北戰十年後，就在五十年代中期，利用了當時的機會，脫了軍裝，考上了某重點大學的歷史系。大學圖書館有幾十萬冊中外歷史藏書，徹底打開了我的眼界。不是在課堂，而是通過圖書館，總算從頭到尾地知道了古今中外的歷史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在課堂裡中國現代史卻被中共完全歪曲了，最讓書看得多的同學不能接受的是，完全否認了國民黨在抗日中的主力軍作用和巨大犧牲的事實，五七年他們也都被打成右派）當然，這時我也讀了不少古代的經典文獻，對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等等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才有了一些對於「中華文化」的了解。在大學裡，因為手裡有調幹津貼，我基本上把錢都花在買這些古書上，那時線裝書也很多，舊書店裡很多很便宜。但是由於正統教育的潮流影響，並沒有從中學到甚麼有益的思想理念。甚至，很多書還沒有看，就抱著批判的態度。自己是中國人，但對於中華古代文獻，大多是只當作

古漢語文言來欣賞，根本談不上對中華的精神文化遺產有甚麼實質性的發掘，更談不上如何地繼承。作一個中國人，也算是一個歷史系大學生的悲哀。

三、孔孟之學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核心

去年我又通過朋友借來了本地「一貫道」贈閱的《學庸論語》(大學、中庸、論語為三書，再加上《孟子》為《四書五經》中的四書。當時還不知道互聯網裡有大量的先秦諸子百家等古代中國文獻)，再次讀到這些書時，才真正與自己的心靈溝通上了。《論語》是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書，是他的眾弟子根據孔子平日言論而整理出來的中國古代聖賢之言的經典。這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中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遺產。否定了他們，事實上也就否定了「中華文化」的存在。而中共正是在其主要方面否定了他們。這大概將是中共最後必然滅亡的文化根源。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中華文化思想」已根深蒂固地紮根在中國人的靈魂裡，中共妄想用西洋「馬列」來改造中國，消滅「中華文化」真是太不懂得「中華文化」的「偉大」和「深厚」了。其結果必然是處處碰壁，直到最後自我毀滅。歷史正一步步證明了這一點。中共建黨八十年歷史，是一部一步步消滅「中華文化」的歷史，不但大規模地毀滅中華古代文獻，而且迫害和消滅所有的具有中華色彩的精英(老幾代的和隨後新產生的幾代中華精英)

四、孔子思想早已滲入中國(華)人的骨髓

非常明顯，雖然在中國大陸，官方從來不提倡學孔孟的書，而且還經常地批判。但大陸的老百姓們，自有他們自己的傳統教養。在他們的日常用語中，不少名言警句都是來自《論語》等《四書》及《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之中。孔夫子之言，早已是一代一代，從民間口耳相傳深入民心，成為中國人民為人處事的道德倫理規範。如有些常用的口頭語。「君子敬而無失，舉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道聽途說」，「患得患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行，必有我師」，「小不忍則亂大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來之則

安之」，「君子成人之美」等等，以及有關忠孝禮智信等深入民心的名言警句，很多很多都出自《論語》，現代中國人，都是應當「學而時習之」的。當然，書中有糟粕，從孔孟原始言論來看，主要的不是糟粕，而多是後來的統治者，為了有利自己的專制統治而一朝一朝的篡改，甚至走極端造成的。其最初作偽者，就是在西漢初年的丞相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的。之後，一步步使孔學變成「儒教」，成為統治人民的八股、教條和工具。大男子主義、歧視婦女、忠君、奴才意識，以及搞八股、師承(不能超過前人)，還有甚麼「三綱五常」的統治者官家解釋，對自己有用的加以極端，歪曲了孔子最早的一些樸素愛民的思想，變成了封殺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鎖，也就成了中國封建專制黑暗社會延續兩千多年的重要原因。

五、儒家學說不等於孔孟之學

這次再讀孔子的《論語》，使我發現，要發揚「中華文化」的優良精神道德傳統，應當以孔子的原汁原味為依據。後世統治者中的大「知識分子」們，把孔子的說學演變成專對統治者有利的「儒教」，實在是中國文化史的悲劇。發揚「中華文化」，把孔孟之學與儒教相區別，行之不過度，不極端；忠而不愚，孝而有智，禮而有度，有哪一件不適合今日之中華民族呢？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都能從大陸今日人民百姓的「德性」與一九四九年前中國人的道德操守狀況相對比之中，強烈地感覺到，中共對「中華文化」徹底摧殘和破壞的可怕和危害。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的道德普遍墮落，人倫喪盡，真善美與假醜惡的大顛倒，就是中共摧殘孔孟之學，砸亂「中華文化」精髓的主要結果。當然，即使如此，孔孟的中華文化之根並沒有在民心中完全消失，表面沒有不等於心裡沒有。中國人對馬列中共的一次次反叛(所謂自由化也好，反貪反腐敗也好)，實質上，就是一次次中華文化的「復興」，包括近幾年大陸的法輪功、中功等現象。雖然他們並沒有提出「中華文化復興」問題，但他們的頑強不屈，其本質就是在復興中華文化。因為人們已徹底看清了中共馬列毛的欺騙性和對人民的殘忍性，完全失去了中華道統。諾大一個中國，在中華(下接第 141 頁)

自我感覺良好……

《王若望自傳》第三卷

1949—2001

本刊主編前言：

名傳天下的作家王若望先生，雖然已於前年作古，但他作為一個有骨氣、有豪氣、有人氣的真作家，特別是他那種“雖為共產黨所不要、卻決心不要共產黨以至死不變”的錚錚鐵骨，實在使海內外所有的景仰者無不心悅誠服。因為他代表著的，乃是一種敢於直面的勇氣，是一種敢於獻身的真誠，更是一種敢於矢志不渝的追求，這就與那些“得則長袖善舞、失則心魂具落”的“壯夫”、“精英”們，不可同日而語了。

本刊為紀念王若萬先生，特決定將他的未亡人羊子女士為他整理成書的《王若望自傳》第三部於本刊連載，藉以告慰他的英靈，告慰他孤帆天涯的晚歲，以在世態猶為炎涼、人情猶為澆薄的海外，為他，也為我們自己，點燃一支不滅的蠟炬，以磨礪我們理應是“蠟炬成灰淚不干的”心志，象王先生那樣，為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未來，繼續上下而求索。

第一部

進入上海第一程 侵入交通銀行

跟隨解放軍進入上海以前，南下幹部集中在丹陽進行短期培訓。學習解放軍總部的“入城守則”，並將各路英雄按行業和黨、政、文、教等分為十多個支隊，組成接管上海的網路機構，猶如影子內閣那樣的統治班子。我被分派在工會系統，領導人是曾山和劉長勝。這兩人沒在丹陽。劉本是上海地下黨的工運領

袖，早就在上海。曾山在解放軍任華東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任，接管上海時他出任副市長。

當時的南下幹部，都像衣錦榮歸的勝利者；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的統治者，過去曾經遭遇種種磨難和挫折，如今都得到雙倍的報償。我們處在高度激昂的興奮狀態中。我們什麼時候出發，要等解放軍完全攻下上海；目下上海還沒有全部解放，京滬鐵路由丹徒至上海的一段還沒有通車。直至我們乘了專列正式出發了，人人都流露出躍躍欲試的焦急，不間斷地唱起八路軍進行曲之類的歌曲。忽然，火車到了真如站，又停下來，原來浦東一角還在交戰。我們一齊下了車，乘坐十幾輛公共汽車駛向上海鬧市，總覺得未能參與解放上海之戰而遺憾，最後在交通大學的“恭綽樓”安頓下來。直等上海局面完全平定了，恭綽樓的南下幹部各奔前程。我跟朱俊欣、周炳坤等前往指定的交通銀行報到。外灘的交通銀行大廈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金融機構，怎麼會接納工人階級的領導班子呢？

憑著我們有解放軍撐腰，消滅資產階級原是順理成章的革命行動。一反掌之間，交通銀行的招牌撤下，換上了上海總工會的牌子，便把偌大的交通銀行大廈據為己有。雖然街頭張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布告裏，明明寫著“原有政府文教衛生所有人員一律留用；本軍任何人不得進入住宅、商店、寺廟和公共機關等”。

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總工會便佔據了交通銀行大廈，這不是言行不一、明目張膽踐踏自己宣佈的條令和規章嗎？

在丹陽集訓時，就已確定劉長勝出任上海總工會主席。劉是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青年時代他投奔俄國海參威做碼頭工人，組織了當地華工碼頭工會，暗中支援紅軍，劉成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羅斯邊疆黨組織的早期黨員。劉是老資格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工運幹部，暗中支援紅軍奪取政權。他回國後，理所當然地成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席也是從蘇聯回國的李立三)，並兼任上海總工會主席。上海總工會(簡稱“上總”)設三位副主席：沈涵、朱俊欣、湯桂芬。他們都是地下黨領導下的幾個產業工會的工人領袖。沈是電力市政工會，後來發展至英商電車、公交公司以及五金工會的工人領袖。湯是紡織工會的主席。在地下黨時期，上海工人福利會頻頻爆發大罷工，在一次罷工中，僅紡織工廠即有三十萬工人參加，上海工運鬧得轟轟烈烈。

我被分派至文教委任副部長。部長紀康，地下黨時期從事工運的宣傳工作，曾主持出版《生活知識》和《燈塔叢刊》等。我們二人的分工，紀康謙虛地分管內部事物以及“上總”上下左右的協作；我則負責各產業工會和業餘工人夜校。在與紀康共處中，發覺他沈默寡言，說話有點木訥，只是寫文章或作工作報告卻是條理井然。

頭一年不同性質的產業工會便有二十五個，各產業工會配備文教幹部，確定一個時期的宣傳要點等等，都劃歸我的名下。此外，還創辦了“勞動出版社”，組成了《勞動報》，成立了總工會文工團。至今模糊記得，工會業餘夜校即有五百多所。考慮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我自己編了四集《工人識字課本》，交勞動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即發行了十五萬套。非常滑稽的是，在我離開“上總”三年以後的反右鬥爭中，“識字課本”本該算作我的貢獻，竟批判為大毒草，因“識字課本”中有一題為‘勞資合作，發展生產’，定罪為抹殺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性，鼓吹階級調和。這是後話，按下不提。本人正是年富力強、精力最充沛年代，常常有一種創造性的衝動使我勇往直前，攬下了上述種種業務還不滿足，又發明了某些新花樣惹得雞犬不寧。想不到正是新花樣的發明，把自己弄得太突出，引起了一系列的杯葛。



王若望先生和夫人羊子在國內某省文聯的歡迎會上

知己難得

在上總大禮堂作的報告大受歡迎，那次由紀康部長主持大會。講完以後，我就徵求紀康的意見，他幾乎羞答答地說：“台下反應很熱烈，要是我上臺講話就不自然”。在報告結束時，曾宣佈：“我們打算讓這樣的口頭講話，也推廣到產業工會系統去”。結果大小工會紛紛至文教委要求王某前往，弄得應接不暇，難以應付。這證明占大多數的文盲，最歡迎的還是面對面的有聲有色的現身說法。我的口才，當初在西安安吳堡青年訓練班時期講進化論，做到雅俗共賞，那時便贏得了達爾文的美名。如今做報告依然貫穿著進化論思想加社會發展史的內容。報告完了以後，留出時間讓聽眾提問或質疑，基本上做到有問必答，偶爾碰著解答不了的，我則以本人學識有限，十分抱歉敷衍過去。這時候我的日常工作，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出發到各個產業工會做報告了，弄得分身乏術、舌敝唇焦。紀康在部務會議上研究這個問題，得出一個辦法：讓老母雞孵小雞，何不從各個產業工會挑選能說會道的文教幹部，培養出更多的報告員隊伍？沒料想，第一屆的報告員培訓班，其中有英國回來的博士，還有震旦大學的教授，解放以後落魄的著名書法家，等等，大上海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咧！

正當報告熱蒸蒸日上的時節，上總一次黨組會議上，有兩位負責人對王某的個人突出提出了責難。“個人突出”與出風頭是同義詞，據文教委的統計：七十萬工會會員中，已有五十萬人次聽過上總的報告，這一數位本應作為文教委的突出成就吧，但在黨組會上劉長勝主席挖苦我是“小熱昏”！小熱昏者，

即街頭賣梨膏糖唱滑稽者之貶語。另一位部長附和道：“王若望的報告可是代表上海總工會和我們的黨哩”。

這次黨組會我沒參加，碰巧我又在外邊作報告，當紀康以婉轉的口氣透露黨組會對我的批評，我簡直受不了。我賭氣地說：既然領導對我這樣不理解，我何必自討苦吃，頂多不幹就是了。如果真的不幹，各廠預約請我作報告的，還有二十多家，一旦不去了，文教部就會軋扁頭。紀康為難地講了這樣的話：“會上說你的演講不能代表上總，也不代表黨。這種批評不實事求是嘛，誰能保證每一句話都代表黨和上總呢？既然黨組並未作出決定不讓你宣傳黨的政策，此人也就不能代表黨組吧！聽我的話，你還是照樣去作報告，只是今後你講話時準備好一份提綱，你代表文教部總是可以的吧？如果回絕了各個產業工會，這個損失不但是文教部的，也是總工會的”。

我滿肚子委屈，終於答應草擬好提綱，再去上陣。我說：“我本厭倦了疲於奔命的演講，就此結束了這個營生也好，這就叫做‘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罵我小熱昏的劉姥姥不明白，把文藝大衆化當作謀生手段的小熱昏，我們怎能挖苦他呢？”

紀康一個勁兒地鼓勵我：“其實，這是一種平均主義在作怪，要是誰個人突出一點，平庸之輩就感到是對他的威脅，罵你是出頭的椽子，你說‘木秀于林’倒是很恰當的”。

在下一次黨組會上，紀康當著劉長勝等作了一次解釋的發言：“我曾作爲一個聽衆聽了王若望的演說，台下的工人氣氛很熱烈，確實有引人入勝之處。台下聽衆提出許多疑難問題要他回答，這正好給總工會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這是親自下去直接解答職工對我們黨的政策存在的種種疑慮。王若望本人好幾次向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領導幹部親自到工人中去接觸群衆，他提出陳毅市長就是這樣的榜樣——，他並不願意單槍匹馬挑起如此沈重的擔子，我是說話結巴，不能作報告，王若望作報告倒是事先準備了提綱，經過我審查的”。

紀康講這些話的時候，可並不木訥，只是情緒上抑制不住激動，簡直是給副部長王若望唱了一曲讚歌，講得“風必摧之”的反對者面有愧色。後來才知道：對立面也派了一位副部長聽過我的報告，這次黨

組會此人也出席了，不過他未曾發言，大概也沒抓到什麼把柄吧。

不幸我跟紀康合作的時間不長，他於1954年調至“世界工聯”任中方常駐代表（該世界工聯駐地在華沙，原受第三國際領導）。劉長勝調離上總比紀康早一年，他任“世界工聯”的中方代表團團長。1954年夏，紀康患了一種古怪的病，只得回國治療，我與他妻子到外灘迎接他的歸來，我看到紀康碩大無比的身軀大爲吃驚，幾乎認不出來。他還能扶著舷梯從船上下來與我握手，他的手就像如來佛的手掌，陪同他回國的同志告訴家屬，他得了肥胖病。他的身體竟擠不進汽車，不得不由幾個人擡著塞進汽車後座。我到醫院看望他兩三次，進了醫院不到半年，於1963年不治而死，終年五十三歲。大上海的報告熱，並不是王某獨領風騷，還有兩位傑出的報告員頗受上海人歡迎：頭一名是陳毅市長，第二名是稅務局局長顧准。陳市長的聽衆大多是黨政軍市區兩級幹部。顧的聽衆則是機關幹部和留用人員，顧准年齡比我長三歲。當時我特地登門與顧准拉同鄉關係，並向他討教。想不到他早有心與我結識，他說：“我曾經聽過你的一次演講，給我的印象很好，你能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舉的例子來自社會底層，正適合工人群衆的口味”。

我要求他指出缺點，顧笑笑說：“有的。在您的講話裏，還透露著常州口音”。我要他談談做報告的經驗，他說：“我的聽衆跟你不同，聽我講話的大多數是科室留用人員，他們似乎有一種自卑心理，以爲自己是被征服者，所以不可有居高臨下好爲人師的口吻。眼下我們的某些領導人，講話的內容是解釋黨的政策，聽演講的看作是政治任務，聽起來乾巴巴，很教條，那就失敗了。如果說我的聽衆是偏右的，那就要注意設身處地，冷靜的說理；而你的聽衆是工人階級，大概屬於偏左的思潮，講得激昂慷慨肯定受歡迎”。

上述這一席談話，至今我記憶猶新。不幸的是顧准在1957年打成右派。他是抗戰前就入黨的黨員，而且去過延安，隨著解放軍一起進入上海，頭一場政治運動他就挨上了。“三反五反”運動中，報紙首批打倒的九名部局長級幹部中就有他，受的處分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來在“大鳴大放”中，他又天真地

爲自己辯護了幾句，正好中箭，一頂右派帽子逃不掉了。他不但不服罪，在某種場合說了一句不妥的話，出於一個不知悔改的右派分子口中，就得罪上加罪了。結果顧准頭一頂帽子沒摘去，又於一九六五年加冕，當時被稱作“雙料右派”。而他還是滿不在乎，正在全國瘋狂似的發動文革期間，竟能在一支燭光下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和《理想主意到經驗主意》等等鴻篇巨著。

在文革最高潮時期，作爲“反屬”，他的妻子汪璧又受株連，遭受百般侮辱；她在1968年自殺身亡。顧的老母避居在女兒家中，當顧准因肺癌彌留之際，只是要求再見老母一面，無奈嚇昏了的妹妹竟忍心阻止母子的生離死別！

一個偉大的天才，活了五十九年於1979年與世長逝！他的著作在死後九年才得出版！

衣錦榮歸

進入上海，我是光桿，小家庭還留在丹陽，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妻子帶了兩個孩子來了。一見面，她就怪心疼地說：“怎麼搞的？你瘦了許多”！我無言以對，不過心裏有數，迎接上海解放，確實忙得不亦樂乎，二來我又顧不上照鏡子。我的居室只是暫時住在交通銀行樓頂只有十平方米的儲藏室裏，既沒有窗戶，又沒有鏡子；加之四出作報告趕場子，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三餐無定時；餓了，就吃碗陽春麵或是油條大餅充饑；困了，就在文教部辦公室沙發上過夜。如今一家五口來到上海，（其中一位是山東女傭）上總又沒有家屬宿舍，行政科關照先在樓頂那間儲藏室裏安頓幾天再說。

李明乘興而來，看到分配的宿舍還不如雞窩，撅著嘴表現出很敗興的表情，我苦笑著做政治思想工作：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上海，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具名的入城守則明明寫著：本部所有人員不得隨便進入民房、寺廟和公私機關，解放軍官兵就在愛文義路的人行道上過夜，這事感動了全上海人民。我們總算還分配這麼一間房子，也可以滿足了。加之我還兼著黨總支書記之職，領導人吃苦在先，要做個榜樣嘛，我們住這號房子才問心無愧！

想不到我妻子頂撞了一句：“解放軍不住民房，按解放軍的入城守則只好睡馬路，報上刊出的照片我看到了。不過你們住的這個交通銀行，不也是民房嗎”？她的反駁有理。我的李明看問題可不簡單。

報告熱慢慢冷下來，總算有一個星期的空檔，我向紀康請了假，打算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常州老家，滿足一下“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故土之戀。自抗戰前夕從蘇州軍人監獄釋放，曾回故鄉十餘日，彈指又曆十二年矣。如今拖男帶女，在延安結婚的新娘還沒見過翁姑哩。我們一家從常州城沿著運河坐班船駛向鬲湖。這一次回鄉最大的區別，我參加的解放軍是馬上得天下的勝利者，胸中有一種“近鄉情更怯”和衣錦榮歸的感情在膨脹。及至到了丫河鎮上，還不讓我徑直走進自家的門檻，特地在大門外燃起一把豆稽，讓我們遠方來的王氏子孫跳過那熊熊火苗，方得進屋。這個古老的風俗，原有越燒越旺，帶有興旺發達的吉祥之意。我則賦予它：參加革命，好比跳火坑的寓意。

我的父親還健在，母親在抗戰前一年去世，父親曾有過自由戀愛，我母親亡故後，爸爸即和青年時代名叫修能的寡婦結婚，她是我的繼母。爸爸首先把繼母介紹給媳婦，李明拽著我一同向父母行了三鞠躬，不過後母有點害臊，一面嚷著“擔待不起”，一面忙不疊地躲開了。

只消半個小時，便把十二年來大家族裏人亡物故的變化告訴我：上一回我領著四位難友回到老家，張羅著招待我們的老祖母已在三年前逝世；我的堂弟壽昌在敵僞時期投奔了新四軍；王鵬隨八路軍南下留在重慶，小弟弟王鶴北上到了安徽合肥，在政府機關工作，兩人在外面都結了婚。

左鄰右舍對李明有種種議論，年輕的皆讚我妻子的知禮、美貌，年長的則稱她生養的姑娘像母親，而生的兒子像父親。我們的衣錦還鄉大概給平靜的市鎮生活帶來不少可資談助的素材，使我也一同感到某種自豪！還鄉的一個專案，便是駕船遊鬲湖，同行的還有一位山東來的保姆。她從未見過湖泊，坐在船上就像孩子似的開心。運河從丫河鎮分成兩汊，成“丫”字形，一條河道通向鬲湖，一望無邊。它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但見成群水鷗時而點水飛翔，時而像鴨子追逐於湖中，對面的陸地即是宜興縣。

如此湖光山色，怎能料到：幾年以後竟遭牛塘鄉愚人大力破壞（丫河鎮屬牛塘鄉管轄），爲了回應毛澤東的“以糧爲綱”，鄉黨委動員上萬農民，經一年多的圍湖築壩將耕地延伸出去一二公里之遙。南方數省的五大湖（洞庭、太湖、鄱陽、洪澤、巢湖），在大躍進時期，所謂走群眾路線，圍湖造田，結果破壞了平衡，釀成多次水災。

毛澤東編造的三個“其樂無窮”——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圍湖墾地包括了“與天鬥、與地鬥”，可並無一點“其樂無窮”，人民吃足了苦頭，倒是“災難無窮”呀！

回娘家勞師動衆

在回上海的途中，李明提議，她也想回故鄉一行。我說好呀，我陪你到浙江的奉化走一趟，男女都有衣錦榮歸的機會。我抱著女兒親親她的臉說：“你還不曾見過外婆咧”。李明感傷地說：“外婆早沒了。跟媽媽到奉化，還能見到你的舅舅”。

李明向上總組織部請了假，（分派在組織部任人事處長），山東阿姨留在上海，我們便向浙江進發。連孩子也不帶，臨行前兩個孩子還哭了一場。奉化屬寧波地委管轄，李明的老家在奉化門門橋，離蔣介石的家鄉只有二十多里，父母早已亡故，只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留在門門橋。

找到門門橋李明的故居，天已黑下來。她出生於上海，生平第一次來尋根，所以壓根兒不知老家的東南西北。她只知道先找叔叔家探聽，這情景是悲涼的，當下口占詩一首紀其事：

有弟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
衣錦歸不得，
故居何處尋？

很不幸的是，只有嬸娘還在村中，叔叔到了香港做木匠很發達。他在那裏另成了家。難得見到李家門的親人，成了棄婦的嬸嬸說著說著就哭出來了。李明的小名叫杏菊，媽媽生的兩個同胞兄弟，一個妹妹。大弟叫梅芳。

嬸嬸說他給地主家放牛割草。杏菊問起在哪個村子放牛？她可沒在意，只記得前兩年他還回到門門橋過春節，後來換了人家，再也沒見過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梅華，他跟著叔叔在香港做學徒。

嬸娘說：“小妹嫁到離門門橋五裏地的張家巷，生了一個孩子，小日子還過得去”。

杏菊最懷念的是她的外婆，只因爸爸死後，媽媽帶著七歲的杏菊到英美煙廠做工，家中留下三個小孩，全靠外婆照料，她並且做粽子上街叫賣補充家用。

李明的母親脖子上生了個癰瘡，本是小毛病，由於沒錢看醫生，耽誤了時機，她媽媽竟送了命！從此，就得由李明挑起全家的擔子。

八一三事變，日本飛機炸壞了“大世界”，死了好多人，杏菊在地下黨的指引下，必須瞞著家庭離開上海，她不打招呼悄悄地跟著組織去了武漢。

“那麼，外婆到哪兒去了呢？”嬸娘說“她回門門橋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李明聽到這裏，熱淚奪眶而出，她深深責備自己，含著熱淚對我說：“我的不辭而行給了外婆多大的打擊呀！外婆在炮火連天聲中拖男帶女保護了弟妹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沒法報答的了”。

在嬸娘處撲了個空，李明馬上找到附近張家巷妹妹的婆家，妹妹像迎接一個從天而降的救星和親人，喜出望外地迎接姐姐，當問及外婆的去世，妹妹的臉色變得陰沈了，她含著淚說：“只因大姐你不該不聲不響地走了，外婆還擔心你大概挨了日本鬼子的炸彈，她日日夜夜等你回來，我們三個只曉得陪著外婆哭，在上海，我們無依無靠，斷了生路，後來想法子到寧波同鄉會討著幾張輪船票，外婆才把我們領到寧波鄉下嬸娘家中。叔叔嬸嬸肯收留我們三兄妹，唯獨不肯收養外婆。嬸娘公開告訴她：你是二婚頭（即寡婦改嫁過的婦女），李家收養你怕敗壞了門風。嬸娘交給外婆二十塊大洋，好讓她另尋個吃飯的去處。梅芳已經懂事了（已十四歲），他跪在嬸嬸的面前爲外婆求饒，哭著懇求無論如何要外婆留下來，三兄妹寧肯少吃一頓飯，千萬不能讓外婆去討飯。嬸娘沒良心呀，她板起面孔說：‘誰要把二婚頭留下來，我就把你們一同攆出去，你們可知道！若是留她在這兒，她的兩個短命鬼會跟在你們後頭’。嬸娘還罵梅芳是不

懂的孩子。外婆看她義斷恩絕，一氣之下，二十塊大洋一錢不要，哭著罵著走出門去。我們三人哭作一團，哭著叫：外婆呀，你別走呀！”

“在往後的日子裏，梅華有一遭趕集市遇見了外婆，她果真成了無家可歸的乞丐，半年不見，老得不認識了，還是外婆先認識外孫，她滿頭白髮，身背佝僂，手拿一根討飯棒，她對梅華說：‘我把你們三個從炮火裏帶回鄉下，我死了總算對得起你的娘和杏菊了’。講到這裏，姊妹二人不禁抱頭大哭。外婆告訴他：她在離門門橋二里地的地藏庵裏過夜，無時無刻不想念你們，我見了你們淚也哭不出，我的淚已經哭乾了……”

“我就瞞著婆家悄悄送食給外婆，我住的村子離地藏庵不過兩里地，外婆告訴我：梅華和梅芳隔三天五日也偷偷地送些剩菜剩飯，那幾天就不用出門乞討了。”

“第二年的一個三九寒天，梅芳又去送飯，發現外婆已經活活凍死在地藏菩薩神龕下邊，梅芳哭著回來報告孀娘，孀娘總算良心發現，拿出二十塊大洋買了口棺材把她埋葬了。”

“我為逼外婆走上絕路的孀娘感到羞恥，魯迅描述的祥林嫂的悲劇果真還在這兒上演！對這位頑固不化的孀孀，我又恨不起來，只是恨透了這個葬送婦女的封建禮教”。

李明又問：“梅芳到哪里去了呢？”

妹妹說：“梅芳哥長到十五歲，他不願看孀娘的臉色，肚裏憋著一口氣去本村財東家放牛，這時候叔叔去了香港，把小弟弟梅華帶走了。梅芳做到第三年上，他轉到三林塘一家地主家放牛，難得回一趟門門橋，放牛穿鞋很貴的。

我每年給他做兩雙布鞋，春節財東放他幾天假，他就到我這裏來過年，那時我們還能見面，不知怎麼的，第四年過春節他沒來，我到門門橋孀孀那裏打聽，她說從來沒來過，我為他準備的兩雙鞋，他也沒來取，至今還擱在櫃子裏。我打發你妹夫到三林塘打聽他的下落，那邊東家說，過了春節他沒再幹了，也不知去了哪里？這一下，梅芳哥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飄到哪兒了。不過，姐姐你不用急，我琢磨他還活著，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保甲長也會尋到門門橋來的”。

李明一躍而起，說：“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他”。妹夫家準備筵席接待，她都顧不得吃，連夜趕至寧波地委，要求黨組織幫助尋找失散了的兄弟。

剛巧專區正在召開區、鄉兩級農會籌備會議，地委書記便把尋找放牛娃的事向大會作了報告，並介紹了放牛娃的年齡和特徵，會上有兩個鄉幹部說某村似乎有這麼一個外來戶。李明與他們兩個分別談話，否定了其中一個，大會籌備處馬上派人去將可能是弟弟的放牛娃找來認認看。

當放牛娃已經站在地委書記和李明的面前，李明向地委書記直搖頭，表示“不是的”，她看著這個放牛娃行動呆滯，個子矮小，不像是個發育正常的二十五歲的青年，她離家以前那個天真活潑可愛的親兄弟決不會是這副樣子。

李明考試式地盤問他：“你阿是叫梅芳？”

放牛娃結結巴巴地說：“我嘛，是的，是梅芳”。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吧？”

梅芳思索了一陣，說：“有弟弟，妹妹”。

李明又問：“還有什麼人嗎？”

放牛娃艱苦地在記憶的深淵搜索了相當長的時間，忽然認出他的大姐了，他吞吞吐吐、口齒不清地終於回答：“記得有，有一個杏菊，是我大姐”。

這個問題是不可替代的，連她的小名都還記得，是了是了，站在面前的確確實實是親手足梅芳，李明的熱淚止不住了，激動地跑近他，捏著他的一雙樹皮般的手，十分激動地說：“你認認，你不記得我是杏菊呀”！

弟弟抽咽著說：“——不敢認呀”！

他們兩人如此相逢的場面，使在旁的地委書記動了情，他派了個秘書陪著放牛娃去洗個澡，理了髮，並辦了一桌酒席慶賀姐弟倆的團聚，請了梅芳所在村子的農會幹部作陪，我借光，跟地委書記坐了首席。李明建議把妹妹、

妹夫一同請來，還特地派出一輛吉普車。

妹妹見到梅芳一下子變了人形，心中辛酸而又痛苦，她發覺哥哥還健在，又感到欣慰，便質問哥哥：“最近兩年你為啥不來我家了？”

梅芳慚愧地說：“我，我不認路了”。

妹妹說：“你以前不是來過嗎？”

梅芳苦笑著說：“只怪我死過去一趟，把什麼都忘了”。

農會幹部在大家祝酒時刻，講了放牛娃何以變了人形的底細：他在三年前，患了一場傷寒病，發高燒不退，東家也沒有給他請醫服藥，最後只剩下一口氣了，東家就命令夥計把他擡到亂墳去埋了，這個夥計發現還有一口氣，報告東家等斷了氣再擡出去，東家答應先把死人擡到豬圈旁邊放一放，誰知在那裏“放一放”竟救活了他，他在豬圈外邊的青石板上躺了一天一夜，沒人管他，他自個兒倒爬起來了。梅芳的復活成了本鄉的一樁奇跡。只是人雖活了轉來，這場病卻把他毀了，從此他說話大舌頭，講話勿靈清。十五六歲正是發育年紀，可是以後，他再也不見長高，幹活還是好樣的，東家只給他吃飽，欺負他老實，不給他工資。我們有句老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話如今不是應驗了嗎？解放軍裏有你這樣的姐姐救他脫離苦海，誰能料得到呢？這不是後福不淺嗎？

李明聽了之後，深深地感謝這位農會幹部，特別要謝謝沒急著把弟弟擡出去埋葬的不知名的夥計。她說：“我打算把梅芳帶走，在我身邊，我好照料他”。地委書記想得真周到，他說：“我們這兒很快分土地了，他跟妳去了上海，分田地就沒他的份兒，妳考慮過嗎？”

李明回答道：“我讓他到上海做工人階級，幹嘛把他拴在土地上呢”？會餐過後，姐姐和妹夫、妹妹三個人簇擁著穿著叫花子衣服的放牛娃上街置辦新行頭；妹妹想起壓在箱子裏的兩雙布鞋忘了帶來，杏菊姐就給他買了雙新皮鞋，把個梅芳打扮得像個新上任的農會幹部那樣。

憶苦思甜風起雲湧

李明計劃第二天就乘輪船趕回上海，三張船票都買好了，地委書記正式通知李明再在寧波逗留一天，說是要給妳的兄弟派上大用場。

李明帶著阿弟去向地委書記道謝，問他為啥要在寧波逗留一天？

地委書記拍拍改頭換面的梅芳說：“妳的阿弟真是個苦水裏泡大的孩子呀！他的故事非常動人，我們佈置他到農會代表會上去做憶苦思甜的報告，藉以提

高農民的階級覺悟，這是最生動的現成的階級鬥爭教材呀！我們這裏又剛巧集中了從四鄉來的貧雇農代表，妳就耽擱一天回上海吧”。

李明為難地說：“你這個主意我只能舉雙手擁護，不過我的阿弟說話結巴，口齒不清，他懂什麼叫做憶苦思甜呢”？

“這就要借重妳這位解放軍姐姐了，重頭戲要妳來唱，由妳介紹兄弟的身世，並且介紹一下妳和妳的弟妹如何失散的，這是多麼豐富的內容啊”？

地委書記真會見縫插針，他很善於聯繫實際為黨的事業做宣傳！李明只得同意留下來，參加農民協會的憶苦思甜現場會。

這是我頭一次參加憶苦思甜會，地委書記邀請我坐上主席臺，我婉言拒絕了。這個會開得非常成功，他們把梅芳看作是地主壓迫的活的標本，拙嘴笨舌的梅芳似乎變得聰明點了，他上了台還講了四句話呢：一句是“我的東家好狠心呀”，往下他說：“沒有姐姐就沒有我的今天，感謝解放軍，感謝毛主席”（其實是他姐姐事先告訴他的）。李明在講到外婆之死和弟弟失去了記憶，她講著講著也泣不成聲了。地委書記在會上還做了總結，認為長達四天的農會籌備會議，最後的憶苦思甜會講得最好，是整個會議的高潮。他要求大家回去後，也去尋找本鄉本村的苦大仇深的窮人家，普遍召開這樣的憶苦思甜會。他的發言還批評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說法，“大難”是舊社會給我們的，至於“後福”的甜，卻是共產黨救了我們跳出了苦海，大難的結果，未必一定有幸福嘛！

我和李明把梅芳帶回上海，才知道憶苦思甜在全國已形成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

上海總工會也得到黨中央指示，必須在工會系統廣泛開展憶苦思甜教育運動。文教部的工作重心便從“報告熱”轉到“憶苦思甜熱”。恰巧我們在寧波專區先走了一步，對這項運動不是那麼陌生。就憑這一點，經我的推薦，先在上總禮堂召開一次憶苦思甜大會，為了體現上總黨組的高度重視，三個副主席和組織部長都來參加了。唱主角的梅芳本可成為憶苦思甜的明星，只怪他大舌頭說話不清，只得請他姐姐做解說員。李明以為自己喧賓奪主，不願幹這份差使。上總首次召開的憶苦思甜會，效果比寧波的第一場差得遠，解說員李明再不想幹這份差使，梅芳的這

顆明星就不再閃光了。不過，更多的工會幹部知道了梅芳的“苦大仇深”，在上海很容易找到工作，加之他姐姐又在上總組織部任人事科長，梅芳很快派到吳淞機器廠作裝箱工，而且很快找到了也是寧波同鄉的配偶，結婚辦喜酒都是他姐姐張羅的。起初組織憶苦思甜保持著樸素老實的原型本色，慢慢的就向誇張和虛偽方面發展，只在於圖一個轟動效應。具體的做法，先物色一個苦大仇深的模特兒，登臺控訴遭遇的階級壓迫之苦，台下事先組織好鼓勵性口號，喊得最響的有“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等等。聽完憶苦思甜後，聽眾還得在小型座談會上“倒苦水”，發現誰所談的身世也是苦大仇深的，此人就被發掘出來，進行培養，用的還是母雞孵小雞的方法。各個產業工會，便將泡在苦水裏長大的“小雞”開列名單，再從中選擇憶苦思甜的明星。若干年後，提拔勞動模範也是用同樣的步驟。

各個產業工會舉行該系統的憶苦思甜大會，總希望上級部門派人參加，這時候我又得一天趕幾個場子，甚至比當初做報告的場子還要密集，不同之處，做報告是我唱主角，憶苦思甜的場子我只是個旁觀者，不過讓我坐上主席臺，我還得作出記筆記狀，表示上級領導很重視的樣子。

聽得多了，就感到枯燥乏味，並且有千篇一律之感。憶苦思甜教育運動確是中共的一大發明，千篇一律裏面，其實只有一個主題：一個極端是舊社會壞透了，苦極了（最好能流眼淚）；另一個極端則是新社會好極了，美得很（高興得手舞足蹈）；把“苦”和“甜”作為對比，這就把人們的思想限制在簡單化、公式化的框架裏，使迷信共產黨成為自身血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某一位報告員講他挨餓的經歷。他講到小時候挨餓，想辦法抓隻貓殺了吃，這時他流淚了，這似乎不近情理了，因為餓狠了他有了肉吃，高興還來不及，眼淚從何而來？可見是擠出來的吧。

憶苦思甜本是和平的、講故事式的教育運動。不過當它發展到極點，真鬧出人命來了。我還記得國棉四廠的一姓徐的女工，她被看中到臺上去憶苦思甜。這個女工原是童養媳，男人年紀比她小六七歲，卻跟公公的年齡接近。徐某控訴了童養媳的苦惱，後來漲紅著臉揭發公公騷情，與她發生了性關係。這時，引起了台下聽眾的一陣騷動，因為聽眾們聽過許多場大

同小異的憶苦思甜，還沒有聽過特別吸引人的如此新奇的情節。

三天後，被揭發的公公便服毒自殺。老人死前曾告訴老伴，兒媳完全是無中生有。後經司法人員深入調查，總算給死者還他清白：國棉四廠的女工徐某坦白交代，原來是廠保衛科幹部指使她添枝加葉，認為她只談童養媳受苦，還不是接近壓迫的“憶苦”，加上這段就一鳴驚人了。

毛澤東玩的新花樣，即使是“除四害”的戰役，僅消滅麻雀這一項，不知枉死了多少人！我們牛塘小學，爬到屋頂上打麻雀，不小心滾下來的孩子，即有重傷一人，死亡二人。全國總共死傷多少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見，一定是個驚人的數位。

憶苦思甜運動整整折騰了一年，不過它的有害公式卻沒有死亡。在各種文學、藝術、戲劇、回憶錄甚至教科書裏，都可以找到憶苦思甜的公式化的影子，大家熟悉的八個樣板戲，浩然的《金光大道》，老舍的《龍鬚溝》，曹禹的《明朗的天》，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文藝批評這個公式又演變為棍子，作品的結尾如果沒有解放後迎接新生活的情節，就可以上綱到作家只愛黑暗、對社會光明面不屑一顧的評價。這還是輕的，嚴重的則打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棍子。

“失救會”的失落

脫離上海總工會

文教部長紀康調往波蘭華沙，按中共幹部遞升的常規，空著的位子，本應提升副部長王若望頂替。結果卻是調秘書長李家齊任文教部長。我心中有數，分明是上總主席劉長勝對我不滿。

共產黨內本無民主可言，按黨性要求，我只有服從的份兒。不過自李家齊當了部長，我原有的積極性大打折扣，只得控制自己加強唯唯諾諾的修養。前部長紀康說得對，我們這兒實行的平均主義，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就是“出頭的椽子先爛”，大家一樣拿供給制，發一樣的津貼，我又何必爭勝要強呢！

我的委屈找到了一個出路：市委組織部長王堯山是我的老上司，何不打個報告向他申訴？構思這份報告應竭力避免把自己放進去，如把自己的委屈直接提

出，就不符合黨組織的原則，講起本人受到領導的排擠，只須領導人批一句：“這是王某人個人主義往上爬的表現。”就會吃不了兜著走，自討沒趣。我的申訴書著重批評上總黨組存在宗派主義傾向，表現在排斥老根據地南下幹部，其中舉了四個人的事實，一方面又舉例證明“上總”用人唯親，因黨組成員多數是上海地下黨的同志，有名有姓，經得起檢查。這份申訴書還給李明看過，她勸我不必控告“上總”。她的黨性比我強，她估計：市委或是“上總”黨組會給你扣上分裂黨的帽子。果然，這份申訴書捅了馬蜂窩了。該申訴書轉給上總黨組，王堯山部長沒有表態，上總組織部長找我談話，指出我材料有點誇大，並說：這不是縮小內部矛盾，而是挑起地下黨和老幹部的不團結。被李明不幸言中，我佩服李明的忠告。聽了組織部長的談話，我並不後悔，更沒有檢討自己，我的倔強和自以為是終於贏得“自由主義者”的稱謂。

沒過一星期，明顯的報復下來了。上總黨組通知王若望：調離文教部，撤去總支書記，要我去新成立的“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報到（以下簡稱“失救會”），讓我頭一次嘗到了共產黨內的無情報復、赤裸裸而且雷厲風行的滋味。直至我到了“嘉陵大廈”的“失救會”，發覺我給市委報告中提及的山東南下的四位幹部，倒有三位同志也調至“失救會”，另一位幹部則調至郵電產業工會。交通銀行的上海總工會終於成爲地下黨的一統天下！

南京路上大展鴻圖

失救會的主任原是上總副主席朱俊欣同志，他被調出總工會，是不是那兒的宗派主義使然呢？我從側面瞭解後，推翻了上述猜疑：朱高高興興上任，跟我的調離不一樣。我到失救會報到，任教育科長，等於連降兩級，是上總黨組的安排。

朱俊欣任失救會主任，倒是獨當一面的新開闢機關，不像在“上總”有職無權。朱對失業工人的文化教育卻是採取放任和旁觀的態度，大概他從紀康那裏，早就知道我的性格和能力。

這裏要補敘一下建立“失救會”的起因，上海的私營企業在三反五反中紛紛倒閉，失業工人加上小業主的隊伍幾乎占原職工人數的百分之三十餘，這就形

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失救會未建立以前，失業工人團團圍住上海交通銀行，有的工人拖男帶女聚集在“上總”門口要飯吃。上海市委討論失業工人的辦法：“以工代賑”，建立一個新機構來救濟失業工人，組織他們從事建築之類的工程，募集經費，則由不曾倒閉的工商企業按職工工資總額百分之三交納“救濟費”。這項加稅令大小資方哇哇叫，總工會眼紅也哇哇叫。這樣，又給三分之二以外再加徵百分之一，作爲在業職工的文教經費。那時節資產階級經過三反五反，一個個成爲驚弓之鳥，加稅百分之三，他們也只得認了。

離交通銀行不遠的嘉陵大廈，以朱俊欣爲首的失救會比起“上總”，就顯出財大氣粗獨佔鰲頭的氣概。老上海應該記得，1951—1952年，外灘堤岸連續兩個黃梅季節被黃浦江漲潮入侵，洪水把南京東路幾家大公司的地下室都淹沒了，北京路、南京路可以陸上行舟。失救會就請工程師設計墊高堤岸，經四個月上萬名失業工人三班制的“以工代賑”，就在1953年夏天把黃浦江堤岸加高了一公尺。墊高外灘中山東一路和南京路的工程需要大量石塊。我被派到蘇州的天平山，去幹破壞這個風景區的任務。

失業大軍來到天平山下，居住的房屋是由解放軍借來的行動帳篷，連炸山也是請解放軍工兵營代勞。滿山遍野佈滿了蘑菇狀的帳篷，每個帳篷擠下二三十人，早上軍號呼喚工人們醒來，另外還架設了擴音喇叭，使每個帳篷都能聽到。

失業大軍按軍事化營連編隊，我是政治部主任的名義。上海方面組織了越劇、滬劇、京劇、滑稽戲等名演員，來到天平山進行慰問演出，也請蘇州本地的名演員在廣播站表演。民工裏頭也有不出名的歌手和曲藝演員，鼓勵他們也到喇叭裏唱上一段。

由上海來的地方戲演員，同樣招待住進帳篷。在大城市生活慣了的名角們，感到有趣而又新鮮，借此機會我與他們建立了難忘的友誼。開石方的勞動簡單而又枯燥，天平山像婦人聳起的兩個乳房，猛烈的爆炸無情地把她炸毀，由民工的連隊將不規則的石塊，用鐵榔頭分解成雞蛋那麼大的碎石子，經過一道質量檢查，運到蘇州河的躉船上駛向上海的外灘。這兩座山從地球上消失，敲石子的勞動延續了兩個月。當時

有一位本地的戲曲藝人讚揚我們幹的“愚公移山”。他大概是學習毛的著作才這般誇獎上海人。當天天平山夷為平地，每個民工的手掌不是起了泡，就是紅腫，我才理解這位藝人代表著蘇州人的民意，實際上是嘲笑阿拉上海人不過是“愚民”呀！

廣播站的建立使乏味的敲石子勞動不會太枯燥，我自封廣播站長，除了從外地請來戲劇演員，我本人也在廣播台宣講時事新聞、建設新上海的前景（集中講墊高外灘在經濟上的價值），我在工地上的官銜無人知曉，各個連隊皆稱我“常州王老師”，因我改不掉常州腔也。

從上海失救會調來的一位山東幹部，名叫方育生。我所以記得他的名字，因為他正是我給市委的報告裏，替四位南下幹部抱不平，遭到逐出“上總”的處分。

他也是受我株連的。他建議：工地上是不是也興起一個憶苦思甜教育運動？我回答他：廣播站要多多增加輕鬆愉快的節目，憶苦思甜太嚴肅，在這裏恐怕不適宜推廣。這樣把他說服了。

天平山民工吐苦水

我在上海的妻子生下第四個孩子，捎信來要我回去一趟，於是我把廣播站交托給方育生負責。等我從上海回到蘇州，方育生報告了接管廣播站的頗為滿意的特別節目：“我們以一個連隊為單位組織了憶苦思甜，失業工人裏苦大仇深的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過也反映了某些民工動機不純，其中有小業主、商店老闆，乘機訴新社會的苦。他們跳出來跟我們搞階級鬥爭。聽了之後覺得味道不對。我手頭就有一份來者不善的名單”。

他對訴苦的民工所作的評判，我抱著懷疑的態度，總認為又是過去搞階級鬥爭的老傳統，可是考慮到今後共事的關係，不宜當面批評。在下個周末，上海的朱俊欣正好到天平山視察，我向他彙報了開展憶苦思甜運動的反效果，我不作否定的結論，存心留給總指揮去做。朱並沒有批評方育生，而是約他親自聽取名單上的幾個工人如何“憶苦”，這裏只介紹一位民工吐出的苦水：

“我回憶起解放前，在老闆那裏工作，養活家口，吃口太平飯，生活還算是有保障的，老闆有時沒

好顏色看，我也認了。想不到上海一解放，把個好端端的飯碗給砸了，只拿了上千元解散費——只頂現在一百元，連房租也付不起，只有賣光當光，而解放後偏偏當舖也關了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得比說得還好聽，只可惜西北風餓不飽肚皮呀，感謝‘失救會’發救濟米，首長還是關心我們，我一家還是感激的。連隊訴苦會我是這麼說，要我上廣播喇叭我還是這麼說。我有個意見不知能提不能？（朱鼓勵他儘管提出來）把我們派到這兒來以工代賑，天天敲石子，各人敲多少石方，應該有獎勵，‘以工代賑’是啥意思？是不是失業工人幹活光給吃飯不給工資；再說，民工的手都敲出血泡，連勞動手套也不發，比資本家還不如，要說共產黨給工人帶來新生活，實在說不出口呀！”

此人稱得上快人快語，總指揮聽了大為讚賞，當場許諾敲石子按石方多少發給每人計件工資，並且發給每人一副勞動手套，朱對失救會的兩名部下說：“失救會有的是錢，必須用在刀口上，這位民工的建議，看來是從資方那裏學的，就照他的辦法實行，民工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回上海我還要推廣到墊高外灘的工地上，那些國營廠吃的大鍋飯，還不如這兒的失業工人哩”。

臨行以前還特地召開了連營長和政治指導員會議，除了宣佈按石方多少發給計件工資，還批評了照搬憶苦思甜的不當：“——別的行業都可以回憶對比，唯有失救會不能搞訴苦運動，用廣播來倒苦水，矛頭不能針對我們的黨”。

方育生在會議以後悄悄地承認他錯了。

一千萬賺個守法戶

全國解放後第一波的政治運動，便是三反五反，加起來要反的便有八條之多：反貪汙、反賄賂、反浪費、反虛報、反官僚主義等等，誰也說不完全。

第二波政治運動才是憶苦思甜，在天平山工地上，發現上海的老闆在三反五反運動裏遭到打擊，弄得一貧如洗，淪落到失業隊伍裏以工代賑，混碗飯吃。三反五反的結果，造成資方人員的破產和大量工人的失業，於是失業工人憶苦思甜，“憶”在業時的“甜”，“思”失業時的苦；而“不忘階級苦”，又把資方人員當作是苦難的根源。由此看來，解放後頭

兩起的政治運動，本是相生相剋的因果關係。把這二者聯繫起來的結合部，兩方面的苦水都針對著偉大光榮的共產黨。

關於憶苦思甜運動，已如上述，這裏補敘天平山失業隊伍裏的幾位資本家的遭遇。

郭玉和，湖北人，在盧灣區開了一家麵館，是他祖上留下來的產業，聽說解放軍快打上海，他對共產黨缺乏認識，以為共產黨來了要“共”他的產。幸而同業工會有人寬慰他，宣傳共產黨來了如何如何好，他將信將疑，繼續賣他的陽春麵。

想不到“共”他的“產”來得好快也！解放沒幾天，便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還好，六個‘反’裏頭他沒一個沾上邊，他繼續賣他的陽春麵。

自己認為太平無事了，三反五反的風還是刮來了，上頭派了檢查隊，有一個長官找他談話，用了一句他不懂的新名詞：“自報公議”。這話比三反五反還疙瘩。“自報”是報告本人的動產不動產，包括家具、存款和盈利等等。檢查隊的長官說：不一定開廠開店的都有三反五反的問題，自報一下，你老闆放了心，政府也信得過。“公議”就是核實，資方有沒有不老實的地方？

郭老闆回味三反五反的“自報公議”，原來是共產黨做好了圈套，八個‘反’好比八根絞索，“公議”看來是走群眾路線，叫餐館業大小老闆狗咬狗，咬出來的數位一定比“自報”的加碼大一截。證明你原來的“自報”不老實，這時你只好認了，認了就可以在八個反裏湊兩、三個反，其實他那個小麵館怎麼有那麼些資金呢？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面孔的長官換了個黑面孔的檢查隊長，再把絞索往死裏勒，檢查隊長給他扣了頂“違法戶”的帽子，他說明實在交不出這麼多錢，檢查隊長還是說他不老實，並且用“天上九頭鳥”的話侮辱湖北佬，他只好把妻子的金銀首飾和飯館地皮都繳上去，他橫下心了，索性把小麵館關門大吉。

這一下闖了禍，黑臉長官氣憤地指責他公然反對三反五反，想用攢紗帽對抗人民政府，此人在打伴的麵館門口貼了一張印好的“嚴重違法戶”的條子。他聽說福州路有幾家商號，門口也貼了“嚴重違法戶”的字樣，資方就被公安局抓了去。他又不敢撕下門口那張死刑判決書，就在那天夜裏，公安局真的把他捉

到監牢去，去的地方是一家批發商的貨棧，裏面已經有六、七個倒楣鬼被關了，六個囚徒裏有一個正是這個貨棧的東主。此人比湖北老闆還要倔，他穿著長衫，戴一副眼鏡，見到新朋友進來，他就像老大哥似地安撫道：“我這個庫房比監牢好，好就好在它是臨時關人，門外頭不設站崗的，估計關在裏頭不會長”。言談間才知道此人是一家綢布店的老闆，他的隨遇而安的瀟灑，給所有的囚徒留下難忘的印象。

倉庫裏七個資本家，只有郭某的企業是小兒科，每個人講到自己的幾個“反”，發現檢查隊勒緊絞索的步驟大同小異，大家一致的感受：等解放，等共產，如今真的共了產。只要看開點，傾家蕩產之後，變成領導階級，說不定還得福咧。相約千萬不要自殺，勒緊絞索的頭一個回合就頂不住了，就是看不開呀！

關到第四天上，檢查隊長果然真喊郭老闆去談話，頭一句就問郭：“怎麼樣，想通嗎？”，“想通了”。“你究竟貪汙多少呢？”“一塌括之（滬語：‘全部’之意）都上交，我那個小麵館關了門，不開店，我還撈個無產階級當當，有什麼想不通的？”長官說：“我沒功夫跟你糾纏，爽氣點，你說個數吧”。“同業工會的尺碼我都認了。把一家麵館全貼上還不夠，連我祖傳的地契都上交了”。

兩個人討價還價就像拍賣行水漲船高，直至湖北佬喊價喊到一千萬。黑臉長官才肯罷休，於是從公事包裹掏出一張印就的“基本守法戶”五個大字的憑據，就算得到寬大處理，郭玉和沒忘了貼在大門上的死刑判決書，請求長官撕下來：“我那個門上的嚴重違法，務必請長官給我消消災”！黑臉長官冷笑一下：“把守法戶的憑據覆蓋了還用得著我嗎”？

郭老闆小心翼翼地吧“守法戶”的憑據揣在口袋裏，一副奴才面孔問了一句：“那麼，我從這兒可以回家咯”？

黑面孔長官將肥大的手揮了一下，不耐煩地說：“你可以走了。一千萬元買一張基本守法戶，便宜了你”！

郭老闆敢於跟我講了上述三反五反的內情，大概從廣播喇叭裏聽到“常州王老師”關於憶苦思甜的講話，才敢於跟我倒苦水。他最後說：“有一點我不曾做到，我以為傾家蕩產落到以工代賑到此地敲石子，

賺一個無產階級好名聲，也還值得。誰知連指導員還是要我填表寫上‘小業主’，我問他小業主是啥意思，他說還是資產階級，看來我這個小業主即使已經兩手空空，娘胎裏定下的資產階級恐怕永遠不得翻身了。王老師，你給我一點指示吧”！

1992年8月我跟羊子來到美國紐約，首場記者招待會由李勇主持，在散會時，有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跟我熱烈打招呼，熱淚盈眶大聲嚷著呼喚我不要走，她嗚咽地說：“你就是我父親的恩人哪，我從小時候就知道你老的大名呀，我爸爸叨念著一位王若望，想不到就是您——”。

她激動以及感人的語言，引起了資深記者李勇先生的注意，他在1992年9月23日《世界日報》寫了一篇“王若望與他的動人故事”。老實說，若不是這位素昧平生的中年女子邂逅於異邦，她所說的往事在我的記憶中早已忘卻了。

這位女子的父親是從香港回歸大陸的愛國資本家，他對中共一向有好感，故在大陸解放後，他寧願結束了香港的生意，將資金拿到上海開了一家五金行，不料開張第二年就來了一場三反五反的大地震，起初把他隔離，並作為嚴重違法戶遭到清算，這家五金行宣告停業。該店的失業員工中有一位知識份子，他平時看《勞動報》，我是該報的創辦人之一，並常常在上面寫些小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批評極左的東西。這位員工眼見著老闆抱著一片熱忱回滬參與祖國建設，遭到如此待遇，自己的飯碗也一齊砸了，心有不甘，便寫信給我，要我解答他心中的困惑和疑問。我親自訪問了他，根據他的陳述，就寫了一篇稿子登在《勞動報》上。

當時我不僅是《勞動報》的撰稿人，還有一個官銜是總工會的宣傳部副部長，而解放初期，總工會的權威甚至超過人民政府。上海市工商局看到《勞動報》的這篇文章，馬上允許老闆回家，並繼續營業，過了一個月還發給他一張“基本守法戶”的鐵卷。這位女士的父親與店裏的那位職工打電話給我，要在某飯店設宴招待我全家，以示感恩不盡之意。我謝絕了設宴招待，但我同意與這位未曾謀過面的愛國資本家見見面。於是，由那位員工領路，到老闆家中走訪，所談的一切不復記憶，在他家中尚有兩位不足十歲的雙胞胎小姐妹。沒料想，正是這位未成年的小姑娘，

在她四十年後成為這個動人故事的穿針引線人！我們又在紐約重逢。

即使我個人一心行善，但無法減輕無產階級專政下殺人如麻的罪惡於萬一，我只是在處理個案時，憑藉手中有限的權力幫助一兩個受害人鬆綁，僅僅求得良心上的平衡而已。

即以這位老實的香港資本家而言，他逃過了初一，仍然沒能逃過十五，在四年以後的鎮反運動中（已開始大反胡風反革命集團了），此公又被囚禁于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我也不知其生死，直到四十年後，我到紐約，才從他女兒的口中，得知此公早就冤死在白茅嶺。他的遭遇比湖北人郭玉和還要慘！

這位中年女士來到美國已有二十多年，膝下子女也成家立業。但中共的紅色恐怖還給她留下心有餘悸的精神虐待創傷，李勇先生的文章，一開頭就聲稱道：“為了她的安全，不便公開她的姓名”。可憐的中國同胞哪，時隔半個世紀，又生活在最安全的美國，她還害怕中共的專政機器有朝一日株連她的後代，在國外講動人的故事也必須隱姓埋名，可見中共暴政的魔杖有無遠弗屆的威力呀！

轉業吳淞機器廠——永久的紀念碑

上海外灘黃浦江堤壩加高的工程還沒有結束，失救會又把我調到吳淞機器廠（後改名“上海柴油機器廠”），是上用總派的工作組名義，去發動群眾三反五反，工作組長是上總的勞保部長許炳根。進到工廠裏，不問三七二十一，目標就瞄準廠長楊錦山。他是上海地下黨員，反正有八個‘反’，按照上級的指示總能找到幾個‘反’把楊打倒；就由許炳根鵲巢鳩佔，任該廠黨委書記，我任廠長。

兩個月後，撤銷了工作組，許炳根調回上總，華東工業部部長馬天水派了山東南下幹部姓刁的任黨委書記。

這個廠地處上海遠郊區，職工大多住在市區，上下班由十多輛大棚車組成的汽車隊接送。我也不能每天回家與家庭團聚；不得不恢復“禮拜六”制度，平日我搬到廠裏與總工程師吳梅生住在一起。

做廠長的，能不能解決交通問題，成了最迫切的當務之急。這時全國上下都“一邊倒”倒向蘇聯，特

別是中共幹部不懂工業管理，也只有跟蘇聯亦步亦趨。

蘇聯管理工業生產實行廠長負責制，並且從上繳利潤中撥出百分之五給職工辦福利或頒發獎金，這筆款項在廠長名下動用，叫做‘廠長基金’。誰知‘廠長基金’之設立在工業部門誘發了一場火爆的爭論。

廠長基金的命名，即意味著沒有黨委書記的份兒。在 1949 年後，大陸所有的單位都是黨委書記大權獨攬。由此連同廠長負責制也是削弱了黨委的權力。這樣就自然地形成了兩大陣營，黨委書記反對廠長負責制，過去“小老婆養的”廠長們則擁護“廠長負責制”和“廠長基金”。

這一場權力之爭，最後只好請示國務院工業部部長黃敬（此人系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在 1958 年 11 月，神經錯亂跌斷了腿而死），他作出調和的指示，改稱“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不過實行起來還是黨委權力大。

本人的興趣只要“廠長基金”，至於黨委負責或是廠長負責並不重要。我授意工會主席在職工代表會議上，提出使用廠長基金建造公共宿舍的提案，全體代表舉手贊成他的提案，同時還以熱烈鼓掌來表達興奮之情。

我與同宿舍的吳梅生合計過，建造工人宿舍的資金，以一層樓九戶人家為一個單元，一年下來，百分之五的上繳利潤，打得寬一點只能造二十個單元，而住在市區的職工足有二十個單元的三倍。我和吳總工程師討論，得出的解決途徑：分期分批施工，廠部發動生產競賽，刺激工人增產，增加上繳利潤的基數。於是廠長辦公室在壁報上公佈了“建造新工房籌建組”的名單，頭一名是刁書記，其次是吳梅生和工會主席譚壽甫，還有基建科科長等等。工會主席同時發起了百日生產競賽運動。

我帶著職工代表會議一致通過的創議和成立新工房籌建組的名單去見馬天水部長（馬任市委副書記兼任工業部長），他對我在吳淞廠發動百日競賽一事頗為讚賞，我提出百分之五的廠長基金不夠造幾幢房屋，是不是可以動用明年的廠長基金？希望得到部長的許可。

馬部長不同意挪用明年的基金，說什麼：“我答應了你，別的廠效法，我就被動了”。

我當即回答說：“家屬宿舍造好，就解決了遠端接送工人上班的交通問題，廠裏負擔運輸車隊的經費，就可節省下來，職工的生產幹勁大，又節約了運輸隊的費用，這可是一舉兩得的改革咧”。

馬天水還是不肯點頭。後來我開後門去說服工業部財務處長，要他在帳目上預支明年的運輸費用。馬天水這才鬆口，要我在減去明年的運輸費用上簽字。我雖同意簽字，但給自己留個餘地，我說：“扣除運輸費的年月，應以職工宿舍落成之日為起點，做廠長的盲目簽字，如果辦不到工人可要看不起”。

我滿意而歸，馬上著手買下農民的土地，好在農民的土地已經歸公，每畝地作價只有三百餘元，農會代表提出失去耕地的農民應吸收子弟進廠就業。農民一下子成了工人階級，皆大歡喜。

離廠半里之遙的工人宿舍，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裏宣告落成。由工會派人驗收後，在廠長基金裏支錢辦了幾桌酒席，犒賞建築隊、新工房籌建組和剛剛轉為工人的農民。在慶祝筵席上，有人提出第一批新工房叫個什麼名稱呢？

我站起來提出：何不叫它工農新村呢？

至今，“工農新村”成了公交汽車站的站名，在上海地圖上也標明這個新站名。從頭到尾，王廠長注入了全副心血。與閔行的幾家有名的國營工廠如上海電機廠、汽輪機廠以及附近的上海機床廠比起來，他們都有廠長基金，可惜只用在每人發一套呢制服，或是改建公共食堂之類，缺乏深謀遠慮的眼光（第二年在老地方又建造了十多幢三層樓工房）。王廠長感到自豪者，我在離廠以後屢次被鬥得不是人，而矗立在上海地圖上的“工農新村”卻是打不倒砸不爛的永久紀念碑！

（第一部完）

為本刊封面敬告讀者

自從本刊第五期問世，許多讀者或投書，或來電，均詢問黃花崗紀念碑上的那一尊“自由女神像”是否為本刊所“移花接木”？

本刊特在此敬告讀者：不是。因為辛亥之後建造這座紀念碑時，她就已經高高地聳立在那裡了……如今她仍然高高地聳立在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的紀念碑頂，或許正在為我們這幾代不解歷史者和不識自由者，而黯然神傷吧！

孫國棟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我的“抗日從軍行”記實

(下篇)

二、二零一師炮四連

十萬知識青年軍分十個師，每師約一萬人。政大的學生編在二零一師，駐地在壁山，壁山是重慶市的衛星小鎮，本來無名，自從成為青年軍二零一師的駐地後，知名度大增，車隊離開小溫泉，便直駛往壁山。

車行約二小時，直入二零一師的師部，經過報到手續後，第一件事是各人選擇兵種以備編隊。我心裡有點躊躇，本來從軍已置生死於度外，無論那一種兵，大不了是戰死沙場而已。但我有點害怕步兵的肉搏戰。我覺得和敵人面對面，對準敵人的胸膛用刺刀猛刺，雖然是深仇大恨的敵人，仍是很殘酷的。所以我不願意參加步兵，改入炮兵。炮兵無論殺敵或被敵殺，都不要面對面的殺戮。於是我被編入炮兵第四連，政大的同學大多與我同編入“炮四連”。原來炮兵又細分不同的兵，其中犧牲率高達 78% 的是炮兵中的“前進觀察”兵，因為要深入敵人的陣地測量敵人的實力集中點，所以特別危險。“前進觀察”兵必需具備測量的技術。我忖度我的數學能力可以勝任，所以參加為“前進觀察”兵。

炮四連大約一百人，政大同學約十二、三人，現在記得名字的有九人：除我之外是張震東、黃典謨，李陰泰、袁廣馥、蔡繼善、郭宜奎、戴樹冉、徐立。中央大學約六、七人，現在記得名字的祇有陳家珏與

袁君範兩人。其餘多來自中學。有一人身份很特殊，自稱是軍政部的文職軍屬，已帶少將軍銜，為了響應從軍運動，願意來當二等戰鬥兵，這也是當時特有的愛國表現。

報到的翌日，清晨到師部集合，聽師長訓話。師長戴之奇是一位清矚的中年軍人，雙目炯炯有神，表現得沉著而堅定。講些勉勵的話，頗有文化修養。訓話後又解釋步兵操典的基本動作，僅“立正”一動作，他作多方面闡釋，頗有哲學的意味。如果是普通徵來的壯丁，恐怕會聽不懂。當講話時全體官兵都席地而坐，他一聲起立，卻能藉著雙膝的力量迅速立起，我們對他的印象很好。（聽說抗戰勝利後，他在內戰中戰死，這是非常可惜的）。

“炮四連”的連長身體頗魁梧，人也誠懇平和，很有親和力。他說帶學生兵很不容易，文化水平越高的兵越難帶。他認為文化水平與集體操作水平常成反比例。

入營的第三天，每人發步槍一枝（但沒有子彈）。教武器的教官指導運用步槍，要我們視武器為第二生命，愛惜武器，常常撫摸武器有如寵物。又講解機關槍的性能，指導我們如何分拆和再合成機關槍，我覺得這些實際的知識比大學中講理論的課目較新鮮有趣，連長要我們選出負責伙食的同學，辦理全連的伙食。青年軍的主食費和副食費都頗豐厚，比在學校時好些，我們選出徐同學辦理伙食，伙食十分好。

入營第四天，師部派來一位女政治指導員，教唱抗戰歌。她很年青，眉目娟秀，長髮垂肩，很有風致。大概也是青年從軍初入軍隊擔任政治工作的，所以顯得有點靦腆而矜持。她的歌聲很甜潤，所教的歌曲，其實我們早就會唱了，但為了愛聽她的歌喉，所以要她重教又重教。後來她發覺真相，愈發顯得靦腆，我們卻大笑。她說“你們使奸，戲弄於我，我不教了。”扭頭就走了，我們越發大笑。當了兵，行為就變得無賴。

師部規定每星期各連要集體會操比賽。第一週炮四連步伐參差不齊，成績最劣，得一面全黑色的落伍旗。此旗指定必須懸掛於連部辦公室。自從落伍旗懸掛以後，連長常常搖頭苦笑。可憐，落伍旗連續三次都由炮四連獲得，連長已受到申斥，炮四連的士兵依

舊理論多多而操作不齊。入營不到一個月，師部命令遷營房。新營房的環境很好，“綠樹村邊合，青山廓外斜”；頗有江南景色。可是營房的面積很小。尤其臥室臥榻不足，一張長長的木板床，中間並無間隔，晚上二三十人擠在一起，人人祇能側身而臥，不能平臥。人與人擠得太緊，無法轉身。如要轉身，必先招呼鄰睡的人，鄰人又要告訴他的鄰人，如此一排人大家一齊翻身。這一夜，各人又好氣，又好笑，天才微明，起床號還未響，各人已無法再睡。分配如此的軍營，人人憤憤不平，認定必是建造營房的軍需貪污。正當各人情緒激動時，有人說戴師長正經過營地附近，於是大夥兒衝出營房把戴師長重重圍住，報告營房的情形，戴師長也很氣憤，答應立即轉換新營房，並說要徹查此事，又鼓勵我們以後如發現不合理的事，可以隨時直接向他報告，他必設法改進。果然，當天下午遷往新營房。從此凡軍中的不合理事，事無大小都有人到師部投訴。於是師部覺得炮四連太麻煩。政治主任乃下令以後有事情要上報的，必須先報告連長，由連長轉報。炮四連同人認為政治主任違背了師長的諾言，不接受政治主任的命令，遇事仍直接到師部報告。從此師部有人傳說炮四連有搗亂份子。每次會操時，又總是落伍旗不斷。於是，連長被調職，我們都感抱歉，但無可奈何，新來的連長聽說是復旦大學的教官，白臉，瘦小，很深沉，有城府，處事很小心而圓滑，與舊連長的坦誠大不同，與炮四連同仁雖不甚融洽，但仍勉強可以維持關繫。每週的落伍旗仍是落在炮四連頭上。炮四連又連續發生了幾件不愉快的事。

第一件是由攔截重慶某將軍夫人的小汽車而引起。

原來壁山公路上的巡邏任務是由各連輪流負責的。當晚，正由炮四連負責巡邏。壁山是重慶的衛星小鎮，重慶因受日軍飛機集中轟炸，於是軍部的將軍們多把眷屬安置在附近小鎮，所以壁山時常有軍眷乘小汽車出入重慶。當時汽油難得，報章日日宣傳“一滴汽油一滴血”，炮四連巡邏隊認為汽油絕不應浪費，非有重要公事，不應乘坐小汽車，祇能乘坐公共車。當晚截停了三部乘載軍眷的小汽車。其中有輛車上的將軍夫人很有教養，當我們說出請她們改乘公共車的理由時，她們說：“很對，很對。辛苦你們了”

便自動下車。但有一部小汽車的女主人態度惡劣。她問“你們是二〇一師的嗎？請戴師長來說話”。我們說：“戴師長很忙，沒有空。”她說“不是已下了班嗎？為什麼還會很忙？”我們說：“抗戰時期，無分上班下班，都忙。”她頭一仰，嘴角一挑說：“難道蔣委員長夫人經過也要下車嗎？”我們說：“如果蔣夫人不是辦公事，當然也得下車。”她問：“你們是那一連？”我們大聲回答：“炮兵第四連。”她悻悻然說：“好，我下車，下次我與蔣夫人同來，看你們怎樣。”我們說：“我們不怎樣，祇請你和蔣夫人一起坐公共車。”當晚，很不巧，公共車卻誤時，將軍夫人們久候，然後公共車才來。翌日，已有謠言，說壁山炮四連的巡邏隊有搗亂份子。

第二件事是因我們往北溫泉沐浴而引起的。

軍營中洗澡比較不方便，新連長為了安撫炮四連的青年軍，特地由他帶領列隊到北溫泉洗澡。當經過一豪宅時。宅內走出三條大狼犬對隊伍狂吠。連長用手杖打狗。不料宅中走出一彪形大漢，大吼連長：“你是什麼人，亂打狗？”連長大聲回答說：“我是中國人，二〇一師炮兵第四連連長。我帶隊伍經過，你不制止瘋狗，反而責我打狗，你是侮辱中國軍人。”我本來對這位連長不大好感，但聽了他這番話，對他的印象稍為改變了，不禁喝了一聲彩“好”！可能其他的同學也有同樣的心意，竟有人大叫：“我們先打兩腳狗，再打四腳狗。”於是不少人同聲喝打兩腳狗，那大漢害怕了，狼狽地叱喝三隻狼狗走入豪宅。第二天又有人傳說炮四連有搗亂份子在鬧事。

第三件是一位中央大學的從軍同學，竟用軍帽作為射擊的目標物。軍帽上鑲有青天白日的黨徽，這同學不知是一時的疏忽，還是真的別有用心。但這事一經傳說，就成了帶有政治性的反黨國行爲。

這幾件事傳揚開來，我就預感到將會有不愉快的事發生。因為軍隊中最容不得搗亂份子，既懷疑有搗亂份子，就不會放過，何況炮四連不斷得落伍旗埋。

過了兩天，師部宣佈要派一些高知識水準的軍士到印度藍伽接受機械化訓練，願意參加的自動報名，條件是自信數學水平可以應付的。我頗有此自信，於是立即簽名參加，炮四連的大學生，大都簽名參加。

又過了兩天，在營房附近的打靶場舉行機關槍實彈射擊練習，打靶場院的一邊是機關槍陣地，對面距離約二百公尺處有一道戰壕，檢查員躲在戰壕內，從戰壕底豎起一塊可以上下轉動的木牌。牌上畫上紅心作為射擊的目標，射擊後，目標牌轉入戰爭壕內，讓檢查員檢視目標物，如無彈痕，會舉起一隻紙製的烏龜，表示沒有擊中目標。我那次連發五槍，對面都沒有舉烏龜，表示我已擊中目標。我正十分高興，忽然集合號角響起，我們立即停止射擊跑步集合。原來師部來了一位軍官，宣讀派往印度藍伽接受機械化訓練者的名單。名單中有我的名字，炮四連中的大學生大都列名。那軍官並宣佈限令十分鐘即出發，各人立即返營收拾行裝來此地集合。我覺得時限太緊，一時情急，大聲請求延長三十分鐘出發，讓我們和同學告別。那軍官諷刺地說：“是不是還要吃了送行酒才出發？”跟著厲聲說“不可以延遲，這是軍令，遲到的受軍法處分。”我不得已，跑步回營房，收拾最簡單的行囊，有一位排長平日和我的私交不錯，勸我不要去，他願替我說話。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說：“我為什麼不去，我是自願參加的，豈能臨時退縮。”我不領他的情，匆匆跑到集合地點，這時有幾輛運輸車已升火待發。我發覺炮四連的幾位好朋友和連長都在，登車的人除炮四連外，其他各連的人共約百餘人。車隊隨即開行。經過師部，師長沒有出現，有同學埋怨師長無情。車隊直赴重慶附近的白市驛機場。白市驛機場是當時軍事運輸中心，出國的班機多由此機場轉運。當天沒有班機，我們留宿在機場的宿舍。晚上，有一位少將高級參謀來講話說，你們明日將飛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入印度。能飛越駝峰是人生極難得極光輝的事，聽得我們人人興奮，恨不得立即成行。但是候了三天仍無消息，人人等得不耐煩，要連長去催促。第四天成行了，我們上了飛機，一心以為將飛越駝峰，正待觀看駝峰的景色。誰知祇飛行一會兒便降落昆明機場，（當時調往印度藍伽受訓的還有其他師的青年軍，二零一師的青年軍降落昆明機場，其他各師的飛機多降落昆明附近的宜良機場，後來都集中於昆明）。昆明的陸軍總司令部把我們安置在新兵接待所，等待出國的班機。在接待所無事可做，我和十幾位同胞結伴遊覽昆明城，滇池，上大觀樓讀有名的長聯。當時社會人士看重知識青年從軍，尤其是昆明

人。因為二零七師青年軍就駐在昆明，所以對青年軍特別瞭解與關切。我們每經過些麵食店，他們常邀請入內免費招待，詢問一些有關青年從軍的事。我們也毫不客氣接受招待，所以在昆明雖身在征途，卻感到很愜意，與昆明晴朗的天氣相應。第五天，陸軍總司令部在接待所貼出告示，說明天有班機，要我們明早七時到操場集合。我們七時到達大操場，人數約二百餘人，列隊等候。

七時半，一小隊軍官帶領十幾位美軍醫官來，要我們就地脫衣服，前後轉身，醫官用小棒在我們跨下挑撥檢查，據說主要檢查性病，結果二百餘人都通過檢查，穿棉軍服上運輸車直往機場上機。在飛機上我們很興奮，高談闊論，以為這一次一定是直飛印度接受機械化訓練，以後不必再作步兵行軍了。因為在國內的行軍訓練，是一大苦事——背著幾十斤重的裝備，長途步行，腰痛欲折，苦不堪言，現在可以解脫此苦了。誰知歡笑未完，飛機已降落，機長命令出機艙，一出艙門，灼熱的黃沙撲面，我們仍穿著棉軍服，熱得難以忍耐。眼前一片沙漠，遠望有叢林，我們茫然，不知身在何所。祇見不少美國憲兵往來巡視，我們問美國憲兵。美兵說這是緬甸密支那。我們以為飛機加油後再飛印度。不料一會兒飛機都飛走了。我們滿腹狐疑，祇見一大隊運輸車，帶來一批中國軍官，他們全不答我們的問題，祇喝令我們上車。我們糊裡糊塗地上車。車直往叢林中開去，叢林中原有一道小溪，溪邊一片空地，建成一所簡陋的軍營，營前有一面橫額寫著中國字“密支那汀江辦事處”。我們然後知道此地確是“緬甸密支那”，不是“印度藍伽”。軍營中走出一隊穿美式黃卡基制服的中國軍人，領首的帶著中校軍銜，後面跟著一隊軍官和運輸車，軍官喝令我們脫下身上所有衣服，不準留下任何物件，然後把衣服堆成一大堆，澆上汽油，一把火燒了，幸好我把隨身帶著的一本殘破的‘稼軒集’偷偷埋在沙裡未被燒去。接著軍官喝令各人依次下溪洗澡，洗畢上岸時，有士兵拿著噴射器向各人全身噴射，說是消毒。然後每人派發襯衣、短褲、膠鞋一雙、乾糧一盒。這個澡的確洗得清爽涼快。洗澡後，打開乾糧盒，內有蜜棗糕一片、餅乾一包、維他命一粒、乾奶粉一包、香菸半包、紙杯一隻，另有防蚊油一瓶。這時正感饑餓，運輸車上有開水，於是我們泡

奶粉、吃乾糧，倒覺特別有滋味。但始終不知此身何以在此。吃完乾糧，軍官命各人排成長隊，到軍營裡注射防疫針，很大一筒防疫液注射在左臀部，一位王同學，一被注射，立即昏倒，軍士把他架開，幸好不久便蘇醒。眾人注射防疫針後，重上運輸車。我偷偷將埋在沙下的幾頁稼軒詞取回，然後上車。每車約四五十人，人滿開車，直向另一森林駛去，我們完全不知東南西北，祇是任由擺佈。車行約半小時，又進入另一森林，森林中有幾條岔路，車輛或入東路，或入西路，大約有三四輛車子走與我車相同的路口。入森林不遠處，有一簡陋的軍營，標著：“新一軍新三十八師新兵營”的橫額。我們人人驚疑，不知所措。車隊入了新兵營，營裡走出幾位赤膊的年青兵士，皮膚曬得黝黑，面無表情，自稱是上士班長，喝令各人下車，按高矮排列，然後他帶隊進入一室，室中有理髮師數人，一言不發，把各人的頭髮全部剃去，人人頓成光頭。我們自從軍以來，仍留著頭髮，忽然間變成光頭，有些同學幾乎不認識，重問姓名，才知是舊識，唯有相視苦笑。班長又喝令光頭兵排好隊伍，有一位帶少尉軍銜的排長出來。他穿得很齊整，扶正軍帽，很莊重地說：“我來教你們唱‘三民主義’，唱‘三民主義’時，大家要立正，態度要端莊。”於是拉開喉嚨唱“三民主義”。他唱一句，要我們跟著唱一句。我們說“我們懂得唱國歌”。他說：“不錯，不錯，是國歌。你們懂得唱？試唱給我聽。”他一面說，一面受不住熱浪，頻頻掀開軍帽拭汗。原來他是個癩疥頭。於是我們齊唱國歌。他立刻立正端莊，又不禁眉飛色舞，連說：“唱得好，唱得好。”要我們再唱一次，於是我們再唱，他笑吟吟地走入連部辦公室把連長請來，說：“這班新兵竟然懂得唱‘三民主義’，而且唱得比我更好聽。”連長是位很精壯的上尉軍官，也很驚異地要我們再唱國歌，於是我們又唱，而且人人唱得特別賣力，有感情。連長很奇怪地問：“你們家鄉在何處，由那一省徵來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十萬知識青年軍，現調往印度藍伽受機械化訓練的。”連長對“知識青年從軍”一事一無所知，他說“你們是國內調派來此補充新一軍的壯丁”，“你們既已來此，就應該接受此地的訓練，你們既是大學、中學的知識青年，一定比甲級壯丁精良，譬如你們唱國歌，可以不待教導就比壯丁好。”

唱完國歌，每人發給軍服，背囊等物，都是美式裝備。又分配寢室。全軍營，無論牆壁、檯椅、睡床，全用竹片織成，晚上亦無被褥，塗防蚊水以代帳。翌日，即接受極嚴格的操練，不容許隨便說話，有些同學，自矜身份，表示是大學生，不料有位班長兇巴巴地說：“我就是整治大學生的。”新一軍與炮四連的新兵訓練大不相同，要求非常嚴格，我們祇好努力地默默忍受。過了二天，忽然有人傳播耳語，說我們本來要赴印度藍伽受訓的，現在卻來了緬甸補充新一軍，錯處由於在白市驛站下，當時政府調一批甲級壯丁來緬甸補充新一軍，因為我們久候班機，而且青年軍名氣較壯丁大些，於是把原來運壯丁的班機讓給我們，以致錯飛緬甸，如果現在再不到汀江辦事處糾正錯誤，則那一批甲級壯丁將代替青年軍赴印度，以後再無法矯正錯誤，並約定明早起床時即在新兵營外溪邊集合，與隔壁五十師營內的青年軍會合一起往汀江辦事處。這一流言傳播很快，當晚人人都知道了，我無從辨真偽，祇希望真能如此，矯正錯誤。翌晨起床號響起，各人真的到營內指定的地點集合。疥頭排長進來宿舍，高聲說：“聽說你們要到汀江辦事處改正錯誤，我勸你們不要輕舉妄動，這是很危險的，在軍隊中鬧事是很危險的，祇要不發給養，你們就全部餓死，憲兵又會逮人，受軍法處置，那時候便後悔無及了。”我們全不理會他的勸告，仍是衝出營外溪邊集合。他真好心腸，拿了幾袋乾糧出來說：“勸你們不聽，就多帶些乾糧吧。”每人分給三四包餅乾。那時五十師的營門已架起機關槍，不讓青年軍出溪邊，我們得知五十師的青年軍不能出來，祇好列隊出發，大約步行三四個鐘頭，回到汀江辦事處，辦事處主任早已得通報，帶著一隊士兵持武器出營。喝問這次騷動行為誰是領袖，誰是代表？我們說：“沒有領袖，也沒有代表。我們人人都是領袖、代表。我們祇是來請求改正錯誤，不是作亂。”他說：“好，派四位代表，跟我來看命令。”於是我們選出四個代表，我是其中之一，跟著主任入營看命令。那主任取出遠征軍部的命令。果然說：這幾架編號的運輸機是運載壯丁，用以補充新一軍。那主任說：“我沒有弄錯，完全依照軍令辦事。如果你們認為白市驛出了錯，你們向白市驛的機關交涉，我祇能遵軍令行事，你們如立即返回新兵營，我可以用運輸車送你們走，不然，我

祇好報告軍部，聽候處置。”我們四人面面相覷。果然錯處不在汀江，我們又如何可以再回白市驛改正呢？於是將交涉情況報告各同學。這時，五十師的青年軍，也不知是如何也衝過機關槍的，竟零零落落地趕到了，知道了交涉的結果，十分失望。這時人人疲乏不堪，賴在地上。一會兒汀江辦事處主任出來，並帶回幾部運輸車，宣佈：“如果願意回新兵營的可以上車，我已報告孫軍長，孫軍長說：‘鬧事的軍人不發給養’。不一會，一團憲兵來，把我們團團圍著，我們憤懣交加，臥倒在沙灘上。我細細回想整個事件過程，認為在二零一師時，由於幾件不愉快的事件和不斷的落伍旗，師部已認定其中有搗亂分子，尤以炮四連的大學生為多，乃下決心整頓，藉口派赴印度受機械化訓練為名，其實是以甲級壯丁補充遠征軍。又為了防止搗亂分子煽動作亂，所以要設計令各人自動請纓參加。其實是照他們的意思辦理。這是一招清師行動，其他各師，恐怕也有同樣情形，這真是所謂“兵不厭詐”，當然亦有可能是一如傳言所稱，原是派我們赴印度受訓的，祇因為在白市驛不耐久候班機，弄錯了，來了緬甸。被另一批壯丁代替去了印度。如果真是如此，現在大錯已鑄成，我們又如何能重返白市驛改正錯誤呢？所以現在祇有一條路：就是重返新兵營。但是，當時的心情無法適應重返新兵營。果然當晚沒有發給養，我們祇飲溪水吃身邊的乾糧。翌日早晨，汀江辦事處主任帶了兩輛運輸車來，車上滿裝食物，他宣佈願意返新兵營的可以上車隨意飲食。結果有人上車，我們不上車的同學在沙地上又空腹臥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清晨，汀江辦事處主任又帶來兩部運輸車和食物，於是不少同學因支持不下，蹣跚上車。我仍是不服氣又饑腸輾轉的在沙上睡了一夜。這一夜我想起以前讀過的一篇文章：講述一個傷兵躺臥戰場的心境，他後悔以前辜負了許多人對他的情意，又把不少好時光浪費在庸俗的物欲追求上。他心想如果說這次能不死回去，他必重新安排以後的生活，對所愛的人如何體貼愛護，拋棄庸俗的欲望與至親至愛的人享受有情意的真生活。我當時雖未受傷，但處境和那傷兵有點相似。於是想著此次如能不死勝利歸去，會如何對我所愛的人補過，如何拋棄一切庸俗的念頭共度美好真情的生活。正當我浮想連翩時，睡在沙地上的同學有人嗚咽而哭。我暗暗地說：丈夫

有淚不輕彈，如何就哭了？這哭聲反而激發我的豪氣，放開心懷，竟朦朧睡去。天才放明，汀江辦事處主任又率領兩輛運輸車來，這是第四天了，他喝道：“你們回去不回去？不願回去的就給憲兵管吧！”跟著，他就下令士兵把我們全部拖上車。

車子回到新三十八師新兵營，我們雖在車上吃過乾糧，下車時步履仍很艱難。幾位班長最是無情，面目特別難看，眼神兇狠，好像表示你們現在不是青年軍了，要接受我的命令了，唯有那位疥頭排長最和善。他勸我們安心在此受訓，還勉勵我們說：“我原來也是二等兵和你們一樣。經幾場戰事我便升為少尉排長了，你們也可以很快升為排長的。”他的話使我們更傷心失望。我們豈是為一少尉軍職來，如果為一少尉而來，我們當初何不參加作政治指導員立即帶少校軍銜呢！“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疥頭排長雖很善良，但對我們實在太不瞭解了。

重回新兵營的第二天，連長派給每人一把砍刀，命各人赤膊，由兇惡的班長帶著去竹林斬竹，建造新營房。竹林十分陰森而清涼。但竹竿相當大。有大碗口粗，與國內搖曳有致的青青竹竿不同，很不容易才砍下一根，一根長三四丈，十分重，拖行很困難。我們拖不動時，便把竹子截短一段。回到營房時，每根竹子祇剩下丈餘長。連長見了大怒說：“這種短竹，老兵可以一手挾四五根，現在罰你們不得休息，再去斬竹，至少要比這次多三倍。”我們祇好再去斬竹，乖乖地把長竹拖回。在烈日下，赤膊，用肩頭把竹拖回，結果兩肩都滲血，背部曬得脫皮，連長仍然未滿意，要我們以後多鍛煉體力、臂力。每日砍竹、削竹建造營房之外，訓練亦極嚴格，我們祇好咬緊牙，堅強地忍耐下去。

到新兵營後好不容易已半月了，仍未見過營長，每日祇由連長、排長、班長訓練。一日偶然聽說營長名“崔德新”。我有如觸電一般感覺，我記得政治大學有一位教官就名叫“崔德新”，是我在校時特別注意的。他高高的鼻梁，靈活的眼睛，樣子很清秀，而且好學不倦，口袋中時常帶著書本，凡是有名的教授演講，必見他站在門外聽。有一次，中華交響樂團來演奏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的樂章，其他教官多半途打瞌睡，而他從頭到尾，表現得很欣賞，與其他教官不同，引起我的注意。我懷疑此新兵營營長

“崔德新”，就是政大教官“崔德新”。於是請連長帶我去見營長。果然，正是政大的教官“崔德新”，他也很詫異我會來緬甸當了新一軍的新兵。於是我把從軍的始末和來此的經過，詳細向他報告。他說自從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參加遠征軍以後，對國內的事很陌生，根本不知道有“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他立即電話報告孫軍長，並說孫軍長明天會來巡視。（崔德新是韓國人，抗日戰爭時加入中國軍隊。抗戰勝利後，韓國擺脫日本統治獨立，崔德新成爲南韓第一任駐聯合國大使）。

翌日，孫軍長來新兵營。我久聞孫立人將軍之名，以前從未見其人。在遠征軍中，無論中、英、美三國軍人，無不敬重孫立人將軍。果然他英姿挺拔，卓立不群，不怒而威，而又風度瀟灑，的確是位非常人物，無怪乎戰績彪炳，名動國際。他先作簡短的講話，大意說：“我很敬重你們當國家困難時投筆從戎，捨身爲國。你們既然以身許國，便應遵從國家的命令，不必追問原因，到印度與到緬甸都是一樣的。新一軍是一支光榮的軍隊，我相信你們參加了新一軍，一定更能發揮你們報國的心願。請你們安心在此地接受訓練吧。”他說完又巡視我們排列的隊伍。各人向他報告名字和學歷、籍貫，他或問一兩句話或微笑點頭。他知我與他同姓，於是問我的學歷、籍貫。他說他也曾在政大工作。並輕輕用拳按我的前胸說：“很精神，很精神。”從此，我們便留在密支那成爲新一軍的步兵。

新兵營的訓練非常嚴格，每早起床號響起，十分鐘之內要完成盥洗、大小便、穿好軍服、打好綁腿，在操場站好 U 字“講話隊形”。當第二次號聲一響，各人必須原地站立，不能移動，未到達“講話隊形”的要用標準的“伏地進行”姿式進入隊形。然後聽連長講話，說明當日訓練的項目。聽講畢，隨即跑步約半小時。然後早餐。早餐後十分鐘即開始當天艱苦的訓練項目。正午休息十分鐘，午餐，午餐後二十分鐘又繼續訓練，直至六時半晚餐。晚餐後自由活動。十時號角響就寢。對時間和動作的要求非常嚴格。由於起床號到集合號相隔祇有十分鐘，很難完成晨起的各種必須活動。尤其大小便，所以同學們在操練進行時遺尿是常有的。跑步落伍被處罰也是常有的。有一次，我跑步稍慢，班長槌我的背，要我加速，我已無

力加速，他再用大力槌我的背，我心中甚憤怒，認爲此人無理又無情，但無可奈何，祇好竭力加速。翌日早晨，第二次號角響起，我距離“講話隊形”尚有十餘丈，於是以伏地行軍姿式進入隊伍。伏地行軍的姿勢必須全身挺直俯伏地面，祇用兩肘，兩膝及腳尖之力運動進行，臀部不能稍高，我當時可能臀部稍高，又是那位不近人情的班長用穿著軍靴的腳大力踩我的臀部。我覺得受了侮辱，又兼昨日被槌背的憤怒，不自覺的站起來斥責他侮辱我。他大怒，揮拳擊中我的左肩，第二拳再來，我一臂擋開。連長跑來大喝：“不準打架”。班長說：“他不服指導”。連長認爲我不受指導，犯規，要受禁閉處罰。把我關入一間如大木箱的禁閉室中。每頓由小窗送入鹽水飯。室內黑暗，祇有一床，一桌，一糞桶。其實我覺得禁閉比操練要舒服。因爲頭腦比較能思索。操練時，不但身體要隨號令動作，不得有半點錯誤，頭腦爲了應付動作，也不容你有思考的時間。禁閉反而可以任情思考。雖身在囚室，而思想反可以海闊天空。經兩天禁閉後，出禁閉室時，照規定所有新兵要在禁閉室外列隊鼓掌歡迎。連長宣佈說：“此人已改過自新，重作新人。”我心裡暗暗好笑，我何曾有錯？而今又如何改過自新了。這樣的禁閉就可以使我重作新人？未免太幼稚了。實在說，禁閉完結，最使我快慰的是走出禁閉室門時，所立即感受到的燦爛陽光。

第二次是當哨兵是幾乎要受處分。

在叢林裡當哨兵，最難忍受的不是敵人偷襲的危險感，而是陰森冷酷的孤寂感。我守崗的那夜，因爲白天操練已很疲勞，有點睡意，站崗之初，森林四周，時常發出沙沙之聲，似有人輕步而來，有被敵人窺伺的感覺，反而睡意全消。後來發覺這聲音祇是些小動物經過乾葉時發出的聲響，於是精神漸漸鬆弛了，倦意悠然再起，正在神思恍惚中。那位無情的班長突然出現，指責我未專心守崗，全無警覺，如有敵人偷襲，如何是好。我自覺疏忽，無法自辯。他立即報告連長，要重重處罰我，那位頭頭排長說：“一個初上戰場的學生，有膽量在叢林中一人站崗，已不容易。”連長也同意。祇囑我下次要警覺些，沒有處罰我。原來在緬甸的叢林戰場，美軍站崗常是二人背對背的站雙崗；英軍則常背對背四人站一崗，中國兵則一人站單崗。

不久，崔德新升級，調任其他職務，一位新營長到任，這位營長，身材高瘦，人頗和平，但不及崔德新幹練，他似乎頗喜歡唱歌，晚上，常聽他低聲哼歌。自從珍珠港事變之後，中、美兩國聯合作戰，不少美軍調來中國戰場，因此有些美國軍歌在重慶也頗流行。美國的軍歌風格不似中國軍歌的悲壯嚴肅，而是很輕快的。當時有一首流行的美國軍歌“The Army of Mr. Jones”，新營長問我懂不懂得唱？我說：“懂。”幾天後，他調我到廚房工作，不必出操。他要我教他唱。可能我的伙頭軍工作做得不好，也可能他已懂得唱“The Army of Mr. Jones”了，一星期後要我重新出操。有一次他又命我帶幾個同學去掘糞坑。我不知如何掘法，於是掘了一個 U 形的糞坑。疥頭排長來巡視，他說：“這是什麼糞坑，面對面的？”我答道：“這是講話隊形嘛。”他哈哈大笑說：“拉屎也要講話隊形麼？要得，要得。”又不禁哈哈大笑。

在新兵營受訓，最愉快的是晚餐後自由活動的時光。我們通常利用這時間到伊洛雅底江洗澡。伊洛雅底江是從千里外的高山流下來的雪水，冰涼清澈，把我們全日的汗漬與辛勞洗得乾乾淨淨。營長也和我們一起洗，不過他是穿著內褲，不同於我們大兵人人赤條條的。洗澡時，我們在江邊沙灘上縱情高歌，恣意奔馳，把整個身體與靈魂都投入大自然中，祇見天風、江水、原野、與一群青春躍動的生命，真是天人合一，使人寵辱不驚，生死兩忘，把人世的俗情俗念完全拋卻，享受著人間的至善至美。

有一次，有一位北方同學，爲了對岸樹林的誘惑，竟不自量力要游過對岸。豈料他游到中間，水流湍急，被水沖往下游，不得到岸，載浮載沉，非常危急。一位善泳的蔡同學，立即游往救人，又大聲呼叫，我聞聲往救，但水流湍急，全力以赴，幸好蔡君已追及溺水的北方同學，用力推他近岸，我也及時趕到，合二人之力把他拖到對岸沙灘。一到沙灘，三人都乏力有如虛脫，臥倒沙上。一會，蔡君難忍怒氣，攔了他兩記耳光，罵他不自量力幾乎害死三人。我們在沙灘上休息，待體力復原後，沿岸尋找較爲可以橫渡之處，後來發現一處江面較寬水勢較緩，中間有淺灘，然後才渡江返營。

除了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之外，較有興趣的是到美軍的 SOS 合作社購買高級的巧克力糖。美國把全國最好的巧克力運到前線，供軍人享用，而且價錢極便宜。美國軍人也常購買郵寄回家。我們的月餉雖極微薄，仍可買得到。在晚飯後的自由活動時間，吃最佳的巧克力糖，抽乾糧盒內的香菸，找二三同學在森林幽僻處聊天，也是極有情調的，這可是勞苦訓練生涯中的大享受。

有一天，疥頭排長帶我們作行軍訓練，我們在一處林蔭下休息。有幾個面目姣好的白夷姑娘走過，自動地來到我們面前，扭動身體跳起舞來。我們感覺很驚異而有趣。疥頭排長問我們見過白夷姑娘麼？我告訴他祇聞白夷姑娘之名，但從未見過白夷。疥頭排長笑著說：“今晚自由活動時間讓我帶你們去白夷村見識見識。”果然，當晚疥頭排長約我和三位同學往白夷村。排長告訴我們，日軍在此地時，對白夷村焚燒擄掠，姦淫婦女，白夷人多逃亡，但遍地烽火，逃亡不易，有些祇得留下，可是到處乏糧，婦女不得已向盟軍以身換糧，疥頭排長對此似乎很感興趣。到了白夷村，全村已被夷平，而今祇在廢墟中再搭起兩三間竹編的房子，每座房子的寢室好像都在上層，下層都四面敞開像間亭子。有一亭子，地上鋪了紡織物，有四位白夷姑娘或躺或坐，上身穿著花色緊身的短衣，下身圍著一條彩色的沙龍。薄施脂粉，面目都頗姣好。其中三位年紀較長，約三十多歲，一位年紀較輕，看來祇得十八九歲。疥頭排長圍著敞開的亭子四面觀看，指指點點。白夷姑娘見人來，既不打招呼，也不問話，任人觀看，好像未見到來人。祇有那較年青的姑娘有點害羞，低頭弄著沙龍的邊沿。過了一會，一位頭上戴著鮮花的姑娘用白夷語與疥頭排長說話。不知他們說些什麼，祇見疥頭排長指一指我們四人，幾位姑娘向我們投下一眼，都微微點頭，低頭的小姑娘稍抬頭向我們一瞥，又把頭低下。排長對插花的姑娘說了幾句話。她點了點頭。排長問我們說：“你們留下還是回營。”我們四人都說：“回營”。排長對插花的姑娘兩手一攤，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幾位姑娘有點失望的表情。我心裡似乎起一點歉意，摸一摸褲袋，希望找到一些巧克力送給她們表示善意。可惜兩袋空空，不禁有點惆悵。於是，我們四人回頭走返營的路，疥頭排長留下來，沿途我們默默

沒有說話，祇聽一位中央大學的同學低聲說：“可憐，可憐。”第二天，見到疥頭排長，他用四川話對我們四人說：“格老子，不對頭啊，你們這些小娃娃，這裡是戰場嘛，可能明天就臥倒，你們怕啥子？真是要不得。”我們祇有苦笑。

我們沿著伊洛雅底江又遷了一次營，又做了不少砍竹子、建營房的勞動。幸好自由活動的時間仍可以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任情高歌、奔馳。在新營地附近，我發現一個濃陰蒼郁的幽谷。我常常一人帶著殘破的稼軒詞到那裡誦讀，點一枝香菸，放縱遐思。新一軍政治部有一位姓余的中校政治指導員也常來此幽谷。我們漸漸有交往，他知道我本是參加青年從軍而來到此地，對我表示好感。他思家念國之情時現於辭色。當談到國事時，他神采飛揚，對抗戰有堅強的信心。提到家事，則惆悵嘆息，他告訴我一些家庭的故事。他是一個真摯而誠實的人，我們不久就結成良友。有一次，我們在此谷約會，我先到，在徘徊等候他時，忽然發現大石下壓著一張紙條，竟有中國字，紙條已變黃。我小心地抽出紙條，原來是幾句短句，但情高意真，動人心弦。紙的前端已殘破，字跡模糊不可辨認，大概是敘述作者的情懷。下面是：“願在身爲影，願在衣爲綃，一十二萬年，永不各分飄，嗟哉天地久，何以慰寂寥。”我很懷疑在此蠻荒戰地，竟有如此深情的中國人，實不可解。余君來，我把紙條給他看。他說一點也不奇怪，軍政治部有不少政治指導員，以前也常來此幽谷，一定是一位深情的政治指導員留下的。人孰無情，人孰無離情。我回憶起在政大元旦入伍時，就有一對戀人依依而別。戰時，別離的戀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雖然祇受訓練，還未直接參與戰鬥，但對緬甸的戰事很想知道，常請老兵告訴我當地的戰鬥實況。疥頭排長對新兵最友善，最喜歡講述戰場上的經歷，他認為讓娃娃兵多瞭解戰場情形。作戰時就會較爲鎮定、較爲勇敢。新一軍的軍人提起遠征軍的戰史，一定不會遺漏仁安羌之役。尤其疥頭排長，聽到仁安羌三字，他即大叫：“我曾參加仁安羌之役。”於是我們請他講述仁安羌之役，他必十分興奮。他是四川人，立即土語俗言，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講述當年仁安羌之役的經過。他平日給人的印象是文化水平很低。連國歌都說成“唱三民主義”。但講述仁安羌之

役，則不但條理清楚，連英軍將領的名字也背得出，可能他已講述過多次了。有一次，他敘述仁安羌之役很詳細，很動人，祇聽他說：

“孫立人將軍當年是新三十八師的中將師長，三十八師有三個團：一一二團，團長叫陳鳴人。一一三團，團長叫劉放吾。一一四團，團長叫李鳴。李鳴就是現在咱們新三十八師的師長。孫將軍奉蔣委員長的命令鎮守‘曼德勒’”。

他說到蔣委員長時立即立正，雙腳合攏，軍鞋“啪”的一聲響，然後繼續說：

“好家伙，仁安羌之役呀，是孫將軍親自指揮一一三團把日本鬼子‘蘿蔔頭’殺得落荒而逃，救了英兵七千人。我當時正是一一三團的戰鬥兵，受過孫將軍很嚴格的訓練。格老子，真是鋼筋鐵骨，一身是膽呀。你們看看要不要得。”

他捲起兩袖，露出凸起的肌肉，要我們摸，果然是堅硬如鐵。他抹抹嘴角的唾沫，清一清喉嚨又神氣活現地說：

“當年英軍被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仁安羌。日本‘蘿蔔頭’把仁安羌四周的有利陣地統統佔據了。英兵好像甕中的烏龜，等待日軍擒拿。英軍沒有糧、沒有水，快要餓死、渴死，非常危險。英軍的司令官認爲，啥都無得救，祇好懇求中國派兵救援。英軍的司令官叫‘望夫山大’，呀，不對，不對。我記錯了，他叫亞力山大將軍。他找到中國遠征軍司令部。格老子，就是羅司令和杜副司令，爲了亞力山大的面子，竟然答應撥新三十八師中的一一三團歸亞力山大指揮去救英兵。孫將軍知道了，大怒說：“豈有此理，這命令不對頭，英軍剛剛被打得大敗，士氣低落，七千人不敵突圍，一一三團不過一千人，而且亞力山大和中國士兵，心不通，情不洽，言語不懂，如何能指揮作戰。一一三團豈非白白去送死”。於是連夜趕到司令部，要改正命令，不能把一一三團交給亞力山大。他們由太陽下山爭論到太陽上山，司令部就是不肯改。孫將軍說：‘要救出英兵，除非由一位與士兵心意相通的中國將領指揮，上下一條心，發揮最大的攻擊精神，或者可以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圍。’羅、杜兩人說：“現在誰人願負這艱難的責任？”孫將軍說：“我願。即使打死了，也和一一三團的士兵一起死。一切責任我願意承擔。”然後司令部才答應

收回把一一三團交由英軍指揮的命令。於是孫將軍立刻趕到前線。一一三團的官兵知道由孫將軍親自指揮，都高興得大叫，精神振奮。我當時的確願意即使戰死十次，也要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圍，這場仗一定可以勝。

“孫將軍到了前線，又因作戰計劃和英軍的第一軍團長‘阿林的媽’（譯名應是‘格林姆’）的意見不同起爭論。‘阿林的媽’要立刻進攻。孫將軍主張拂曉進攻。你們曉得嗎？拂曉就是天快要亮最黑暗的時候。孫將軍認為現在進攻，日本鬼子容易知道我們的實力。現在我們應先查清地勢，待明早天將亮未亮最黑暗時候突然發動攻勢，日本鬼子正睡眼朦朧，突然之間不容易知道我們的實力，以為我們有大量援軍，在他們狐疑之時，殺他個措手不及，才可以以少勝眾。‘阿林的媽’被孫將軍說服了，還把戰車隊和炮兵隊交給孫將軍指揮。把英皇的軍隊交由中國將軍指揮，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真是要得。孫將軍詳細探明地勢之後，格老子，下令衝鋒，我一聽號令，發揮最高度訓練出來的技能，一跳就是十幾尺，心中祇知衝鋒，其他什麼都不知。連殺了多少蘿蔔頭也不知。當我們衝破了日本鬼子的重圍，仁安羌被圍的英兵見到我們時，他們都豎起大姆指用中國話大叫‘中國萬歲，中國萬歲。’有幾個英兵把我抱起，拋起，把我的軍帽弄脫了，露出癩疥頭，那幾個英兵還爭著用嘴親我的疥頭哩。從此，中國軍隊揚威緬甸戰場，孫將軍接受了英皇頒發的獎狀。這次，一一三團犧牲了二百多人，殺死了鬼子蘿蔔頭一千多人，救出英兵七千人。”

他說到淋漓處竟笑出眼淚，我們聽眾都激動得大叫。疥頭排長雖然知識不高，但樸實誠懇，忠勇愛國。中國抗戰勝利，最重要的是得力於如此實心實力的人。

疥頭排長又喜歡對我們講述一些日兵兇殘的故事。譬如狙擊手是被縛在樹上的。如果一旦被敵方發現，就必死無疑。因為他是被縛在樹上，不能逃走，必待接班的人爬上樹替他鬆了縛，然後他又把接班的人縛好才離去。接班的人要等下一接班人為他鬆縛。所以狙擊手一被發現，他必被敵人射殺。後來，疥頭排長還指點給我們看叢林中大樹上其時還看得見的，

被縛著的日本狙擊手的遺骸——一具腐爛了的屍體吊在樹上，既陰森可怖，又殘酷得使人心寒。

日軍又有一種“敵後堡壘”的戰術。在緬甸戰場作戰是寸土必爭的，肉搏戰很激烈。每日能夠推進二三百公尺，就算是很大的收獲。日軍為了應付這一戰況，特別設計出這種“敵後堡壘”的戰術——在每條戰線上建築不少小堡壘，這種小堡壘建築得非常堅固，而且大部分藏入戰壕中，祇露出堡壘的小圓頂，可以四面發射機關槍，每一堡壘祇有二三名駐守兵。野戰炮無法轟倒它，當我軍推進二三百公尺時，這些小堡壘就落在我軍的背後，在我軍的背後開槍，使我軍前後受敵，我軍祇得退回原地。所以如果不先攻破這些小堡壘，就無法向前推進。但要攻破這些小堡壘很困難，因為很難消滅堡內的日兵。除非你能到達堡壘的入口處，往裡丟手榴彈，炸死堡壘內的守兵，然後才能攻破一小堡壘。所以中國軍欲攻破小堡壘，必先審明小堡壘機關槍的每個死角，然後從死角處用多人一齊伏地前進的方式爬行而前。再用多挺機關槍密集射擊，壓制日軍的機關槍，使日軍的機關槍無法對伏地前進的中國兵士射擊。於是伏地前進的兵士，必有少數可以到達小堡壘的入口處丟手榴彈。故此要攻破一小堡壘，必傷亡不少伏地前進的兵士。疥頭排長帶我們觀看日軍遺留下的敵後小堡壘，使我常常想到我那次受禁閉的原因，正是因我伏地前進的姿勢不對而引起的。我不知我當時反抗班長指導行為是否適當。伏地前進的方式在戰場上是常常要運用的。

我從各方面觀察，發現中國軍人就體格的外型看，是不如英、美軍士魁梧，但是由於訓練的嚴格，體能決不在英、美士兵之下。而且表現得比英、美士兵靈活、敏捷、勇敢、堅韌、鎮定，尤其戰鬥精神的強韌，都是英、美軍人所不及的。英、美軍士當他估計敵人的形勢比自己強時，或者敵人的火力比自己大時，便輕易撤退。中國軍人當發現敵人形勢比我好，或敵人的火力勝於我時，則必加倍堅忍奮發，發揮生命的大能力以克服困難。這是中國遠征軍與英、美遠征軍不同的地方。

當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中國遠征軍初到緬甸戰場時，是與英軍併肩作戰的。英軍輕易撤退，有時撤退得太匆忙，甚至未及告知中國軍隊，因此中國軍隊常常吃虧。中、英兩軍的戰鬥精神不同，

配合很困難，所以緬甸戰爭初期，中英盟軍大敗。被逼從野人山退入印度。野人山是個極大的原始叢林，當撤退時，以新三十八師殿後作防衛，所以新三十八師吃的苦頭最多。疥頭排長告訴我，當時每日祇有二小時睡眠，饑餓、疲勞，加上野人山的瘴厲，與遍地毒蛇猛獸，以至不少人睡下後即不能再起來。所以屍體常排成一行列。因此一提到緬甸初期戰役與野人山撤退情況，新三十八師的老兵多憤憤不平。認為遠征軍司令部對孫將軍不公平。我不知道遠征軍司令部是否真的對孫將軍不公平，但新三十八師的老兵常表現這種心態。

新三十八師退入印度後，在藍伽努力整訓。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將新三十八師、二十二師和三十師合編成新一軍。新一軍除了三個基本師之外還有各種特種兵團：如炮兵團、汽車兵團、工兵團、化學兵團、輕重兵團、戰車營、高射炮營等，組成一支中國最現代化的新軍。孫將軍當時任副軍長仍兼新三十八師師長。開始反攻緬甸。並重新考慮各同盟軍隊的性能，作新的安排——以中國軍隊為前線作戰的主力，美軍擔任後勤給養，當中國軍隊攻下城鎮後，交由英軍防守。孫將軍為前線指揮，並晉升為新一軍軍長。從此同盟軍戰功彪炳，收復了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臘戍、曼德勒等地，把日軍趕出緬甸。老兵們提到新一軍的戰績，竟有感奮至落淚的。老兵們又告訴我，孫將軍的神經系統是最健康的，當戰事緊張時，他詳細部署作戰計劃，執行後，說我休息，一會，他便能馬上入睡，有時攻打重要的城市，敵軍堅守，久攻不下，孫將軍常誓言：不攻下此城不刮鬍子。所以常見孫將軍鬍鬚滿面地攻下名城。他的智慧、堅韌、決心與毅力，使新一軍從印度整訓後，再反攻緬甸時，便成了常勝之軍。

這時歐洲戰事亦接近尾聲，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邀請孫將軍赴歐參觀歐洲戰場。緬甸方面，日軍已全部被驅逐。緬甸戰事已結束。在新兵營受訓的新兵雖已訓練完成，可以應付戰場上的各種任務，但新一軍已奉命歸國，由臘戍、密支那啓程，以廣西南寧為集中地。到南寧時，我與炮四連的同胞仍常在一起，但不幸有兩位同胞因受不了在緬甸時的精神壓力，竟患上了精神病，需入院治療；又有兩位因不能忍受嚴格的訓練而逃出兵營，因而失蹤，聽說已死在

叢林中。八月，孫將軍參觀歐洲戰場歸來，擬寫一本“回憶錄”，他想到新一軍中有不少從軍的大學生，要選拔一人來擔任這工作。於是在南寧舉行一次選拔考試。考試的要求很簡單，祇作文兩篇。文言文和語體文互譯兩篇。我不知道他憑什麼選取了我。把我由二等戰鬥兵升為特級下士，調到軍部孫將軍的辦公室工作。一時新兵營中的營長、連長、排長、班長們，平日對我的冷面孔都添上笑容。唯有疥頭排長對我的態度依舊。疥頭排長的文化水平雖然很低，但我十分尊敬他。

我被調到軍部，但孫將軍未有撰寫參觀歐洲戰場的回憶錄。不久日本無條件投降。新一軍奉命接收廣州市。孫將軍問知我是廣州人，命我隨先行部隊乘船沿西江入廣州。還讓我推薦幾位知識青年軍以下士資格隨行。於是我推薦了一位政大同學張君和兩位中央大學同學陳君和袁君。孫將軍又命我起草一進入廣州的安民告示。我說我從未撰過這類告示。他讓我試試起個稿。我不便推辭，於是找到一些新一軍在緬甸作戰攻陷敵方城鎮時所作的安民告示作參考，我發覺那些告示大都語氣凌厲以威武鎮壓亂兵亂民。我覺得在緬甸作戰時可以如此，因為怕地方上一些不法之徒勾結日軍作亂，所以應用威嚇以鎮之。但對廣州居民不可以如此。因為廣州是中國淪陷區，淪陷區的人民不但是同胞，而且是當年政府撤退時，未被照顧的人民。他們被遺棄在日軍和敵偽政府下忍受悲慘的生活。真是“遺民淚盡胡塵裡”，盼望王師已八年。現在盼得抗戰勝利，收復廣州，政府對廣州的遺民，應該表示抱歉，不應該再持武力威嚇的態度。所以我起草的安民告示，是先向廣州人民道歉收復廣州太遲，使他們多受苦難，以後必盡力為他們解決各種問題，然後對亂民則表示必以武力鎮壓。我把草稿給陳君看。陳君是中央大學文學系的高材生，他說：“新一軍軍部有幾位秘書，政治部又有幾位秘書，撰安民告示是他們的分內工作，你無論撰得好，或撰得不好，他們都不會用的，你不必太費心思。”果然後來所用的安民告示是那群秘書先生所撰的。仍是聲勢洶洶，強力鎮壓亂民的口氣，絕無半點對廣州人民道歉之意。我看了覺得不妥，想對孫將軍提出。陳君勸我不必提：“因為一群秘書必有他們的說詞，孫將軍不能拒絕一群秘書的意見而聽你一位特級下士的話。而且

你所主張的告示內容，是一位行政長官的應有態度，不是一位軍事將領於初入城時所適宜說的。中央政府將來必會派行政長官來處理政務的，這番話留待行政長官說罷。”我覺得陳君所言，很有道理。他的見識比我高，我很佩服。所以不再提這件事。但是後來中央派羅卓英將軍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正是行政長官。就我記憶所及，他似乎並未有對廣州人民作道歉之言。

新一軍軍部駐於廣州沙面。沙面是廣州市珠江邊的一小島，有橋與江邊長堤的“六二三路”相連，原是外國人的租界。各國領事的辦公處和人員的住宿地，環境很清靜幽雅，建築物也特別精緻。新一軍暫以此地一幢樓宇作辦公室。我被安置在孫將軍的鄰室，祇替他看些無關重要的應酬信。由於日軍突然投降，中國接收淪陷區的工作未能好做準備。接收人員中自然是以軍隊最為權威。孫將軍有時命我去封閉一些敵偽的機構。我以一個下士竟自寫封條，封閉敵偽機構，這是非常特殊的。在我所查封的敵偽機構中印象最深的是查封傍臨珠江的“永安堂”大樓。這座大樓原本是胡文虎家的物業，於廣州淪陷期間，偽政府利用這座大樓辦了一份偽報。所以當時永安堂內仍保留著三部平板印刷機、排字機和大量白報紙。孫將軍命我利用永安堂的偽產辦一份小型的軍報，同時把永安堂作為新一軍一部分文職人員的臨時宿舍，待原來的業主回廣州時才交還業主。於是我和張、陳、袁幾人都入住永安堂。新一軍自到廣州之後，有不少新人以秘書或參謀的名義加入新一軍，這些新來的秘書或參謀不少也入住永安堂。

孫將軍既命我辦小型的軍報，我問他軍報用什麼名字，孫將軍說：“我平生最佩服岳武穆，更敬佩他母親為他背刺‘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們的軍報就叫‘精忠報’吧。”於是我利用永安堂的物資辦了一份小型的軍報《精忠報》。軍政治主任葛南杉將軍和一位上校陳秘書、一位中校梁秘書都參加辦‘精忠報’。我對辦報完全是外行，幸梁秘書有經驗，對我指導甚多，後來我們成為好友。孫將軍又派他的侄兒孫克剛來督導《精忠報》。但他的第一個意見我就不接納。他要我增闢一欄“大人物的故事”，記載軍中上校以上人物的生活小故事。孫克剛是上校，當然也包括他的生活瑣事。我當時少年氣傲，說：“新一

軍裡配稱大人物的，算起來，恐怕祇有孫將軍一人。”我沒有增闢這一欄，他十分不高興。當然《精忠報》辦得不好，我已不想負責，正好新一軍奉命北上與共軍作戰，軍報要隨軍北上。我覺得現在抗日戰事已勝利，我應該退伍復學了，於是一心祇求退伍。辭了《精忠報》的責任，請陳上校秘書為我辦退伍。

新一軍在緬甸作戰時，軍紀是非常好的。官兵人人奮發自律，到了廣州後，由蠻荒之地，忽然到此膏腴之鄉，社會的引誘多，克己自律的精神不如前，加以滲入不少新人，藉著軍人的聲勢以欺人之事是常有的。就我所接觸，在永安堂住宿的幾位新人，就受流俗的影響而不克守自制。有一位中校秘書，能詩善畫，自許為讀書人，常對同僚的不守法而嘆息，我以為他是比較正直的，晚上常到他房間閑談。有一天晚上，他對我說：“住在永安堂內的幾位秘書，知道永安堂內有不少敵偽留下的白報紙，現在由你在管理，他們要我問你，是否同意把白報紙賣了大家分用，以補貼微薄的薪俸。”我乍聽之下，大吃一驚。常自許為讀書人的而竟出此言。我說：“我們奮鬥八年，現在剛勝利，收復失地，淪陷區內百廢待舉，我們應繼續發揮抗戰時的克難精神才是。”他微現羞愧說：“正是，正是。”我就告辭，結束了談話。這一夜，我愈想愈害怕，因為這一群秘書已起如此心意，今晚他們的要求雖然被我拒絕，將來的演變很難預測，永安堂的物資由我管理，將來他們如果有不法行為。出了事，一定會把責任推在我身上。我必須把所有由我管理的物資交還新一軍政治部。於是我連夜趕製我所經管物資的清冊，翌日請政治部主任葛南杉將軍定期點收。葛將軍命上校陳秘書主持清點接收會議。我把物資一一點交清楚，祇餘一些零碎雜物未列清冊在會上公開提出，我記得在零碎物件中有八部照相機卻列了出來。會後，一位少校秘書對我說：“你真呆，這些照相機也在會中公開列出，現在大家都動不得了，應該在公開之前每人拿一架，豈不省事。”我懶得跟他打話，掉頭離去。

我的故居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同福路。我到廣州已幾天還未曾回去看看。因為一則工作很忙，二；來聽說此屋現仍有日本軍人佔住，不知日本投降後日本兵的反應如何，我單身一人行動怕有危險。後來我忍耐不住了，冒險一人循著跨江的海珠橋過江。沿途有日

兵站崗，每一站崗的日本兵見到中國軍人立刻行敬禮，我亦點頭答禮。到了老家，房子依舊，有幾位日本軍人引我進入。他們的態度非常恭敬。我不得不承認日本軍人的服從性很高，日皇一宣佈投降，士兵立即服從，對中國軍人行敬禮。我的老家曾被日軍徵用作慰安所。現今室內空無一物。凡是木製的東西都已殘破不堪，其餘尚無大破壞。後花園所有花草植物已全不存在，祇見井邊有一婦人全身赤裸在眾目睽睽之下洗澡。隨我而行的日兵，想招手要她前來，我揮手表示不必。家園的殘破。早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並無特別感觸。祇盼望能早日收回故居，讓流亡廣西的父母早日回來。

我所關心的，除了故居就是母校教忠中學。我初中就讀於珠江北岸位於文德路的教忠中學。每日早晨騎腳踏車過珠江橋返學。高中時廣州陷敵，逃難到澳門，教忠中學亦遷往澳門，我仍讀於澳門的教忠中學。當時教忠中學名義上由董事長金曾澄先生負責，而執行校長職務的是沈芷芳女士。全校教職員和學生都視她為校長，稱她為沈校長。沈校長是一位女中豪傑，她的剛正堅毅和實幹精神在當時廣東教育界幾乎無人不知。她是汪精衛的甥女，當汪精衛組織偽政府時，汪家和沈家的親戚幾乎全追隨汪偽政權，唯有沈校長堅持抗日的立場，汪氏曾欲委任她為僑部長，她堅決拒絕，甚至有人竟以鎖鏈、手榴彈置於其家門前逼她就範，她仍領導教忠中學的師生離開澳門返大陸後方自由區的羅定縣連灘，開辦流亡式的教忠中學。她對國家的忠貞，辦事的膽色與魄力，備受當時社會所推崇。

廣州市收復未及一星期，其他人未必敢返廣州。但我猜沈校長一定已返廣州主持教忠中學復校工作。所以特別抽空到文德路訪母校。果然一入校門，已見沈校長正忙於指揮員工在籌辦復校工作。她知我參加十萬知識青年軍，很高興說：“你當國家困難時參加青年軍，真使人敬重。”她的話使我無比安慰。因為我自回廣州，有些故舊親戚對我的參軍並不以為然，現得沈校長讚許，我覺得有知遇之感。她還告訴，她的女兒——我多年的女同學何某某將於二三日內返回廣州，真使我喜出望外。果然幾日之後，我與她重逢，經過患難之後，又能重聚，使我感到生命充滿幸福與生機。

我最後一次見孫將軍是在廣州市的政治大學校友會上。我自從因辦《精忠報》搬到永安堂住宿，不再去沙面孫將軍的鄰室辦公後，一直未見他。我的印象，孫將軍自到廣州之後，似乎心情很壞，我不知他苦惱的原因何在，祇見他常發脾氣斥責部屬。這次校友會的聚會，羅卓英將軍和孫將軍都是被邀請的嘉賓。羅將軍先到，校友會主席介紹各校友與羅將軍見面，羅將軍與大家一一握手，主席介紹我時，我仍穿著下士的軍服，當我伸出右手時，羅將軍祇顧上下打量我，遲遲不伸出右手與我相握，使我空懸右手，非常尷尬。一會，主席不得已再次介紹說：“這位孫校友先參加十萬知識青年軍，後來奉調到緬甸新一軍。”然後羅將軍才勉強地伸出右手輕輕接觸我的右手，我心裡自責太天真，見了長官不行敬禮，竟欲握手，亦責羅將軍太缺乏風度。不久孫將軍到，主席又逐個介紹校友與孫將軍見面。我不待介紹，趨前向孫將軍行軍禮。孫將軍答以軍禮後又親切地伸手與我相握，笑說：“你也來了，很好，很好。”

不幾月，新一軍從海路北上秦皇島，我全心全意盼望退伍重返政治大學復學，當時我雖未離軍籍，但心已不在軍營。我父母亦由廣西回廣州。永安堂的主人胡好先生也回到廣州，新一軍交還永安堂給胡好先生，我乃遷回同福路的故居。何同學則在中山大學師範學院補修四年級課程。我常常到中大師範學院與她相會，我仍穿軍服，她的中山大學同學多側目以視。晚上我常從廣州市河之南，踏著月色到河之北她家相聚。後來我的退伍請求正式被批准，還發給我一張“直接參加抗戰官兵”的證明書。這時政治大學已由重慶遷回南京，於是我返南京復學。

從此，從軍生活祇留在我的記憶中。使我懷念的軍人中人物，是豐富動人的孫立人將軍和誠樸忠勇的疥頭排長。我的從軍於國家無絲毫貢獻，祇豐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很珍惜這一段經歷。

陌生的父親

林牧晨

父親於 1911 年 1 月生於遼寧岫巖，原名林永泉（後改名為詠泉）。他上有一哥哥和四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1930 年春，父親考入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第八期。此後，投入抗日戰爭的軍旅生涯，最高軍銜為上校。他業餘時間亦筆耕於詩社文壇，小有名氣，又熱衷於體育運動，身手不俗。不過，在軍職上似乎表現平平，或者可說是不稱職，甚至是一叛徒。

1949 年，他違背了帶部隊去臺灣的命令，在湖南率部起義，向解放軍投誠。結果被判七年徒刑。刑期中，患過傷寒癥，1956 年回家探親一次。刑滿後回家過了近一年，隨即被送江西勞動教養。在勞教農場多次重傷病危，歷盡苦難，九死一生。1986 年獲平反，1987 年離開勞教農場，十足吃了三十七年官司。

1989 年 12 月 23 日，母親去世。去世前關照我：“讓你爸爸回來住吧”。我托友人去蘇州親戚家接回父親，趕上了母親的追悼會，算是讓他見了結婚四十六年、離婚二十年、共同生活不滿五年、已有近三十年未碰頭的亡妻最後一面。

1994 年，我離家赴美。八年多未見父親了，不免時常想念。他現住在離家很近的敬老院裡。92 高齡了，沒什麼要緊的病，祇是頭腦已不清楚。他常把幻覺當真事，據說他常在幻覺裡見到我。

而我卻從未夢見過他。我們父子一起過的日子加起來大約有七年。我對他越瞭解，便越感到陌生。按某種存在主義的標準，父親的一生沒什麼錯。他的志向無非是棄武從文，解甲歸田，功成名就，衣錦還鄉那一套。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總覺得他缺少了某種很重要的東西，雖然我至今還沒搞清楚那是什麼。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父親”祇是一個美好的許諾；——母親時常說：“爸爸就要回來了”。於是我便會設想，這從未見過的爸爸會給我帶來什麼禮物。我最終決定要一架小飛機，就像我的大朋友王維義自作的那種會飛的模型飛機。

那一年，爸爸終於回家了。他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高大英俊，而且並無親切感；他很沉悶，很疲憊，像個長途跋涉中的旅客，好像祇是經過這稱為“家”的驛站小作停留。母親和他去蘇州無錫游玩了幾天，給我帶來的禮物是石膏做的飛機，機艙上居然冒出個娃娃飛行員！大失所望之餘，我揮手“放飛”，暗自“慶幸”把它摔了個粉碎。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年父親是回家探親——他在湖南勞改營服刑。又過了兩年，他刑期已滿，便回家準備長住。他沒有工作，想以寫作爲生。寫作了幾部書稿，但都無緣發表，全退了回來。有幾次見他在燒書稿，大概半是和母親嘔氣，半是灰心。母親祇搶下了一部《顏真卿》，後來也在“文革”中連同父親留下的所有文字被專政機關拿走了。

派出所民警多次找上門，母親在師範學院又受到“反右”運動的波及，心情自然好不了。母親性格剛烈直爽，父親則孤傲固執，兩人一吵架簡直便形同敵國。我從母親對父親的責罵中知道了不少事：原來父親曾是許多名流女性追求過的“男花瓶”，原來父親在和母親吵架時曾拔出手槍來威脅，——父親在我心裡是大大地掉價了。但我很喜歡父親念小說給我聽，還有他唱的家鄉小曲：“太陽出來照呀麼照滿院，掃清了院子我洗淨了鍋碗，我先把那豬來餵呀，我再把那雞來喚呀，吃罷了早飯我好做那針線”。他對“務農”有種天生的熟悉感。我們“開荒種地”，種些黃豆、扁豆、花生、茄子、辣椒、波菜、塌鍋菜；也常去挖野菜：薺菜、馬蘭頭、馬齒莧、苦蒜——所有這些經外婆烹調一番，便成了絕頂的美味。父親像所有品嚐過外婆手藝的人一樣老是讚不絕口，外婆當然很高興。但對母親來說，父親此舉無異“策反”；於是母女間的口角也烽火不斷。

父母的“熱戰”很快就結束了。派出所找父親去參加“修鐵路”，結果一去不復返，變成長期的“勞動教養”。而我當時還以為父親是去“工作”了。有一次，聽小朋友爭誇他們家裡誰當了解放軍，我不服

氣地說“我爸爸也是解放軍，是騎兵！”還跑回家找出一張父親騎馬的軍裝照，拿給小朋友看。過了幾天，小朋友都避開我了。原來是他們家長關照的：“他父親是國民黨，是壞人！”這一陣風吹得師院裡的小家夥躍躍欲試地想聯合起來教訓我這個“國民黨”。於是，發生了多次對我的“摩擦”。還有一次“陣地戰”，我一人面對幾十個拿著“長短兵器”的“敵陣”，氣得發了狂，手揮“竹劍”橫衝直撞，居然以少勝多。但從此以後，我便多與孤獨長期為友了。

母親老在寄郵包。主要有餅乾、魚肝油。父親來信老是稱病，母親顯然十分擔心。終於，母親決定帶我去江西看望父親。乘船，換車，住在油燈如豆的小旅店，跟著郵差走一整天的路，翻過好多大山，一條溪谷中幾片竹棚便是勞教人員的住處。十多人一間屋，有幾個患水腫躺在竹板床上；開飯時，每人拿個大臉盆去“打飯”。——從大木桶裡分一盆灰黃色的稀湯，然後用竹勺打撈那點數得出的飯粒和幾絲南瓜，最後留著那盆清湯寡水慢慢“享用”。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伐竹，運竹。為避毒蛇，得用煙熏，這使不少人得了眼病。但還是常有人被毒蛇咬傷。有個以捕蛇為生的中年人常來聊天，講起那年他被五步蛇咬後自斷左臂的經歷，真是驚心動魄。

以前母親還相信官方的宣傳，沒想到眼前的事實如此冷酷：豬狗不如的“生存”，渺無希望的“前程”。她終於明白：人是可以如此輕易地毀掉的，哪怕他再有才華，也不管他如何順從。她已過不惑之年，知道願望不能改變命運。她提出了離婚。但父親不同意。他具有農民式的守舊自保趨利避害的天性，不會坑害別人，也不會為顧全別人而讓自己受損。為離婚的事，父母又開始了長期的冷戰。母親要我忘掉父親，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別人會時常來“點穴”。

小學五年級，我得到校方的一次“警告”處分。起因是代課的陶老師在課堂上誣蔑我有抄襲行為。我推翻課桌以示抗議。他竟對我施暴。校長和我談話時，根本不聽我的抗辯，反而逼問我：“你講過‘豬毛會師’，是不是你父親教的？”我十分鄙視這位校長的淺薄卑劣。那次“警告”，對我祇是一個諷刺小品。

中學裡，我是班主席，三好學生，學雷鋒標兵；但我入不了團。幾位老師在寬慰我時，也讓我明白了“家庭出身”這個詞的分量。這也成了我決心不再升學的主因。

66年8月，我受政治形勢影響，在工廠裡反四清工作隊，籌備組織紅衛兵。工作隊和廠黨支部立即拋出檔案材料，宣示我乃“黑五類”出身。之後二十幾年，我在無數次“衝擊”中，無數次地被“提醒”：爾乃國民黨軍官之後！連我改姓名的“企圖”都不允許，即使到後來父母終於辦完了離婚手續也無濟於事。

1987年春，我去江西永橋勞教農場看望父親。他剛獲“平反”，與幾個“縣團級以上”的老難友住在一起。一個小煤油爐，一個小鋁鍋，幾個搪瓷碗，一個搪瓷臉盆，一木箱書，一個破舊的軍用皮箱，幾件舊衣服，這些便是他活了76年的全部家當。

為了父親最大的願望，我陪伴他作了一次長途的回鄉旅行。在南京、瀋陽、岫巖、迎春、哈爾濱、大連、青島等地，見到了他闊別幾十年的一些老友、幾個親屬和許多從未謀面的晚輩。見了這麼多人，沒有任何激動的瞬間，感覺不到生命的壯麗。大概父親亦有同感。他很沉默。整個旅程都灰濛濛的，包括父子間的交談。

從父親口中我了解到，他一生都很清貧。從軍，入黨，對他都像出工種地般平淡，沒有什麼特權專利，沒什麼榮耀值得多講。常與黨政軍首腦接觸，也祇是公務關繫。軍中唯一的好友是黃埔同班的鄭為元；還有黃傑，曾把他當作得意門生。關於黃傑和鄭為元先後出任過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防部長，父親毫無談興。他喜歡談的一是文藝，二是體育。體壇名人徐亨是他的好友。在文藝界，他和演員如崔巍、蘭萍等一度過從甚密。與孫望、常任俠、鄭廣珊、武俊達等文人，更是知交。甚至還差點和才女孫多慈結緣。父親最愛京劇，最恨越劇和搖滾樂。有一次，他聽著不遠處播放的搖滾樂，氣惱地說：“我真想把那個作曲家一槍給斃了！”他談到蘭萍時說：“沒想到她後來變得那樣；不過她也做了件好事，——提高了京劇，消滅了越劇！”我暗自苦笑：這老子比共產黨還霸道！

我試探地問起當年爲何不去臺灣，他回答得極簡單：“想家了。不想打仗了”。

是啊，——想家。無可辯駁的理由。這也許是當年國軍潰敗的原因之一。我不忍心問他那時是否想到過日後的幾十年官司，是否想到過“家”的鉅變以及“國”的鉅變。

在出國前和父親同處的幾年裡，我因參與民運活動而麻煩不斷，風雨頻仍。父親雖然沒有直接地反對我，但他的憂慮甚至恐懼時常溢於言表。而且，他表達了一種他認定當然的理念：不可與政府作對。他顯然不歡迎常來我處的那許多民運人士，對我們毫無忌憚的高談闊論，他會顯出無法掩飾的惶恐與惱怒。我有時把他和去世的母親相比較，覺得兩人之間的反差實在太大。母親生前熱情地支持民運，贏得上海眾多民運人士的敬仰。她的追悼會可稱爲一次規模不小的民運聚會。去世前，母親曾在家中“發表”了許多“政見”。例如：“現在的社會風氣比國民黨時期差得太多了”；“那時真的是很自由，不像共產黨這樣搞得到處是克格勃”；“回想起蔣介石，他的確十分出眾，不愧稱爲偉大人物”；“共產黨裡也有好人，可是太少了”；“齊奧塞斯庫是罪有應得，現在等著看這裡共產黨的下場了”——其實這些話都屬於平民百姓基於直感的經驗之談，但就是有很多人不敢這麼說，甚至不敢這麼想。這種人包括我所認識的不少“資深”學者，也包括了我的父親。

出國後，父親有封信裡盛讚中共使香港回歸，熱望臺灣內附。我去信告訴他，很多香港臺灣人並不願意回歸與內附於中共黨國。他來信斥責：“這些人是喪心病狂！”我沒話可說了。三十七年的官司，妻離子散的悲劇，紅色恐怖的國家，世風日下的社會，都不能喚起他的憤怒。是“憤怒出詩人”這句話錯了，還是他算不上詩人？他算不上，那麼還有他的詩友艾青等人呢？他不是詩人，那麼作爲一個公民呢？或者，退到底，他連公民也不是，是個奴隸呢？奴隸還有反抗的勇氣呢！還有陳勝吳廣呢！

我該擱筆了。倒不是怕號稱“愛國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們的攻擊。對一個歷盡人世滄桑的 92 歲高齡的老人，我不能說得再多了。何況，他是我的父親。

(2/10/2003)

感時憶舊
步韻和黃花崗詩

林
詠
泉

1.

掩卷忽欲縱筆酣
硯墨沉吟思再三
黃花崗前應有愧
蘆溝橋頭心未甘
伏櫪老驥垂銀鬣
尚待聞風跨深潭
烽煙一夢往何處
八十年前下東南

2.

故人已隨風煙去
燦爛英年不復還
好漢誰提當年勇
黃塵埋盡棟樑才
夢裡恍惚憶師長
軍旗一舉烏雲開
國難依舊千鈞重
嘆無孫黃鶯鶴來

3.

未避雷霆緣首丘
一朝覆水水難收
不堪草民斑斑淚
熱血為何寫春秋
裙帶風行豢走狗
運動愚民似耍猴
社稷無存乾淨土
英靈回眸亦唯愁

4.

蒼巒列岫暮雲浮
黃昏何意不甘休
生死離別尋常見
耀祖功名本難求
從來恩怨各有主
偏是冤家能聚頭
遙對陵台一長拜
青山暝水悠悠

因本刊編誤，第五期所發
非林先生詩，本期補正。

改良與革命

特稿

——中國工黨的選擇

中國工黨“一大”政治報告（要點）

中國工黨主席 方圓

（1）在封建時代，社會的楷模是狗。義犬救主，一直是千古美談。狗兒對自己的主人，任你大吼大罵，拳打足踢，它總是俯首貼耳，搖頭擺尾。狗兒對主人的敵人，則是勇猛攻擊，奮不顧身，無私忘我，死而後已。封建的時代精神，就是一個“忠”字，就是提倡人民忠於封建主，奴從封建主。狗，這種封建時代的社會楷模，反映了封建時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基本關係——奴從關係。

（2）人類進入了工業時代，在資本積累的初期，社會的楷模是牛馬。君不見，“我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作孺子牛。”“伯樂識千里馬”。等等，等等。馬和牛需要很少，奉獻很多。牛和馬，這種資本積累的初期的社會楷模，反映了資本積累的初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基本關係——剝削關係。

（3）到了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時代，社會的楷模是螺絲釘，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狗兒和主人尚有一層脈脈的溫情，牛馬和主人也有一層淡淡的依戀。而螺絲釘，沒有任何消費和需要，把你擰在哪兒，你就一輩子釘在哪兒，只准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共產黨時代的這種社會楷模——螺絲釘，反映了共產黨與人民的基本關係——專政關係。

（4）現在國內的形勢，是改良與革命賽跑。中國工黨希望改良跑到革命前面，這樣，社會轉型的成本

會低得多。中國工黨渴望對話，渴望安定。但中國工黨決不害怕鎮壓，絕不放棄反抗鎮壓的權利。反抗鎮壓的權利，也就是革命的權利，不僅是每一個中國工人的不應放棄的權力，也是每一個中國人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5）現在選擇改良，還是選擇革命，主動權不在人民手裏，而在統治者手裏。如果剛上臺的胡錦濤政權選擇了改良，中國工黨立刻放棄革命，擁護改良。如果執政者放棄改良，中國工黨和中國人民就不得不起來革命。

（6）有的朋友會問，如果胡錦濤選擇了改良，中華民國是否還需要重建？其實這兩者並不矛盾。如果胡錦濤選擇了改良，也就是實現了他“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這個“新三民主義”，也可以稱“胡氏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的“孫氏三民主義”的發揚光大，這個“胡氏三民主義”的切切實實的施行，就是中華民國的重建。

（7）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合乎中國國情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中國工黨爭取中國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實現，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也就是重建中華民國！

（8）我們期盼的是真改良，而非假改良。如果出現了假改良怎麼辦？那我們就用真革命對付之。重建中華民國，就是用真革命來反對假改良。

(9) 中國工黨誠心誠意期盼改良，扎扎實實準備革命，以改良呼喚革命，以革命催生改良。歷史告訴我們，當權者一般都是在革命的沈重壓力下選擇改良的。革命的速度越快，改良的速度越快，革命的壓力越大，改良就越徹底。

(10) 有財產不是罪惡。每個人謀求自己的個人利益也不是罪惡。有恒產才有恒心。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才有獨立的人格。

(11) 馬克思把私有制當成一切罪惡的淵源的立論是錯的。“公有制”就是由此推導出來的。人類近一個世紀以來對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實踐，證明這個謀求解決社會不公的藥方，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的不公，相反造成社會更大的不公。

(12) 其實社會主義的本意，是謀求社會的公正，而不是甚麼公有制。公有制與社會公正不能打上等號。實現社會公正有很多途徑，很多方法，不一定要走公有制的路子。

(13) 馬克思主義，僅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一個流派。這個流派主張以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來追求社會公正。怎樣去消滅私有制呢？必須使用政權的力量。奪得政權後怎樣辦？那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用專政的手段來統一思想，用專政的手段來實行財產轉移。財產轉移給誰呢？名義上是轉移給“全民”，實際上轉移給這些財產的管理者，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在這裏，“全民所有”實際上是“全都沒有”。財產，只不過假“革命”的名義，從一部分人手裏轉到另一部分人手裏。

(14) 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歷史正義感和窮人對富人的忌妒心的雜種罷了！所以馬克思主義具有迷人的外表和骨子裏的邪惡。

(15) 中國工黨的目標，就是要使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也就是要讓中國人民成為真真正正、實實在在、以合法佔有資產為保障的國家主人。

(16) 當人類進步到把尊重他人利益當作保護自己的利益的必要的時候，人類將終於走出野蠻的黑暗，迎來文明的曙光。

(17) 世界大同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來的美麗理想，民主主義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傳統崇尚。

所以，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寶庫裏有的是好東西，不必去洋人那裏去頂禮膜拜，去搞一些自己都沒有弄懂的洋玩藝，洋教條來禍害中國人民。

(18) 世界大同不等於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是同頂一塊藍天，同踩一塊大地，是在

同等的社會條件下去挖掘自己的潛能，是在同樣的自然環境中去實現自我。當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特異性最大程度發揮出來的時候，也就是人類大花園中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時刻，就是每一種“異”都在一個“同”中表現出來的時候，就是世界大同。因為“異就是同”，或曰大異就是大同。這就是中國工黨的理想境界。

(19) 中國工黨是崇尚個性自由的黨，是維護個人尊嚴的黨，是主張實現個人價值的黨，是主張市場經濟的黨，是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的黨，是主張在公平的條件下自由競爭的黨。同時，中國工黨是主張社會公正的黨，中國工黨是勇於建天堂，也是敢於毀地獄的黨，中國工黨是堅決反抗暴政的革命民主政黨。

(20) 我們堅信政治有責任在全世界都要捍衛基本的人權，反對以文化特殊的名義踐踏人權。我們對社會公正與公民自由的信仰，將我們區別於，而且使我們反對共產主義理論。我們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公正、自由、和諧與有效率的社會。



中國政改

何以不能啟動

張三一言

目前中國中心問題的中心是：政改！

這裏的政改指的是變專制制度代之以民主政治。

中共幾乎年年都談政改，例如 2001 年《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給政改定性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根本的東西都不能動搖。」

江澤民則給政改套上了四項基本原則的金籠罩，說政改「不搞多黨制，不搞權力分立，不搞新聞自由，不搞結社自由」。

可見，中共的政改，其目標很明確，是要堅持、維護和鞏固一黨專政；有違一黨專政的原則教條者，一律嚴禁。因此，它是保黨政改，是保專制政改，是「不准政改的政改」，是假政改！

[一]、黨不准民主政改

本文是討論「中國政改何以不能啟動？」

對這個問題御用文人給出很多理由和答案。現把答案作一簡介並作出簡要的事實回答。

其一、中國人素質低論。

答：錯！同水平或比中國素質更低的泰、印度、菲律賓都可以。中國素質最低的基層農民可民主選舉，最高水準的大學不能。中國人素質五十多年前比現在要

低得多，但卻可全面民主（見《歷史的先聲》），現在反而不能。

其二、民主與儒家文化不相容論。

答：錯！同文同種同素質的台灣，同是文化圈的韓國日本都可以民主；當然也有不可民主的越、朝。

其三、民眾要麵包不要民主論。

答：錯！現今民主制度和思想的要義是不受傷害。如今佔人口絕大部分的工人農民都自發地反抗黨權的傷害，即是自發地要民主。全世界半數以上國家都民主了，民主後的國家和民眾都不願再復辟專制；在專制國家幾乎都沒有例外地有民眾追求民主的運動，但沒有聽見過民主國家有人搞專制運動；只有專制國家民眾向民主國家偷渡、沒有民主國家民眾向專制國家偷渡。連最反民主的很多高官也把家屬安置到民主國家，自己持有多種民主國家護照。

其四、民主無用論。

答：錯！全世界半數以上國家都民主了，總的來說民主國家的經濟比專制的好；民主國家遠遠比專制國家安定；民主國家的民眾都比專制國家的民眾有尊嚴、有人權、有自由……

還有很多……

最重要的一條是：民主與我們的國情不合！

答：對！中國之所以不能啟動民主改革的進程，而且確是民主不容於中國的國情！

這個國情是甚麼？

它是：黨不准民主！黨禁絕一切民主，把民主扼殺於萌芽狀態中；黨把一切不在黨控制下的民間力量視為顛覆國家的政治敵對勢力，把它消滅於萌芽狀態中；黨壟斷控制國家的一切權力。當國不分，黨即國家，黨不准就是國家不准；所以原本是黨情的「黨不准民主」也就理所當然地變成是國情了，這國情成了中國不能啟動民主進程的最根本的原因。

現在中國的民主政改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阻擋東風者就是共產黨，就是黨不准。只要黨准了，民主政改隨時隨地都可以立即啟動前進。

其他國家之所以能民主化，正因為它沒有這些中國的國情。

民眾怎麼樣對付對黨的不准呢？

[二]、你「黨不准」，我就民眾抗命

在中國的國情下，黨就是法、黨大於法，黨不准就是法律禁止。這裏的抗命指的是人們在共產黨的法外進行抵抗。這就是革命的一種！（絕不能告別革命！）

黨不准，是黨一廂情願的事，它是有效的。民眾抗命也是民眾一廂情願的事，看來好像是無效的事。但事實是黨的不准是速效的，但也必然是失效的，現正在進入一失效期；民眾抗命是緩進的，它可能在長期間內不見效，但它必然會顯現功效的，現在是它處於生效期間。黨的不准和民眾的合法抗爭、民眾抗命，正在較量中。民眾的合法抗爭、民眾抗命，已經全面採取攻勢；黨在民眾的壓力下，已經全面處於守勢，且在敗退中，敗退的速度正在加速中。

我這個判斷，無需用甚麼理論作論證，只要拿這一二十年前和前一二十年作個比較，看看民眾方面從黨獨佔的權力中取得了多少空間，黨失去了多少實控權力就可以了。

爲甚麼會出現民眾抗命走向勝利的現狀呢？

因爲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符合人性的。人的本性是不喜歡別人傷害自己的，人的本性是要做自己的主人的，人的本性是要維護自己的自由、權益和尊嚴的，人的本性是要求別人公平對待自己的。而這些本性只能從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取得，恰好專制卻在本質上要求壓抑和剝奪人的這些本性要求。因而民眾與專制的鬥爭、要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

現在黨的不准民主和民眾抗命，正是這種鬥爭的集中表現。這種鬥爭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

這種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全方位鬥爭，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意識形態的較量

意識形態的較量，指的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思想等現代化觀念和專制獨裁的較量。二十年前黨視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資產階級反動的東西，在黨的高壓下成了全民無異議的共識；誰提一下都有罪。但二十年後的今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成了人們斷事判理的準則；雖有異議，但異議已經邊緣化了。世界上第一大反自由民主的專制黨只好僞善地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連其頭號反自由民主的人物也只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僞善地宣稱

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共識，其第三號人物也僞善地對外國人說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比別人更焦急。

過去專制獨裁者攻擊美帝的理由是反革命反人民；現在它仍然反美帝，但其所持的理由是美帝違反了人權、民主而行霸。這理由的前提是確認了自由民主人權是行事判理的準則，不再是反動的東西了。

在大陸，人們在爭論時所持的準則，也不像是過去那樣指別人反黨、反動、反革命、反人民，而是指別人無理。而這所謂理，追其根本就是自由民主中的公平等原則。

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的較量中，專制獨裁者失敗了。

這較量像是無形的，但結果是極顯著的。

雖則是專制獨裁者失敗了，但是統治者並沒有在權力方面失敗，它還是依照權力本性對異議者、民主人士、法輪功徒、地下教徒、工運領袖等，實行對內暴力戰爭，近者的顯例是抓劉荻等一批異議人士。也進行國際恐怖行動，綁架王炳章就是。所以民眾在意識形態較量中取得的勝利，並未產生根本性的政治實效，它還沒有制止專制者放下屠刀的能力。即是說專制統治者還沒有徹底全面的失敗。我們現在較量的重心，要做到在我們的意識形態面前，令統治者不敢再舉起他們慣用的屠刀。讓他們意識到舉屠刀理虧，理不正則氣不壯，舉刀無力甚至無膽舉刀。

這較量的結果是大大削弱了黨不准民主的能力，爲啓動民主進程減少了阻力。

民眾與專制者的意識形態較量還沒有完結。

（2）、迫黨在利害面前讓步

這個迫黨在利害面前讓步，可能要民眾付出慘重代價：例如要三面紅旗餓死幾千萬人後才能讓毛退居幕後，要到農村破產邊緣時才容忍包產到戶，要經濟一塌糊塗到亡國特別是亡黨邊緣時才被迫對民主世界開放。現在應該好一些了，因爲共產黨對自由民主世界開放的結果，構成了依賴自由民主世界生存的勢態。國民經濟固然離不開自由民主世界，父權子商中狂刮國家財富得來的錢，也多數存到自由民主國家中，掌權者親屬也多在自由民主國家作預防性避難所。於是乎，面對原本是敵對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觀念、制度規則的取捨時，權衡

利害得失的結果，不得不容忍和接受民主世界的影響，甚至接受其思想觀念、制度規則。但這也是要人們付出忍受其貪汙腐敗的代價。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積蓄民間體制外力量，當這些力量大到你黨接受民間的自由民主訴求，則民主生、黨存，反對則民主或者會死，但黨必亡。這時他就會選民主而棄專制了。其實，只要民間有了一定力量，當權者中的比較明智的人或野心家，就會來聯合你以壯大其政治力量，這樣，民主政改就啓動了。

這裏的關鍵是保證獨立於體制外的民眾政治力量，特別是民主革命力量。

(3)、弄假成真

我在(1)中所談的就是人們常說的和平演變的東西，在和平演變中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是在民眾抗命或利用黨的偽善中，形成一個事例→前例→慣例→共識的過程。弄假成實在操作上，大多以個案處理的形式進行。民眾抗命的弄假成真的典例，是令公社破產的包產到戶事件，侵佔黨權的基層民間結社，打破黨有一統天下的個體戶變成大資本家等，都是。在惡法統治下作公民抗爭是必然的、必要的、可行的。

利用黨的偽善弄假成真的典例，是郭羅基告學校黨委侵權事件。請律師打官司也是實例；黨的原意是用律師為公安非法背書，但他偽善地要擺出公正的面孔，於是弄假成真有了現在部分不賣公安法院帳、為當事人辯護的現實。可見在策略上，我們偽善地支持黨的偽善是有必要的。在這裏，真是：偽善亦善。

像今天關注劉荻就是其中一件比較有影響的的個案。弄假成真既可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它可以是一件轟動事件，也可以是無聲無息，一直到普遍成事後當人們回頭望時才發現已經變了天。弄假成真令黨的不准民主的施壓無從著力；它無法施用專政工具來把這些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中。

中共現在搞了很多假自由民主的東西，搞了很多偽善的動作，搞到最後完全有可能弄假成真。中共主觀上當然不想出現這樣的情況，但他們回天乏術。因為國內國外客觀大氣候不准他們逆轉。

現在專制者及其御用文人普遍有一種時代阿Q症：總是把一些形勢比人強、絕非中共之功、更非其主觀意願的弄假成真的東西，視作是黨的自我改良、是黨的偉大成就。

現在中國大陸經濟政治思想社會結構，都正在處於大變動或大變動前夜的狀態，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把中共不反對或支持或高唱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偽善行動弄假成真。弄假成真的成本也輕了，成功率也高了。過去在以個案訴求的方式加強自由民主人權的工作做得比較少，今天在這方面工作的條件相對地好一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

弄假成真的特點，是它沒有民主政改之形，但確是以點的方式增加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要爭取的內容，這是一種漸進的無形的民主政改。

(4)、筆桿子的任務

筆桿子要做的，主要的就是上面(1)點所說意識形態較量的事。因為它有一些要說清楚的地方，所以在這裏特別強調一下。

反抗黨的不准民主、啓動民主政改，是全民的工作。要啓動民主改革，就得在民間的所有方面，各自作戰，互相配合。例如稍富的中產階級要求參政、工農要求應有的權利、民間政治異見團體的訴求、或許會有黨內民主力量的增長、國際的壓力、文明的政治文化經濟的規則的入侵，都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筆桿子的任務，就是給這些動力所起到的作用，作鼓與呼的工作，使每種力量影響得到傳遞、幅射而加強。

筆桿子的第二面的工作任務，是做好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推銷員。把現代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思想觀點，向閉塞的大地傳送。在這方面很多人不願做，覺得是老生常談，重複別人的話，了無新意；那些不懷好意的御用文人也以低能、炒冷飯等貶詞，阻止人們對國內人作現代文明的啓蒙、普及、傳播、推廣工作。

筆桿子的第三方面工作，是和御用文人交鋒。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是學而優則士。今天中國讀書人大多數已被共產黨成功地洗了腦，經過被洗的腦想出來的東西，就與權力機構造謠工廠的產品基本相同；他們客觀上就是起了御用文人的作用，這些當了義務的御用文人還以為自己在獨立思考。有一些鼓吹民主恩賜論的天下第一

號驚天動地愚蠢的義務御用文人，還自詡為獨立知識分子。最大問題是今天有很大部分的讀書人是被黨包養起來的，是被黨收買了的沒有了靈魂、沒有了良心、沒有了獨立人格的人。這是受僱的御用文人。今天中國的御用文人之多是史無前例的。站在他們對立面的知識分子就相對弱勢了。這就是為甚麼今天中國文人中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聲音分貝那麼高的理由所在。從而也說明在中國民間筆桿子與這些御用文人鬥爭之困難。

與這些御用文人較量，在面向民眾方面，主要是反駁其如上面所說的形形色色的民主不宜論。在政治較量方面，主要是反對唯體制內改良論。現在甚麼告別革命、革命必然導致專制、革命動盪分裂等理論甚囂塵上。還有一些自稱為獨立知識分子者，驚天動地愚蠢地提出民主恩賜論，明是捨人唾液還自誇是原創。這些理論的要害是保共改良、保專制改良。

要注意的是反對唯體制內改良觀點，不是反對改良；反對唯體制內改良，不等於要提倡唯革命觀點。

一句話，筆桿子的任務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為民主政改積蓄力量，在理論上掃除傳統累積的和現今由黨及其御用文人加強了的專制獨裁所設的反民主觀念的阻礙，為民主政改開路。

黨不准民主，我們不能等待黨良心發現恩賜民主；我們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你不准，我就非要你准不可！這就要我們做很多的民主革命工作。我認為這些民主革命，工作主要是上面所講的一些工作。

3/9/2003

（上接第 96 頁）

個是普遍性，一個是特殊性，每一個民族都該如此反省其自身的文化。祇要它是個真理，它就有普遍性。但是真理並不是空掛著的，而必須通過生命來表現。通過一個生命來表現，就有特殊性。通過這雙重性來進行最的判教，也可以漸漸地得到一個諧和。

以上所談的，就是我個人對於中國文化如何維持其自己、如何向前發展的大體想法，這次就講到此為止。

~~三個代表~~
還是

~~“三大控制”~~

朱執中

對“三個代表”這一“創新理論”，江澤民定位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要求中共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年多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推廣，雖然表面上已獲得相當部份黨員的贊同、擁護，但也一再遭到黨內的公然抵制，暗中反對。2001年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上，要出席者投票通過“三個代表”，結果有八十多人棄權，占出席人數的四分之一。接著，各省黨內接連不斷傳出對這一新理論的質疑、抵觸之異音，其中不少來自中共理論重鎮的部份黨員，如中央黨校，天津、河北、貴州、四川等地的社會科學院。此外潛在的反對者也為數不少。像這股強勁的異音，為中共第一、二代核心發表重要新論時所少見。這反映出，第三代核心的權威，比前兩代輕薄多了，而“三個代表”本身的不實之詞，也難以令人信服。今天即使“三個代表”，已被列入黨章，但大陸不少官員、學者說：“三個代表”，不在中國，不在黨中央，而在美國。對它潛在的異議，可見其普遍性。

哪個黨都難當這“三個代表”

有人說，理論是客觀事實的抽象、概括，如果背離事實，那就不會是正確的理論。“三個代表”論的核心思想、或說它的三個總概念、即三個“始終代表說”，假若把它們拿來同中共八十年發展史對照一下，將會發現太多理論與實際不符的謬誤。

江澤民說：“我們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要求”。先進生產力是生產力的一部份，沒有發達的普通生產力，就不會有先進生產力。那麼為何祇提代表“先進”的，而不代表“普通”的呢？這裡藏有玄機，暫且不表。倒要先問問，一個政黨，真能“始終代表”一個國家的先進生產力要求嗎？西方主張政治民主與自由經濟的政黨，不論執政或在野，他們都認識到，要推動、提高本國的先進生產力，是艱鉅而又科學技術性很高的任務，祇能讓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各項專才依照社會民眾普遍需要去自自然然地開拓、發展。在黨綱中絕不會寫上作這樣項目的“代表”，連曾是社會主義公（國）有制與計劃經濟開山老祖的前蘇共，其1977年經增修後通過的憲法第六條也寫道：“共產黨，決定蘇聯社會發展的總遠景：領導蘇維埃人民之偉大建設活動”，僅談‘領導’與‘決定’，也不便自封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江先生會說，這是我們“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然而，這種“創新”，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嗎？

對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仔細作分析便會發現，從能自立走動的原始人開始，六十多萬年來，生產力是靠人類的雙手和智慧共同開拓、創造，自自然然地開始，自自然然地發展。再順著漸漸形成而又不易為人察覺的經濟規律，一波又一波、長江後浪推前浪地不斷向前推進和演變。當年，剛能直立的人類始祖，如地球上所有動物一樣，先為個人，後又為家人能填飽肚子，求得生存必需的食物，缺了它，原始人的生命就不能延續。這時誰也得不到別人的長期供應，自然也絕不可能從還未出現的市場買到。原始人求生的這“第一需要”（住、衣在其次），便成為人類生產力自自然然出現的一個重要內在推動力。時正“渾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蠻荒年代，未有部落，沒人指揮，原始人個個都自由地揮動著雙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和山嶺，捕捉野獸，採摘果實，有時還涉水江河抓魚，從而獲得維生的必需養料。如此經歷多少萬年，這狩獵，捕魚，採果等勞動及其延續人類生命的鉅大成果，便構成了最原始最低級的生產力。

早期人類一代復一代繁殖增長，依靠原有生產力獲取的食物，已出現供不應求的短缺現象。緊迫增添食物的新需求，以及因人的智力已有所提高所引發的

多種新需要，如脫離茹毛飲血、赤身露體、居無定處的原始生活方式，增高了獵獸捕魚量的需求，以及以物易物新商品的普遍需要等等，這些都自自然然地促使勞動群體、特別是那些技高智強的能人，不斷自發地去探尋先進生產力。經過早期人類持久不懈的鑽研試驗，能帶動原始生產力進入文明開發境界的先進利器、工具、新生產方式，也接連不斷出現。幾十萬年後通過考古發掘，舊、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石鎚、石斧、石刀、石矛、石箭頭、骨針、粗魚網、雛型種植器具等等，都是證明。今天，這些都是生產工具中的小字輩，但在遠古，卻令生產力躍進一大步，令人類進入初期文明時代。在中國，伴隨他們出現的，便是留傳著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享用熟食、神農導民種植得五穀等美麗傳說。

從以上初步探索可以獲得兩點啓示：一、世界生產力是人類在原始時期，為了求生獲取食物這一重要需求而自自然然地開始和發展起來的。隨著早期人類多元物質需求的出現，在生產力有相當發展的基礎上，人類第一波先進生產力也自自然然地脫胎而出。“需”與“供”這兩大社會因素的形成和互動，使得人類自自然然、或說自自由由開拓了的生產力的經濟發展規律，在原始與遠古期已經形成，亦有利於人類社會需與供的平衡。之後幾十萬年，這規律雖然不斷遭遇干擾，破壞，甚至完全扭曲（如消滅私有制），以及它本身的弱點缺陷，但因它具有鉅大的潛藏影響力，亦不斷穿過礁石與險灘，與今日世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息息相連。那些曾違反這規律的皇朝和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一一受到懲罰而被巨流所淘汰了嗎？中共執政頭二、三十年，因毛澤東悍然扭曲這一規律，嚴重破壞生產力，不是仍然遺禍至今嗎？江澤民卻侈言中共在建立時就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註1）試問，這符合中共八十一年份的歷史實踐嗎？！

二、原始與早期人類開拓、深植的自自然然發展經濟的規律已啓示，古代、近代、現代各國經濟發展史亦表明，歷史上人類的物質精神需求，不管那個時期，都是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拓展的基本動力。而勞動群眾，特別是那些技高智強的能人，也總會自自然然地創造出新技術、新產（商）品去滿足人類的需要。首先，創造、發明者本身亦有同樣的需要，再者

人與人（包括原始人）的信息溝通，以及自由市場出現與成熟之後，人、社會、國家不斷出現種種新需求的信息，傳播渠道更多，傳得更快更廣，因而更迅速地刺激、推動了種種相應新產品出現。其中傳統製造工業的產品已不能滿足人的需要，呼喚著新的先進生產力出現。敏感的私管企業如IBM、微軟等，便進行某些具有重大價值的新產品研究，並接連成功，如計算機，電腦，硬件，軟件等等問世，投入市場，並為億萬民眾採用，這就昭示了先進生產力又朝前飛躍了一大步。須知，在以私有制為基礎、市場自由經濟為體制的現代國家內，以上這一切經濟活動及其鉅大社會效果，大體上都憑藉著民間和市場的溝通與互動，便可以有序地去完成。就算即使有弱點、弊病，紛爭，也不會成為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政府在此的職能，僅是規定法律給予商務的規範，和合理而適度的領導管理而已，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集團作它的代表。而民主國家的政黨祇須管好本黨黨務、參加競選準備和料理黨的其它雜務就夠了，根本無須請它作本國的先進生產力代表，自然而各民主政黨的首領也沒想過要去當這麼一個代表。

反觀中共，善於“與時俱進”的江澤民“核心”（現在是否變成隱形），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註2），自然還有他個人的想法，從唯我獨尊的高位，退下或不退，還是部份不退（效法於鄧？）之後怎樣維護自己的地位，影響，利益……為鞏固這一切，非有創新的理論就難以說（壓）服黨內外的異己者。經過兩年的包裝攻防，“三個代表”論，終於在中共十六大寫進了黨章。

但是若認識經濟發展具有其自然性自由性的重要特質，並吸取歷史教訓，中共還是不宜再爭先自我定位，毛遂自薦地充當“中國先進生產力代表”。原因有三：一、1950年代初，執政還沒幾年，中共政權就通過消滅城鄉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和實行計劃經濟，控制了全國城鄉經濟命脈。此後多年強力集中數不清的大量人力、財力、物力去建設工業，也算是發展先進生產力吧。雖然取得一些成就，但與因重複建設，種種浪費所耗費的鉅大資源相比，這等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在這同時，因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重大經濟決策錯誤，扼殺了中華民族相承幾

千年經濟自然發展的勢頭，導致國窮民困，廣大民眾長期遭受必需品嚴重短缺的痛苦；三年人為饑荒，更害得三千多萬人死於非命，全國元氣由此大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雖然一再對病入沉疴的國企體系——也即“先進生產力”進行治療，雖然小部份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挺立起來，為大陸經濟新發展立了功，但多數國企依然靠補貼，後來靠貸款艱難度日，弄得國營銀行背負的壞賬率占本身總資產的25%（有的說高達45%）因此，在改革中，能讓陷於崩潰邊緣的大陸經濟獲得轉機的主要動力，不是國企，而是對外引資本主義（先是港、臺、後是其它自由經濟國家），對內復蘇私有制，而這些內外經濟成份，都與人類幾千年來自自然、自自由由地發展經濟的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可是四十多年前不知天高地厚、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中共，竟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腰斬了私有制命脈。傳說唐朝叛將安祿山篡皇位後曾將全國私田改為公田，但還不敢全面消滅私有制。因為這一“改”，便加速了他的滅亡。由於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共便一手發展經濟，一手破壞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而遺下嚴重創傷，至今難以完全治愈，此，是誤還是重罪？惟願海內外華人給予公議和公斷！當中共核心與高層至今對此仍無半點公開自省與道歉的時候，竟然自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能說服什麼人呢？奉勸中共自覺撤銷這個“代表”，黨，再不要像過去一樣，過多、過深地去控制與干擾大陸經濟了。

三、近些年，中共談政體改革，常提出“黨政分離”，“政企分離”。後者的改革，為了讓國營企業能在經營上獨立自主，發揮積極性，轉虧為盈。這一改革似乎進展得較好。而“黨政分離”就大大滯後了。國企改革，由朱鎔基總理管。但兩年前一陣子，江總書記也插手去管，親自主持國企改革會議，據說朱總理未獲邀與會。兩者意見一致還好，若然分歧一大，而中共歷來是黨大於政，即使總書記的點子不妥，總理也得服從，過去毛澤東不也常插手本應由政府首長管的經濟政務嗎？可是主席權大，他帶有嚴重錯誤的經濟指示，即使下屬高官一再提出不同意見，可主席不接受，恃權強制全國執行，結果連闖大禍，如“三面紅旗”等等。今天江澤民軟硬兼施將“三個代表”寫進黨章，將來假若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策略

上，新總書記提出指示，又因他是本黨的第一個“代表”，總理與部長就是有異議，也祇好“奉命”執行。再加上中共從來“黨政不分”，“黨大於政”，那些錯誤主張便常常得以實施。因此，即使是從沉重的歷史教訓來說，“三個代表”也不該列入黨章，避免重蹈覆轍。

四、過去，中共發展經濟習慣政治掛帥。“寧食社會主義的草，不吃資本主義的苗”，便是經典說法。當毛澤東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指示各省要開展本地獨立工業體系大規模建設時，不管資源是否具備，為緊跟毛主席，各省黨委便一窩蜂上馬。當這陣政治風颳過以後，全國一普查，同類產品工廠太多了，許多貨買不出去，形成“重複建設”，虛耗無數人民血汗錢。今天黨“核心”又號召當先進生產力代表，為了保持同中央一致，難保各省市黨委不會在新時期犯老毛病。總而言之，中共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政制一天不改掉，而中央第一把手又常作不切實際的號召、佈署，政治上；定會出新問題，經濟上也會出新問題。以上分析說明，“三個代表”中的“第一個”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還包含著“計劃經濟”的“幽靈”和遺毒。

“三個代表”的第二個，就是江澤民說的：“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一個政黨有這樣大的能量嗎？答案是：不可能。文化，最簡單的註釋是，人類歷史和現實生活實踐的總和。可見它包涵若海，深達千仞。中共八十年實踐的總和表明，從質量說，它代表的文化方向是與先進逆向而走的。政治？它的第一代核心毛澤東早已自我標榜：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這句話就道出中共的政治文化，比二千多年前的秦皇朝更專制更反動，實踐也是這樣。而第三代核心江澤民口口聲聲要繼承發揚毛澤東思想，並用大油畫描繪出與毛、鄧同列，那不是自我表白，三代核心是一鼻孔出氣，都是專制、高壓而已。而大量的文化、新聞都為這反先進的反動政治服務，試問如此，中共有何能去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呢！？幾年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評說，中共是走在歷史的錯誤方向上。從數量看，中共區區一個落後至極的政黨，更無能耐代表中國的先進文化方向。

至於“三個代表”的第三個，江澤民說：“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試問什

麼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解放”、“站立起來了”？不錯，那是對中共及少數特殊階層而言。幾十年來，廣大受苦受壓的民眾何曾受到過這樣的利益？何況目前大陸眾多“弱勢團體”，“弱勢民眾”，不是正在遭受中共的“二薦苦”嗎？！幾年來，不少城市工人因工資、退休金被拖延不發，醫療保險費激增而苦不堪言，此起彼落地示威抗議，一年之內能高達萬計，好些地區農民，反對苛捐雜稅和幹部蠻橫害民而集會示威，也時有所聞。這些不是都對“始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說最有力的批判嗎！？如果不是中共軟硬兼施並見效，這眾多抗議活動，可能早已聯成為另一次“六·四”民主運動了。

從以上歷史、現實去分析，這三個方面幾乎包含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整體，無疑須要政府合理、適度的領導、管理、組織和推動，但無須任何人、任何政黨去充當它們的“代表”。客觀規律表明如此，為何江澤民竟要費九牛二虎之力，非把“三個代表”納入黨章不可？而中共十六大集所謂政治、文化、經濟菁英於一堂，而他們的大多數卻盲從地舉手通過，豈不令局外人費解。其實，祇要除去“代表”兩字，把它們列入政府工作計劃即可。

權令智昏我什麼都可代表

“三個代表”真是“創新理論”嗎？答曰是也不是。江澤民自詡中共要始終作這三方面的“代表”，就此點說確實堪稱“創新”。至於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在馬恩列斯的理論中，在前蘇共和中共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相應言論中，早已有反覆論述，那就輪不到他去創新了。

先說那第一個“代表”吧。1950年，正是中共恢復國民經濟時期，有些報紙曾發出這樣的號召，要把國民黨留下的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發展生產力是我們的中心任務。1956年中共八大公告中特別強調，當前，我國先進的生產關係（註：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生產力落後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今後，我們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先進生產力。這些論點的思想本質，同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含義，基本一致，具體說法，祇是因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至於“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江澤民解釋說：“發

統治者需要什麼

他們就製造什麼

從張藝謀這一次
玩出了原形說起

梁
衛
星

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也是我們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他說得不少，其實就是要達到“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從思想上精神上正確武裝和不斷提高起來。（註3）這種以黨的文化、思想武裝群眾的論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時代的思想”（大意）。毛澤東也曾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思想一律，行動一律，輿論一律”。江澤民的代表先進文化說，同他老祖宗以上的論述，不是存在著微妙的異曲同工之處嗎？何來創新之有？至於“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說，馬列毛老祖宗就說得更多了。1917年，列寧為否定克倫斯基領導的走民主憲政道路的臨時政府，高呼為解放水深火熱中的俄國無產階級而武裝奪權，實行馬克思一再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效法列寧，也高呼要解放被壓在“三座大山”底下的中國人民，因而掀起內戰，揮舞槍桿子、筆桿子這雙槍，奪取了中華民國政權。為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在革命與執政過程中，毛澤東更不斷高唱“為人民服務”、“關心人民利益”這等高調。江澤民步其後塵，拾其牙慧，在這點上又有何創新！？

“三個代表”內容的主導思想，既來自馬列毛，而老祖宗生前那一番宏論，受歷史實踐與發展檢驗，證明部份荒謬，為害甚烈；部份無法兌現；部份祇能局部實現。這類宏論既言而無信，明智者紛紛摒棄它。但不願政改、仍憑著老祖宗覆轍走的中共，政治與理論已走進死胡同。口頭上雖還常掛社會主義，可“老祖宗”曾為它描畫過的種種美景與幻想，已一個連一個地破滅。大陸經改廿多年，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所謂平等、清廉、治安好、高就業、公房、公費醫療等，不是消失，就是大打折扣。頑固不化不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江澤民之流，雖然不肯放下舊招牌，但無從再美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向黨內和民眾大發激勵人心的宏論，祇好拾起“老祖宗”常談並補充新內容，湊成“三個代表”，並自我給予定位為“立黨之本”的“創新理論”，將之納入黨章。“北京觀察”專欄作者雲上風，2002年11月18日發表《三個代表在美國》這篇短評，寫道：一位年逾80的中共老一位理論家說，如果把“三個代表”往自己臉上貼，是“厚顏無恥”。（接142頁）

編者按：如何認識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精英知識分子”，也就是為中共所批准、所欣賞、所一再賞賜的“知識精英”們，和他們作為中共專制統治者之幫忙、幫閑、甚至是幫兇之本相，特別是他們“一旦為共產黨所不要、卻一心想要共產黨的本能”，本刊以為，這篇文章值得一讀。

我對大肆炒作的東西一向缺乏興趣，對張藝謀更無興趣。這個人從沒能給過我哪怕一點點驚喜或震撼。

因此，我對《英雄》一點熱情都沒有。當網上罵聲鋪天蓋地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對張的揣測又一次應驗了。我沒有任何失望，有什麼可失望的呢？這個人還能拍出什麼好東西出來嗎？

然而，我終於還是看了《英雄》，又是朋友的盛情要挾。他是一個張迷。我看過的張的片子幾乎全是他強行提供的。而且全都是千辛萬苦弄來的盜版，盛情難卻，就當是消遣吧。可是，這一次我卻一點消遣的感覺都沒有。我感覺吃了一隻蒼蠅，難受之至。我

向來是不擅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精英們”的，但每次又都證明，我還是過於天真了。我似乎永遠都想像不到：那些總是以精英自居的中國人，究竟有多麼無恥與下賤。

的確，這一次張玩得太過火。他居然玩出了原形。他居然把電影當成了純粹的宣傳工具，迎合的對象，自然是不勞而獲為富不仁而又炙手可熱的權貴階層及其意識形態保護傘。

看完電影，我很久不舒服。我的眼前時常浮現出影碟上的一行字幕：說來好笑，不是任何一句臺詞，而是片頭上的一行大字——中國正宗盜版公司。這一行文字，使我意識到：中國人的智慧實在非同尋常，很搞笑是吧？但它卻又一針見血地給我們偉大的張大導演定了位。張大師的的確確乃一正宗盜版公司。回顧他拍的那些濫片，竟無一不是用電演語言複製當時流行的思想文化潮流或主流意識形態，以迎合所謂的思想精英或權貴階層及統治者。時代流行什麼，他就盜版什麼；權貴們需要什麼，他就複製什麼；而時代當然是“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的時代；張大師可真是與時俱進啊！

一、《老井》、《紅高粱》

《老井》（編按：此指電影老井，非指鄭義小說原作。）與《紅高粱》的時代，屬於文化尋根思潮席捲大江南北的時代。不能說尋根文化思潮在 80 年代中晚期不具備進步的思想文化意義，然而，這樣的進步意義是要大打折扣的。在表面上，他有一點類似於新月詩派與國民黨的關繫：小罵大幫忙。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尋根返祖的潮流可說比比皆是，幾乎每一個動亂年代之後，都會興起這樣的尋根思潮。

這些尋根思潮從根本上說，**要麼為統治者尋找其統治的合法性新依據**；要麼為統治者前段時期的荒唐統治尋找有力的藉口；要麼為處於惶恐中的知識精英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緩解精神危機，**實質上仍是為逃避自己的良知與責任尋找心安理得的理由**。可以說：中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尋根熱情，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中國每一急須變革的時代，保守力量強大之極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說：五千年治亂循環的歷史，也是奴隸或奴才們尋根與尊根交替的歷史。

所以，中國任一時代的改革幾乎都以一種奇怪的形態告終：往往改革的是外殼，而整合改革後思想文化與政治倫理秩序的依舊祇是傳統文化。祇不過每一時代的這股傳統文化整合力量或有不同。比如，孔子企圖用以整合他那一時代的文化力量是周禮，漢初是黃老之道，漢武帝時代是儒術。這些傳統文化，對每一時代崩潰分裂的社會文化政治倫理秩序的整合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問題是，中國的思想家們從沒能想過中國文化之根究竟是什麼？當然，每一種文化學說都有自己的道，但這種道是不是終極，似乎不言自明，無須追問。

這根，應否批評，也從沒人想過。往往是這一時代需要此種文化整合力量，就將此奉為圭臬；那一時代需要彼種文化整合力量，也將奉彼為圭臬。結果總是那幾種文化思想在互相攻訐，其勢力因時代不同而此消彼長。思想家們從沒有想過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對這些傳統文化作整體的審視；更沒有想過，這些傳統文化其所謂的終極之道，在現實層面與勢的關繫，究竟是誰占上風。是以，每一時代的變革，其結果都是這些更緩解甚至消除了專制皇權與獨裁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從而無一不為統治者所接受甚至恩寵有加。

80 年代中後期的思想文化尋根思潮依舊循此老路。當中國的思想文化精英們把眼光投向遠古、投向民間時；無論他們是服膺還是批評，其實都緩解了黨國統治的合法性危機，為黨國的糟糕統治尋找到了有力的藉口。

傳統文化禍國殃民嗎？是啊，如此流毒深遠的傳統文化的確禍國殃民，幸而有我黨的英明領導，否則，十年動亂怎能及時制止！國民深具劣根性嗎？是啊，如此可怕的國民劣根性，十年之間陰謀陽謀出賣虐殺……怎能避免呢？還好，有本黨力挽狂瀾，否則，不知會到什麼地步！你歌頌傳統文化嗎？那好，我們就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們要穩定壓倒一切，我們要以德治國！尋根，就這樣事與願違地走向了反面，不僅在客觀上變成了為專制與獨裁辯護，甚而還加大了專制與獨裁的力度。

可見，尋根的積極意義實在要理性估價。比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玄學的盛行，實質就是當時知識分子逃避自身責任，無視司馬氏政權高壓專制統治，而形

成的時代風潮。這一股時代風潮，對司馬氏的非法統治並無任何反撥作用，甚而相反。

與此類同，興起於 80 年代的尋根思潮，尤其是隨後的國學熱，實際上迎合取悅了統治者，成為統治者掩飾歷史膿瘡，實行專制獨裁的最有力的支持。

張藝謀無疑是深知此點的。在《老井》中，他深挖狠批中國傳統文化，塑造了愚昧落後頑固保守的中國形象與各種劣根性：怵目驚心的中國國民形象。這樣的形象，既博得了深刻嚴肅的美譽，**又取悅了知識精英，更迎合了專制當局**，當真是一箭多鵰，厲害之至。

到了《紅高粱》，他又出爾反爾，同樣是塑造農村人的形象，這一次卻變成了充滿狂野生命力，並能為中國人的劣弱注入雄性激素的英雄形象。沒有人注意到，他在這兩部片子中的自相矛盾。他依舊戰績輝煌，一箭多鵰。

二、《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

90 年代，人性是中國思想文化界最為關心的問題，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先鋒文化人。在人性的旗幟下，他們肆無忌憚地釋放著下半身，並美其名曰：人的徹底回歸與解放。毫無疑問，由於文化的政治的倫理的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人之人性的確承受著鉅大的壓力，遭受著鉅大的禁錮，有著鉅大的扭曲。

所以，在 80 年代人的回歸之後，90 年代人性的徹底開放，成為了中國社會又一顯著景觀，其進步意義自有目共睹。然而，當中國人狹隘地將人性的回歸與解放，純粹理解成性的開放時；我們能不能說，人性同樣遭受著深重的禁錮與壓抑呢？沒有人這樣想。他們盡情地為下半身的赤裸歡呼著。

張藝謀又一次抓住了這股熱潮。在這兩片中，他不僅拍性，而且還拍亂倫，拍爭風吃醋。與其說他是在批判性的異化與人的淪落，不如說他是以其為佐料，以迎合人們窺視的慾望、狂亂的夢想。他又成功了。一般人當然喜歡看。誰不喜歡看性呢？知識分子更喜歡看。他本來就是拍給這些人看的。目的當然是獲取其認同，甚而成為他們之中的精英。後來不是有作家專門研究張的嗜好去寫小說，以期一朝入張眼，身價便倍增嗎？而這一切對統治者來說，不也是一種

變相的歌頌嗎？**影片的 20、30 年代背景之設置，對 20、30 年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誣衊及糟蹋，實在是獨具機心，無恥之尤。**對比之下，黨的英明偉大不正蘊含其中嗎？

三、《秋菊打官司》、《活著》、《一個都不能少》

如果說此前階段的張藝謀以批判起家，通過批判成就了其在國人心目中、尤其是那些他其實打心眼裡瞧不起的精英們心目中廉價的大師地位，**也讓當局比較滿意；那麼從《秋菊打官司》起，他便開始了公開的歌頌。**張藝謀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此前，他所做的一切為他贏得了精英甚至大師的殊榮，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視；然而，批判畢竟是戴著鐐銬跳舞，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拍錯馬屁，那麼多年處心積慮建立起來的基業就有可能毀於一旦。

如今，他對精英們的利用達到了目的。他沒必要再把精力耗在他們身上了。而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此前的批判，如果有文人深文周納，給他一個罪名也是現成的。這麼多年看各方眼色行事實也夠累的。哪兒比得上歌頌來得乾脆。**那些所謂的精英，其實也都是些名利之徒；**如果有了尙方寶劍，再給他們一點顏色，他們還不屁顛屁顛的！於是就有了**歌頌階段**的創作。

《秋菊打官司》直接配合了當時黨國對中國式法制建設的號召。其對黨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歌頌，如願以償地為他贏得了當局的讚賞。然而，緊接著的《活著》卻使張大師遭遇了出道以來最大的滑鐵盧。

這其實是一個天大的冤枉。《活著》遭遇封殺，一定是張大師萬萬沒有想到的。要知道張大師為黨國真是用心良苦啊。拍《活著》的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矛盾正日益尖銳，官僚資本主義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資產，農民基本全部破產，下崗工人遍佈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敵對情緒與日俱增，苦難……苦難……觸目驚心的苦難，中國其實成了一個隨時可以爆炸的火藥桶。憂黨憂國的張大師急啊，於是便有了《活著》。

這部電影取材於另一個正在走向墮落的先鋒作家余華的同名作品。和原作一樣，電影塑造了一個在無窮無盡的苦難中，逆來順受、安分守己、樂天知命的奴隸形象。毫無疑問，**張拍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

苦難中的人們漠視並遺忘苦難，平和沖淡與世無爭與世無怨地活著。這部片子其實宣揚的是徹頭徹尾的奴隸甚至是奴才哲學。張大師當然希望這樣的哲學，能使苦難深重的人們徹底消泯內心深處的絕望與怒火，像蟲子一樣活著。祇有人們像蟲子般活著，黨國的江山才能穩如磐石，張大師也才能永遠做他的社會精英！

然而，張大師這一次的一腔苦心卻被當成了驢肝肺，張大師冤啊。那麼張大師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不然，也不至於拍錯了馬屁。張大師錯就錯在原搬了小說中的時間跨度。那是小說啊。電影是視覺形象。一旦公映，可是要入全國人民之眼的。而電演裡涉及到了太多的偉光正時代：那不是不僅沒法讓人們忘記現實的苦難，反而還要人們也記起往日的苦難嗎？更何況這苦難又與我黨有關呢？真是大師千慮必有一失啊！

挨了一悶棍的張大師，爲了將功贖罪，表達赤誠，立刻拍了《一個都不能少》，歌頌黨的人道主義，歌頌黨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歌頌黨的英明政策，歌頌社會主義優越性。

危機總算過去了，但張其實心有餘悸。他一直在想著怎樣成爲黨國要人。這一段時間，李安的《臥虎藏龍》給了他深刻的啓示。其實，張的電影從來就沒有什麼獨創。他的每一部片子後面都有一個或數個國內外其他名導演的影子。這一點幾乎和中國 80 年代後成名的作家一個德性！這一次，他要讓偉光正夢中都笑出聲來。

《英雄》於是出世了。

四、《英雄》

關於《英雄》，我其實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大家有目共睹。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治宣傳片，有點類似於希特勒的御用電影人所拍的片子。他給暴君安上了英雄的王冠。他毫不隱諱地叫囂著天下一統的專制王權思想。他給暴力、給殘殺、給血流成河、給屍骨如山尋找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和平。

張大師果然厲害。他這一招既歌頌了“偉光正”的基本政治體制，又支持了其現行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而且還爲他們的所有恐怖與暴力行爲，找到了合理合法天經地義的理由。張大師是如此急於表白忠

誠。他甚至取消了故事情節。他不能不這樣做啊：因爲祇要有情節，就有可能產生歧義。張大師怕呀。再說，拍申奧片多風光啊，那可不是誰都能拍的。他還沒從那種純粹的宣傳激情與君恩深重的感懷之心中走出來哩！可憐了幾個好演員。他們被張大師當成了邀功請賞的工具。不獨如此，張大師還似乎在拍旅遊風景區的廣告，以爲黨國的繁榮盛世招徠更多的遊客。實在厲害！

夠了，不用多說了，回顧張大師的導演史，我們可以說，他從一個所謂的先鋒導演，變成一個赤裸裸的御用電影（關？）人，一點都不偶然。因為他骨子裡從來就是一個無恥的奴才，從來就是以民眾、以知識精英、以流行文化思潮作爲工具，以取媚邀寵於當局。也正是因此，他其實是這 20 年來，中國流行文化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最盡職盡責的複製者。

張藝謀不過是我的一個個案研究而已，類似於張藝謀的文化人還不知有多少。

嗚呼哀哉！

中國政經新辭典

申雪

（續）

三峽工程：人定勝天的“釣魚”工程。中國共產黨的里程碑，中華民族的墓誌銘。

國有股減持：財政部長的“特大利好”，中小股民的特大利空，股市的特大股災，政府的特大失策，總理的特大失職。

16 大：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表演的老把戲。前朝欽定或隔代欽定的登基大典。

政策和策略：政策是關抽屜，策略是拉抽屜；政策和策略就是來回拉抽屜。

我的太陽：江主席保留曲目。歌壇的萬幸，意大利的不幸。從此，意大利歌曲將蒙受不白之冤。

髮廊：色情業的過渡階段。遍佈全國城鎮，為拉動內需的支柱產業。

紅包：特指病患術前送給醫生的牛皮紙信封。其中鈔票數目可反映出病人對自己生命的期望值。

一夜情：互聯網的產物。特指素昧生平的男女在網上敲定的週末風流快事。

盲流：泛指在城市中以偷為主，以搶為輔的無產者。也叫流氓。

商品房：充滿詐術的迷宮，官商勾結的漩渦。廣告語為：請君入甕。

知識精英：特指賣身投靠權勢集團，以學者名義行騙的皮條客。

上海幫：並非指說儂語的人。特指在上海從政發跡，直升中央執掌大權的新時期火箭式幹部。

收費廁所：專門破壞城市公共衛生的公共衛生部門。導致城市地下通道、綠地常有便溺尿溺。城區迅速變為臭城。

恐怖自殺：有別於恐怖攻擊。常見於春節前工地塔吊的懸臂上；民工以自殺脅迫老闆補足欠薪回家過年。

海龜：早先指海外學成歸國人員。現指從海外歸來在大陸競爭失敗，又回游海外的學業有成人員。

會計師：專門配合國家、部門做假賬的行當。總理題詞：不做假賬。後經多方考證，疑是總理漏失一字，應為：誰不做假賬。

穩定壓倒一切：執政黨的座右銘。歷史上能夠壓倒一切的祇有法西斯。

國企：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拜把兄弟。專門從事使國有銀行壞賬增多的生產活動。

拆遷法：使大城市老城區居民徹底破產的一種方法。可導致三代返貧。請參考辭海條目：“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利息稅：銀行強行從老百姓保命錢中抽取的血汗錢。

古都風貌：指拆毀真古董後營造的假古董。

網警：專門修補防火牆，與大陸網民捉迷藏做遊戲的電子狗。

買斷：企業對工人強制性的行政措施。工人工作幾十年後被迫補簽的賣身契。

臺獨：軟硬不吃，文武不怵，特立獨行，蒸不熟，煮不爛，響噹噹的一顆銅豌豆。

三個代表：說的全是反話。愚人節中國共產黨獻給全國人民的黑色幽默。

豬市：相對於“牛市”、“熊市”。專指中國股市。中國總理姓朱，因此曰“豬市”。意為政策市。

香港記者：“比華萊士差太多，無知，幼稚”，普通話說不利落，專講粵語的人。

特首：指特別欽定，沒有競選對手的特區行政長官。

網特：監視網上言論，截留電子郵件，有偷窺癖的變態狂。

防火牆：防止西方精神污染，保大陸一方淨土的網絡萬里長城。

代理服務器：網上游擊隊用來爆破防火牆的武器。可在防火牆上開天窗，看到外面的世界。

癲人：能對不動的物體或移動的物體進行連續爆炸的瘋子。如石家莊的靳如超芳林小學黑衣人等，統稱癲人。

法輪功：原產中國大陸，遍佈世界各地，用特殊材料造成的人。

綠帽子：長安街兩旁高層建築上的綠屋頂。俗稱王八蓋。為陳希同主政時搭建。

上訪：公民向上級機關反映意見的犯罪行為。有標語為證：“嚴禁黨員上訪，打擊集體上訪，遣返個人上訪”。

辦實事：政府部門早該辦拖著不辦拖不下去又不得不辦的事。往往是屁事，如翻修公共廁所。

豬權理論：對“人權就是生存權”的精闢闡釋。豬祇要生存，人卻要思想。

下崗：指失去工作又找不到工作，對生活絕望的生存狀態。

主旋律：極權專制下奴僕為主子譜寫的頌歌。

中央黨校：馬列第一神學院。專門從事造神祭神運動。

中國特色：“特色”即特權。中國特色即維持極少數人的封建特權。

(完)



在成其林先生追

悼會上的講話

辛灝年

—2003年1月31日於美西

(辛灝年該文與成其林先生遺稿臨時撤於下期刊載)

(上接第98頁)

道統方面，竟然遠遠不如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南韓、日本，更不如台灣。中共打著中國人的旗號，甚至藉民族主義來絡籠和迷惑青年和一些糊塗的老人，但販賣的還是行之不通的「馬列」，使中國成了失去了「中華魂」的中國。十三億中國人正處在迷途之中，並在迷途中經過五十年受騙，如今已經覺醒。

六、世界萬物歸一，才是人類和平之源

孔孟之學對中國人民有甚麼用呢？孔孟之學究竟有甚麼優秀呢？通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是基督徒，把西方「基督文明」的核心——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與中華文明結合為一。他的民主、民權、民生和他提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他提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不都是孔夫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基督的人類皆是上帝之子，天下皆兄弟姊妹，生來平等，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想結合嗎？中共把孔子的「天下為公」變成一黨之私，把「中庸」、「仁愛」變成「鬥爭哲學」；把

「信」變成「謊言世界」；把公平正義變成人情世故後門成風；把仁政變成暴政；把孔子的人人平等變成特權至上，人分九等；把孔子的自由思想變成言論專政打壓封殺；把孔子的「忠」搞成盲目崇拜、逆我者亡和不忠於職守、違法亂紀、翫忽職守；把「孝」變成不認爹娘，爲了愛毛而逼死父母、鬥爭父母、斷絕父母之情，在大陸不是比比皆是嗎；把溫良恭儉讓變成不仁不義不信互相敵對。把「四海之內皆兄弟」變成民族主義膨脹，把「禮儀之邦」變成蠻不講理，強加於人。子曰：「愛人，知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中共則諱疾忌醫，視善言爲惡語，最喜歡鎮壓和封殺。這些哪有一點中華人的道統？把中國人變成沒有「中華魂」的中國人。以上所說只是中共的一廂情願和他的罪惡用心，實際上孔子的思想，中華人的祖傳道統，早就浸入華人的靈魂。雖然在中共的大中小學的教科書裡把中華道統排除在外，在民間卻是無法除盡的。現代的中國人總是苦難不絕。趕走了「鬼子」來了「狼」。孔子信天(應當是指上帝)，通道，他說道是人須庚不能離開的，就在你的週圍。信「地」，愛世人，爲世人；基督，是上帝之子，世人的朋友，人人平等，天賦人權，自由意志，「愛」撒「人間」，從罪中拯救一切人類。如果說孔子《論語》重一個「地」，講人生之道，但他是要造就一個「天人合一」的人間世界；《聖經》重在上帝，宣告神的旨意，最終是要造就出一個神人合一的人類社會——新耶路撒冷。從中外人生「天書」——《聖經》、《論語》來看，不論講天，不論講地，都是要達到陰陽合一，萬物歸一，宇宙歸一，天地合一，天人合一，人神合一，人類歸一。這個一就是初，就是始，就是源，就是祖，就是老子的「道」，就是孔子的「天」，就是耶穌的「上帝」，就是「神」。神就是愛，就是華人心中的「老天爺」(並非物質的偶像，而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力量，無形而客觀存在的大能)。這難道不正是人間「滄桑正道」嗎？

七、中西融合的「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台灣堅定不移地持守國父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核心是民權人權，講民族也是以人權爲核心的民族共和，民族平等)理念，如今經過五十年，經濟騰飛，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充滿社會人間，把中華

文化中的優良者發揚光大，造福了人間。人民生活富裕，精神道德不斷升華，人間友愛和諧。這正是「中華文化」由「三民主義」發揚光大，世界文化融合歸一的結果。兩千多年來時而以「亂，鬥，恨，分」為宗的中國人，如今在台灣，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實現了總統直選，近百年的老「國民黨」竟不用一槍一炮，由人民一人一票做了決定，平平安安下了台，下台的還向上台的表示祝賀。這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大事？這一切都是從哪裡來的呢？答案不是很清楚的嗎？今日的中華文化之魂不在大陸，而在台灣。我不是說台灣甚麼都好，我是說社會的文化主流，道德主流。

八、否定孔子，就否定了「中華文化」

如此，我才明白了，為甚麼當年在民主與專制撕殺最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即使是追求現代思想最激進的民主鬥士們，提出的也只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口號的真諦；而不是後世那些反「中華文化」的中共叛逆者們，採取了全面否定打倒孔老夫子的態度。想消滅孔子和他的思想，就是想毀滅「中華文化」。這應是很清楚的邏輯結論。中共幾十年來，用根本不適合中國文化傳統的西方落後思想「馬列」改造中國人，想把中國人改造成沒有中國人靈魂的中國人，失去了中華內涵的中國人。中共不會成功，必然像七百年前「蒙元皇朝」和九十年前「滿清皇朝」，最終都要融化在中華文化海洋中，不是為中華文化所戰勝，就是為中華文化所拋棄。

九、台灣經驗是中國大陸民主追求的榜樣

台灣的實踐經驗，具有全世界華人(包括大陸十三億人)的未來理想追求的現實意義。都是華人，台灣能實現的，大陸中國也應當是完全能實現的。「馬列理論」是要消滅中華文化，是搞「階級鬥爭」的分裂哲學，是殺人鬥人整人的「災難哲學」，是「中華文化」和「基督文化」最兇惡的反叛和破壞者。台灣問題絕不是統獨問題之爭，而是復興還是消滅中華文化之爭。目前海外有一小批被中共統戰收買誘姦又自作多情的商人，搞甚麼「和平統一中國」的騙局，又是開會又是通電，在全世界造勢，製造假像，欺騙輿論。這明明是中共兩手中的一手，公開武力恫嚇和暗中陰謀拉攏收買，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沒有深受中共之害的「中華人」，以為對兩岸和平作了甚麼好事。

你們可知道？你的呼號成功之日，就是你作為「中華人」開始變成「馬列」徒子徒孫之日，如果不服，必置於死地而後快。中共五十年統治史，幾乎是每天都證明這一事實。最近以來，剛下台的國民黨，不首先閉門思過，棄舊圖新，整日在幹出一些讓中共「漁翁得利」的鬧劇，真是不知是被哪一個中共的特工(賴星昌乎？姬勝德乎？)搞混了頭，十分值得警醒。台灣民主是全世界華人(包括十三億大陸人)最寶貴的共同財富，應十分珍惜和護佑，以便有朝一日，把台灣民主政治推及全大陸。當今你有本事，讓中山先生的理念在大陸全面實現(中共至今還是掛著孫先生像)；你有本事讓中共認同，要救中國只有「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只有如此才能談統一。那才是九十年老黨應全力以赴的大事。全世界華人，包括大陸中國全體華人，現在當務之急是萬眾一心，為「復興中華文化」而團結奮鬥，一切倒行逆施者，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如當年千千萬萬為中共賣命最後怨死者一樣，去愧對你們的子孫吧 (2000/12/15 第六次修改稿)

(上接第 136 頁)

江澤民既然默許他與毛、鄧同列的“三代核心”油畫在大陸四外張揚，那麼讓他的“創新理論”、“三個代表”小冊子發行天下，就不足為奇了。

與時俱進和與權俱進

江澤民說“三個代表”的理論創新是“與時俱進”，此話頗有道理，不過應加一句，它也是與“權”俱進的。

不少評論曾指出，“代表先進生產力”論中有一點含義，江澤民是為吸收資本家入黨，擴大黨的階級基礎，修改黨的性質，並為已成暴發戶的太子黨大開入黨之門，並晉升其中被認為政治可靠者到黨、政領導層，通過十六大這場大秀，確實證明資本家也已經名正言順地當上黨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了。而江氏這一論不愧為“與時俱進”

因為，改革開放中，私、民營企業、個體戶(微型私企)發展神速，據大陸工商聯反映，到2001年末已達203萬多戶，就業人員27263萬人，年產值1萬9636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經濟年生產總值20.46%，占全國零售額達47.1%。2

002年私營經濟又有較大的增長，消息說，去年它的年產值已超過大陸國民經濟一年總產值的四成。當它更壯大更成熟，並出現大批政治視野開闊、又有組織力的資方人員，民主自由訴求也會隨之增長，那將成爲中共在政治競爭中強而有力的對手，甚至發展到會威脅現政權的安危。中共有見及此，早些年已秘密在私營企業建立它的基層組織，發展黨員，其中也有新興資本家。當已成事實才予以公開。據說目前私營企業中的黨組織已達十萬個。在這樣前提下，江澤民以“三個代表”的理論去肯定它，並列入黨章以鞏固它，其目的就是要通過間接的途徑去控制私營經濟。此外，另兩個“代表”，也是爲了在新時期新形勢中加強對文化界和政府系統的控制。正如有的評論指出，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論，有意加強中共同經濟、文化、政治三方面所謂“精英”人物結盟，同時加強對這三條戰線的控制力，以維護中共一黨專政。因此說“三個代表”也就是“三大控制”，是“與時俱進”也是“與權俱進”。但這並非江氏的創舉。中共建黨初期加入國民黨，抗日時期與國民黨第二次結盟，亦是以上所述兩種“俱進”的生動表現。不同的是，上兩次是爲了“奪權”，眼前是爲了“固權”。既固中共的權，也固江氏“大袍哥”的權，不論是顯形還是隱形，不論是眼前還是長遠。從這點看，江澤民倒還有點深謀遠慮。但大陸未來的發展，是否會依照他所想的軌跡而去，那就有待拭目以看了。

（接右邊）

馬威龍	少將旅長	廣西	陣亡（河南）	
李昌齡	少將旅長		重傷（河南）	黃埔三期
毛齡翼	上校團長		陣亡（河南）	
汝鑫	少校營長	甘肅	陣亡（河南）	軍訓一期
於宗渭	上尉連長	山東	陣亡（河南）	軍校九期
崔清祥	少尉排長	江蘇	負傷（河南）	總隊學兵
陳茂松	上尉連長		陣亡（河南）	

附註：

- 1、上述陣亡、負傷姓名、級職僅就個人認識所知而言。
- 2、表內所謂「殉國」係指撤退時不能過江而被敵人殺害，以及投江自殺以死報國者而言。

附總隊參加京、滬及蘭封諸次戰役中幹部傷亡情況

姓名	級別	籍貫	陣亡殉國地點	備註
謝程瑞	上校團長		殉難（南京）	
秦士銓	上校團長		殉難（南京）	軍校
李義伯	中校軍需	安徽	殉難（南京）	
羅玉峰	少校營長	湖南	紫金山三峰陣亡	軍訓一期
周士泉	少校營長		白骨墳陣亡	
歐陽俊	少校營長	湖南	紫金山二峰負傷	
傅守彝	少校營長	山西	殉難（南京）	
申博施	少校參謀	河北	南京被俘殺害	軍校九期
溫秉鐸	少校團副		明故宮機場陣亡	
劉南溪	少校營副	安徽	殉難（南京）	軍校六期
李維州	上尉營副		孝陵衛西山陣亡	
王鏗千	上尉連長		孝陵衛西山陣亡	
湯國俊	上尉連長		孝陵衛西山重傷	
胡英	上尉連長		紫金山三峰陣亡	軍校八期
張仲羨	上尉連長	河北	中山陵園陣亡	軍校九期
戴鴻鈞	上尉排長	安徽	江中負傷	軍校九期
喬夢鶴	上尉台長	遼寧	殉難（南京）	軍校九期
施國藩	上尉連長	福建	殉難（南京）	軍校九期
施振強	上尉連副	河北	殉難（南京）	軍校九期
李承業	上尉排長	浙江	殉難（南京）	軍校九期
賈維翰	上尉排長	陝西	殉難（南京）	軍校九期
劉冠軍	上尉排長	陝西	陣亡（南京）	軍校九期
劉效吾	上尉連長	綏遠	陣亡（南京）	軍校九期
徐乾英	上尉連長	山東	陣亡（南京）	軍校九期
華有睿	上尉排長	陝西	陣亡（南京）	軍校八期
崔光明	上尉排長	河北	陣亡（南京）	
陳斯健	上尉連長	福建	殉難（南京）	軍校八期
郭懋德	上尉排長	陝西	陣亡（南京）	軍校九期
呂鶴年	上尉連長	山西	負傷（南京）	軍校九期
於祥生	准尉排副	河北	陣亡（南京）	總隊
王俊	上尉連長		陣亡（南京）	
李昌齡	上校團長	山東	負傷（上海）	軍校三期
劉殿卿	少校團副	河北	陣亡（上海）	軍訓一期
張洪九	上尉連長		陣亡（上海）	軍校八期
晏澤英	上尉連長		陣亡（上海）	軍校八期
屠仁昶	中尉排長	湖北	負傷（上海）	軍校九期
陳裕廉	少校營長		陣亡（上海）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 22.00；加拿大為 \$ 26.80；其它地區為 \$ 39.80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_____

我的郵寄地址是： _____ (姓名)

支票抬頭請寫： _____ (街名)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_____ (城市) (州名) (郵編)

(縮寫：MCHS) _____ (電話) (email)

《黃花崗》雜誌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e-mail : hgang2001@hotmail.com

因最近有不少讀者來信來電詢問如何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辛灝年先生的——

《誰是新中國》一書，本刊特回復如下：

1、《誰是新中國》定價：38 美元；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八折：**30.40** 美元；美國銷售稅為 **2** 美元，其它地區免稅。

2、郵資自付：美國為 **2.81** 美元；歐洲空運為 **9** 美元，海運為 **3.31** 美元；亞洲空運為 **9** 美元，海運為 **4.46** 美元。

3、美國藍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BSPH) 信箱：

**P.O.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USA**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黃花崗雜誌免費代購

請聯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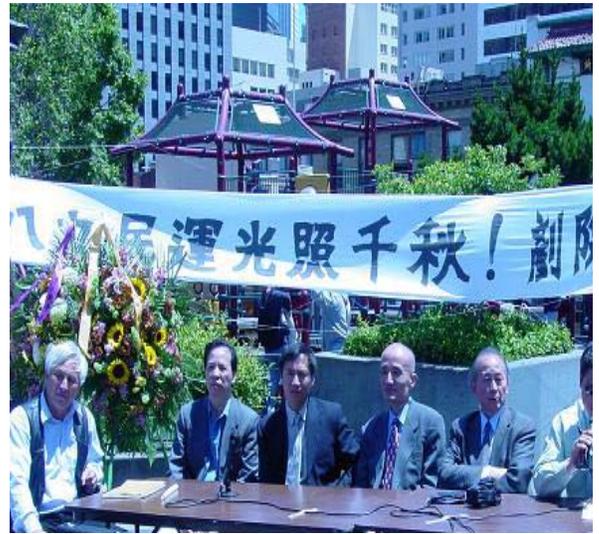
誰是新中國
訂閱

本期編成，我們頗有感慨，也頗覺歉意。由於本刊來稿太多，有許多的好稿子，我們無法立刻予以發表；還有許多的好文章，我們又不得不一延再延。雖然，大陸讀者，臺灣讀者，甚至是大陸、香港、臺灣一些大學的許多年輕讀者們，都一再地來信來電，希望我們能夠儘快地將黃花崗季刊改成雙月刊，甚至是單月刊，但是，一是由於財力，二是由於人力，而使得我們沒有辦法立即實現願望。我們畢竟只是靠民間一點有限的捐款來艱苦支撐的。雖然在編發上，我們曾採取“下期預告”的方式，懷著負疚的心情和巴不得讓讀者早一點知道的念頭，來預告某些好文章。但是，本期就是對這些已經發過預告的文章，和其它已經拖延了很久的稿件，也不能全部兌現。其中一個原因，是編者考慮到剛剛從大陸投稿本刊的“南京保衛戰”長文，因作者已九十一歲高齡，故優先立即發表，尚望其它作者諒解。另外，本期還曾編輯了一組紀念“六四”十四週年的文章，但一是考慮時已逝矣，二是稿件太擠，三是考慮到本刊不是民運刊物，所發表文章涉及海外民運內部的問題，頗不適宜；加之本期已經刊載了大量紀念六四的圖片新聞；所以，只好忍痛割愛。在此本刊特向上述作者致以深深的歉意。所幸者，這些文章，有的投稿之日或之前，即已在網路發表。總之，本刊在編輯的過程中，確有許多對不住作者的地方，祇希望作者諒我力甚綿薄，本刊同仁將不甚感激之至。

編後致歉



加拿大卡爾加里華僑紀念“六四”十四週年



舊金山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舉辦紀念“六四”活動



黃花崗副社長易丹軒在華府“六四”紀念會上



法國知名人士在巴黎參加“六四”紀念活動

全球六四英烈十四週年 祭

芝加哥紀念六四14周年燭光音樂講演紀念會 左二為主持人楊逢時博士，右一為歷史學者辛灝年



當代老媪歌

配詩見內頁第六十六頁

阿冰作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NEW YORK, NY
PERMIT NO. 5135